12 | 社会思想丛书
刘 东 主编



Gossip Men

J. Edgar Hoover, Joe McCarthy, Roy Cohn, and the Politics of Insinuation

八卦男

胡佛、麦卡锡、科恩与影射政治

〔美〕克里斯托弗·M. 埃利亚斯 著
何文忠 袁嘉婧 于春丽 译

商務印書館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重审谣言、传媒与政治交织的八卦现场，尽显历史的悖论与黑色幽默。

在貌似沉郁严峻的历史中，难登大雅之堂的“八卦”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社会的飞速发展、技术的日新月异，如何使信息成为一种危险的权力？八卦的制造与传播对“八卦中人”是机遇还是陷阱？

埃德加·胡佛、约瑟夫·麦卡锡和罗伊·科恩，俱是20世纪中叶美国的政坛风云人物，出身各异，却肩负一项共同的“使命”：努力成为无可指摘的“美国男性标杆”，借此获取并巩固有形与无形的种种权力。冷战大背景下，乘着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东风，他们借助性别、身份、国家安全等一系列话语，有意无意地操控着名为“八卦”的武器，登顶或坠落于波谲云诡的名利场中……

ISBN 978-7-100-23545-7



9 787100 235457 >

定价：108.00 元

12 | 社会思想丛书
刘 东 主编

Gossip Men

J. Edgar Hoover, Joe McCarthy, Roy Cohn,
and the Politics of Insinuation

八卦男

胡佛、麦卡锡、科恩与影射政治

〔美〕克里斯托弗·M. 埃利亚斯 著
何文忠 袁嘉婧 于春丽 译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卦男：胡佛、麦卡锡、科恩与影射政治 /（美）克里斯托弗·M. 埃利亚斯著；何文忠，袁嘉婧，于春丽译 .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 --（社会思想丛书）.

ISBN 978-7-100-23545-7

Ⅰ. D771.2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SK168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社会思想丛书

八卦男：胡佛、麦卡锡、科恩与影射政治

〔美〕克里斯托弗·M. 埃利亚斯　著

何文忠　袁嘉婧　于春丽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23545-7

2025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40　1/32

202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¼

定价：108.00 元

以思想为樯橹

商务印书馆（杭州）有限公司出品

GOSSIP MEN

J. Edgar Hoover, Joe McCarthy, Roy Cohn, and the Politics of Insinuation

By Christopher M. Elias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2021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总　序

刘　东

就这套丛书的涉及范围而言，一直牵动自己相关思绪的，有着下述三根连续旋转的主轴。

第一根不断旋转的主轴，围绕着“我思”与“他思”的关系。照我看来，夫子所讲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正是在人类思想的进取过程中，喻指着这种相互支撑的关系。也就是说，一副头脑之“学而时习”的过程，正是它不断汲取“他思”的过程，因为在那些语言文字中结晶的，也正是别人先前进行过的思考；而正是在这种反复汲取中，这副头脑才能谋取相应的装备，以期获得最起码的“我思”能力。可反过来讲，一旦具备了这样的思考力，并且通过卓有成效的运思，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颖结论，就同样要付诸语言文字，再把这样的“我思”给传达出来，转而又对他人构成了“他思”。——事实上，在人类的知识与思想成长中，这种不断自反的、反复回馈的旋转，表征着一种最基本的“主体间性”，而且，也正是这种跨越“代

际”的“主体间性”，支撑起了我们所属的文明进程。

正因为这个缘故，思想者虽则总是需要独处，总是怕被外来的干扰给打断，可他们默默进行的思考，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事情，从来都不属于个人的事业。恰恰相反，所有的“我思”都无一例外地要在交互的思考中谋求发展，要经由对于“他思”的潜心阅读，借助于周而复始的“对话性”，来挑战、扩充和突破心智的边界。正因如此，虽然有位朋友好意地劝我说，“五十岁之后，就要做减法”，可我却很难领受这类的告诫。毕竟，我心里还有句更要紧的话，那正是夫子就此又说过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了这种杜鹃啼血的心劲儿，就不要说才刚活到五十岁了，纵是又活到了六十岁、七十岁，也照样会不稍松懈地“做加法”，以推进“我思”与“他思”的继续交融。

这意味着，越是活到了治学的后半段，就越是需要更为广博的阅读和更为周备的思虑，来把境界提升得更为高远。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内在的企求，自己多少年来的夜读才得以支撑，以便向知识的边界不断探险。因此，跟朋友对于自己的告诫不同，我倒是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为什么文科要分为文学、史学、哲学，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还有社会学、人类学，乃至语言学、心理学、人文地理学？本是因为人类的事务原是整体，而人类的知识只能分工前进。这样一来，到最后你们才能明白，在所有那些学科中间，你只要是少懂得一个，就势必缺乏一个必要的视角，而且很可能就是那种缺乏，让你不可能产生大智慧。”

接下来，第二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则围绕着“个人阅读”与“公共阅读”的关系。自从参与了“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

界”丛书，乃至创办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我就一直热衷于这种公共的推介。——这或许与自己的天性有关，即天生就热衷于“野人献曝”，从本性上就看不惯“藏着掖着”：“以前信口闲聊的时候，曾经参照着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也对照着长年来目睹之怪现状，讲过自己所看到的治学三境界……而我所戏言的三种情况，作为一种不太精确的借用，却在喻指每况愈下的三境界，而分别属于‘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自求解脱’的小乘佛教和‘秘不示人’的密宗佛教。”（刘东：《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

不过，这个比喻也有“跛足”之处，因为我在价值的选择方面，从来都没有倾向过佛老。因此，又要把这第二主轴转述一下，将它表达为纯正的儒家话语。一方面，如果从脑化学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把我们从事的教育，看成“催化”着乐感元素的“合成”：“先要在自由研讨的氛围中，通过飞翔的联想、激情的抗辩、同情的理解，和道义的关怀，逐渐培训出心理学上的变化，使学生在高度紧张的研讨中，自然从自己的大脑皮层，获得一种乐不可支的奖励。只有这样的心理机制，才会变化他们的气质，让他们终其一生都乐学悦学，从而不光把自己的做学问，看成报效祖国的严肃责任，还更把它看成安身立命的所在。”（刘东：《这里应是治学的乐土》）可另一方面，一旦拿到孟子的思想天平上，又马上就此逼出了这样的问答：“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孟子·梁惠王下》）——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前面所讲的“个人”与“公共”的阅读，又正好对应着“独乐”与“众乐”的层次关系。

无论如何，只有经由对于一般学理的共享而熔铸出具有公共性的“阅读社群”，才能凝聚起基本的问题意识和奠定出起码的认同基础。缘此就更应认识到，正因为读书让我们如此地欢悦，就更不应只把它当成私人的享乐。事实上，任何有序发展的文明，乃至任何良性循环的社会，都先要来源和取决于这种“阅读社群”。缘此，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学者和公众的关系，就并不像寻常误以为的那般单向，似乎一切都来自思想的实验室，相反倒是相互支撑、彼此回馈的，——正如我曾在以往的论述中讲过的：“一个较为平衡的知识生产体系，似应在空间上表现为层层扩大的同心圆。先由内涵较深的‘学术界’居于核心位置，再依次扩展为外延较广的‘知识界’及‘文化界’，而此三者须靠持续反馈来不断寻求呼应和同构。所以，人文学术界并不生存和活跃于真空之中，它既要把自己的影响逐层向外扩散，也应从总体文化语境中汲取刺激或冲力，以期形成研究和实践间的良性互动。”（刘东：《社科院的自我理由》）

再接下来，第三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则毋宁是更苦痛和更沉重的，因为它围绕着“书斋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事实上，也正是这根更加沉重的主轴，才赋予了这套丛书更为具体的特点。如果在上一回，自己于“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总序中，已然是心怀苦痛地写到“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那么，再目睹二十多年的沧桑剧变，自然更受到多少倍的“恶刺激”，而这心气便觉得更加“鼓荡难平”了。既然如此，虽说借助于前两根主轴，还是在跟大家分享阅读之乐，可一旦说到了这第三根主轴，自己的心也一下子就收紧了。无论如何，“书斋”与“社会”间的这种关联，

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冲击着自己书房的深重危机感，都只能用忧虑、愤懑乃至无望来形容；而且，我之所以要再来创办“社会思想丛书”，也正是因为想要有人能分担这方面的忧思。

歌德在他的《谈话录》中说过：“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换个角度，如果我们拿“学术”来置换他所讲的“艺术”，再拿“社会”来置换他所讲的“世界”，也会得出一个大体相似的句子。也就是说，“做学问”跟“搞艺术”一样，既可以是超然出世、不食人间烟火的，也可以是切身入世、要救民于水火的。至于说到我自己，既然这颗心是由热血推动的，而非波澜不起、死气沉沉的古井，那么，即使大部分时间都已躲进了书斋，却还是做不到沉寂冷漠、忘情世事。恰恰相反，越是在外间感受到纷繁的困扰，回来后就越会煽旺阅读的欲望，——而且，这种阅读还越发地获得了定向，它作为一种尖锐而持久的介入，正好瞄准千疮百孔的社会，由此不是离人间世更遥远，反而是把注视焦点调得日益迫近了。

虽说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界，曾被我老师归结为“思想淡出，学术淡入”，但我一直不愿苟同地认为，就算这不失为一种“现象描述”，也绝对不属于什么“理性选择”。不管怎么说，留在我们身后的、曲曲弯弯的历史，不能被胡乱、僭妄地论证为理性。毕竟，正好相反，内心中藏有刚正不阿的理性，才至少保守住了修正历史的可能。正因为这样，不管历史中滚出了多少烟尘，我们都不能浑浑噩噩、和光同尘。——绝处逢生的是，一旦在心底守住了这样的底线，那么，“社会生活”也便从忧思与愤懑的根源，转而变成“书斋生活”中的、源

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正是鼓荡在内心中的、无休无止的忧思，不仅跟当下的时间径直地连接了起来，也把过去与未来在畅想中对接了起来。事实上，这套丛书将稳步移译的那些著作，正是辉煌地焕发于这两极之间的；而读者们也将再次从中领悟到，正如“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总序所说，不管在各种科目的共振与齐鸣中，交织着何等丰富而多样的音色，这种“社会思想”在整个的文科学术中，都绝对堪称最为响亮的“第一主题”。

最后要说的是，就算不在这里和盘地坦承，喜爱读书的朋友也应能想到，我的工作状态早已是满负荷了。可纵然如此，既然我已通过工作的转移，相应延长了自家的学术生涯，当然就该谋划更多的大计了。而恰逢此时，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又热情地提出，要彼此建立“战略合作”的关系，遂使我首先构思了这套“社会思想丛书”。几十年来，编辑工作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我也从未抱怨过这只是在单向地“付出”，——正如我刚在一篇引言中写到的：“如今虽已离开了清华学堂，可那个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工作过的地方，还是给我的生命增加了文化和历史厚度。即使只讲眼下这个‘办刊’的任务——每当自己踏过学堂里的红地毯，走向位于走廊深处的那间办公室，最先看到的都准是静安先生，他就在那面墙上默默凝望着我；于是，我也会不由自主默念起来：这种编辑工作也未必只是‘为人作嫁’吧？他当年不也编过《农学报》《教育世界》《国学丛刊》和《学术丛刊》吗？可这种学术上的忘我投入，终究并未耽误他的学业，反而可能帮他得以‘学有大成’。”（《中国学术》第四十三辑卷首语）

的确，即使退一步说，既然这总是要求你读在前头，而且读得更

广更多，那么至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编辑就并不会耽误视界的拓宽、智慧的成长。不过，再来进一步说，这种承担又终究非关个人的抱负。远为重要的是，对于深层学理的潜心阅读、热烈研讨，寄寓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全部未来。所以，只要中华民族尚有可堪期待的未来，就总要有一批能潜下心来的“读书种子”。——若没有这样的嗜书如命的“读书种子”，我们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指望还能拥有一茬又一茬的、足以遮阳庇荫的“读书大树”，并由此再连接起一片又一片的、足以改良水土的“文化密林”。

正所谓“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唯愿任何有幸“坐拥书城”的学子，都能坚执“即一木犹可参天”的志念。

2022 年 12 月 16 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献给我的母亲。

世间不乏流言蜚语，而其最崇高的形式，或许就是历史。二者之间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

——罗伯特·维尔尼克（Robert Wernick）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现代性图景　　23

第二章

公众视野下的职业官僚　　57

第三章

美国腹地的民粹主义政治家　　101

第四章

年轻的权力掮客　　137

第五章

丑闻作为政治艺术　　167

第六章

弧光灯下　208

后记

监视国家男性气质的经久不衰　262

致谢　276

缩略词　279

注释　281

参考文献　373

索引　396

引言

听证室内，人人汗流浃背。当天明明是局部多云的温和天气，最高气温只有 23 摄氏度，但参议院会议大厅的室温却在节节攀升。富丽堂皇的会议大厅设计容量只有 300 人，这天却涌入了 800 人。国会警察面带歉意，援引消防法规将一些听众请出会议大厅，有时甚至连国会议员也不例外。强弧光灯和电视摄像机进一步挤占了本就拥挤的空间，灯泡散发的热量让室温攀升得更高。然而，对出席本次听证会的人士来说，现场纵有种种不适，也远不及直面直播镜头乃至电视机前的两千万观众那么痛苦。[1]

这场有关“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听证会是早期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实况转播事件。麦卡锡主义得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既指他反对联邦政府中“共产主义颠覆分子”的运动，也指这种颇有争议的政治策略。[2] 四年多来，整个国家为之倾倒，麦卡锡因此吸引了数



图 1. 陆军－麦卡锡听证会期间，电视摄像机预先就位，准备直播。
图片来源：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摄影师埃里希·哈特曼(Erich Hartmann）。

百万名拥趸。在那个时代，美国最紧迫的地缘政治问题就是与共产主义斗争，其中牵涉的秘密行动和幕后交易，从麦卡锡制造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就可以窥见一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心头一直笼罩着恐惧的阴霾，即认为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企图密谋摧毁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这一威胁要求美国时刻警惕国内颠覆，而麦卡锡能够迅速掌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承诺会保护国家不受侵害。

但麦卡锡及其领导的反共运动却颇具争议。批评者控诉他践踏个人自由，迫害无辜联邦雇员，藐视公民言论，恶意捏造证据。就连共和党内部也有人公开反对麦卡锡，指责他“大肆渲染恐慌情绪和挫败感，这可能会引发全国范围内的自杀事件，终结我们美国人民所珍视的一切”。[3]

而现在，麦卡锡主义正面临最严峻的考验。美国陆军方面指控麦卡锡及其高级助手罗伊·马库斯·科恩(Roy Marcus Cohn)为杰拉德·大卫·席因（Gerard David Schine）寻求特殊优待。杰拉德既是麦卡锡

的幕僚又是科恩的密友，近期刚刚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二等兵。麦卡锡和科恩则针锋相对，指控美国陆军利用杰拉德·大卫·席因的身份，阻挠麦卡锡调查陆军中的共产党人和同性恋者。前者被认为是美国民主实践的死敌，后者也是离经叛道的同路人，颠覆特性与生俱来。

1954年4月30日下午，会议大厅挤满了人。与此同时，质疑开始转向一张照片，这是麦卡锡提供的证据。美国陆军特别检察官约瑟夫·奈·韦尔奇（Joseph Nye Welch）注意到这张照片被裁剪过，于是大声追问这张照片是从哪里来的，又是谁要求裁剪的。麦卡锡的助手吉姆·朱利安纳（Jim Juliana）坐在证人席上，汗如雨下。他面庞圆润，穿着一套松垮的西装。这张照片正是他准备的。朱利安纳一再表示自己并不知情，随后韦尔奇问道，难道他认为这张照片是“小精灵（pixie）送来的”吗？

韦尔奇的讽刺独具特色，倒比先前的讥讽更有效果。观众发出一阵轻笑，其中夹杂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意味。几个月来，一直有传言称麦卡锡和科恩其实是同性恋，两人有意为席因寻求优待，可能是因为其中一人（或者两人同时）与席因有暧昧关系。两人因这一传闻备受困扰。麦卡锡意识到了此刻观众的反应，希望避开韦尔奇的攻击，随即要求韦尔奇就“小精灵”一词给出解释，并暗示韦尔奇可能是这方面的老手。韦尔奇回答说，“小精灵是小仙子（fairy，在英语中也指男同性恋者）的近亲”，并询问麦卡锡这一解释是否让他“想起了什么”。[4] 观众爆发出一阵哄笑声，此时电视镜头拉近，画面从整个会议大厅切换为韦尔奇、麦卡锡和两人的邻座。观众可以看到麦卡锡暗笑了一下，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朝韦尔奇翻白眼。而坐在他旁边、

年龄不过 27 岁的科恩，眼袋突出，强装微笑，却难掩沮丧的神情。他坐立不安，双肩塌缩，目光低垂，盯着面前的桌子，抑或是自己的双手。

***

长期以来，陆军－麦卡锡听证会都被视为战后美国政治的关键时刻：麦卡锡和他那过激且大多毫无根据的指控在全国人民的良心面前被击倒了。那是在听证会快结束时，韦尔奇向麦卡锡发出了著名的质问：“先生，难道您不讲一点体面吗？”然而，这个故事可能会掩盖另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问题，这个问题体现在由小精灵联想到小仙子（男同性恋者）这一轮交锋的同性恋话语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种新兴政治身份一直深刻影响着美国政治，我称其为“监视国家男性气质”（surveillance state masculinity）。其诞生源于 19 世纪末以来的三股趋势：男性身份建构发展和表达方式发生变革，美国民众对媒体和信息的态度发生转向，以及联邦政府在塑造安全国家方面面临转型。这些变化深刻改变了美国公众与领导人的关系，影响了政治人物的衡量标准、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以及与民众的沟通方式。为定义和探索这一政治身份，本书研究了约 1885—1954 年间性别、性、八卦、国家监视与安全国家之间是如何相互交织的，其中重点关注冷战的前十年。[5]

麦卡锡和科恩体现并完善了监视国家男性气质，但这种政治身份的创始人实际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简称 FBI）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胡佛可以说是 20 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官员，他对国家监视和安全国家的建



图 2. 陆军 – 麦卡锡听证会上，麦卡锡和科恩捂住麦克风，确保两人的私密对话不会被直播出去。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

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首位充分认识到现代大众传媒诸多可能性的重量级政治人物。胡佛将自己和特工们的男性气质作为实现个体、政府和意识形态目的的工具。麦卡锡在其基础上将粗犷的男性气质和狂热的反共运动相结合，进一步吸引了全国民众的注意力。科恩则将二者的性别策略发挥到极致，通过保密、操纵和误导来获得政治影响力，而后这种做法又延续到了美国新一代领导人身上。

胡佛、麦卡锡和科恩能够上位，都离不开人们对性别角色转变、共产主义渗透、社会风气变化和犯罪率显著上升等因素的政治焦虑。即使在被造谣和影射为“酷儿”或“娘娘腔”，不够阳刚因而无法守护社会公德和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三个人也都明显表现出了自己的男性气质。[6] 上述谣言通过日益壮大的政治八卦行业散播开来，该行业自称意在贩卖“国家情报”。实际上，八卦通过报纸联合专栏、大热的期刊杂志和民众口口相传，已成为一种表达、讨论和协商国家安全、

性别角色和性别认同等问题的手段。

这些焦虑相互叠加，催生出一种特殊形式的男性身份（masculine identity）。到 20 世纪中叶，这种男性身份开始主导美国政治。其印记可以从个体为引导公众期望所使用的手段中看到。例如，为什么胡佛不断误导媒体自己体格健壮？为什么麦卡锡要在竞选中强调自己粗犷阳刚？为什么科恩乐于让八卦专栏编排自己与小明星的绯闻？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助于阐释，在国家监视和安全国家兴起、建构、扩张和合法化的过程中，个体是如何协调政治文化的性别差异，并最终与之形成关联的。

这种大背景下诞生了种种特质，观察者正是以此判定一个人是否适合领导和捍卫安全国家。这样的人必须具备侵略性和掌控力，作风强硬，见多识广，专业过硬，好胜心强，心思缜密，且毫无疑问是个异性恋者。而这样的政治身份来源于两种焦虑情绪的相互叠加：一是对国家安全的焦虑，二是对“消费主义男性气质”兴起的焦虑。[7] 这种男性气质更像一种行事作风而非意识形态，载体就是形形色色的官僚和政客。[8] 胡佛、麦卡锡、科恩等人试图展现这种气质的核心特质（如“男性形象的硬朗粗犷”），以表明他们是保护美国的合适人选。[9]

研究胡佛、麦卡锡和科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政治、性别和性的发展历程。[10] 研究三者作为公众人物和个体如何协调自身形象与时代期望，可以阐明时代期望和赋予其权力的制度因素究竟是怎样的。[11] 在这一过程中，八卦（gossip）——将利益各方试图保密的信息公之于众——发挥了重要作用，联结了安全国家政治以及个体性别身份。自美国建国以来，八卦和影射（innuendo）就影响着美国政治，但在各

种因素的交织下，其在 1885—1954 年间（尤其是 1945—1954 年）格外具有变革意义。首先，小报、杂志和专栏等八卦行业在这段时间不断发展，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增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八卦行业还是时代进步下新闻专业化的产物。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许多新闻媒体明确将自己与某个政党或派别联系在一起；但此后，它们标榜自己立场客观，声称将致力于揭露社会、政治和文化背后的“真相”。八卦影响力扩大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难以被当作政党偏见的产物而即刻被置之不理。其次，八卦影响力的扩大离不开“名流”的诞生。20 世纪上半叶，美国民众对公众人物的态度开始有所改观，认为个体行为会主导公众行为，电影明星、当红歌手、体坛偶像和政客要员的私生活越来越受到民众关注。[12] 最后，美苏冷战和第二次“红色恐慌”（Red Scare）也助长了八卦的蔓延滋长，“保密”（secrecy）和“国家情报”（national intelligence）之类的说法正是由此得到普及。曾经被当作“闲话”的消息，如今却成了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一个男人与同性发生关系，这不仅是“变态”，也会让自己暴露于被敲诈勒索的风险中，还会败坏国家社会公德。

因此，胡佛、麦卡锡和科恩利用八卦捍卫国家安全，这在广义上属于八卦内容、准确性、流行程度和传播方式革命的一部分。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等专栏作家和《机密》（*Confidential*）等杂志传播流言，捕风捉影，将个体生活与政治活动相结合，试图以政客要员变化无常的性格和看似固定的特质来定义这个群体。八卦行业在不断树立和摧毁政要名誉与人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与美国民众定义和建构身份的深层次趋势产生了共鸣。[13]

监视国家男性气质塑造了国家安全、监视国家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国政治文化。这种气质诞生于伴随美国崛起而来的焦虑情绪，对“情报”价值的重视，以及包括八卦滋生、小报新闻、公众名人和电视直播等特征的变化中的媒体格局。而这种气质又平息了焦虑情绪，因此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胡佛、麦卡锡和科恩在攫取权力时表现出这种气质，并不仅仅是为了回应美国政治的主要问题。他们也需要以此掩饰自己身上所谓的男性缺陷……在陷入极度焦虑时，他们也会感到恐惧。

7

***

故事发生在历史发展的三个十字路口：国家监视和国家安全国家概念的诞生；性别和性政治革命；八卦作为关键因素出现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了解这三段历史，对于理解胡佛、麦卡锡和科恩所做的一切的革命性本质至关重要。

“国家安全国家”（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概念的出现是美国外交政策和联邦政府扩张的分水岭。它涉及所有确保美国免受国内外威胁的政府机构、法律、法规和倡议。国家安全国家起源于 1947 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该法案重组了美国的国防机构，并使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以及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 CIA）得以成立。[14] 表面上看，国家安全国家意在对抗国际威胁，但它对情报收集的重视深刻影响了美国国内的各种行动。杜鲁门总统试图在《国家安全法》中加入限制联邦调查局监视权的语句时，遭到了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阻挠，其中就

包括新任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15]

实际上，国家安全国家的根基比冷战扎得更深。早在苏联成立前的几十年，美国政府就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来收集信息。19 世纪末，美国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监视国家”，也是美国后来各类政策的试验场。[16] 在那里，美国领导人利用商业打字机、杜威十进制系统、穿孔卡片和电报通信系统等新技术收集、组织和管理国家潜在敌人的数据，形成了某位历史学家所称的“基于信息的警察控制一体化系统”。[17] 这启迪了后来的美国官员为国家更加“安全”而努力，其中就包括埃德加·胡佛。

这些担忧促使国家监视和安全国家相互交织，包括过度收集潜在威胁信息、持续渲染恐慌情绪以及模糊个人与政治之间的界限。这些担忧也同时塑造了胡佛、麦卡锡和科恩的男性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时代造就了这三个人。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渴望成为美国的权力精英，甚至是控制美国的权力精英。此外，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表明，从维多利亚时代到冷战期间，美国人对性别和性的看法，尤其是对男性行为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男性气质”（masculinity）及其近义词“男子气概”（manhood）和“阳刚之气”（manliness）等词的意义在 19 与 20 世纪之交发生了重大变化。性别史学家迈克尔·坎摩尔（Michael Kimmel）认为，在 19 世纪末：

> 男子气概被视作一种内在品质，即自主能力和责任心，在历史上被视为孩子气（childhood）的对立面。人并不是理所当然地

就成了一个男人；到了某个时候，长大成人的男孩会证明他已经成为一个男人，并且已经摒弃了那些幼稚的东西。进入20世纪，“男性气质”逐渐取代“男子气概”这一说法。“男性气质”是一系列行为特征和态度，如今与女性气质（femininity）[18]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变化与南北战争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期间美国的经济调整密切相关。美国经济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生产为主，这种转变极具变革性。“从农场到工厂和办公室，从户外体力劳动到室内久坐工作”的变化激发民众追求政治、精神和生理上的变革，达到了美国建国后前所未有的程度。[19]

经济结构调整几乎影响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20]这不仅改变了民众的工作方式，还改变了其他各个方面，如住在哪里、和谁一起住，如何旅行（多久旅行一次、旅行多远），如何沟通，吃什么，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何时结婚，何时生育、生育几个，信仰什么宗教，以及如何思考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等等。

与此同时，这场变革让美国人能够围绕消费品和休闲活动精心打造身份。全新的分销模式、广告、营销和品牌出现后，美国人与消费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尽管民众仍然受制于民族性、家庭关系、种族和性别等难以改变的因素，但消费主义仍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这些限制。[21]

9　这些社会和经济巨变在几十年间不断演化，助长了性别上的根本性转变。女性逐渐增强自身的社会和经济独立性，并开始挑战（暂且

不说消除）将生活领域按男性和女性进行划分的“两分领域”教条。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中产阶级妇女通过淡化传统的社区关系、参与市场竞争、建立社会关系并积极参与政治，扩大了其社会和经济世界的范围。同时，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妇女走出家庭，开始从事有偿劳动。[22]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男性，尤其是中产阶级男性，失去了许多以往所谓男子气概的文化标准。大多数男人再也不能自称是独立生产者了。许多人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赚取报酬，并逐渐发现，如何消费——也就是如何生活——比收入更加重要。当“生产主义”经济理想让位于“消费主义”经济理想，“成为一个男人”又意味着什么？直到 20 世纪，民众都在为此焦虑。1931 年，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评论说，“在使用现代机器时，现代人正慢慢失去保持男子气概的能力”。他认为，“人类失去了与周围事物的联系，我们和穿的衣服没有关系，和住的房子也没有关系。我们住的房子不是自己盖的，坐的椅子不是自己做的，开的汽车不是自己造的，睡的床也不知其来历”。[23]

因此，历史学家马丁·萨默斯（Martin Summers）指出，“男性气质”在中产阶级中比在工人阶级中更快地取代了“阳刚之气”[24]。“男子气概”意味着生产力和父权制，而“男性气质”是社会性的、消费主义的，需要不断自我证明和再证明，“以免男人毁于被认为过于女性化”。[25]这个持续过程让男性对性别认同焦虑不已。

男性气质这一概念与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性别习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建构的，也就是说，所谓“男性化”或“女性化”

并不是由生物学决定的，而是由社会进程中不断变化的社会标准定义的。[26] 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性别身份可以根据情况发生变化。当然，这个过程十分混乱：人们无法稳定控制自己的性别角色，还会受各种因素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年龄、地点、居住的社会空间以及其他社会关系。[27] 也就是说，虽然男性气质由社会结构决定，但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男性气质都相同。正如坎摩尔所言，“在美国，成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阶级、种族、民族、年龄、性取向以及地区……但与此同时，所有美国男人又必须面对一种独特的男性气质……这是我们用来衡量自己的模式”。[28] 学者们用“霸权的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指代这种社会建构的“模式”[29]。

美国男性气质以一系列零星的危机为标志，这种普遍观念已经失去了历史学家的青睐。历史学家现在认为，美国男性（和女性）正面临不断变化的性别形势。[30]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美国男性的性别身份认同在某些时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比如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 50 年代。“阳刚之气”的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动荡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工人转向中层管理职业，再加上战后对消费主义和消费行为的强调，美国文化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多种男性气质：从约翰·韦恩（John Wayne）[①] 到休·海夫纳（Hugh Hefner）[②]，

---

① 约翰·韦恩（1907—1979），美国电影演员，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角色而闻名。（本书脚注如无特别注明，皆为译者注。）

② 休·海夫纳（1926—2017），美国商人，色情杂志《花花公子》创刊人及主编。

从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①] 到李伯拉斯（Liberace）[②]。[31] 在这种转变之下，男性即使无法以体力劳动等更“传统”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也能够继续宣称自己具有男性气质。于是，在麦卡锡和科恩逐步介入国民意识时，社会上正激烈争论究竟什么才是男性气质。这两个人最终也参与了这场辩论，自己还成了讨论对象。

社会上存在一种偏见：男性特征体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预科学校和常春藤联盟的毕业生身上。这些人都是东海岸权力集团的成员。胡佛、麦卡锡和科恩在许多方面都不符合这些特点：胡佛和麦卡锡没有上过精英学校；科恩和麦卡锡不是新教徒；麦卡锡来自美国中西部；科恩和胡佛一生未婚；并且这三个人都没有孩子。因此，他们不得不努力表现，以证明自己配得上男性领导的身份。胡佛、麦卡锡和科恩都是交际场上的边缘人，他们努力重塑自己，以成为国家监视和安全国家的重要人物。

这三人并没有一套相同的标准化男性身份，而是用各自的方式证明自己拥有刚强坚韧的男性特质。其间差异可归结于他们在年龄、阶级、财富、宗教、出身地、职业和性格上的不同。作为一个在联邦官僚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保守派新教徒，胡佛精心打造的男性气质属于白领阶层，这种男性气质源于礼节、组织性以及对制度的忠诚。为了进一步展示自己的大男子主义（machismo），胡佛采用了 19 世纪晚期颇受欢迎的肌肉男子形象。这样一来，胡佛打造了一种新的职业型男子

11

① 詹姆斯·迪恩（1931—1955），美国话剧与电影演员，以叛逆、忧郁、孤独的形象闻名。

② 李伯拉斯（1919—1987），美国著名艺人、钢琴家，其表演风格和生活方式高调且奢华。

气概，既经营了他的公众形象，也塑造了他领导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形象。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的成长经历可谓艰难，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农民，这意味着他的男性身份更符合工人阶级节俭和自给自足的价值观。麦卡锡凭借这些特点打造其公众形象，他展示的男性气质让民众想起生产主义时代的男子气概。与此同时，他也会采用现代手段展示男性气质。科恩的父亲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民主党法官，野心勃勃往上爬，科恩则将自己的男性身份建立在以社会地位为基础的权力之上。因为科恩无法依靠其种族背景、宗教信仰或身体特征来展现阳刚之气，所以他强调社会地位、职业成功和掌权机会。在科恩的一生中，他声称自己是个男子汉，更多是基于自己的成就，而非内在的身份特点。

随着维多利亚时代至现代期间性别转变的发生，一场并发的、与之相关的性革命也应运而生，让这些性别身份上的表演变得更加复杂难懂。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影响让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突破了以往性行为的社会接受界限。[3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变革性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些事件迫使美国人背井离乡，违背传统保守的性守则，从而造成了社会动荡。[33]1890—1950 年间，美国人纷纷涌向城市，城市地区的人口密度、文化交流和社会活力促进了性关系和性别身份的试验，形成了独特的同性恋亚文化。这些变化引发的问题将成为压在胡佛、麦卡锡和科恩身上的重担，因为他们也背井离乡，也试图表现自己的男性气质。这三人参与到冷战中时，女性和同性恋者的全新公众形象使民众更加担忧美国官僚缺乏击败共产主义的力量，尤其是华盛顿特区的女性和同性恋者——新政时期和二战期间，在当时的华盛顿特区，联邦政府的扩张吸引了大量移民工

人，由此形成了一种相对国际化的社会风气。而胡佛、麦卡锡和科恩 12
象征着监视国家的男性气质，因此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是异性恋。

支撑我论点的“三脚架”中的第三条腿或许是最难界定的概念。什么是八卦？答案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明显。它一定充满性挑逗或是粗俗不堪吗？它必须是轻浮的吗？八卦是一种明确的私人交流形式，还是可以进入公共话语？如果八卦的信息是可靠的，那么它还是八卦吗？八卦和其他相关概念——比如谣言、影射、诽谤、诋毁和蓄意误导——有什么不同？最重要的是，像八卦这样看似无关紧要的东西，能不能被视作带有政治或者历史色彩？更简单地说：八卦重要吗？

任何定义都应从术语的起源开始。“八卦”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概念，它的含义在其存在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既涉及它所传播的信息种类，也涉及传播所采取的形式。英文 gossip 一词起源于古英语 godsibb（可直译为“上帝的亲戚”），这个词指的是孩子洗礼时的随从，其根源可以追溯到 11 世纪（“教父或教母”［godparent］也是同样派生而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godsibb 摆脱了其宗教起源，让人想起了孩子到来时更喜庆的一面，包括宴饮和一般的睦邻关系。到了 16 世纪，godsibb 已经变成了 gossip，这个名词用来指“妇女在分娩时邀请来照顾自己的亲密女性朋友”。[34] 由于被明令禁止进入产房，男性开始担心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会被女性说些什么。在一个亲密的空间里，女性会坦率地谈论她们的丈夫和其他男性亲属吗？如果是这样，她们将分享哪些令人尴尬的细节？这一术语由此开始体现今天最常见的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含义。到 17 世纪初，英国作家用它来指代《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所定义的人：“一个性格轻浮，

特别是喜欢闲聊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是女人。”正如这一定义所表明的那样，八卦被理解为一种女性交流形式；1755 年出版的一本英国词典将其定义为“如卧房中女人一般谈论私事者”。但早在 17 世纪，美国和英国作家就把八卦称为一种沟通方式，而不是表达八卦的人，他们嘲笑八卦是“女性的闲聊和谣言”。[35] 1811 年，《牛津英语词典》将这一定义扩大了，开始包括它的第二个现代含义，即“闲言碎语的谈话；微不足道或毫无根据的谣言”。

我对两种形式的八卦很感兴趣，一位评论家将这两种八卦定义为
13 “私人谈话”，它们表现出“对私人事务的浓厚兴趣”。[36] 第一种是“恶意中伤”，即试图通过传播的信息给个人或群体带来负面影响。[37] 这种恶意中伤的例子并不难找到，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从邻居对某位行为不端少年的讨论，到八卦杂志对最新风流电影明星的报道。第二种形式可以被认为是“正面的谣言”，这是一种暗示，通常在主体的敦促下传播，以构建一种身份。这类八卦的例子可能更难识别，但它们可能以如下形式出现：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通过巧妙游说使朋友获得晋升，或者一则新闻报道暗示，一名国会候选人多年来一直匿名向当地的一户寄养家庭捐款。这两种特质暗示了八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八卦传播的是私人信息，但它在定义上是要被分享的。事实上，我认为八卦只有被分享了才能称之为八卦 ——其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正是传递信息。实际上，八卦需要三方参与：传话者——分享八卦的个人，接受者——吸收八卦的人，八卦所涉及的对象。

八卦与谣言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虽然八卦往往传达未经证实的信息，但即使是经过证实的报道也可以被视为八卦。即

使在离婚被确认后，熟人离婚的消息也可能成为八卦。这种真实的可能性增加了八卦的可信度，同时放大了其价值。其次，八卦总是围绕着人类话题展开。城市规划办公室将很多地方划为适合成人音像店的区域，这可能具有八卦所必需的色情要素，但它缺乏特定的人类主体性，因此只能属于传闻。人性是八卦的核心，因为从根本上说，八卦是关于社会关系的。八卦的社交功能意味着，无论内容如何，八卦从来都不是无聊的。八卦定义和重新定义了价值观，设定了群体认同的参数，可以用来挑战社会等级制度，并集中反映了更强烈的社会文化焦虑。

长期以来，社会批评人士一直认为，八卦的主要作用——无论其内容、主题和传播者是什么——是帮助构建社区，特别是通过宣传和重申社会价值、标准和习俗达成这一目的。[38]记者尼尔·加布勒（Neal Gabler）指出，当由“相互认识、受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约束”的个人组成的“社区”转变为“社会”，即“次要关系日益取代主要关系”时，八卦的支配力量变得更加重要。[39]在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的研究基础上，加布勒把八卦视为帮助个体确定社会身份的必要因素——在社会中，大多数人只通过名声（reputation）来认识彼此。 14

尽管八卦在历史上总是与女性和罪恶联系在一起，但它已经被所有性别的美国人用来实现各种目的。是的，八卦是传播信息的一种手段。[40]但它也是一种评价；单是通过八卦分享信息的行为，就意味着分享者正在对这个主体做出判断——或是积极，或是消极。例如，历史学家认为八卦是“煽动和塑造社会和政治混乱的关键，这种混乱导致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巫术指控和审判”，并表明这种八卦是来自所

有社会阶层的妇女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发表意见的一种方式。[41] 还有人表明，八卦是殖民地时期和共和国早期精英们为维持社会秩序而挥舞的棍棒。[42]

自美国建国以来，“影射”就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了作用，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利用媒体盟友指责对方道德不当的方式就是明证。（早期的新闻记者詹姆斯·T. 科连德［James T. Callender］曾为这两个人散播邪恶的谣言。）八卦也有助于在外交使团中传递信息，“美国外交部门专业人士看重八卦作为内部沟通模式在专业外交界的潜力，它可以促进关系发展，引发职业竞争，并提供急需的有关工作保障、晋升和调动的信息”。[43] 在这种体制下，八卦在危机期间成为可靠信息的主要来源，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更是认为八卦比热衷政治的外交官出具的官方报告更值得信赖。[44]

现代性改变了八卦，也允许个性（personality）超越性格（character），成为身份的主要决定因素。在《自我曝光》（*Self-Exposure*）一书中，历史学家查尔斯·庞塞·德·莱昂（Charles Ponce de Leon）展示了对公共人物的痴迷（“名人文化”）是如何出现的。“名人与现代性密切相关”，他写道，因为这是一种“思考公众人物的独特方式……（这）是一些我们大多数人都视作进步的发展的直接结果：市场经济的扩张，以及民主、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名人文化并非某种困扰本来健康的有机体的怪诞突变，而是其核心特征之一，直接源于现代社会为社会流动性和自我创造提供的激励”。[45]

八卦还让民众得以窥见头条新闻背后的黑暗世界，那些阴暗角落里充斥着好莱坞的掮客、黑手党老板、腐败的律师和诡计多端的政客。此外，全国性媒体上八卦的出现，也有助于引导公众讨论此前被认为不得体的话题，包括同性恋、通奸、“变性欲”、各种形式的恶习和精神疾病的报道。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类话题的出现似乎使公众辩论庸俗化了，但它也提高了公众对性别和性身份的认识，不然这些问题都将是不为人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八卦杂志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民众对国家情报和冷战背景下的“国家机密”的关注也在增加；随着八卦杂志《机密》的报摊销量超过了《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和《展望》周刊（*Look*），谣言和猜测进入了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并在国会调查期间（包括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调查）被当作合法证据引用。八卦已成为一种监视手段，通过口口相传的谣言和小报报道，使社会能够监督人们的行为和身份。[46]

研究八卦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挑战。首先是追踪八卦的分布和接收情况。当然，很多八卦都是通过口口相传扩散开来的，因此八卦代表着一种随时间流逝而消失的档案。历史上的八卦杂志的发行量很难确定，往期杂志也不例外。冷战早期的出版物尤其如此，所有这些出版物都早已停止出版，而且发行它们的公司已经倒闭。八卦杂志经常在朋友之间分享，所以每一份《机密》及其模仿产物都可能被无数人阅读。[47] 八卦出现在更主流的新闻媒体上时，通常是以俚语和影射的隐晦语言传播的。因此，几乎不可能确定有多少人接触到某条八卦消息，他们是否理解出现的暗示，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些指控。

其次是确定八卦的“真实性”。恶意中伤（distilled malice）尤其涉及其主体通常希望隐藏的信息，而对谣言的承认通常伴随着否认。八卦的准确性也受到八卦分享者自身利益的影响。部分由于这些挑战的存在，本书更多地关注八卦的影响，而不是其准确性。

胡佛、麦卡锡和科恩在两个关键方面使用了八卦。对这三个人来说，八卦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收集手段，可能有助于实现其政治和职业目标。他们使用更传统的信息来源建立关于其政治盟友和对手的档案，但也很重视道听途说。他们利用八卦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交流信
16 息——关于他们自身和别人的信息。他们都熟练地使用八卦记者的工具，包括夸张、影射和牵连定罪。胡佛、麦卡锡和科恩利用媒体来提升自己的公众形象，同时利用恶意中伤将对手描绘成负面形象，包括他们自己都非常害怕的那种“娘娘腔”形象。通过将自己的“缺陷”投射到他人身上，他们一举调转了批评的矛头，并以此痛斥自己的敌人。

17 但这一过程也存在危险。胡佛、麦卡锡和科恩为建立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公开抨击敌人而采用的精确策略，最终被用来对付他们自己，这三个人都成了恶意中伤的目标。矛头的掉转正是因为他们所体现的明显悖论。其核心矛盾在于，尽管这三人未能表现出监视国家官员所要求的许多特质，但从冷战前开始（尤其是在冷战期间），他们都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通常来说，这些批评表现为对这三人性别和性身份的质疑，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三人最终都被自己的胡言乱语搞得焦头烂额。这一打击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尽管他们帮助塑造的政治身份依然在美国政治中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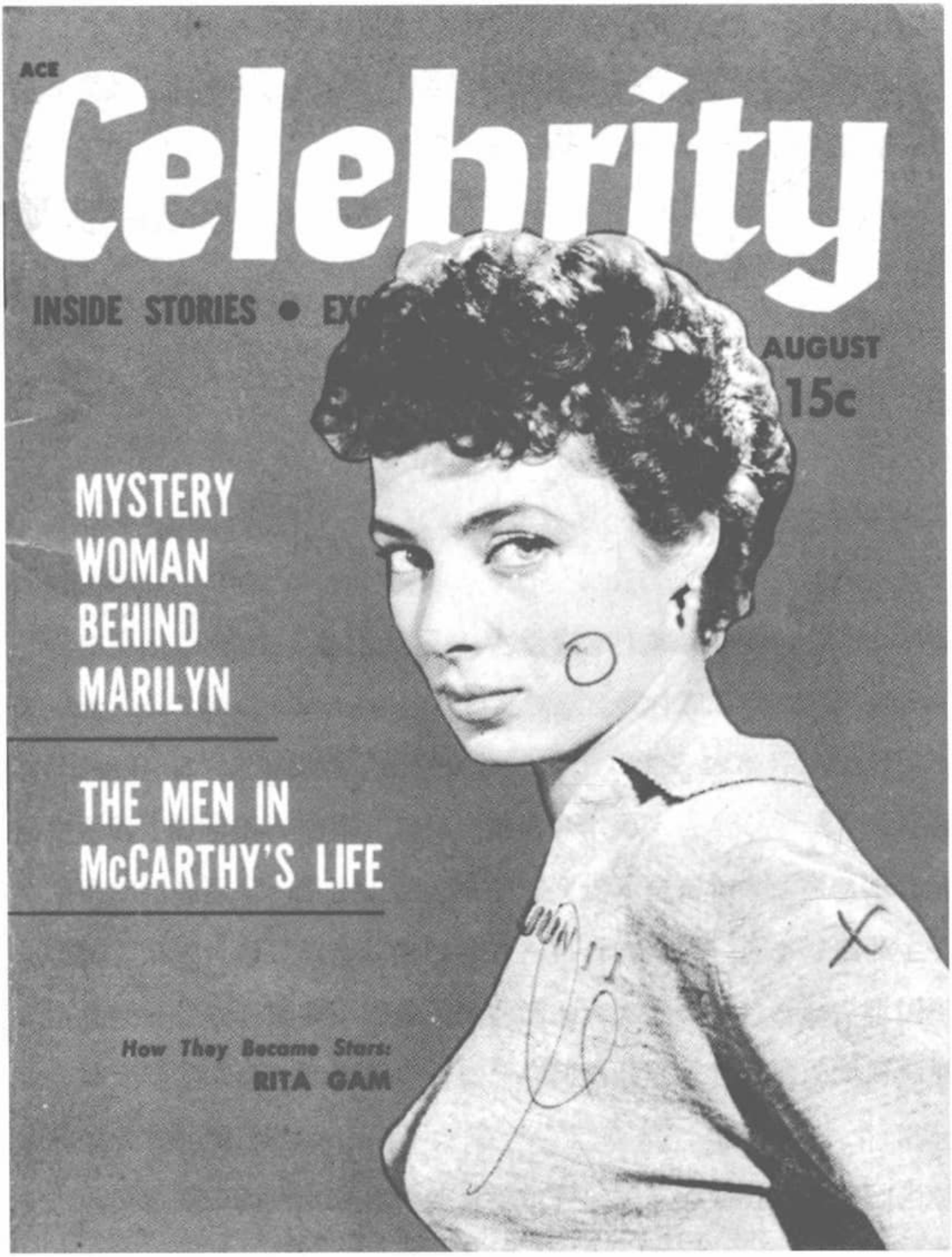


图3. 1954年8月，八卦杂志《名流》（*Celebrity*）刊登了一篇标题为《麦卡锡生活中的男人》（"The Men in McCarthy's Life"）的文章。

图片来源：私人收藏。

第一章

现代性图景

在《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Middletown: A Study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一书中，社会学家罗伯特和海伦·林德（Robert & Helen Lynd）夫妇探讨了现代化是如何在1890—1925年间影响了这座中西部小城市的。林德夫妇得出结论，米德尔敦（后来被发现是指印第安纳州曼西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化机械、电气设备、汽车和电影等新兴科技的结果。技术发展催生了经济和社会变迁，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如何赚钱谋生、如何经营家庭、如何抚育子女、如何消磨闲暇时光以及如何参加宗教仪式和社区活动。

就文化变革而言，现代化使米德尔敦居民能够充分参与美国当时繁盛的印刷文化。《美国杂志》（*The American Magazine*）、《星期六晚邮报》、《麦考尔》（*McCall's*）、《女士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等热门刊物为读者提供了文化潮流和社会礼仪方面的

指导。[1]不过，其中一些全国性刊物由于侧重强调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招致了其他刊物的质疑。除了这些普通杂志，米德尔敦的邮递员还会大量投递一种新型刊物，林德夫妇称其为“性猎奇杂志”（sex adventure magazines）。性猎奇杂志专注于呈现据称是取材于现实、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浪漫故事，例如“原始情人（她想要一个粗野之人做丈夫）”“如何在婚姻中保持兴奋状态”“妻子能用其他女性的手段取胜吗”等。[2]大约每十名米德尔敦居民中就有一名订阅了性猎奇杂志，包括《真实故事》（*True Story*）、《真情自白》（*True Confessions*）、《真探》（*True Detective*）、《真实事件》（*True Stories*）和《生活故事》（*Live Stories*）。这些刊物承诺，会向读者传授“生活规则的知识”。这种揭示现代世界运作方式背后隐秘真相的承诺，也是当时产自美国各大城市的八卦杂志的关键元素。在一位米德尔敦的母亲看来，这些新兴色情刊物正在影响当地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我们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可不像现在这样大胆！”[3]

20

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忧虑的人。尽管米德尔敦居民很快就接受了“对待具体事物的新方式”，但人际关系和“风俗习惯”方面的类似转变却引发了焦虑情绪。[4]现代化带来的是简洁高效，但林德夫妇发现，这些变化也让米德尔敦居民“对飞速变化的世界感到愈发紧张和困惑”。[5]他们所担心的“社会问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包括但不限于“年轻一代”的行为举止以及“政治腐败”“住房问题”“街道交通”等。[6]

在美国的几乎任何角落，人们都努力寻找自己在这个美丽新世界中的位置。以年轻的埃德加·胡佛为代表的一群人重新确认了他们与

教会、学校和政府的联系，尽管这些稳定性机构也在改造自身来追赶时代的步伐。其他人则接受了现代化带来的全新社会和文化景观，将性猎奇杂志和八卦媒体等新兴资源视为理解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些变化多端、有时甚至自相矛盾的风潮，是由类似的焦虑情绪和雄心壮志所驱动的，而正是后者造就了监视国家的男性气质。

***

曾经矗立在华盛顿特区苏厄德广场 413 号的这栋房子并不引人注目。它有两层楼，墙上的百叶窗又大又暗。狭窄的门廊顶端装饰有齿状图案，这是这栋房子为数不多的装饰物之一。这栋房子位于美国国会大厦东南方向约半英里处，居住在附近的都是政府工作人员，都是 21
白人，大多信仰新教。胡佛就在权力中心附近这座简朴的住宅里出生，并在此度过了四十三年时光。这栋房子见证了这个胡佛家族的幼子从高中时期的领袖人物成长为法律系学子，再到政府职员，最后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第一任局长。这条成长道路培养了胡佛的性格特征（以及他建立的官僚机构的特征）：野心勃勃、渴望受人尊敬、奉行道德绝对主义，以及毫不动摇地忠于秩序。然而，胡佛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充斥着焦虑情绪，这种情绪体现在他的成长道路和国家的发展道路上。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既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又害怕被认为不适合成为权力精英。[7]

胡佛深受中产阶级新教徒焦虑情绪的影响，这个群体诞生于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其间正值现代化转型和移民潮、城市化等社会剧变的先兆。这种不确定性铸就了根植于胡佛性格之中的价值观。在某些方面，胡佛继承了 19 世纪的遗风，并试图以此引导 20 世纪，

宣扬与当下国家社会现实不符的道德准则。与此同时，胡佛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有助于他巧妙地管理人力和信息资本，从而成为 20 世纪最具权力的美国人。[8]

埃德加·胡佛出生于 1895 年 1 月 1 日，正值亨利·卢斯（Henry Luce）[①] 所称的“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开端。胡佛的母亲叫他“埃德加”，其他家人则叫他“J. E.”。胡佛的父母都是华盛顿本地人，在他出生前十五年就结婚了。埃德加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但比他大十六个月的姐姐（二女儿萨迪［Sadie］）3 岁就因白喉症去世了。作为这个刚刚遭遇悲剧的家庭中的新生儿，埃德加备受父母和兄姐（小迪克森［Dickerson］和莉莲［Lillian］）的宠爱。[9]

和周围的许多邻居一样，父亲老迪克森·胡佛（Dickerson Hoover Sr.）在政府就职，担任美国海岸与大地测量局（US Coast and Geodetic Survey）的印刷所所长。为政府工作是他们的家族传统：埃德加的祖父也曾在美国海岸与大地测量局工作，母亲的外祖父和叔父都曾担任瑞士驻美高级外交官，胡佛的兄长后来也在美国汽船检验局（US Steamboat Inspection Service）工作。简而言之，胡佛出身于官僚政治家族。[10]

22　虽然在家表现得很安静，但父亲老迪克森的信件表明了他对家人有着深深的情感依恋。参加 1904 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时，老迪克森以一种多愁善感又略带粗鲁的口吻给幼子写信，说道：

---

① 亨利·卢斯（1898—1967），美国著名出版家，《时代周刊》创始人。

我多希望你也在这里，这样早上起来我们就能互相打闹。你妈妈可能认为你不够强壮，但只要你俩打一场她就会发现……好好照顾你妈妈……做个好孩子。给你一个大大的吻。爸爸。[11]

埃德加被视作已故姐姐的“替身”，深受家人宠爱。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说，“埃德加是受慈爱父母喜爱的成绩斐然的儿子，是哥哥姐姐挚爱的弟弟，是备受全家关心呵护的宝贝”。[12]

不过，这种温情并不代表埃德加被宠坏了，或是他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母亲安妮（Annie）给他灌输了一种秩序感。安妮是采矿工程师的女儿，是位严格的纪律主义者，“奖励和惩罚是她教育埃德加的手段”。[13] 在家庭生活中，安妮的控制欲无处不在，对家里的佣人尤为严厉，时常因为他们稍作反抗就予以解雇。

但无论安妮怎么责骂幼子，似乎都没有使二人的关系有任何紧张。据政治活动家、胡佛的朋友乔治·艾伦（George E. Allen）说，埃德加“可算十足的妈宝”。[14] 母亲安妮是对埃德加影响最大的人，他对母亲的忠诚坚不可摧。直到 1938 年安妮去世后，埃德加才搬出了这所位于苏厄德广场的房子。

埃德加小时候有口吃的毛病。于是他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然后了解到一种理论：克服口吃这种语言障碍的诀窍就是把语速提到最快。这个技巧在大多数时候效果显著，也让埃德加在童年时期得了个“飞人”（Speed）的绰号。此后他的语速一直很快，只有压力很大时才会出现口吃的情况。

得名“飞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送杂货时敏捷灵活，那是埃德加

的第一份工作。为了得到雇主的小费，埃德加在华盛顿东南部的汹涌人潮中不断穿梭，送货速度快得惊人。出于维护自身形象的目的，胡佛后来要么宣称这个绰号是别人在橄榄球场上给他起的，要么对此种说辞不置可否。[15] 事实上，埃德加身材矮小，这意味着他早在中区中
23 学（Central High School）读高一时就被橄榄球队排除在外了。在美化类似的真实信息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共关系部门的成员接到指示，“局长只比 6 英尺（约 1.83 米）稍微矮一点罢了”，但这个数据起码比真实身高多了好几英寸。[16] 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说，“（胡佛）办公桌下垫有高高的台阶，派对避免邀请高个子，很少允许个子高的特工晋升总部，这些都有助于维持这种错觉”。[17]

华盛顿并不是个毫无活力的南方城镇，事实上，1900 年它就已经位列美国第 15 大城市，但在胡佛的少年时代，华盛顿确实具有一定的稳定性。[18] 这种稳定性在胡佛的社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用历史学家理查德·吉德·鲍尔斯（Richard Gid Powers）的话来说，“苏厄德广场是美国中产阶级白人新教徒的缩影。那里几乎没有富豪，更没有穷人；除了每天来此做饭打扫卫生的佣人以外，都是白人。唯一存在分歧的是宗教信仰，路德教、长老会和卫理公会教徒在此展开了温和的竞争。苏厄德广场的孩子会逐渐意识到，其他人在本质上和自己并无不同”。[19] 社区的同质性给埃德加留下了终生烙印：对“他者”的警觉和怀疑，无论这种“他者”是体现在种族归属、宗教信仰、政治立场还是性别上。

人口结构的相似性也延伸到了埃德加的教育经历上。他一直就读于公立学校，先是布伦特小学（Brent Elementary，距离他家仅一个

街区），再是中区中学。埃德加生活在“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①] 治下、梅森－迪克森线[②] 以南，他只参加全是白人的集会。在那个年代，华盛顿的公立学校“强调公民身份和纪律性”（直到1913年才废除体罚）。学生的着装要合乎规范：低年级男生身着夹克和短裤，打着领带，八年级改穿长裤；女生则一袭连衣裙，或短裙搭配中袖衬衫。[20] 虽然东区中学（Eastern High）离家更近，但埃德加自己（而非他父母）还是决定就读于中区中学，后者办学严谨，也更具挑战性。充满野心的埃德加做出这个抉择，胡佛家族可能并不意外。

在中区中学，胡佛因选修了要求最高的课程而名声大噪，并最终当选致告别辞的毕业生代表，这也证实了他的声望之高。[21] 埃德加高二的成绩单显示，他所有科目的成绩都是“优秀”，包括英语、法语、几何、历史、三角学和绘画。他在“整洁”这一项上也是满分。他总是按时上学，从未缺过一天课。[22]

高一过后，他把课外时间都花在了辩论和军训操练上，并在此充 24
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中区中学辩论协会在当地的辩论巡回赛上一枝独秀，因此常常和地方性大学的辩论队展开比赛以作挑战。高三那年，胡佛成为学校辩论协会公认的最佳辩手，在女性选举权、总统预选制、公共事业管理等议题上，他表现出了“冷静无情的逻辑”。他的论点往往基于更高的正义感。在一场关于死刑的辩论中，胡佛主张保留死刑，认为这是符合《圣经》且得到“所有基督教国家”支持的做法。[23] 这种对基督教道德的诉求，预示着胡佛对道德标准和男性形象的追求

---

① 1876—1965年美国南部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② 美国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分界线，过去蓄奴州的最北边界线。

将贯穿他的职业生涯。

胡佛的另一项主要课外活动是军训队，即中区中学学员旅（Brigade of Cadets）。尽管军训队在全国不算普遍，却是当地公立学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所公立中学都有一支约 180 名学生的军训队，分为三个连队，每年春天在白宫附近的椭圆形草坪（White House Ellipse）举行演习比赛。1913 年，胡佛率领中区中学的军训队沿宾夕法尼亚大道行进，这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游行（长达四个小时）的一部分。胡佛在军训队一路晋升，直到高三时成为 A 连指挥官为止。他在连队实行了不少新规矩，认为这会使其更高效、更有序，如要求所有学员参加每周例会。高三结束时，A 连在全市演习中与冠军擦肩而过，输给了一支人数更多、演习任务更具挑战性的连队。尽管如此，胡佛的领导才能还是让同龄人钦佩不已，他在中区中学的人气之高，仅次于学校体育队的风云人物。胡佛对自己与军训队的紧密联系感到骄傲，他甚至会在周日穿着刚熨好的军训队制服去教堂做礼拜。[24] 在这位华盛顿年轻人的社交日程上，全市的学员舞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舞会。[25] 其他学员在送女朋友礼物时，经常会用印着军训队徽章的丝带来包装礼物。然而，当被问及胡佛高中时期的感情生活时，同窗好友回答道，尽管他们确信胡佛有过约会经历，但他从未和任何女孩正式交往，他的精力都放在别处了；他“爱的是 A 连”。[26]

正是这样一种关系，在塑造胡佛的性格、气质和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让他尝到了掌控他人的滋味，以及带领个体实现共同目标所产生的自我价值和效能感。他还就此确立了对组织结构层级的认同感，认为其价值体现在行动布局和遵从指挥系统等各个方面。

后来胡佛组建联邦调查局时就采取了军训队的理念。学员生涯也培养了胡佛的组织忠诚，他发现全身心投入某个组织将会收获回报。这预示着终其一生，胡佛都将利用组织的力量来实现个人和职业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胡佛要永远受制于这些组织，相反，他懂得了作为偌大组织的一分子有助于推进自己的计划。

尽管胡佛从未入伍参军，但军训队的经历让他坚信，军规军纪是种美德。对秩序的推崇不仅成为他的个人准则，也影响着他对待下属的方式。他的生活可以用固定和精确来概括：每天，他都会在同一时间起床，吃着一成不变的早餐，选择固定的餐厅吃午饭。胡佛过分强调确保联邦调查局的核心成员穿着得体、彬彬有礼、举止体面、遵守时间。这种军国主义式的敏感也延伸到了胡佛打击犯罪的方式上，例如他坚持要求联邦调查局采取全国指纹数据库这类“科学方法”。可以说，联邦调查局是以他为标杆建立的。

***

胡佛的早年经历揭示了男性气质的社会关切如何影响他的个人发展。胡佛的性别认同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两个有所交集的运动：一是男女工作性质与不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剧变，由此产生对男性气质的焦虑情绪；二是这些世俗的焦虑情绪，通过新教的男性化倾向得以展现和迭代。为实现白人男性基督徒的理想形象，年轻的埃德加努力满足所处阶级对男性的期望，同时为跻身上流社会做好准备，打磨自身形象。

在胡佛的青年时代，美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1880—1920 年间，美国人口翻了一番，从 5000 万增加到 1.06 亿。随着美国

城乡人口分布重新洗牌，人口密度也增加了一倍。[27] 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口结构（包括种族构成、城市中单身年轻人的数量、家庭规模等）、
26 交通系统、经济组织与财富分配、国际地位、娱乐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可能是 1880—1920 年间的移民潮，特别是来自西欧地区的移民潮。在此期间，美国接收了约 2800 万移民。[28] 截至 1900 年，37.8% 的美国居民不是在外国出生，就是移民的后代。[29] 出生率和平均寿命的上升使得美国总人口增多，移民的涌入更助长了这一趋势。移民潮、人口增长，以及工业经济的日益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快速扩张。

另一个变化是（通过印第安人战争和种族主义法律政策）对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实行人身、社会、经济和文化控制。与此同时，美国利用帝国主义新政策影响或控制南美、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屿，扩大其全球影响力。这种扩张得到了美国经济巨头的支持，其发生得益于企业制度的发展、管理阶层的出现、科学管理理论的应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工人衰落）和商业资本的增加。

文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革命性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剧，以全新的方式将美国人民彼此联结在一起，促进了文化交流。媒体迅速发展，报刊杂志的读者数量达到空前水平，新兴新闻业（小报）迅速发展，图书出版的业务领域扩展到更受欢迎的低俗小说和廉价小说，广告即将成为媒体的重要收入来源。新闻业的扩展催生了新的文化英雄，包括运动员（尤其是拳击手和大学橄榄球队队员）、电台主播、歌舞杂耍演员。这些明星的走红离不开摄影和电影等新兴大众媒体的支持。

在家庭领域，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他们不愿承担来自家庭和社区的责任，也抗拒参与时新的娱乐活动，由此出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口中的“单身汉时代”（the age of the bachelor）。[30]

社会各个领域几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引发了人们内心的担忧：美国男性是否变得太过文质彬彬了，特别是他们倾向于选择白领中层管理岗位而避免体力劳动。1870—1910 年间，白领工作岗位增加了六倍以上。[31] 另外，1873—1879 年、1884 年、1893 年的经济恐慌造成了家庭内部动荡，导致出现了一批无法养家糊口的茬弱男性。

这些问题深刻地影响着那个时代男性的成长方式。很多指南声称要教会父母如何培养儿子的男性气质，如凯特·厄普森·克拉克（Kate Upson Clark）的《如何教养男孩》（*Bringing Up Boys: A Study*，1899）和弗兰克·奥尔曼·贝克（Frank Orman Beck）的《迈向男人：一项关于男孩的研究》（*Marching Manward: A Study of the Boy*，1913）。总的来说，这些指南建议青年男性应该保持精力充沛、信仰虔诚、遵守纪律、道德高尚，同时尽力避免走上任何歧路，包括异常的性行为或其他反常行为。

克拉克的研究针对的是中上层阶级的家庭或那些渴望跻身中上层的家庭，胡佛家族就属于后者。她主要建议男孩应该保持活力和勤勉，他们的外表和举止彰显了其内心性格。这些积极特质可以通过玩游戏和参加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加以磨炼，这是“对道德本质的重要考验”。[32] 棒球就特别有助于培养诚实和韧性等可取的品质。与此同时，体育确实存在道德危险。克拉克对运动员时常爆出赌博丑闻感到

惋惜，比如 1877 年路易斯维尔灰人队的球员故意输掉比赛以换取赌徒的贿赂。她也不赞成那些更为激烈、可能致伤的运动，特别是橄榄球。[33] 虽然《如何教养男孩》强调男孩要衣着整洁、举止得体，但克拉克不希望这种精致优雅有损男子的阳刚气概。和其他人一样，克拉克抱怨说男孩的都市化损害了他们的职业道德，她担心非体力工作会削弱劳动与成功的联系。作为证据，克拉克列举了许多“乡下小伙”经过童年的努力奋斗后成为伟人的例子，包括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①、大卫·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②、纳撒尼尔·鲍迪奇（Nathaniel Bowditch）③、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亨利·克莱（Henry Clay）④、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⑤。[34]

弗兰克·奥尔曼·贝克也是类似的思路，并在著名心理学家 G. 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的研究基础上塑造了一个 10 岁男孩的理想形象：精力充沛、体格健壮、组织性强、充满好奇、忠诚节俭。如果一个男孩表现出“不受约束的行为爆发”，他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发泄“被压抑的本能”罢了。贝克认为游戏有益于身心发展，

---

① 丹尼尔·韦伯斯特（1782—1852），美国著名政治家、法学家和律师，曾三次担任美国国务卿，并长期担任美国参议员。

② 大卫·利文斯敦（1813—1873），英国探险家、传教士，维多利亚瀑布和马拉维湖的发现者。

③ 纳撒尼尔·鲍迪奇（1773 —1838），美国数学家，常被视作现代海上航行的奠基人。

④ 亨利·克莱（1777—1852），美国著名政治家、演说家，辉格党的创始人。

⑤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1805—1879），美国著名废奴主义者、社会改革家、出版家。

可以为躁动不安的人提供发泄精力的途径，也可以作为男孩保持活力的手段。[35]

面向男孩的作品中，描绘男性气质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杰弗里·汉托弗（Jeffrey Hantover）指出，“1894—1913 年间流行的男性主角传记杂志从追捧虔诚、节俭、勤劳等被动特质，转变为强调活力、强硬、掌控力”。[36] 类似的特征也受到美国童子军（Boy Scouts of America）的重视，该组织成立不到十年就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男孩团体。其执行秘书詹姆斯·E. 威斯特（James E. West）表示：

> 真正的童子军不是“娘娘腔”。他不是“小勋爵方特勒罗伊”（little lord Fauntleroy）[①] 那样的温室植物。他身上没有什么“牛奶和水似的柔弱感伤”；他不畏惧黑暗。他不做坏事，因为他要避免失去体面。他不是个矮小孱弱、沉闷无趣或书呆子气的小伙子——那样的人满心幻想却无所作为——而是生机勃勃、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兴味盎然，对自己想做的事情充满想法，也知道该怎么着手。他有许多理想，也有许多偶像。他不对母亲唯命是从。虽然崇拜母亲，愿意做任何事让她免于痛苦或不安，但他自力更生、心性坚定、活力满满。[37]

威斯特轻蔑地谈及“娘娘腔”，不仅仅是在批评缺乏运动天赋和

---

① 出自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1849—1924）同名代表作，该作品的主角“小勋爵”原为平民出身，在经历人生巨变后成为爵位继承人，具有天真善良、宽容优雅等特质。

28

活力的男孩。这些指南指出，男性的成长很容易受到性异常的影响。在贝克看来，“性方面的腐化堕落”是“家庭必须面对的最大敌人”。这句话出自一位新教主教之口，他认为“当前社会生活最严重、最有害的问题是淫秽（impurity）增多，这对个人和大众而言都是个灾难”。[38]这种强硬的措辞让人毫不怀疑社会将如何对待那些行为反常的年轻人。

林德夫妇在《米德尔敦》一书中写道，汽车的兴起和高中的普及通过拉远青少年与父母的距离和模糊前工业化时代性别分工的界限，改变了青少年关系的现有格局。这些发展使得两性之间可以自由接触，也催生了新的性别表达方式。对社会变迁的焦虑情绪在米德尔敦无处不在，许多居民呼吁传统的秩序维护者（包括宗教组织和国家）来统摄这些他们视为危险的发展倾向。

显著增多的失德行为已经成为天主教、各新教领袖势力和一些致力于促进公共道德的私人组织的攻击目标，这些组织全部成立于1878—1905年间，包括新英格兰观察和护卫协会（New England Watch and Ward Society）、十五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Fifteen）、
29 十四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Fourteen）。[39]失德行为也受到了许多妇女组织和禁酒组织的关注，这些组织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掌握政治影响力，其中包括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国民纯洁会（National Purity Congress）、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美国警醒会（National Vigilance Association）。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反对社会堕落的斗争赢得了政界各方颇具影响的势力的支持。美国社会卫生协会（American

Social Hygiene Association）成立于1914年，影响力不凡，旨在通过推广教育和宣传高尚的道德来抑制性病传播，由赫尔大厦（Hull House）[①]的创始人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等进步人士领导。

公共道德倡导者的主力军可能是纽约反堕落协会（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简称NYSSV），该组织由内战老兵、虔诚的基督徒安东尼·康姆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于1873年成立。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下，康姆斯托克及其同伴向警方透露了数个卖淫窝点的消息，说服了当局起诉那些倡导节育的人，并成功游说国会立法禁止通过美国邮政散播“淫秽书籍和文章”的行为，他们还试图阻止商贩在星期日销售酒类。部分出于这种压力，纽约当局开始积极采取行动，监督并起诉“失德”行为。根据历史学家乔治·昌西（George Chauncey）的说法，“在曼哈顿，因教唆同性恋而被定罪的男性在四年内翻了八倍，从1916年的92人升至1918年的238人，再到1920年的750人以上”。[40]尽管康姆斯托克本人颇具争议，但他和纽约反堕落协会还是得到了大众的广泛支持，尤其是上层阶级的支持。1915年康姆斯托克去世后，他精心挑选的继任者约翰·萨克斯顿·萨姆纳（John Saxton Sumner）继续领导与性自由主义的斗争。[41]

胡佛能接触到关于性、淫乱和男性气质的焦虑情绪，主要是通过他信仰的教派及其为宣扬时新的基督教男性气质所做出的种种努力。面对人们对性别角色转变和更为普遍的男性气质危机的担忧，教会领

---

① 赫尔大厦（又称赫尔馆、赫尔宫协会），美国著名社区服务中心。其纲领具有广泛性，后发展为社会改良主义团体。

袖试图重新强调“男性是上帝在俗世王国的主要建设者”的观点。这个观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教会看待少年人的态度，其支持者认为，“现在 12 岁或 15 岁的男孩将会在 20 年内接管世界”。[42] 它的关键节点是“强健派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的出现，这一运动强调男性气质在主流新教中的作用。[43]

30 向这些男孩灌输强烈的基督教道德观，等到他们长大成人，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就会收获回报。《牧师与男孩》（*The Minister and the Boy*）是艾伦·霍本（Allan Hoben）1912 年为牧师撰写的指南。在该书中，霍本主张牧师应当倡导年轻男性信徒进入政府（而非教会）工作。他宣称，“由于外国移民大量涌入，种族问题尚待解决，政治腐败，政府官员庸碌无为，美国更需要良好的公民意识而非宽容大方，更需要政治家而非牧师”。[44] 据霍本及其盟友说，美国正面临着一场社会政治危机，而救赎美国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影响年轻男性，使其遵守更为正当的道德准则、职业准则、个人准则。

基督教新男子气概倡导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说服公众基督教和阳刚的男性气质并非不可兼容。基督徒的美德和上帝的荣耀被重塑为男子汉的行为。基督教评论家用来形容虔诚的表达变得十分强硬。威廉·拜伦·福布什（William Byron Forbush）在其 1915 年撰写的指南《家庭中的男孩问题》（*The Boy Problem in the Home*）中建议道，父母应鼓励其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成为“年轻的角斗士”，并“对上帝抱有男子汉的敬畏心”。[45] 这种剑拔弩张式的宗教表达是经过专门设计的，针对的就是那些认为现代化导致美国社会普遍疲软的民众。另一种策略是将基督教与历史上的领袖及成功典范联系起来。俄亥俄州牧师杰

森·诺布尔·皮尔斯（Jason Noble Pierce）在 1912 年的一本手册中指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大多是基督徒”。[46] 因此，基督教就是通向伟大的道路。

牧师被教导参与到男孩们在赛马场、学校操场、运动场举办的活动中，由此吸引年轻男性加入教会。霍本建议牧师“通过与男孩在俱乐部、比赛、露营中的交往”赢得年轻男性的忠诚。[47] 在 1909 年一本名为《男孩与教会》（*The Boy and the Church*）的巨著中，尤金·C. 福斯特（Eugene C. Foster）也提出了类似建议，表示牧师可以利用体育运动与年轻男性拉近距离。福斯特建议教会领袖关注能够吸引年轻男性的《圣经》课程，还告诫道，男孩觉得“主日学校时常强调的种种品质很‘娘娘腔’”。[48]

娘娘腔化（sissydom）似乎是许多牧师担心的问题，他们忧虑的不仅有他人看待自身教派的方式，也有教义的实际内容。福斯特似乎希望教会课程体系能够更加实用，他对主日学校的图书馆感到失望，认为里面的书籍“说是给男孩阅读的，但书中的‘娘娘腔’过着天使般的生活，给女孩读的则因角色太过甜腻而令人作呕”。[49] 他还认为，教会在性教育方面不应保持沉默，主张牧师与那些父母逃避责任的男孩讨论“生活中的客观事实”。[50] 这个办法既可以被看作为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性别关系做出的尝试，也可以被看作将教会描绘得适应现代世界种种挑战的努力。

为进一步证实基督教的男性气质，宗教思想家重新审视了耶稣基督的身份，强调这位上帝之子是理想的男性形象，而非随便一位降落凡间的天人。这样看来，耶稣在世间表现出的男性气质是所有人应当

努力追赶的目标。在《基督的男性力量；或，把基督当作人来衡量》（*The Masculine Power of Christ; or, Christ Measured as a Man*）一书中，杰森·诺布尔·皮尔斯将耶稣描绘为真男人的典范，认为“耶稣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充斥着力量”。[51] 皮尔斯指出，耶稣面对诱惑时的抵抗力、不受侵蚀的美德、领导他人的嗜好都是证据。他以更具对抗性的语言介绍了耶稣在世间遭遇的考验，不断谈起他的“敌人”，并将他与恺撒、拿破仑、亚历山大等军事领袖进行比较。[52] 这样的重新评价没能让耶稣拥有和《旧约》中的上帝同样的品性；在皮尔斯的描述中，他仍关爱邻人，关爱弱势社会成员。但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认为，耶稣提倡的爱显然不是“软弱或愚蠢的爱”。这种爱坚不可摧、活力十足、重在实效；这是男人可以骄傲表露的爱。

罗伯特·沃伦·科南特（Robert Warren Conant）1915 年的论文《耶稣的男性气质：一种新观点》（*The Virility of Christ: A New View*）呼应并扩展了皮尔斯的观点，强调“耶稣代表了最强壮、最刚健的男子，他没有任何柔弱之处”。[53] 把耶稣定义为男人的极致，也意味着他站在了女性气质的对立面。这种观点不仅仅是审美层面的姿态改变。在科南特看来，“基督教女性化”严重削弱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尤其是公民的道德品质。但科南特也写道，这种病症的根源本身就是解药，“因为宗教有责任也有特权为任何衰颓的倾向，包括耶稣的阳刚心理，提供必要的救治……宗教应该找出思路，指明方向”。[54]

耶稣深刻的阳刚之气，甚至足以让人相信他拥有完成最终使命的能力。皮尔斯表示，耶稣“所具有的男性力量可被所有的男人同样拥有，他们由此变得伟大并将拯救世界”。[55] 同样的救赎力量也能用来促进

基督徒和全体人类的道德福祉。就如科南特反问的那样：“富有男性气质的耶稣和基督教的训导难道不会通过宣扬男性化品格来促进公平正义吗？”[56] 这是基督教男性气质的关键所在：世界上的道德领袖因何种品格变得完整，其他男人也不例外。男子气概是一种美德。

在自己的生活中，基督徒可以在身体和心灵层面模仿耶稣的男性气质。基督教新男子气概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强健派基督教”的影响，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运动致力于将宗教上的虔诚同体格强健联系起来。“强健派基督教”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在1880—1920年间影响力最为广泛，当时“英美大批新教牧师得出结论，如果男人并非身体健康又‘富有男子气概’（manly，这个词暗示着力量、耐力和其他固有印象中的男性特质），他就算不上真正的基督徒”。[57] 历史学家克利福德·普特尼（Clifford Putney）认为，美国“强健派基督教的巅峰”出现在1919年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行的美国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传教士百年庆典上，其间由一千名年轻男性组成的军训队会在展览场地巡逻，他们是卫理公会能找到的最健康、最强壮的人选，他们负责证明“宗教对男孩意味着‘男性化、强健化、吸引力’”。[58]

基督教与年轻男性身体素质的联结，自然而然地在体育运动上体现了其价值所在。教会领袖开始重新思考维多利亚时代的体育等级体系，该体系认为有些体育爱好有助于发展绅士风度，有些则很可能会助长野蛮行径。现在，即使是那些更为激烈粗暴的运动（包括橄榄球在内）也有助于培养年轻男性的理想品格。霍本认为团队运动是“通过亲身体验，培养男孩正义感或公平竞争意识最有效的手段”，并指

出“在正确的领导下，男孩很快就会意识到，真正的男子汉运动与拦路抢劫和流氓恶棍相去甚远”。[59]时至今日，适当监督下的体育比赛在传递男性文明价值观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美国，棒球和橄榄球具有灌输理想价值观的作用，因此被视为效率最高的有组织运动。霍本认为，棒球可以传递许多美德，包括团队合作、忠诚意识（身穿制服和“牺牲打”①等），以及将团队成功置于个人成功之上的信念。[60]橄榄球则被视作更为激烈的全民娱乐活动：

33

> 棒球传递的美德全部可以在橄榄球中获得，只是表现得更为突出。当然，比起棒球，橄榄球更强调肉体的英勇无畏，对团队忠诚及其引申的其他品格也要求更高。一个组织良好的团队中，成员彼此间的关系好比一份永不磨灭的情感。团队陷入困境，急需连进两球时的加油打气；不论胜算如何，充满斗志，将比赛进行到底；伸出手去扶住刚刚运球向前的人；轻拍队友的背部；情不自禁地拥抱；输掉比赛后一同流下伤心的眼泪——这些都是意义非凡的社会和道德体验。[61]

橄榄球对身体素质的要求足够严苛，反而可以容忍参与者情难自控时做出的感性举动，包括哭泣和表达情感的肢体动作。情绪化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是在体育运动的背景下，并且是用来实现更为雄伟的

---

① 棒球比赛中，击球员牺牲自己安全上垒的机会而使跑垒员进垒得分的击球战术。

目标。

基督教对男性身体素质的关注，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 YMCA）的迅速发展。基督教青年会于 1844 年在伦敦成立，旨在改善“年轻男性的精神、思想、社会和物质条件”，后于 1851 年首次传入美国。[62] 在大西洋两岸，基督教青年会成了鼓励青年男性基督徒参与体育活动，通过肉体完满来赞颂上帝的地方。这些活动占用了年轻男性的时间，也为他们提供了发泄精力的途径，由此从两个方面分散了他们对不太健康的娱乐消遣的注意力。霍本衷心支持基督教青年会，指出“它重现了希腊时代在身体健康方面的理想，其全面健康的生活理念符合上帝的意志，缓和了基督教高高在上、远离凡俗的气质”。[63] 对许多当代观察家来说，基督教青年会正在尝试创造美国社会最为欠缺的东西：道德力量与肉体力量相匹配的男性领袖。

胡佛首次学习到男性基督徒的守则是通过家庭熏陶。胡佛的父母——更关键的是他的哥哥——坚持让这个家中幼子接受主的教育。胡佛曾回忆道：“我坚信性格的塑造始于家庭……我记得，在家中没有一顿饭前是不做祷告的。我就是这样长大的。”[64] 埃德加起初信仰的是改革派路德教，路德教会就位于离他家不远的街道拐角处。在哥 34
哥小迪克森的引导下，埃德加很小就开始大量参与教会活动。他曾在一年的时间内每周准时参加教会礼拜，因此被奖励了一本《新约圣经》。[65] 后来，他开始在改革派主日学校授课，年仅 14 岁就被任命为教会通信秘书。[66]

十几岁时，埃德加改信了教会和教派，转而加入华盛顿第一长老

会（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Washington）。这种转变既增加了地理距离，也制造了家庭冲突："长老会"离家更远，母亲安妮更是公开反对小儿子背弃路德教。不过，第一长老会在华盛顿社会地位尊崇，小迪克森近来也开始带自己的小家去那做礼拜。第一长老会会众成立于1812年，曾有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等华盛顿名流捐赠礼金，在当地可谓历史最悠久、最受人尊敬。教会会众与社会政要联系紧密，这也让教会格外体面。

最重要的是，加入第一长老会意味着埃德加周日可以聆听唐纳德·坎贝尔·麦克劳德（Donald Campbell MacLeod）讲道，他是一位魅力非凡的教会领袖人物。麦克劳德起初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德维尔，1899年成为"长老会"牧师。他当时年仅26岁，在负责的教区享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在年轻的信徒中。尽管有些传记作家声称，埃德加转信长老会，只是在跟随哥哥的脚步，但胡佛本人表示，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最重要的原因是对麦克劳德的个人崇拜，他甚至称麦克劳德为"我的英雄"。[67]

正是麦克劳德牧师给埃德加上了关于男性基督徒有何责任的最清晰的一课。在1954年的一次采访中，胡佛表示麦克劳德是"一个阳刚、清醒、充满力量的男人。他会支持我们的球赛，并在其中担任裁判。如果冷不丁冒出句'该死'，他也不会在意。他对我们充满兴趣，而且他不是装出来的。因为他，我差点就成了牧师。他正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68]

麦克劳德对预防性堕落的关注还体现在他对《残次品》（*Damaged Goods*）的支持上。这部道德剧由尤金·白里欧（Eugène Brieux）撰写，

讲述了一个年轻男性因婚前偷情感染梅毒，后来又传染给他的妻子，最后生了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孩子的故事。这部剧于 1912 年在华盛顿演出，在此之前，麦克劳德“登上管弦乐队指挥站的台子，宣布这场演出的本质、道德剧的神圣性、观众的特点决定了这是一次代表全体 35
人类的宏大布道，在此祈求上帝的赐福是非常合适的”。[69] 麦克劳德发表的此类公开声明，为埃德加等年轻信徒树立了道德标杆。这种将宗教性质的道德准则应用于公民责任的做法，无疑对年轻的胡佛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加入了反酒吧联盟（Anti-Saloon League）、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志愿宣道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并在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担任荣誉会员。为胡佛作传的理查德·鲍尔斯将这些组织都解读为“新教美国抵御外来移民威胁的手段”。[70] 事实上，这些组织作为公开展现信仰的例证，揭示了胡佛是如何逐渐将基督教道德和正义视为治理快速变革的美国社会的最佳方式。后来，胡佛证明了他的理念：联邦政府是承担道德监管职能的理想机构。

而对于埃德加在道德教育组织上的兴趣，另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这些组织致力于培养具有高尚情操的绅士。除学生志愿宣道运动（其重点是促进国际传教活动）外，这些组织的核心利益至少都包括了规范男性道德。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和反酒吧联盟表示它们的使命与男性有关。二者认为，要想改善妇女儿童的福祉，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限制男性饮酒。减少男性酗酒极大改善了道德状况，包括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稳定存在，强奸和家暴减少，被迫卖淫的女性和嫖客数量下降。总的来说，禁酒运动承诺让男人重返家庭，从而重申家庭中的父权秩序。因此，胡佛不断意识到，基督教男性气质对道德社会的发展是多

么重要。虽然政府可能是规范社会成员遵守基督教道德的理想机构，但家庭、政府乃至整个华盛顿的男性领袖必须是传达这种价值体系的主要成员。

埃德加孩提时代那种平静的家庭生活在他离高中毕业还有几个月时破裂了。1913 年初，他的父亲老迪克森在精神崩溃后接受治疗。由于“烦躁和悲痛情绪交替出现”，他在马里兰州的劳雷尔疗养院又待了几个月。[71]

36 关于埃德加那时是否探望过父亲（或多久探望一次），目前没有任何记录。随后几年里，老迪克森一直在与精神疾病做斗争，1917 年 4 月，他因精神疾病复发失去了海岸和大地测量局的工作。不久，他又回到劳雷尔疗养院长期居住。此后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 1921 年去世。

除情绪压力之外，老迪克森入院治疗也给胡佛家族造成了严重经济困难。家中不仅失去了他每年 2000 美元的薪水，也无权申领养老金，尽管老迪克森已经为政府工作了四十二年之久。哥哥小迪克森也有自己的小家要养活，因此养家糊口的主要责任落在了小儿子身上。尽管获得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奖学金，但胡佛还是决定去上离家不远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大学成了胡佛家庭生活的延伸。他加入卡巴奥发兄弟会（Kappa Alpha fraternity）后，母亲安妮变成了兄弟会的“编外女管家”。在成长过程中，埃德加似乎从未动摇过自己的道德观，尽管他“似乎十分享受同性友谊，热衷于搞恶作剧，卡巴奥发兄弟会的成员后来回忆说，胡佛‘对垃圾游戏、扑克牌、酗酒等荒唐行为态度不明’”。[72]

1917年7月，在父亲被解雇三个月后，胡佛拿着到手不久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接受了美国司法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的文员职位。他的余生都会在那里度过。

***

胡佛选择接受基督教影响下的男性气质和道德观，以此应对现代化的种种挑战；与此同时，美国小报和八卦杂志的版面上也在讨论这些话题，不过立场与之大相径庭。20世纪初的八卦产业大多离不开对城市化、外来移民、工业化、企业化、性别角色变化的焦虑情绪，这也是胡佛宣誓效忠的那些保守组织诞生的起因。但这些让改革者夜不能寐的社会问题却被八卦媒体商业化了，八卦媒体试图取悦读者，而非吓唬他们。最重要的是，不同背景的美国人可以透过小报和八卦杂志一睹现代都市的精彩之处，同时以其为框架理解不断变化的社会格局。

尽管美国八卦杂志的发展脉络悠长而模糊，现代美国八卦杂志还是可以追溯到《都市话题：社会杂志》（*Town Topics, the Journal of Society*）。该杂志创立于1879年，最初名叫《安德鲁斯的美国女王：国家社会杂志》（*Andrews' American Queen: A National Society Journal*），主要发布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名单。这个模式并没有带来商业上的成功，尽管为了盈利又改名为《都市话题》，杂志还是在1885年被迫宣布破产。29岁的律师尤金·曼恩（Eugene Mann）以最低价收购了该杂志，他没有任何出版方面的经验。曼恩接手后的杂志采用更轻快活泼的语调，“谦逊”地宣称自己是“有史以来最紧跟时事、最前途光明、最诙谐幽默、最机警明智、最新颖独特、最具娱乐性

37

的报刊”。[73] 这次转型的关键是“闲逛”（Saunterings）栏目，相较于其他刊物，这个轻松愉快的八卦专栏上的故事实在是有伤风化。接下来的六年里，“闲逛”使得杂志的发行量从 5000 份增至 63000 份，广告费用涨至原来的 8 倍。[74]

杂志的转型方向引起了不必要的关注，尤其是那些得罪人的话题报道。受害人时常会出现在《都市话题》的办公楼，要求当面会见冒犯他们的作者或编辑。他们的来访太过频繁，于是编辑部制定了新对策，就是告诉愤怒的人们，他们要找的人“昨天刚刚去世”，再眼泪汪汪地表示那些冒犯性的文章正是“他最后写下的遗作”。关于这个计策是否成功，目前没有任何记录。受害人的愤怒还表现在诉讼数量的上升，罪名包括诽谤中伤和发送低俗邮件。1887 年，曼恩被判犯有猥亵罪，但执行了缓刑。1891 年，他又因同样的罪名被捕，这可能是因为“闲逛”栏目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堕胎在年轻女性群体中越发普遍。[75]

曼恩知道，二次犯罪的服刑时间可能会大大延长，于是谎称生病，逃之夭夭，把《都市话题》的编辑工作留给了他的哥哥威廉·道尔顿·曼恩上校（William d’Alton Mann）。1864 年退伍后，曼恩上校花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开展各种创业计划，包括为骑兵用枪的平衡装置申请专利、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勘探石油、设计有轨车辆，但无一例外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失败。

在接手《都市话题》前，曼恩上校也曾涉足过媒体行业。他通过合并阿拉巴马州沿海三家规模较小的报社，成了《莫比尔纪事报》（*Mobile Register*）的老板。曼恩上校利用这份报纸支持民主党，宣

传新成立的三 K 党（Ku Klux Klan）[①] 的政见，由此建立了一个忠实的拥护者网络，这对一个重建事业的内战老兵来说无疑是个壮举。1869 年，在阿拉巴马州重新加入联邦后举行的特别选举中，曼恩上校 38
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国会议员，但因失去黑人选票而落选。他在莫比尔市又待了三年多，然后前往纽约和伦敦，那时他的主要工作是有轨车辆制造。[76]

将近二十年后，曼恩上校又回到了主编的位子上。1885 年弟弟买下《都市话题》后，曼恩上校可能已经拥有了三分之一的股份，但直到 1889 年他的有轨车辆业务倒闭后，他才开始在报社发挥重要作用。曼恩上校可能是在目睹了诸如《世界与真理》（*World and Truth*）等伦敦色情小报的成功后，才建议弟弟将《都市话题》向下流猥亵转型。

从任何意义上说，他那惊人的直觉都高过生活本身，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每天到麦迪逊广场公园的戴尔莫尼科餐厅用餐的结果。曼恩上校在沿用弟弟做法的基础上加以拓展，把《都市话题》周刊变成造谣和影射纽约精英人士的杂志，其中包括阿斯特家族（Astors）和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s）。[77] 人们认为是他创造了“盲闻”（blind item）。“盲闻”是当时八卦刊物的普遍特征，指在不指明对象的情况下印刷散播谣言。曼恩上校从不讲求细节，他会在临近的段落旁边（通常在对开页）写上对象的名字，这样就不会显得内容太过隐晦。他还开创了维持各种线人的策略，包括酒店职员、剧院舞台工作人员和餐厅老板。

---

① 三 K 党奉行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和基督教恐怖主义，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最早于 1865 年由美国南方邦联军队的退伍老兵组成。

“闲逛”充斥着被其他社会杂志视为禁忌的话题：酗酒、婚前性行为、性病、通奸、非婚生子女、同性恋、离婚。曼恩上校曾表示，“纽约的社会不会变得比今天更毫无价值、更空虚无聊、更做作浮夸。这里住的都是些蠢蛋、浪子和暴发户”。[78] 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位采访者称，他的抱负是“通过让社会名流感到自我厌弃，停止他们那愚蠢、空洞的生活方式”，以此完成改造。用曼恩上校自己的话说，他是在“教导伟大的美国民众不要关注这些愚蠢的傻瓜”，就算他不出版《都市话题》，也会有“没有道德责任感”的竞争对手这么做的。他总结道，“我做这项工作，是为了社区，为了伟大的美国”。[79]

曼恩上校的“道德责任感”并没有让他停下出版工作。“闲逛”是一部评判、羞辱、蔑视的杰作。“贝尔蒙特夫人染了头发，”一期杂志刁钻地形容道，“虽然戴着钻石戒指，但她的手却像洗衣妇一样皱巴巴的。”另一篇专栏文章如此描述一位名叫范·艾伦的小姐，她“喉咙有些毛病，至多半个小时必须要喝点酒”。[80] 杂志还批评了同性恋和气质柔弱的人，比如，在描述时尚名人哈里·莱尔（Harry Lehr）时说，“他炫耀了自己的诸多女性化特质”，包括“他粉红的面容和金色的头发，有气无力的声音，怪异的姿势，以及整体妆容的阴柔之美”，这些“已经超出了体面社会的容忍范围”。[81]《都市话题》利用性别暗示莱尔的同性恋谣言，这是其自创的典型八卦杂志策略。另外，《都市话题》的言下之意是，人们对男性名人身上的女性化特质是有容忍空间的，这表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气质是逐步形成、依阶级而改变的。

39

同时，“闲逛”与八卦形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不管外界如何指责“闲逛”专栏，它的总体影响并不深刻。正如曼恩上校所说，“闲逛”试图取笑纽约上流社会的自以为是，他一心想要扮演一个尖刻辛辣的宫廷小丑。专栏采用轻松的笔调，在篇幅较长的新闻中加入了短小的话题笑话：“梅（May，与“可能”双关）说，我听说你很有爱心。梅利特（Merit，与“美德”双关）回答道，是啊，我总把看不上的追求者推给我的妹妹们。”[82] 这种轻快明朗的语调后来被美国八卦杂志广泛应用。但“闲逛”不怎么明确谈及政治八卦，而是倾向于关注家庭和社会秘闻。

对《都市话题》来说，最重要的是“闲逛”能够吸引读者。截至1893年，杂志封面上印有自豪的宣言，“发行量保证突破75000册”。[83] 一位纽约名人后来回忆称，《都市话题》“几乎打入了塔士多公园（Tuxedo Park）[①] 的每间屋舍，就像渗透到纽波特（Newport）[②] 的小屋、别墅、豪宅中一样。主人和仆佣都读得津津有味”。[84] 杂志对各社会经济阶层的读者有着巨大吸引力，这点在杂志内容和广告目标客户上都有体现。一个名为“抢钱世界”（Other People’s Money）的板块重复出现，其中的散文语调积极，教会读者辨别“牛市和熊市的线索”。这种建议直白肤浅，又出现在八卦杂志的末页，这表示其目标客户只是普通投资者，或是那些利用股市扩大资产的中产阶级。1893年2月16日那期杂志的“抢钱世界”告诫道：“春季躁动对多头活动来说绝非有利，却为资本家提供了机会，融资空间狭窄的投资者甚至可以趁

① 塔士多公园位于纽约市西北部，经济大萧条前富豪精英云集。
② 位于罗德岛南部的海滨度假胜地。

此证券疲软之时买入，持有一段时间后将会收获非常可观的利润。”“抢
40 钱世界”还提到了“华尔街用语”中的常用术语，这说明该板块的预期受众不是华尔街业内人士。[85]

广告通常出现在杂志的最后两三页（类似报纸的广告版面）或每个栏目底部的单行提示。铁路线路和投资机会的广告大受欢迎，说明读者群体更富裕。[86] 但最常见的广告还是有望改善容貌的产品。1893年1月，波特夫人（Mrs. M. A. Potter，“纽约唯一的女性从业者”）宣传自己的“电解医美：目前唯一能够永久去除多余毛发和癍的方法，无痛，不留疤痕”。波特夫人的广告下面紧接着帕克焦油皂（“用于治疗皲裂、擦伤、瘙痒、皮肤不适和汗臭”）；可以提供“绝佳身材、美妙肤色、健康身体”的神秘疗法，源自旧金山的埃拉·登特夫人（Mrs. Ella M. Dent）；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名媛俱乐部售出的“丁香苷”（“美化和增强女性特征的产品，潮流女性都在用”）。[87] 自我提升的相关内容太多，这可以解读为国家层面对社会进步的关注与“个性”不稳定催生出的焦虑情绪被联结在了一起。

这些广告也还原了民族品牌的发展历程，民族品牌既是现代化的标志，也是现代化的产物。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市的史密斯·邓克利公司承诺，会将其著名的卡拉马祖芹菜罐头免费邮寄到美国的任何地方；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波佐尼公司兜售的肤色蜜粉则“可以在任何药店和高档商店买到”。[88] 一家饮料公司建议读者保持品牌忠诚，这则建议刊登在“抢钱世界”板块底部：“在俱乐部或咖啡馆请点‘约翰尼斯’。它能与各种烈酒和葡萄酒完美融合。不要接受任何其他替代酒水。”[89] 同时，广告在杂志收入中只占一小部分，《都市话题》的收入主要来

自订阅费和报摊销售。

这份杂志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直到一次轰动全国的审判后才有所改变。1905 年，一名《都市话题》的员工因敲诈埃德温·博斯特（Edwin Post）被捕，后者是未来的礼仪专家艾米莉·博斯特（Emily Post）不忠的丈夫，随后曼恩上校和《都市话题》被以勒索罪起诉。曼恩上校的代理人拿着埃德温出轨的证据与他交涉，包括他用来安置情妇的小屋地址。如果埃德温不想在《都市话题》上看到自己的婚外情细节，他就得掏出 500 美元。埃德温惊恐不已，也可能是不够机灵，因此他 41
向妻子坦白了这件事，妻子却建议让警方插手此事。曼恩上校的助手查尔斯·阿勒（Charles Ahle）落入警方的圈套被捕。《都市话题》的敲诈勒索，一直让行为不端的纽约精英感到困扰不已。阿勒被捕后的第二天，埃德温去纽约证券交易所上班时，他的股票经纪人同行纷纷停下手头的交易，起立向他鼓掌。[90]

博斯特夫妇还提起了民事诉讼。曼恩上校成功解决了这场诉讼，事实上，他从未在诽谤案中败诉。不过《都市话题》被永远改变了。尽管杂志还在继续报道八卦，尤其是通过“不那么隐晦的方式”，但已变得相对谨慎，基调更为保守。这种温和克制最终导致发行量下滑，杂志再也没能恢复从前的地位。[91]

《都市话题》的流行时间虽然相对短暂，但恰逢监视国家男性气质发展的关键时刻。它不仅是曼恩兄弟大胆创业、勇敢作为、洞察社会的产物，也是 19 世纪末美国社会变革驱动力的产物。某种程度上说，《都市话题》试图回应现代化背景下社会持续发展带来的种种挑战，包括在日渐复杂和匿名化的公共领域中寻求社会联结，在消费资本主

义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创造新的身份，围绕性别和性别政治变化的焦虑情绪，以及由此产生的重新定义社会风俗的需要。

在埃德温·博斯特对《都市话题》进行“消毒”的十年后，美国最臭名昭著的八卦杂志变成了《百老汇简讯与社会八卦》（*Broadway Brevities and Society Gossip*）。这本杂志于 1916—1925 年间在纽约出版发行，创始人斯蒂芬·G. 克洛（Stephen G. Clow）出生在加拿大，生性叛逆。杂志的特色是社会八卦和戏剧界绯闻，是靠影射来暗示丑闻的杰出作品。杂志倒闭的多年后，联合专栏作家威斯布鲁克·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称克洛为“酒吧新闻业的鼻祖”。[92] 值得注意的是，《百老汇简讯》会直接点明八卦对象的名字。用媒体历史学家威尔·斯特劳（Will Straw）的话说，“它的八卦对象通常是那些在战后经济繁荣中崭露头角的社会群体：乍富的企业家、时髦商品（如再生面霜）的制造商、来自中西部的新曼哈顿人”。[93] 但和曼恩上校一样，克洛也利用《百老汇简讯》敲诈制片人特克斯·里卡德（Tex Rickard）这样的富人，承诺只要他们在杂志上打广告，就会大肆吹捧他们。[94] 其他人则选择花钱消灾，不让克洛在杂志上刊载对他们不利
42 的内容，如酵母大亨朱利叶斯·弗莱施曼（Julius Fleischmann）、纽约洋基队老板雅各布·鲁珀特（Jacob Ruppert）、银行家 W. 埃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

也许《百老汇简讯》最惹人注目的是其在恐同话题上的浮夸行文，这一点在“仙境之夜”（Nights in Fairyland）系列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系列据称是对纽约同性恋夜生活的幕后观察，至少有 13 篇文章。“仙境之夜”承诺会带读者进入“阴阳人”（androgynes）的秘密世界，

而《百老汇简讯》对“阴阳人”的定义是“我们今天乐于称为‘仙子’的那些精神病杂种”。[95] 这些文章的作者身份不明，他们像是熟知一切的导游，引领着读者穿梭在曼哈顿的各个社区，领会潜藏其中的阴森可怖。一则报道称：“仙子国度有自己的专属领地。”“包厘街可以看到贫寒穷苦、衣着破旧的同性恋；布朗克斯区有犹太血统的同性恋；桑树街上充斥着讲意大利语的同性恋；唐人街全是来自东方的滑稽同性恋。110 街到 160 街之间那条长长的莱诺克斯大道上的有色人种街区里，也能看到同样的景象：成群结队的‘大小伙子’卖弄风骚，从事着所有行业中最古老、最有害的职业……整个城市，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是如此。”[96] 在这趟行程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城市化导致的性变态，还可以看到外来移民（以及彼时非裔美国人的大规模流动）融合带来的麻烦。尽管这个系列有时也会提到女同性恋，但它的报道和焦虑情绪主要还是集中在男同性恋身上，他们是酷儿世界（queer world）入侵的主力军。

除了证明同性恋故事可以提高销量，“仙境之夜”还向读者大众介绍了指代同性恋的一系列词语，包括“阴柔的”（camp）、“仙子”（fairy）、“妓女”（punk）、“基佬”（fag）和“性别倒置”（invert）。该系列还挖出了某某著名戏剧演员、导演和制片人的同性恋取向，他们参加了据称是存在同性奸情的聚会。报道有时会提到全名，但更多时候只说出对象的名字首字母，这种策略能扩大嫌疑范围。尽管“仙境之夜”语调玩味，但它对亚文化的描述显然存在恶毒暗示。1924 年 11 月，该系列的第 11 篇文章结尾写着：“警惕同性恋国度！”

真是肮脏不堪啊！但这也只是预示着“现在的境况和将要出现的未来”罢了。的确，1924年是属于主的一年，但正如一位才华横溢的精神病学家几天前说的那样，问题不是“谁是同性恋”而是“谁不是同性恋”。性别倒置已经严重腐蚀了现代社会结构，
43 抹杀了男女两性的分别，嘲弄了正常合理的爱欲和行为，破坏了无数人的家庭和生活。同性恋那令人作呕的恶臭弥漫在我们的鼻孔里，对任何人来说，它的威胁都是巨大的。事实上，同性恋如瘟疫般昼夜肆虐不断，使我们的文明变得虚弱又堕落，一切纯洁、甜美、声誉良好的事物都成了笑柄。如果通过这些文章，《简讯》能消灭哪怕一点儿无耻淫乱，我们都感到努力没有白费。出于这样崇高的目标，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无情的曝光行动！[97]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任何一个不积极确认和重申自己的男性气质以及异性恋取向的男性都会不断受到质疑。

第二章

公众视野下的职业官僚

J. 埃德加·胡佛大步走向停着的轿车时，司机阿尔文·卡皮斯（Alvin Karpis）急忙转身扑向后座，那里放着一把步枪。还没等这个“穷凶极恶的”家伙伸手够到武器，胡佛就抢先一步抓住了他。卡皮斯举手投降。胡佛指挥着他的手下：“给他戴上手铐，伙计们。”卡皮斯时年 28 岁，这名被报纸称为目前“头号公敌”的罪犯已被逮捕。[1] 44

至少当天（1936 年 5 月 1 日）晚些时候，胡佛面对新闻媒体发表演说时是这么描述当时情景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宣称，“胡佛亲赴新奥尔良抓获了卡皮斯”；《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也附和道，“胡佛率领 20 名特工逮捕了全国头号罪犯”。[2] 埃德加·胡佛又一次拿下了他“对犯罪宣战”（war on crime）的头号目标。

目前尚不清楚，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在新奥尔良市运河大街 3300 街区一栋矮小的公寓大楼外抓获卡皮斯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联邦调查局的记录很大程度上与胡佛的表述吻合：胡佛也在搜捕队伍

中。卡皮斯被捕时明显受到了惊吓。在其普利茅斯汽车内发现了武器，其中包括一支步枪。但这些记录中并没有提到胡佛真的“抓住”了卡皮斯，甚至没说他靠近了那辆车。[3] 卡皮斯在 1971 年的自传中谈到，胡佛并非那个天降英雄，他是等到手下把卡皮斯团团围住，又确认周围已经安全后才出现的。“他不是带头逮捕我的人，”卡皮斯写道，“他一直等到手下通知他周围清场后，才走出来收割荣誉。”[4] 卡皮斯还指出，自己不可能伸手去摸后座的枪，因为他的普利茅斯是一辆轿跑车，根本没有后座。

45

尽管如此，卡皮斯被捕的相关报道还是体现了联邦调查局的早期发展和胡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胡佛出现在抓捕卡皮斯的现场，这是这位 41 岁的联邦调查局领导人为改善公共关系做出的部分努力。就在不久前，一位参议员谴责胡佛虚构了自己作为“犯罪斗士”的名声。4 月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田纳西州民主党人肯尼斯·麦凯勒（Kenneth McKellar）表示，胡佛和联邦调查局为其调查成果邀功，但这些成果本该属于地方和州警察。麦凯勒甚至暗示道，胡佛并不是联邦调查局公共关系部门树立的优秀警察形象。麦凯勒质问胡佛：“你抓获了多少罪犯？都有谁？”[5] 胡佛援引了他领导下的成功逮捕案例，但真正的答案其实是“一个也没有”。为了挽回颜面，胡佛发誓要参加联邦调查局下一次重大逮捕行动。听说特工已经追踪到卡皮斯去了新奥尔良，他就赶忙登上飞机前往新奥尔良参与逮捕。

在卡皮斯被捕后的公开演说中，胡佛向记者强调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将联邦调查局描绘为一支坚持铁面执法，同时采取现代警务策

略的武装力量。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也附和着联邦调查局的说法，赞扬特工们勇敢高效。报道称，“麾下四名特工被杀，卡皮斯正是嫌疑人之一，出于报复，联邦调查局迅速发起突然袭击，周围的人甚至认为这只是一起小小的执法事件”。合众国际社还指出，联邦调查局特工“非常确信自己会抓住目标，他们甚至在设下陷阱之前就包下了一架专机，预备事成后将卡皮斯带到圣保罗”。[6] 有报道称，这次成功不过得益于一名汽车销售员不经意间提供的线报，胡佛则试图重申调查本质是科学的，并告诉记者，这次行动真正取得突破，是因为敏锐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卡皮斯共犯的藏身处发现了一个啤酒瓶上的指纹。[7]

媒体报道将卡皮斯和搜捕者的周旋描述为邪恶与正义的战斗，这正是西方滥俗小说读者所熟悉的套路。许多报道认为卡皮斯是个“亡命之徒”（ desperado ）——把他比作人们臆想中的西部荒野草莽英雄，抓捕他的则是怀亚特·厄普（ Wyatt Earp ）那样的执法界传奇。[8] 同当年的警长一样，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动机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感，也是“为四名枉死的同事复仇”。胡佛一再强调，一旦卡皮斯被捕，罪犯的真面目就会立即暴露出来。他强调了卡皮斯有多恐惧，并回忆道，“被捕后不久，他就请求我下令即刻处死他。我从未见过比他更惊慌的人。事实上，我们靠近他的车时，他吓得浑身发抖，如同筛糠一般”。[9] 胡佛对一位记者回忆道，卡皮斯当时“害怕极了，都不敢说话”，还得出结论，罪犯“对我们来说都不过是黄毛鼠”。[10]

46

卡皮斯是所谓“对犯罪宣战”期间最后一名被抓获的值得各大报纸进行头版报道的知名罪犯。早在胡佛喊出“对犯罪宣战”的口号之前，

20年代中期的美国报纸就开始用这个词形容当局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付出的共同努力。是的，正是胡佛本人在三年的时间里带领联邦调查局与强盗、银行抢劫犯和黑帮分子轮番作战，最终把“对犯罪宣战”变成了一句宣传口号。为了庆祝联邦调查局取得的成功，《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在报道卡皮斯被捕的同时以年鉴的形式刊登了一系列照片，这些照片是胡佛和他的手下抓获或击毙的罪犯，包括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机枪手”凯利（“Machine Gun” Kelly）、“漂亮男孩”弗洛伊德（“Pretty Boy” Floyd）、邦妮·帕克（Bonnie Parker）和克莱德·巴罗（Clyde Barrow）、“娃娃脸”纳尔逊（“Baby Face” Nelson）以及巴克（Barker）家族（剥皮老妈［“Ma”］和儿子弗雷德［Fred］）。[11] 这场“战争”更让美国民众意识到，胡佛是国家抵御日益猖獗的犯罪活动的重要堡垒。但从更深层次上说，胡佛的处事方式让自己和联邦调查局都能充分利用当时的形势：经济格局不断变化、国民对社会道德滑坡愈发忧虑、联邦官僚机构企业化（特别是在法律和秩序责任方面）、大众媒体不断涌现。在这些领域，胡佛利用公众的性别认知，将自己和联邦调查局定位为抵御国家威胁的男性堡垒。

从1917年胡佛加入司法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调查局（Bureau of Investigation，简称BOI，后在1935年更名为联邦调查局）逐渐演变为一个大熔炉，国家监视者的男性气质的许多核心要素正是在此得以锻造。甚至胡佛上任之前，调查局就在寻求这样一个角色：他不仅是联邦警力的领导人，更是国家道德的仲裁者，由此调查局可以突出自己的地位（相对于其他联邦政府执法部门而言），并取代地方和州

执法力量。但是，早期的调查局也经历过组织混乱，时任局长还受到了渎职指控。1924 年的“茶壶山丑闻案”（Teapot Dome scandal）[①] 造成了权力真空，胡佛因此在同年担任了局长一职，继而对调查局实施全面控制。作为局长，胡佛延续了调查局对道德监督的关注，认为国内安全与道德状况直接相关。但通过制定一套全面的个人、职业、道德标准，胡佛也重塑了调查局。通过引入科学的警务策略，灌输企业组织理念，重新将调查局特工定位为新式美国英雄（即所谓“G-Man”），调查局摇身一变，成为最具权力的政府机构之一，胡佛也跻身美国文化人物的行列。在胡佛重塑调查局并于自己周围建立个人崇拜的过程中，美国大众媒体可谓一把双刃剑：好莱坞电影、广播连续剧、漫画书都对调查局特工大加赞扬，态度友好的记者将胡佛视为名流，但八卦专栏作家和疑心胡佛权力膨胀的记者则刊登谣言，质疑胡佛自我吹捧的大男子主义。总体而言，胡佛依赖的是一种基于性别的身份认知，包括白领群体的道德观和体面感，现代认识论关于科学确定性的新兴理念，以及西部边陲执法者（如怀亚特·厄普）这样的经典男性形象。

47

人们很容易认为，胡佛这番言论的潜在受益者是他本人，毕竟他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权力和控制欲望特别强烈的麦克白式人物。但胡佛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基于个人对权力的追求，更表达了异性恋、忠诚上帝、遵纪守法的白人男性主导的世界观，他们致力于维护“真正的美国精神”，而这正是胡佛本人试图追寻的理想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

---

① 茶壶山丑闻案，指在美国 1922—1923 年暴发的贿赂丑闻。

胡佛并没有推行对他个人有利的政策——他提出的政策是为了确保美国能够按照他的个人形象发展成型。

***

还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本科时，胡佛就开始为联邦政府工作了，那时他在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担任邮递员和书记员。1917 年春天，胡佛通过家庭关系，在司法部的战时应急处（War Emergency Division）获得了一份文书工作。[12] 尽管美国当时刚刚对德
48 宣战，但作为政府雇员，胡佛获准延期服役。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种逃避兵役的行为是懦弱的表现，但胡佛很可能是为了在父亲入院治疗后照顾母亲。胡佛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更能说明的问题是，这份工作要归功于战时政府的不断扩张，而这次扩张为后来创建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安全机构打下了制度基础。

战时司法部的人力需求之大，让胡佛在刚入职六个月之内就获得两次晋升。所有人都认为，他的快速晋升理所应当。1937 年，《纽约客》（*New Yorker*）是这样介绍当年的胡佛的：“他穿得比大多数人都要好，而且有点时髦花哨。他对待琐碎工作一丝不苟，热情周到地处理各种杂务。他不断承担新的任务，哪怕对加班也持欢迎态度。与所在部门的领导开会时，他会表现出一副对自己升迁信心满满的年轻人姿态。”[13] 他经常待在办公室里，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一周七天都不休息。这种恶名昭著的职业道德贯穿了胡佛的整个职业生涯。[14]

胡佛很快被任命为战时应急处的敌国公民登记部（Alien Enemy Bureau）负责人，1918 年 11 月战争结束时，他被提拔为司法部长特别助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部长 A. 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又任命胡佛为情报总局（General Intelligence Division，简称GID，有时也称“激进部门”）负责人。又过了两年，情报总局在重组中被划归调查局管辖，胡佛被任命为调查局副局长。1924 年 5 月 10 日，在沃伦·G. 哈丁（Warren G. Harding）政府的种种丑闻导致司法部的领导队伍大量流失后，新任司法部长哈伦·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任命胡佛为调查局代理局长，同年晚些时候又给予了他正式任命，事实上，胡佛此后都会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胡佛从司法部文员迅速升任调查局局长的同时，这两个机构在美国执法体系中的职能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 世纪初的几十年里，除了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以外，调查局还成为司法部维护传统的性道德准则的工具，对卖淫、异族通婚、通奸和重 49
婚等行为施加约束。调查局之所以监管性道德，主要原因是民众对此有明显需求。工业化带来了经济现代化、城市化以及移民潮，并由此衍生出社会关系的变化，这都让许多民众担心国家的道德结构会因此破裂。[15] 调查局监管性道德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为提高该机构在联邦官僚体制中的地位提供了机会。1908 年调查局成立时就没有明确的业务范围，因此它一直在和地方、州和联邦机构争夺司法管辖权。与这些机构相比，调查局可以通过道德监管增强权力。促成道德监督的法律手段是《白奴贩运法》（White-Slave Traffic Act），即人们所熟知的《曼恩法》（Mann Act）。这项法案禁止在州际或国际“出于卖淫等任何不道德的目的运送妇女和女孩的行为”。[16] 其措辞宽泛，不够具体，特别是“任何不道德的目的”一句，就导致它的确切限制还有很大解释空间。《曼恩法》仅仅是一项反绑架、反卖淫的法案吗？又或者它

的目的在于允许国家广泛监管通奸和重婚等不道德性行为?

总的来说，调查局乐于接受后面这种解释。调查局特别针对那些“非传统”的关系，尤其是未婚情侣和似乎只是出于某种便利缔结婚姻的夫妇（即建立在商业关系而非生育关系的基础上）。调查局认为，在监管性犯罪方面，自己通过促进婚姻忠诚，遏制性病传播，最终保护了万千美国家庭。在埃德加·胡佛的领导下，调查局才扩大了对这方面的关注。1921—1936 年间，调查局共调查了约 47500 个《曼恩法》有关案件。1930 年出席国会听证会前，胡佛估计调查局特工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调查违反《曼恩法》的行为上。[17] 十年后，胡佛吹嘘说，其调查结果导致 476 起案件在 1940 财年内被定罪。[18]

也许胡佛早期对调查局的道德监管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创建了淫秽档案（Obscene File）。国家的道德前哨正在不断萎缩，这种预感随着 20 世纪 10 年代末、20 年代初的事态发展变得更加强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公民被动员到城市地区，这让初获独立的个体有了突破保守价值体系的机会，战争期间，近两百万美国士兵和海员被派往欧洲作战，并在那里接触到了性欲横流的社会。[19] 随后出现了“咆哮的 20 年代”（Roaring Twenties），在此期间，美国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经济飞速发展，这也使得自由放任的淫乱行为层出不穷。一些社会改革组织对此深感焦虑，主张对淫秽制品的传播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这一努力的高潮出现在 1923—1925 年间，当时许多道德改良家共同合作，发起了净化图书运动（Clean Books Crusade），要求图书馆和书商下架淫秽文学作品。[20]

1925 年 3 月，胡佛正式制定了一项政策，用来处理任何调查局特

工认定的淫秽制品：将其放在一个个密封的信封或盒子里，外面用粗体字印上“淫秽”一词。最初，特工似乎可以选择将这些档案存放在地方办事处，或转交给位于华盛顿的调查局总部。收集和整理这些档案的程序启动缓慢，但调查局官员指出，截至 1932 年，他们已经获取了“大量的淫秽档案”。[21] 尽管直到 1942 年调查局才正式建立起集中的官方淫秽档案，但胡佛在上任局长后这么快就决定建立淫秽制品的处理程序，说明了他领导风格中的许多关键要素，包括他对道德问题的忧虑、对组织工作的嗜好和对淫秽档案的关注，这些档案未来可用于调查和打击犯罪。

后两个重点，即组织工作和档案建设，促成了胡佛在 1932 年建立调查局犯罪实验室，目的在于通过应用胡佛所说的“科学警务策略”，让调查局迈入 20 世纪。这些新手段包括指纹复原和匹配（依赖于 1924 年胡佛建立的全国指纹信息处）、笔迹分析、印模技术（人身伤害研究）、纤维分析和枪支弹道学。1938 年，胡佛自豪地宣称，联邦调查局鉴定处“每年协助抓获近 6500 名逃犯”。[22] 1935 年国家警察学院（National Police Academy）成立，为地方和州警察提供研究课程，他们会在这里学习联邦调查局号称的先进调查手段，由此巩固了联邦调查局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调查专家形象。用胡佛自以为是的 51 话说，学院的毕业生“学成归来，回到社区，就像联邦调查局特工一样熟悉最新的侦查和逮捕手段”。[23]

胡佛试图将联邦调查局描绘成一个完全现代化的警务部门，相比于其他调查部门，联邦调查局使用合乎逻辑的科学方法解决复杂的犯罪案件。胡佛希望培养起公众对联邦调查局的敬畏之心，这样就显得

它的调查手段无可指摘，特别是那些本就存在问题的手段。正如胡佛后来的行动所展现的那样，强调这些特征也有助于将联邦调查局特工打造成新型白领、职业男性的化身。往更深层次上说，这些“科学警务策略”使联邦调查局能够更密切地监视美国人民的身体，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实际身体状况也可以被视为犯罪。这样一来，联邦调查局不仅界定了哪些行为是非法的，更将犯罪行为投射到了身体本身，从而迎来一个基于生物学的概念，即种族、阶级、性别、性等身份特征说明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胡佛还制定或重新引入了其他策略，包括使用窃听器和搭线窃录等监听装置，依赖秘密线人获取情报，这让联邦调查局得以介入公民的私人空间。[24] 美国军方最初利用监视战术，是在 20 世纪头几十年里打击菲律宾起义；而随着这些策略的应用，美国国内治安也开始走向监视战术。[25] 再加上身体的入罪化，这种对私人空间的入侵将深刻影响美国人看待犯罪行为、性、政治身份三者关系的方式。

从官僚的角度看，联邦调查局通过《曼恩法》和收集淫秽档案的方式监管性道德，得以在国家执法机构中谋得一席之地。在当时，许多可能分派给国家警力的任务已经交由州和地方来完成。羽翼未丰的调查局之所以能利用淫秽档案和《曼恩法》扩大司法管辖权，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既需要联邦机构的参与，也需要赢得公众的广泛支持。[26] 在亲眼见证事态的发展后，胡佛意识到，公职人员可以通过公众舆论获得权力，就此免去官僚体制的繁文缛节，甚至绕过宪法的种种限制。

***

52　胡佛被任命为调查局局长后，开始重塑调查局形象，摆脱其成立

后的头十三年间形成的腐败名声。由于胡佛的晋升与哈丁政府的不端行为密切相关，他坚持要营造出严格的组织道德，还曾表示，“鉴于过去几年受到的舆论攻击已经太多，调查局绝不能再承受任何大众丑闻……我不希望看到调查局被冠以别人经常用来称呼其他政府机构的名号”。[27] 为了有效规范道德，调查局本身必须成为正义的典范。

胡佛想把调查局改组为美国最精锐、最高效、最受人尊崇的警务部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二者都源于他在长老会教堂和中区中学习得的男性修养。胡佛努力让调查局变得技能娴熟、足智多谋、有条不紊、道德高尚、刚正不阿，表现出它原本缺乏的一系列男性特征。同时，他还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公众想象中男性特征的化身。他就是调查局，调查局就是他。

胡佛向调查局灌输男性气质和刚毅心性的背后有多重目的。首先，这是向持怀疑态度的公众保证，调查局的使命核心就是道德。其次，这是使用通用语言与公众交流，让调查局的价值体系和上下等级以公众更熟悉、更可读的父权形式出现，而胡佛则成为一个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组织之父。最后，这把胡佛本人置于一个更强有力的位置，使他与美国所珍视的英雄特质联系起来，又为他披上了一件保护衣，以免他因为自己的性行为和性别认同遭受攻击。

但胡佛为重新定义调查局的制度文化所做出的努力，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对整洁、纪律和秩序的忠诚。他还试图将调查局刻画成男性理想的化身。在将调查局描绘为男性理想的产物、现代化警察队伍的过程中，胡佛创造了一个新的执法人员类别——调查局特工（G-Man）。这个词是“政府人员”（Government Man）的缩写，起源尚不清楚。

联邦调查局本身也乐于提及有关绑匪、银行抢劫犯“机枪手”乔治·凯
53 利于 1933 年 9 月被捕（很可能是捏造的）的故事。当意识到调查局特工已经包围了他在孟菲斯藏身的小房子时，凯利不情不愿地放弃了与他同名的武器，高举双手走出房子，乞求道：“别开枪，特工们！别开枪！”[28] 更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个词起初指代的是所有政府特工，后来在 30 年代“对犯罪宣战”期间才成为调查局特工的专属称谓。

虽然这个绰号直到 30 年代中期才成为流行词汇，但其实胡佛一当上调查局局长，就着手打造这个群体。调查局总部和地方办事处的特工被建构为美国家庭生活和社会安全的职业守护者，他们是男性化、基督教的法律和秩序的生动体现。凭借公众对调查局特工的丰富想象，胡佛结合漫画中的英雄、电影中的牛仔和低俗小说中的侦探形象，创造了一个现代版超级警探。

胡佛对男性的想象来源于男性气质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是 19 世纪末企业革命和管理革命的结果。经济变化推动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变，并最终导致男性与其劳动成果相分离，以及中产阶级白领管理人员的增长。男性不再能够通过体力劳动或手工创造证明自己男性化的一面，他们寻求改变对办公室工作的社会文化认知。正如历史学家安杰尔·柯欧拉克 – 福朗（Angel Kwolek-Folland）所指出的：

“19 世纪末，管理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断演变，这就要求出现新的男性观念……通俗来说，就是把男性同商业联系起来，这个定义试图将伏案工作、渴求财富、消费者导向的商业追求，关于男性体魄的新观念，传统重商主义关于经济结构和男性社会地位的思想调和起来。”[29]

为了重获男子气概，男性白领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手段之一

是显示出争强好斗的男性气质，这种气质的构建理念，用历史学家约翰·佩特格鲁（John Pettegrew）的话说，是男人继承了“野蛮祖先的好斗精神和史前时代对竞争异性、狩猎、战争的暴力需求”。[30]“原始主义”（primitivism）被认为是对抗“过度文明”（overcivilization）情况下男性阴柔化的方式之一。此外，相关的策略还有信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同男性气质一样，个人主义也被视作最有可能因现代化而丧失的品质。[31]

在重建政府白领男性气质的过程中，胡佛不仅试图改变对白领男性的普遍认知，更是要改变长久以来人们对政府职员的刻板印象，即 54
认为他们尽是些文弱书生。1873 年，一位评论员写道，政府职员“任职期间毫无独立性，缺乏男子气概……他们必须公开表达对所有上司的绝对信任，不然就会遭到解雇，还要表现出尊敬顺从、恭维讨好的态度”。[32] 原始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或许可以消解这种软弱无能，但胡佛作为调查局局长，必须重新将服从和忠诚定义为男性特质。为了完成这项微妙的任务，胡佛试图将男权个人主义与新教影响下的男性理想结合起来，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这种理想强调“自制力、财产所有权的稳定性作用、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家长式关系、利他主义、慈善事业以及履行人生‘使命’的内在宗教美德”。[33] 当然，其对男性气质的理解非常符合胡佛年轻时学到的经验。

为了尽可能从头开始，也为让国会的监管者满意，胡佛接手调查局后立刻裁减了人员，返还了调查局 12.5% 的年度预算拨款。[34] 为了确保此举成功，也为衡量收效如何，胡佛转向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商业运营是机械的、自动的、客观的、可衡量的”。[35] 胡佛知道，

国会和公众对调查局近来的丑闻不满，应用这些原则将得到二者的支持。

随后，他革新了调查局的招聘偏好。胡佛希望确保大多数应聘成功者精准符合这样的形象：来自“上流阶层”、拥有法律或会计硕士学位、外表干净整洁的白人男性。理想中的候选人经常通过加入共济会等全国性兄弟会组织证明自己对基督教美德和社区建设的忠诚。胡佛喜欢雇用单身男性，认为他们不容易受到家庭责任的困扰，会把工作放在首位。[36]

1928 年，胡佛未来的首席助理、终身伙伴克莱德·托尔森（Clyde Tolson）向调查局递交申请时，几乎完全符合这些条件。当被问及录用托尔森是否合适时，他的前主管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指出他“对女性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37] 尽管这句话可以被解读为托尔森的性
55 取向有异，但它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一位年轻的职业男性绝不可能是同性恋，因此这个评价成了一句赞扬，说明他一心一意对待这份工作。正如历史学家克莱尔·邦德·波特（Claire Bond Potter）所指出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调查局上层每年都会给出托尔森这样的评价：卡巴奥发兄弟会成员、西格玛努兄弟会（Sigma Nu）成员、共济会成员。军训队、童子军等倡导男性价值体系的青年组织也对申请有利。这些案例说明，胡佛不仅相信自己的职业道路是正确的，而且认为道德高尚的人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在向组织机构的价值和纪律看齐时造就的”。[38] 胡佛还执着于聘用职业生涯刚刚起步的男性，1939 年他骄傲地表示，“如今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平均年龄还不到 34 岁”。[39] 尽管胡佛宣称，这种偏好是出于对青年热血的投资，其实也是尽力在这些

特工受到其他组织文化的影响前培育他们。

新入职的特工必须严格完成胡佛设计的综合培训计划，目的是把他们打造成专业高效的探员，他们将成为调查局这台机器中最亮眼、最重要的部件。[40] 在人们的心目中，没有哪个特工能比调查局更加伟岸（当然，胡佛本人除外）。特工如果胆敢批评他的上级或调查局，就会被发配到外地办事处，干着枯燥乏味的案头工作，无论他的工作能力多么出众。就连调查局最出名的外勤特工梅尔文·珀维斯（Melvin Purvis），也在公开发表被胡佛视作批评的言论后，感受到了他的怒气（珀维斯曾成功领导了对“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和约翰·迪林杰的搜捕行动）。[41]

所有特工都要严格遵守行为准则。为了确保大家遵守纪律，胡佛经常对特工的办公室、留档记录和个人形象展开突击检查。胡佛像一名教官（又或他曾经当过的军训队队长）一样，坚持要求手下的特工足蹬锃亮的皮鞋，身着考究的西装，蓄着修剪过的胡子，留着整洁的发型。他要求全体特工每年参加一次体能测试，并通过资助跨部门的体育队来推广体育运动。[42] 在致全体特工的备忘录中，胡佛解释说，他认为每个特工“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都必须这样做，以此杜绝自己行为可能招致的任何批评，哪怕概率渺茫也不行……我所要做的是保护调查局特工不受外界的批评，不因个别特工的不当行为致使调查局名誉扫地，这样的特工过于沉迷私人欲望和喜好，无法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牢记自己从事的行业的荣誉感和正直品格”。[43]

胡佛要求调查局特工管好“私人欲望和喜好”，这说明他相信所有的男人都需要有意识地管理自己的冲动。自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以

来，这种关于男性原始冲动的想法逐渐得到了大众文化和社会学的认可。[44] 如果胡佛真的发现自己有需要控制的“非正常”性取向，那么他的指示也可以被解读为自我指涉。有证据表明，胡佛是这样看待同性恋行为的：20 世纪 40 年代初，在调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的同性恋指控时，胡佛将威尔斯的不当行为归结为缺乏自我控制。[45] 正如胡佛在 1941 年所说，“我们要求联邦调查局特工保持品行清白、无可指摘”。[46] 撇开个人联系不谈，这句话也让我们洞悉了胡佛的观点，即道德品质是可以通过自我约束来培养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和必要性是调查局特工从世纪之交的白领男性形象中借鉴的关键要素，这种形象尤其强调，特工不该产生犯罪腐败，而应被培养为普通民众的道德榜样。

胡佛意识到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决心管理好调查局和手下特工的媒体形象。[47] 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培养与记者的友好关系。胡佛知道，早期调查局打击性交易和淫秽行为能获得大众支持，离不开媒体的作用，因此他要求特工和记者搞好关系。胡佛在给梅尔文·珀维斯的信中写道：“我希望调查局在与新闻界代表打交道时始终保持礼貌。”此前，珀维斯对合众国际社的记者表现得不太友好。[48] 胡佛本人也试图和沃尔特·温切尔、埃德·沙利文（Ed Sullivan）、雷克斯·科利尔（Rex Collier）等权威记者搞好关系。1935 年秋天，胡佛出席了在洋基球场举行的一场拳击比赛，他战略性地选择与一群记者坐在一起，托尔森则与另一群记者相谈甚欢。比赛本身显然不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出席的唯一原因。[49]

胡佛通常会通过代笔定期向报纸和杂志投稿，直接面向公众发表

言论。1933—1934 年间，由他署名的文章频繁发表，这段时间恰好是“对犯罪宣战”的开端。胡佛发表的这些专栏和评论文章主题多样，包括班级教师在打击犯罪中的作用、间谍活动、青少年犯罪、女性犯罪和军队犯罪。胡佛撰写的系列文章中，许多都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联合发表，例如《为了更好的美国》（“For a Better America”）和《为了没有犯罪的美国》（“For a Crime-Free America”）。无论什么主题，胡佛的语气始终自信强硬。他不断强调，调查局有能力通过科学的调查方法保护美国，只要“普通公民”愿意充分配合工作。[50]

57

胡佛还在这些文章中强调特工的坚毅品格，称赞他们勇敢坚强、准备充分、高效专业。胡佛把他们描绘成热爱祖国的儿郎，愿意为了保家卫国做出最大的牺牲，并时常提及那些执行任务过程中遇害的调查局特工。调查局特工有意愿也有能力在必要时刻以暴力对抗罪犯威胁。1939 年，胡佛对自己治下取得的成绩发表演说，他回忆道，“16 名罪犯拒不自首，负隅顽抗。面对罪犯的枪弹，联邦调查局特工别无选择，不得不以暴制暴”。[51] 胡佛还在海军陆战队协会的杂志《皮领》（*Leatherneck*）上表扬了联邦调查局的枪械教官。[52]

胡佛领导下的调查局特工，另一个关键在于准备工作。日本偷袭珍珠港（1941 年 12 月 7 日）的四个月前，胡佛向他的专栏读者保证，联邦调查局特工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会在接到通知后，立刻与“第五纵队”的敌方间谍和破坏分子展开战斗。[53] 胡佛从来不会错过任何赞颂调查局和手下特工有多高效的机会，他经常引用数据，表明调查局破获的案件比例之高，以及追回赃物为纳税人挽回的数千美元损失。[54] 但胡佛也会着力强调手下特工有多诚实，并指出，尽管调查局

会因破案率高而骄傲自豪，特工还是对找到真凶而非简单结案更感兴趣，且他们往往为无辜的一方洗刷冤屈。[55]

调查局的公共关系部门还向记者提供了逮捕敌人的细节，从而凸显调查局特工无可争辩的阳刚之气。“机枪手”乔治·凯利就是一个例子，他被描绘成一个由妻子操控的傀儡男孩。胡佛（或他的代笔）写道，凯利夫人“沾过酒的双唇”中不断吐出“码头工人说的脏话”，她威胁丈夫说，如果他“这么害怕”，她会为他“处理掉”这个问题。[56] 通过描绘对手懦弱惧内的形象，调查局特工的伟岸阳刚得到了反衬。最重要的是，胡佛让调查局特工展现出了家庭生活守护者的一面。

58

无论家庭生活受到非法性行为、下流刊物、颠覆性思想还是公开抢劫和暴力的威胁，调查局特工都不会放任不管。归根结底，或许调查局特工的核心责任是确保家庭成为年轻公民安全成长的空间。1938年，在对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的一次演说中，胡佛“将犯罪率上升归咎于守法公民的冷漠”，并表示“最大的责任在家庭，年轻一代本该在家中学会明辨是非”。[57] 十年后，胡佛通过全国广播倡导国民在家祷告，他声称：“想要美国未来仍有希望，想要我们的家园仍能得到和平幸福，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皈依上帝，重拾每日家庭祷告的传统。”[58] 谈到美国的犯罪问题时，胡佛把犯罪说成是一个亟待“攻克”的“尖端”问题。[59] 在此过程中，胡佛将联邦调查局特工形容成怀亚特·厄普、派特·加勒特（Pat Garrett）等边陲执法者的现代化身，他们通过男性的坚韧打造出一片免受不法分子破坏的净土。

对胡佛来说，安全的美国是一个可以自由实践和传递“美国精神”

（Americanism）价值观的家园。他的“美国精神”涵盖了基督教道德与权利、正义、牺牲、自由等宽泛的概念。这也与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在面对日渐增多的不道德行为时，社会保守派使用“美国精神”重申对性、性别、家庭关系的父权态度有关。[60] 胡佛绝不会用陈词滥调来定义它。1940 年，在对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的一次演说中，胡佛概述了他心目中国民精神的核心要素：信任权威，特别要遵照犹太 – 基督教传统；有能力实践“知识自由”，而非诉诸“知识限制和放任”的“非美国”做法；追求效率（“美国的生活方式只有在被证明是有效率的情况下才会持续下去”）；尊重执法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领导人；延续“（我们）祖先的开拓精神”。[61] 这些要素都在胡佛为调查局和他自己培养的人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

为了促进这样一种国家认同，胡佛时常隐晦地将他对美国精神和男性气质的看法结合起来，由此激发听众的男子气概。胡佛传递的观念是，哪怕美国精神和男性气质并不完全相同，至少也是相辅相成的。 59
1939 年，在纽约世界博览会的童子军日上，胡佛在谈到公民权利时向台下聚集的“明日之子”说：“净化美国（clean up America）是你们的责任！”[62] 他提倡男孩怀抱一种“敢于竞争、目标高远、活力充沛的精神和改善同胞的渴望……（并）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清洁、更美好，距离祖先的梦想更近一步”。胡佛还建议道：“只把你们的思想和精力投入到那些能锤炼品格的活动中去……热爱你的家园，热爱你的教会。保持身体强壮，精神纯洁，品德正直……永远信守童子军誓言，简单来说，就是从始至终（First, last, and always）都做个好公民，做个好人，做个好美国人。”[63]

在强调竞争、虔诚、忠诚时，胡佛对男性气质的定义显然来自童年时代的教会和学校经历。但在对男性气质的理解中，他最强调权力是一把标尺。仅仅拥有某些男性特质是不够的，真正的男人会整合这些特质来为自己、为集体、为国家服务。

在对青年商会（那时完全由男性组成）发表的演说里，他也是这么和年纪稍长的听众说的。胡佛注意到组织机构可以在促进道德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建议道："你们会遭遇逆境，但这正是对男子汉的真正考验。"[64] 1941 年，在南方大学毕业典礼上，胡佛对全体男生说："我们需要强大、年轻的血液来振奋因冷漠、懒散、欺骗、背叛而衰弱的血管，这正是流淌在美国精神中真正的鲜红血液！"[65] 顺着这个思路，胡佛认为，美国的先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即使是面对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也拥有坚忍不拔、永不妥协的重要勇气。他们不懂得什么叫恐惧。他们的词典中没有'投降'一词。他们为自己崇高的理想而战，必要时不惜以身殉道。他们随时愿意牺牲生命中珍视的一切，只为完成一项对他们来说比生命本身更伟大、更神圣的事业。他们为身为美国人而倍感自豪"。[66]

胡佛公开表示，男子气概和美国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他认为，雄心、热情、强健、坚韧、勇气、纯洁的心灵、正直的品格等男性美德最终将"净化"和升华美国。为了让这些美德成为丰碑式的存在，胡佛将其与开国元勋联系起来，进而与美国的创立联系起来。胡佛表示，为了延续这种伟大，美国需要传承这些男性美德。尽管人们多用女性代词"她"来称呼美国，但胡佛暗暗将男性人格赋予美国，他声称，为了避免"外国意识形态"的"毒害"，美国"必须再次强大起来，

恢复活力”。[67] 他希望他的国家、他管辖的调查局、他手下的特工和他本人都能清楚地表现出男性气质和力量。

虽然胡佛的文章和公开演说有很多，但调查局特工的公众形象主要是由诸多文艺作品塑造的。自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来，调查局特工化身为文化偶像，开始在电影荧幕、广播电视、漫画书和侦探小说中抓捕罪犯。这些作品往往与调查局直接相关，取材方式要么是直接目击，要么是参考局内档案，要么是由胡佛本人背书。

关于调查局特工，最早的大众文艺作品可以追溯到 1935 年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主演的好莱坞电影《调查局特工》（*G-Men*），这部由调查局特工为主角的作品重新定义了黑帮题材电影的高峰。尽管胡佛不得不发表正式声明：“调查局并未参与本片的制作，或以任何形式为其宣传。”但就算胡佛亲自担任制片人，华纳兄弟在片中对调查局和胡佛的追捧颂扬都不会比现在更多了。[68]《调查局特工》复制了卡格尼在另一部流行黑帮电影《人民公敌》（*The Public Enemy*）里机智、忠诚、圆滑的硬汉形象，但这次让他扮演的是一位名叫布里克·戴维斯（Brick Davis）的警员。由于拒绝接受客户的不道德委托，戴维斯的法律事业变得一团糟，因此他加入了调查局，为不幸被杀的朋友复仇。戴维斯参加了调查局的培训，电影通过纪录片的形式描绘了特工使用枪械、练习武术、学习科学的调查程序等场景。他在其中证明了自己在调查方面十分敏锐，此后他就开始使用武力和枪械伸张正义。值得注意的是，本片尤其强调枪战，因为调查局特工是在 1934 年才被批准使用枪械的。[69] 剧中的主要反派以约翰·迪林杰、“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和“娃娃脸”纳尔逊为原型，巧妙地避开了美国电影

协会禁止电影描绘现实中的黑帮分子的规定。剧中的爱情支线也很健康，戴维斯放弃了他在夜总会工作的前女友，转而选择与调查局教官的妹妹成为恋人。

影片的主要宣传海报上，卡格尼衣着整洁，身穿三件套西装，头戴一顶软呢帽，手中的枪直指观众，安·德拉克（Ann Dvorak）则瑟瑟发抖，躲在他身后。宣传材料承诺，观影体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
61 要骇人，因为每句话都来源于现实！”。这种说法表明，《调查局特工》是一部侦探恐怖片。电影中甚至还有个致敬胡佛的角色，即调查局局长布鲁斯·格里高利（Bruce J. Gregory），恭维之意路人皆知。[70]也许《调查局特工》最大的影响是把调查局描绘成一个独立的组织，一个脱离了联邦政府或者说司法部管辖的组织。这样一来，这部电影也引领了新的风潮，胡佛由此成为“对犯罪宣战”的代表人物，抢走了本该属于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Homer Cummings）的风头。[71]

仅1935年，好莱坞就有七部以特工为主角的电影：《调查局特工》、《人民公敌之妻》（*Public Enemy's Wife*）、《剿匪伟绩》（*Public Hero Number One*）、《玛丽·本恩斯：亡命者》（*Mary Burns, Fugitive*）、《皆曰可杀》（*Let' Em Have It*）、《铁面金刚》（*Show Them No Mercy*）。1938年，胡佛的“对犯罪宣战”回忆录《藏匿者》（*Persons in Hiding*）启发派拉蒙影业（Paramount Productions）制作了四部以上的B级电影：《藏匿者》（*Persons in Hiding*，1939）、《卧底医生》（*Undercover Doctor*，1939）、《开笼放虎》（*Parole Fixer*，1940）、《黑手党女王》（*Queen of the Mob*，1940）。[72]这些动作电影的主角都是调查局特工，也模仿了侦探片的套路：调查局特

工运用创新思维和科学调查手段，在找出一系列线索的同时侦破了各种惊天大案。这些新英雄也在面向年轻观众的系列电影中频繁亮相，其中包括《至尊神探》（*Dick Tracy's G-Men*）。[73]

还是在1935年，调查局授权一部广播连续剧使用“调查局特工”的名号，该剧声称自己是对联邦调查局真实案件进行艺术加工。这部广播剧后来改名为《惩恶锄奸》（*Gang Busters*）并随之走红，直到1957年才停播。每集开场都直奔主题，别具特色：“快报警！找调查局特工！号召全体美国人向黑恶势力宣战！”《惩恶锄奸》标榜自己基于现实创作，特别指出所涉案件准确，有胡佛参与制作。作品还强调了胡佛预期的卖点，即科学侦查在搜捕嫌疑人方面的作用。事实证明，这部广播剧大受欢迎，“非常火爆”（come like gangbusters）这一表达甚至成为全国流行的词汇，指的就是剧集开头的嘈杂场面，警笛狂响、机枪乱射。

《惩恶锄奸》的成功也催生出许多类似的广播节目。《和平与战争年代的联邦调查局》（*The FBI in Peace and War*，1944—1958）和《联邦调查局由你掌控》（*This Is Your FBI*，1945—1953）更多针对的是成年观众。后者自称是“基于联邦调查局档案的官方广播节目”，并得到了胡佛的明确支持。其赞助商衡平人寿保险社（Equitable Life Insurance Society）表示，自己与调查局拥有同样的使命：“联邦调查局寻求的是国家安全，衡平人寿保险社寻求的是金融安全。两个伟大的机构都将全力保护您个人、您的家庭、您的国家。”《少年特工的真实冒险》（*The True Adventures of Junior G-Men*，1936—1938）由多平台共同播出，目的是吸引年轻听众。和《惩恶锄奸》一样，每集 62

开场都是喧闹的警笛声（虽然没有枪声），开门见山："呼叫全体少年特工，呼叫全体少年特工！"节目极力诱导听众加入"少年特工团"，这是一个分发警徽和反犯罪作品的团体。该节目还催生了《飞行少年G–战警》（*Junior G-Men of The Air*），这部由环球影片出品的系列电影在1942年上映。[74]

年轻人也是漫画的主要受众，例如《特工J–8》（*Special Agent J-8*）和《秘密特工X–9》（*Secret Agent X-9*）。后者是1934年国王影业（King Features Syndicate）在报纸上刊载的漫画故事。虽然从未大爆，但它的连载时间长达六十二年，还在20世纪30年代末被两次改编成电影。故事讲述的是一位无名特工的冒险经历，有的观众认定他工作的机构就是联邦调查局。这部漫画仿照《至尊神探》的故事情节和绘画风格，塑造了主人公自信勇敢、坚决果断的形象。[75]1936年，《华盛顿明星晚报》（*Washington Evening Star*）记者、胡佛的朋友雷克斯·科利尔开始创作《对犯罪宣战》（*War on Crime*），这部连环画据称是"基于联邦调查局档案的真实特工故事，专为公众兴趣改编"，并得到了胡佛的官方授意。这部漫画梳理了调查局的历史，同时删减了其中对调查局不利的部分。在讲到迪林杰案件时，《对犯罪宣战》强调，抓获头号人民公敌的直接原因是科学的警务搜捕程序和智能化的罪证收集，而非线人安娜·赛奇（Anna Sage）意外送上的消息。[76]编辑还决定把调查局特工的形象贴近家庭，虽然胡佛喜欢雇用单身特工，但流行文化中的调查局特工常以丈夫和父亲的形象出现，突出其在保护家庭方面的投入。

有关早期调查局的文艺作品广受欢迎，意义不仅在于推广了调查

局特工的形象，并让胡佛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整合了调查局和胡佛积累的价值观和理想。这些文艺作品是围绕着胡佛建立的新男性身份而创作的，因此其中的调查局和特工形象都是专业可靠、谨慎周密、健壮阳刚的。调查局特工成了西装笔挺的动作英雄，而非沉闷古板的联邦官员。在部分美国人因罗斯福新政下宪法和法律的越界而对联邦政府产生不信任时，调查局特工在流行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善的一面呈现给了民众。另外，展现调查局特 63
工在家庭生活中的稳重可靠，强调了胡佛为调查局设置的家长式角色，也在家庭似乎摇摇欲坠的时刻重申了男性道德，1940 年的一项调查估计，“大萧条期间，多达 150 万已婚妇女被丈夫抛弃”。[77] 胡佛将男性气质置于调查局特工身份的核心，这巩固了他本人和调查局作为国家安全机构核心支柱的地位。

除了让调查局特工成为文化偶像外，大众媒体对该局的报道还教育公众了解国家安全面对的各种威胁、该局应对这些威胁的战略，以及公众如何协助这场斗争。通过向广大群众宣传调查局好的一面，这些作品说服公众，调查局既是安全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普通公民的盟友。正因如此，大众相信调查局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守护者，而非害怕这支秘密警察队伍。

调查局公共关系部门的许多活动都是为胡佛高唱赞歌。许多文艺作品中夹杂着胡佛说过的话或写过的文句，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显得真实可信，二是让胡佛成为特工主角的终极典范。新闻报道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正如 1933 年《科利尔杂志》（*Collier's*）写道，“在讲述外勤特工的故事时，每篇报纸和杂志文章、每次无线广播中无一

例外都会出现‘美国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名字”。[78]对胡佛来说，树立个人崇拜是宣传调查局的关键，他竭尽全力确保公众不仅将他本人视作调查局特工的领导人，也将他视作他们最崇高的模范。他希望被当成他所创造的男性传奇的生动化身。

胡佛如此热衷于打造这样的人设，部分原因很有可能是他的男性气质在新闻媒体上存在争议。1933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就任前后，少数专家提出，新任总统将会任命新局长取代胡佛，因为他不够男性化。记者纷纷指出胡佛的外貌和个人习惯作为证据。1933 年 8 月 3 日，《华盛顿时代先驱报》（*Washington Herald*）专栏作家彼得·卡特（Peter Carter）提到，胡佛喜欢收藏高
64 价古董。[79]8 月 19 日的《科利尔杂志》中，雷·塔克（Ray Tucker）强调了传言中胡佛的女性特质：

> 仅从外表上看，胡佛先生完全不像故事书中的侦探。他个子不高，体形圆润，看着像个商人，走路时迈着小碎步。乌黑的头发、黝黑的皮肤和大学生式的发型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38 岁）要小，但厚重的角框眼镜又让他显得成熟沉稳、位高权重。他衣着考究，搭配的领带、手帕、袜子颜色以埃莉诺蓝为主。他颇有些虚荣浮夸，即使是去附近的自助餐厅吃饭也要乘坐豪华轿车。[80]

如果这些批评意见单独出现，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没什么根本性损害；如果集中出现，影响就会很恶劣。这篇文章中，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关注点是胡佛的“小碎步”，认为谈及这点实在挖苦刻薄，

特别是后来其他新闻媒体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份心照不宣的讽刺似乎直击要害，彼得·卡特在 8 月 28 日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专栏文章中指出，胡佛一直在有意识地拉长步伐，好让自己显得更加果决刚强。[81] 然而，这种印象延续了下来，在 1936 年《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沃尔特·特罗安（Walter Trohan）写道："胡佛走起路来步子相当小，几乎像个女人。"他又进一步质疑胡佛在体育方面的说辞，指出钓鱼是他参加的唯一一项"活跃运动"，"如果钓鱼也算运动的话"。[82]

塔克的话还大胆地暗指了胡佛的女性气质和性取向，虽然说得比较含蓄。塔克指出，胡佛的衣服以"埃莉诺蓝"为主，这个词是媒体自创的，用来形容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出席丈夫就职典礼时穿的天鹅绒日礼服，实际颜色偏向紫色或蓝紫色。事实上，史密森学会档案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对这件礼服的描述是"淡紫色（薰衣草色）"（lavender），这个词早在 1933 年就作为男同性恋的委婉说法被列入了词典。[83] 可以推断，塔克之所以提到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他把调查局局长和第一夫人联系起来，更是因为他在暗示传言中胡佛的性取向不同。就像围绕着胡佛的诸多性八卦，以及后来的麦卡锡和科恩的性八卦，这是一次公众视线之外的指控。《科利尔杂志》的普通读者可能看不出这种隐喻，但那些了解内幕的人肯定能。塔克描述胡佛"皮肤黝黑"（swarthy），这个词多用来形容偏离种族和性别常态，也凸显了大家的怀疑心理。针对《科利尔杂志》的这篇文章，《自由》（*Liberty*）杂志刊登了一篇专题文章，其中写道，胡佛"身材结实，有着轻量级拳击手似的肩膀，没有一丝赘肉，那 170 磅重（约

77 公斤）的身体里只有磅礴跃动的阳刚之气”。[84] 据称，这篇文章正是出于胡佛的授意。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胡佛不断强调自己充满激情和活力。1954 年接受采访时，胡佛表达了对生活的坚定信心，他声称“从本质上讲，我在任何时候都会积极表现自己。我不是个温柔、随和的人。我打网球很使劲。我走得很快。在最近一次国会意见听证会上，我像往常一样积极地发言”。[85] 他的自我评价说明了他对外在表现很重视，回望他的职业生涯，即使在权力十分稳固时也是如此。特别是当他步入中年，身体变得健壮，他就更乐于把自己描绘成热爱运动、精力充沛、坚决果断的人。这次采访中胡佛追溯往昔经历的做法，也说明他主要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这种人设。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胡佛开始忌讳那些关于他性取向的传言，于是他下令让所有特工在知道后第一时间向他报备，未能及时做到的人会受到斥责。胡佛的公开和机密档案中，许多备忘录都与此相关，其中包括一篇关于“纽约知名人士”的报告，报告称此人在接受联邦调查局的采访时提到，他曾听到“一个谣言，大意是胡佛先生是个‘同性恋’”。另一份档案也是类似的故事，不过是发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86] 两起事件中，当地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都被下令“公开谴责”这些人。[87]

联邦调查局为遏制胡佛相关的性八卦传播做出过许多努力，其中最声名狼藉的一次也许是在 1951 年。副局长路易斯·尼科尔斯（Louis Nichols）在给克莱德·托尔森的备忘录中写道，一名联邦调查局女特工告诉上级，她在美容院做美容时听到老板说：“胡佛局长是个娘娘

腔，喜欢男人，是个‘同性恋’。”一名员工对此表示赞同：“（老板）说局长是同性恋，美容师也表示她听过类似的说法。”尼科尔斯在备忘录中建议两名特工前往美容院，“把这个捏造丑闻的骗子绳之以法”，这个建议得到了托尔森和胡佛的批准，两人在档案边缘处写下了意见。[88]

除了努力抑制谣言散播，胡佛还积极提出了替代说法。胡佛深知八卦的影响作用，他甚至在 1933 年创办的联邦调查局内部刊物《调查者》（*The Investigator*）中增设了八卦专栏（此外还有新闻和漫画板块）。[89] 胡佛怎么缔造了调查局特工的神话，就准备怎么创造自己的传奇。通过电影、广播节目、连载漫画、公共演说、报刊文章和态 66
度友好的八卦专栏作家，他树立了个人崇拜。胡佛尝试过的人设中，最经典的莫过于阿尔文·卡皮斯被捕的联合报道中的形象：

> 胡佛时年 41 岁，黑发黑眼，为人严谨专注，不说闲言碎语。他的眼距很宽，这象征着他视野宽广，圣保罗和新奥尔良被他尽收眼底。每当陷入短暂的思考时，这双明亮有神的眼睛也会变得像扑克筹码一样淡漠冷峻、捉摸不透。在一天漫长的工作中，胡佛先生时刻保持身体振奋、精神抖擞，他的工作状态就像一位架子鼓手，为找来一位工作能力出众的手下替他复仇，他先摁下桌上旋转拨号电话的按键，再像游击手接住迅猛的地滚球一样抓起电话，嘶吼着发出短促的命令，随后又放松下来，在转椅上旋来扭去，开始亲切坦率地交流，好像自己是个感情外露的人似的，虽然有时他确实是这样的……他对剥皮帮（巴克－卡皮斯团伙）

成员的行动细节了如指掌，就像指挥家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对《罗恩格林》（“Lohengrin”）的乐谱烂熟于心。[90]

这篇人物简评发表在胡佛“对犯罪宣战”取得胜利的巅峰时期，几乎涵盖了胡佛努力展现的所有关键特质：魅力非凡、足智多谋、体格健壮、高瞻远瞩、领导力出众。对胡佛来说，男性气质作为一种工具，适应性强、功能多样，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来推进目标。为了塑造阳刚气魄，胡佛试图展现出多种身份，好让自己的公众形象更加通俗易懂。他可以是都市里的年轻单身汉，可以是打击犯罪的青年才俊，可以是现代官僚制度的操盘手，可以是社会的道德榜样，可以是家庭生活的守护者，又或是集这些身份于一体。

胡佛宣扬男性气质时，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万千女性追捧的单身汉形象。胡佛与八卦专栏作家的合作关系，让这种形象得到了广泛宣传。八卦专栏记者得到了调查局的行动细节，作为交换，他们在报道胡佛在当红夜店彻夜不归，或是八卦他的绯闻故事时，都会以对他有利的视角来写。这些人中为首的是《纽约镜报》（*New York Mirror*）记者沃尔特·温切尔，他创建了美国首个联合八卦专栏，他的周日晚间广播是20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67]温切尔最受追捧的时候，他的专栏和广播受众约有5000万美国人，占成年群体的三分之二。[91]为胡佛作传的科特·金特里（Curt Gentry）指出，温切尔“比任何其他人都努力延续埃德加·胡佛和调查局特工的神话”。[92]尽管这个评价或许低估了胡佛本人在缔造神话中的作用，但温切尔的助益确实不容小觑。1933年4月，温切尔和

胡佛开始通信，四个月后两人会面，当时温切尔前往华盛顿，就纳粹主义的迫切威胁向罗斯福总统提供“建议”。随着两人友谊不断加深，他们开始共享闲暇时光，包括在温切尔最爱的斯托克俱乐部度过漫漫长夜。[93] 俱乐部老板、前私酒贩子谢尔曼·比林斯利（Sherman Billingsley），也开始把胡佛视为最亲密的朋友之一。[94]

媒体对胡佛社交生活的报道让他获得了知名度，也让他显得平易近人、镇定自在。同时，社交活动和八卦专栏也提升了他的地位，因为他在其中都以社会精英一员的形象出现，这些精英包括演员、音乐家、体育明星、社交名流、商界巨头、知名政客。起初温切尔不愿提及胡佛的夜店生活，担心民众产生不良印象。但胡佛毫无顾虑，他声称：“我在夜店确实会得到几分真正的放松和享受，特别是有你一起时。我希望未来的漫漫长夜有你相陪，享受真正的乐趣，同时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95]

在 1935 年 9 月 29 日的专栏中，温切尔专门讲述了胡佛和托尔森前往纽约洋基球场出席乔·路易斯（Joe Louis）和马克斯·贝尔（Max Baer）的拳击比赛。其中，温切尔还写到胡佛带领两名顶尖特工去往斯托克俱乐部、托尼俱乐部、21 俱乐部这三个纽约市最热门的社交俱乐部，并把他们介绍给俱乐部的老板。在 21 俱乐部，“胡佛先生和托尔森先生对禁酒时期酒吧精心设计的藏酒体系感到瞠目结舌”。看到犯罪行为，调查局特工只是露出惊讶之色，这说明他们是人民的盟友，看来就连美国的高级警官也承认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禁酒令）的荒谬。温切尔还在专栏中强调，胡佛去每个俱乐部都有美女相陪，包括刚在《齐格菲歌舞团》（Ziegfeld Follies）中出镜的女孩们，还有女演员佩吉·乔伊斯（Peggy Joyce）。“（她）与胡佛握手时露出了痴

迷的神色，一边抚摸（胡佛的）手一边叹息：‘我想这些英俊的男人都已经结婚了，身边有妻子相伴左右。’”[96]

68 温切尔经常散布谣言，说发现胡佛和身份不明的小明星混迹于娱乐场所。[97] 八卦专栏竞争激烈，纷纷暗示胡佛与多位女性有染，包括女演员金格尔·罗杰斯（Ginger Rogers）的离异母亲莱拉·罗杰斯（Lela Rogers）、编剧弗朗西丝·玛丽恩（Frances Marion）、好莱坞明星多萝西·拉莫尔（Dorothy Lamour）。这张 1936 年斯托克俱乐部新年夜派对的照片广为流传，照片上胡佛戴着一顶纸做的派对帽，一位金发女星微笑着拿玩具枪指着他，他举起双手，假装投降。[98] 专栏作家不止一次说过，胡佛订婚在即。



图 4. 1936 年新年夜，托尔森和胡佛在斯托克俱乐部与一位女性朋友（可能是演员兼模特路易莎·斯图尔特［Luisa Stuart］）庆祝新年。
图片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静态图片。

胡佛的夜生活让他获得了预期的公众形象，很快他的名人地位就得以巩固。1936 年 10 月，《华盛顿邮报》八卦专栏作家玛丽莲·里夫（Marylyn Reeve）将胡佛列为纽约市黄金单身汉，强调他在当地的根基和运动才能。“他十分忙碌，”里夫写道，“在闲暇时间，他会像刻苦工作一样尽力玩耍……他的书房里挂着一条旗鱼，这是他不久前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钓到的。”里夫还有意提到，胡佛和母亲住在“一幢温馨的老宅里”，这说明了他对家庭的奉献。[99] 不到三年后，《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头版文章称胡佛为全美最抢手的单身汉之一，还对他抵达洛杉矶的情形做了八卦描述：“迎接他的是一群联 69
邦调查局特工和一名神秘的黑衣女子。她穿着时髦的黑色蓬蓬裙，头戴一顶宽边黑帽，在格伦代尔大中央航空航站楼与胡佛近距离聊了 10 分钟。这位女士不愿透露名字，胡佛只是粲然一笑。两人都说‘不能拍照’，在场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又多，因此没有照片留存。”[100] 胡佛的笑容非常有说服力，因为它假设胡佛和读者都心照不宣，对读者来说，胡佛既是高高在上的（他显然有能力与“神秘”“时髦”的女性约会甚至上床），又与他们地位平等（他也有男性追求乐趣的基本弱点）。

鉴于胡佛如此致力于向公众确认他的男性气质，他被视为年轻男性的模范榜样也就不足为奇了。1940 年，《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无耻地报道了新社区中的“年轻人”是如何模仿胡佛的习惯，并拿出准备好的少年特工正式徽章，偷偷溜进他的房子，希望能一睹“美国头号特工”之风采的。[101] 胡佛虽然不是父亲，但他对自己和联邦调查局都表现出家长式的作风。在童子军、美国男孩俱乐部和各种毕业典礼开始前的演说中，胡佛都会向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提些直率的建议。

1938年，《妇女日杂志》（*Woman's Day*）刊载了一篇颇具启发性的文章，其中胡佛认真思考了他对儿子的教养方式（如果他有儿子的话）：

> 我希望他长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会参加有益的激烈户外运动。如果他在家比我想的要聒噪，我会试着包容他。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男孩们就很聒噪。如果各种球拍和渔具胡乱摆在大厅的壁橱里，我会要求他把它们整理好，但我不会为此大发雷霆。如果他打架了，除非是他主动挑起的，不然我不会惩罚他。就算是他主动挑起的，我也会弄清楚背后是否另有隐情。我绝不会因为他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惩罚他。如果他不这么做，我反而可能会对他严厉些。童年的伤痕不是悲剧，而是成长过程中的小插曲。[102]

胡佛利用这个机会，强调了自己的积极特质。通过对家长养育男孩面临的挑战表示同情，胡佛培养了与杂志读者的私人关系，但他也采用了权威的口吻。虽然没有儿子，但胡佛是男性气质的权威人物，尤其是帮助男孩蜕变成“真正男子汉”的男性气质，因此他可以担任
70 顾问的角色。另外，胡佛主张性格塑造始于家庭，这再次证明了家庭生活在美国的崇高地位。

在胡佛列出的男性气质中，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关注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胡佛暗示，成功可以且应该在生理上得到体现，与之相呼应的是他十分在意别人如何描述他的身体特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男孩的外表和行为却满不在乎。胡佛回忆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男孩们就很聒噪”，这说明他对男孩的成长过程持传

统主流观点，这种观点的核心在于内在冲动与道德约束的分歧。但通过相对宽容放任的主张，胡佛表达了自己身上幼稚的一面，这说明他年轻时就体现了这些特质，而且至今仍保有活力和激情。在胡佛看来，他的目标是积极引导而不是刻意遏制。

胡佛身为“道德楷模”，他的公众形象还包括另一层重要身份：国内 / 家庭（domestic）的守护者。这个身份首先可以视作抵御本土威胁、捍卫美国人家园的哨兵。胡佛抓住一切机会赞扬家庭和家园的神圣性，他将家庭单位定义为社会的基础，家园则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珍珠港事件六个月后，胡佛在一场毕业演说中清晰地说明了这场战争的终极意义：“没有哪个国家比家庭的总和更强大。家庭是民主的基石。”[103] 毫无疑问，这种对家庭的关注，部分是为了将美国与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结构和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法西斯主义区分开来。但对胡佛来说，将家庭置于优先地位也让联邦调查局的使命和策略免遭指责——怎么能对一个以保护家庭生活为主的组织机构提出任何批评呢？

谈及家庭安全问题时，胡佛提到，既要避免物质破坏，也要提防意识形态毒害。1939 年，胡佛告知民众，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家庭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仍是至高无上的。攻击家庭就是在攻击国家，国家是所有家庭的总和……维护家庭安全的同时，我们也在捍卫国家安全。现在是时候竖起防御屏障，以保护我们的家庭和政体免受外来主义（foreign isms）的潜在恶性病毒和颠覆势力的侵害了。”[104] 胡佛的这番话中，“外来主义”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包括一切威胁国家安全的政治、社会、宗教信念。他将这些主义比作病毒，既指它们的阴

险本质，也指它们往往无声散播，直到像流行病一样大规模爆发。调查局的职责就是甄别症状，隔离病毒携带者，最终消灭疾病。

尽管这些威胁似乎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神论、独裁主义，但胡佛从未将其一一列出，他也没有准确说明这些主义为何如此有害，以至于必须将其归类于“非美国主义”（un-American）。1939 年，他告知民众，“一个好公民必须警惕一切形式的颠覆现象。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或者什么其他主义，都是非美国主义”。接下来，他用性别和神学的视角进行阐释，“判断我们是否爱国，最好是看我们是否努力保护美国的理想，使其不受那些侵害正义和体面的家伙的破坏……这是一场敬畏上帝的重要原则与异教徒和无神论之间的较量”[105]。一年前，胡佛也表达过类似的宗教言论，攻击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他指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站在美国自由和民主信仰的对立面。美国不容许颠覆破坏者、专制独裁者、无政府主义者存在”。[106] 胡佛把意识形态而非某个国家或民族当作敌人，营造出美国的敌人正在不断逼近的景象，虽然纳粹德国或苏联士兵并未在波托马克河发动水陆攻击。这些主义更多的是侵蚀美国精神，毕竟这种攻击是无声无息的，可以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渗透防线。此外，保护国家免受军事入侵在国防部门的职责范围内，但意识形态战争已然成为联邦调查局的专长。

1940 年，在对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①] 发表的演说中，胡佛解释了先前的模糊之处：“你们已

---

① 成立于 1890 年，是由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爱国者后裔组成的全国性妇女组织，简称 DAR。

经注意到了，我没有指明所有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当下这些意图扼杀美国自由的敌人把所有好事归功于自己，把所有坏事说成是政府组织的问题，从而在攻击我们时制造混乱，这是它们的策略。因此，美国公民面临的考验是能否与这些敌人划清界限。对公民身份的真正考验，是维护先辈为之奋斗甚至献出生命、我们如今得以坐享其成的民主事业。”[107] 拒绝完整定义这些敌人的同时，胡佛能够不断修正目标对象；敌人是谁，任他决定。这种修辞上的瑕疵也渗 72
透到了胡佛对美国精神的定义中。在定义何为“美国精神”时，胡佛多是泛泛而谈，暗指以家庭、教会、法律为中心（并受其监管）的一些模糊观念。“美国精神”的界限不明，因此这把弹性武器可以适时延展和塑造，以应对当下的危机。

胡佛认定，“外来主义”是对国家安全和美式生活的威胁。他大力宣扬这个观点，努力使其融入联邦调查局的文化形象中。国家叙事接纳了这个观点，美国人对国内安全的思考方式也随之改变。正如胡佛的疾病隐喻所说，外来主义最危险的是秘密传播，美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都可能会不知不觉遭到感染。由此，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国内安全需要受到监管。因此，胡佛在缔造调查局特工的传奇、提升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同时，也在着力推进法律构建以促成对国内的监管，推动国家安全和监视国家的发展。

构建这些机构的法律和社会框架，从根本上改变了胡佛的世界（以及麦卡锡和科恩即将面临的现实）。最直接的结果是扩大了联邦调查局的权力，使其拥有监视国内目标的法律权利和技术能力。同时，它让普通民众明白了国家监视的界限和所谓的必要性，包括下列观念：

思想和行为都可能会触犯法律；在争取自由的战场上，家庭和任何西欧或南太平洋的前线一样重要；私人生活细节可能关乎国家安全。最后，框架的构建方式进一步将异性恋价值观和男性化政策纳入了法律制度和政治体系。[108] 事实证明，这些发展变化是孕育第二次红色恐慌和麦卡锡主义的核心要素。

***

在推动联邦调查局向庞大的官僚机构转型时，胡佛也在促进国家安全和监视国家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他得到了更大的助力。这些组织机构相互关联，内在根源复杂多样、意义深刻。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1947 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但这样就忽视了二战前的发展变化。[109] 虽然一些历史学家对国家安全和国内监视做出了区分，但这
73 种人为定义割裂了二者的共生关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国内监视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另外，虽然《国家安全法》和国家安全局都是冷战初期的产物，但早在 20 世纪的头几十年里，二者就已初具雏形。

政府计划监视国内的早期标志之一是《曼恩法》。为了推行《曼恩法》，调查局做出了诸多努力，其中就包括昙花一现的打击白奴交易司（White Slave Division），这就开创了一个先例，即调查局在职权范围外拥有道德监管的权限。违反道德的行为大多不为人知，因此政府有必要（也有义务）侵犯私人空间。然而，直到 20 世纪 10 年代末，国内监视才得到广泛实践。20 世纪首部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安全法是 1917 年的《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司法部官员曾用它来排除异己。社会主义者尤金·V. 德布斯（Eugene V. Debs）就是批评美国参与一战而触犯了该法律的人之一，他因为干涉征兵，被判

处十年监禁。[110]

1919—1920 年间，正值美国红色恐慌时期，此时胡佛作为司法部情报总局局长，利用《反间谍法》发挥了巨大作用。1919 年春天，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其中一次几乎焚毁了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在华盛顿的住所，在此之后政府受到刺激，也开始对叛国行为采取强硬态度。随后政府展开搜捕行动，史称“帕尔默突袭”（Palmer Raids），导致大约一万名外籍居民被拘留，最终 556 人被驱逐出境。爆炸事件后来追踪到一个由意大利移民鲁奇·加里尼（Luigi Galleani）领导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政府认为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受到了外国人的煽动，这点从由移民局特工执行任务就能轻易看出。随着搜捕行动的展开，胡佛在华盛顿通过电话远程指挥突袭。这种无须官员签字授权的新型“电报令”为搜捕嫌疑人提供了便利。[111] 很多时候甚至连逮捕令都没有就展开了行动，在纽约的突击搜查中，只签发了 27 份搜捕令，却拘留了大约 200 人。[112] 当帕尔默因司法部在搜捕行动中的表现而受到批评时，他试图以胡佛“才是此事的负责人”来回避问题。[113]

被驱逐出境的人中，最出名的是犹太裔立陶宛人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据报道，她的公开言论促使里昂·乔戈什（Leon Czolgosz）刺杀了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胡佛在一份备忘录中赞同驱逐戈尔德曼，他表示戈尔德曼及其同伙亚历山大·贝克曼（Alexander Berkman）“无疑是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中最危险的分子，一旦获释将造成严重损害”。[114] 如同胡佛反对外来主义一样，贝克曼和戈尔德曼从未因其行动而被指控反对美国，只是通过言论；

两人之前被判入狱，是因为在一战期间公开反对征兵。

搜捕行动本身只是司法部在第一次红色恐慌期间打击极端主义的部分策略。与此同时，胡佛发起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行动，收集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人的信息并进行分类，牵涉范围之大令人震惊。1968年，《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称，“1919年，胡佛和手下在百天之内，收集到了六万份政治‘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资料，在那个混乱的战后年代，这些人是司法部的特殊目标。联邦调查局收集的档案从最初的规模，扩大到1956年的近五百万份”。[115] 虽然名义上是为了追踪持不同政见者和国内恐怖分子而创建的，但档案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联邦调查局将档案信息甚至是录入档案的可能性变成了武器。

20世纪20和30年代的事态发展，包括禁酒令、新政下的政府扩张、胡佛本人的反犯罪战争，都进一步协助执法部门侵入了美国社会，扩大了联邦政府的司法管辖权。[116] 自20年代末以来，胡佛无视1924年司法部长哈伦·菲斯克·斯通的禁令，指挥调查局特工对国内的反政府激进分子进行一定程度的监视。[117] 但联邦调查局正式决定监视美国内部是在1936年8月24日，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胡佛开始讨论收集有关国家安全的内部威胁的“一般情报信息”。胡佛在这次会议的备忘录中写道，罗斯福关注的是“美国本土的颠覆活动，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胡佛指出，尽管特勤局几乎在所有共产主义团体中都安插了线人，但这些特工主要负责监视威胁总统生命的情况。胡佛回忆道，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罗斯福授权胡佛调查“美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和法西斯主义活动”。罗斯福知道这样的指令会引起争议，

因此拒绝书面形式的授权，只有他本人、胡佛、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了解此事。[118] 而在胡佛看来，罗斯福已经授权对颠覆活动进行广泛调查。[119] 75

罗斯福的确切意图尚不清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并非有意授权联邦调查局对国内政治激进分子和工会成员进行广泛监视。指令的非官方性质给了胡佛回旋的余地，但在罗斯福去世后，胡佛没有证据表明，联邦调查局确实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因此，历史学家理查德·吉德·鲍尔斯写道，每当调查局在秘密行动上的权威受到质疑时，胡佛就会“非常激烈地反驳。他被迫接受总统的含糊其辞，于是他将指令解释为范围广、可调整的，但后来根据其字面意思，又解释为范围小、有限制的”。[120] 尽管鲍尔斯似乎在说胡佛当时进退两难，但实际上，胡佛有意挑战对他本人和调查局权力的任何限制，成心违反 1924 年斯通的禁令就是明证。

尽管出于计划的保密性，监视的规模难以衡量，但调查局关于国内间谍案件的公开报告大体说明了国内监视活动的增多。在 1940 年的一份报告中，胡佛详细介绍了自战争爆发以来联邦调查局参与侦查的间谍案件增多的情况。

> 1938 年之前的五年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显示……平均每年有 35 起间谍活动。1938 财年，联邦调查局处理了 250 个此类案件。1939 财年，共收到 1651 个有关国防的案件以供调查。随着 9 月初欧洲爆发战争，总统宣布进入临时紧急状态，这类工作大幅增加。仅在 1940 年 5 月的一天里就收到 2871 份指控。1940 财年，

共收到 16885 件需要进行后续调查的国防事务。[121]

虽然美国直到 1941 年末才正式参战，但从胡佛的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联邦政府已经处于战时状态。1938 年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成立，也是出于对国内安全的关注。

就在胡佛宣读这份报告时，国会也通过了《史密斯法案》（Smith
76 Act of 1940），表达对内部颠覆活动的关注。法案规定，鼓吹推翻美国政府的行为触犯法律，并要求全体非美国公民在联邦政府登记。出于战时进行国内监视的紧迫性，加上工作量庞大，联邦调查局要求公众配合完成任务。胡佛呼吁公民对民主的威胁保持警惕，他在二战前夕发表演说："你们需要随时保持警惕，协助联邦调查局留心任何可能意图损害国内安全的破坏活动、间谍行为或违反中立的情况。"[122] 胡佛还要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美国革命女儿会等组织提供支持，打击他所谓的"任何外来破坏势力对美国的成功入侵"。[123]

联邦调查局因在控制颠覆活动方面的做法遭到批评，尽管这些批评大多被战时迸发的爱国主义情怀所淹没，但胡佛还是试图辩解，联邦调查局不该因反间谍活动受到指责："对间谍行为和破坏活动的调查是否成功，不能以起诉和定罪来判断……调查必须以查明涉案人员的身份、联络方式、行动手段、信息来源和相关事项为目标。未雨绸缪才是最要紧的。"[124] 在这一构想下，胡佛可以宣称，联邦调查局的反监视计划是有效的，即使其行动并没有引发任何的司法活动。

二战期间，联邦调查局几乎被视为一支特殊的军队，就像陆军和

海军在外国海岸作战一样，联邦调查局保护的是后方防线。作为战争的一部分，1939 年，联邦调查局秘密制定了拘禁名单。胡佛向国会委员会表示，这份名单里存放着“从事颠覆活动、间谍活动或任何可能危害美国内部安全的活动的个人、团体和组织信息。名单条目按照字母顺序和地理位置排列，无论面对什么情况，哪怕真的涉及外部矛盾，我们都能通过浏览这些条目，找出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或团体”。[125] 虽然一些国会议员对政府的过度干预表示担忧，但这份名单从未被销毁。

二战也让胡佛有机会重新启用窃听装置，而这一技术原本因 1939 年的一项法院裁决被禁用了。1940 年 5 月 21 日，罗斯福总统秘密授权联邦调查局使用窃听装置，前提是窃听行为必须得到司法部长的个案批准。不过，司法部长罗伯特·H. 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以安全考虑为由，拒绝把批准意见落在纸上。由此，胡佛的窃听行为事实上获得了全权委托。[126] 同时，胡佛的呼吁得到了一些保守组织的响应，这些组织向联邦调查局汇报了颠覆活动的情报。其中最全面的合作是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合作，该协会在 1940—1966 年间提供了数份关于可疑激进分子的报告。[127] 截至二战结束，胡佛领导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国内监视行动，这次行动几乎完全处于他的掌控之下。

77

胡佛避免了前任局长遭受的不道德指控，扭转了基于性别的道德认同为他所用，从而站上了美国的权力巅峰。在此过程中，胡佛成为急剧发展的国家安全和尚未成型的新男性气质之间的重要纽带，这种转变可以从他支持调查局的性别政策和打造调查局特工的文化形象中看出。胡佛巧妙运用大众媒体，向公众展现自己和调查局特工的魅力，

完成了这些相互关联的任务。此外，胡佛将调查局特工塑造成道德人物，也有助于他努力扩大调查局的监视权力。为了在胡佛定义的战后社会政治局面中崭露头角，约瑟夫·麦卡锡和罗伊·科恩需要解决男性身份的问题，同时展现自己是适合监视国家的男性人选。

第三章

美国腹地的民粹主义政治家

约瑟夫·麦卡锡不是拳击手（boxer），而是一名斗殴者（brawler）。[78]

皮尔斯·伊根（Pierce Egan）称拳击为“甜蜜的科学”，但这背后的艺术性并不存在于麦卡锡的拳击生涯中。在马凯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读本科时，麦卡锡是一名业余拳击手，他“出手狂野，每当开赛铃声响起，就会冲出角落，拳头像雨点般落在对手身上。除非对手被击倒在地，否则他永远不会停止攻击”。[1] 他完全不顾防守，“因此难免要挨打，但他选择承受代价，仿佛自己乐在其中，就算被打得血流不止、踉跄无力，也会继续猛扑对手”。[2] 他总是笑对这些磨难，因此业内称他为“笑面乔”（Smiling Joe）。他曾是学校的重量级冠军，但他很快以两胜两负的成绩结束了他的业余拳击生涯。

人们很容易把麦卡锡的拳击风格与政治生涯混为一谈：他是一条出了名的疯狗，不会从战略上思考问题，除了眼前的目标，对任何事都视而不见。[3] 就连许多记者和历史学家也这样认为。许多批评人士

说麦卡锡权欲熏心，因此不加考虑就对（无论是真实存在还是幻想出
79 来的）敌人发动正面攻击，哪怕敌人的反击可能伤害到他。[4]

这是对麦卡锡的误读。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忽视了他的才智、他的魅力、他的职业道德，这些性格品质铸就了他美国权力巅峰的地位，哪怕维持时间不长。但就像在拳击场上一样，他在政治上也是个斗殴者。他似乎总是处于进攻态势，每次出手都是一记重拳。这些策略是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包括麦卡锡的个性、塑造某种特定公众形象的意愿以及这种坦率在过去曾有所回报的观念。他认为自己自命不凡、逞凶斗勇的风格是有效果的。此前多年也确实如此。

他的身份认同是他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价值观与不断膨胀的野心之间碰撞的结果。他极度渴望受到大家欢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可能会颇为算计。这并不是说他很虚伪。很多时候，他似乎真的在同情他人的处境，特别是当这些困难在他眼里清晰可见时。他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天赋，能够与认同其劳动阶层价值观的人惺惺相惜，并通过自己的职业道德向这种价值观和追随者展现忠诚。但他缺乏埃德加·胡佛的自制力和分寸感，麦卡锡的价值观在某些情境下非常有利，其他时候却注定要失败。其中的核心就是他对男性身份的理解，这种思想强调体力、劳动、勇气、竞争力、对女性的支配。这种男性气质让他在政治生涯早期大获成功，并进入美国国会。但这也导致他做出了严重的误判，最终轰然倒台。

***

要完整准确地还原麦卡锡的早年生活轨迹很困难，因为这些都被他自己编造的故事掩盖住了。他讲的这些故事似乎有意夸大了自

己的传奇经历，但他的成长本身就足够引人入胜了。1908 年 11 月 14 日，在威斯康星州大丘特镇（Grand Chute）的农舍中，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在助产士的帮助下呱呱坠地。父亲蒂莫西·麦卡锡（Timothy McCarthy）和母亲布里奇特·比德·麦卡锡（Bridget Bid McCarthy）共育有七个孩子，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排行第五。蒂莫西是个农民，就在爱尔兰移民来的父亲传下的 143 英亩土地上劳作为生。他沉默寡言，勤恳工作，恪守本分。母亲比德身材矮胖，相貌平平，是个虔诚 80
的天主教徒，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邻居们回忆说，乔（约瑟夫的昵称）是她最宠爱的孩子，但也补充道，她从来不会溺爱他。[5] 兄弟们就更不会了，他们经常取笑乔又高又瘦、动作笨拙。邻居们还记得，麦卡锡家的男孩时常打闹不休，毫无疑问，为了胜出，乔必须具备一定的战斗精神。这家人常去教堂做礼拜，终其一生，乔都保留了每个周日参加弥撒的习惯。

最重要的是，麦卡锡一家重视“勤勉工作”的观念，包括体力劳动、勤劳敬业、勇敢坚韧、不屈不挠，这是不少劳动阶层文化的核心要素。农场里有大量体力活要干，土地要犁，牛奶要挤，马匹要喂。他们家那座用白色墙板建成的农舍没有通电，也没有下水管道。父亲蒂莫西对儿子的要求很高，毕竟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都压在他们肩上。乔表现优异，比其他兄弟都要努力，活没做完就不休息。多年后，一位邻居回忆说，乔是个异常勤劳的年轻人，“拼了命地工作”，有一次，他靴子都掉进了泥里，还坚持帮父亲清理干草。[6]

对年轻的乔来说，这种奉献精神有多重目的。首先是迎合了他的父亲。尽管后人可能夸大了蒂莫西的专横性格，但他确实对儿子的职

业道德有着很高的期望。乔一年四季在农场里辛苦劳作，这让父亲很是满意。另外，大丘特作为小型农业社区，体力劳动是这里衡量一个人价值的主要方式。尽管邻近的阿普尔顿（Appleton）因坐拥众多造纸厂而发展成小型城市，大丘特仍以农业种植为主。在这样的环境下，经商和务农成功是脱颖而出的唯二手段，但因难以获取资本，成功的路径只剩下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就像许许多多的农民一样，大丘特的镇民似乎也为自己的简朴生活而感到自豪，虽然这在城市居民眼中可能就是落后。

麦卡锡的童年教育始于只有一个教室的昂德希尔公立学校（Underhill Country School），这与胡佛在华盛顿接受的教育体系有着天壤之别。据大多数人说，麦卡锡相当聪明，记忆力绝佳。他进步神速，但也有些过于活跃，坐不住，有点话痨。麦卡锡对学业缺乏兴
81 趣，读完八年级后就离开学校，在家庭农场干活。16 岁时，他说服父亲租给他一英亩土地，开始经营自己的养鸡生意。[7] 麦卡锡的辛勤劳动获得了回报，仅一年后，他就成为一个生意兴隆的小企业老板，拥有一间大鸡舍、数百只母鸡、一辆二手皮卡。为了运送货物并开展业务，他走遍了奥塔加米县（Outagamie）和威斯康星州。可是好景不长，几年后麦卡锡生了一场大病（可能是流感），不得不长期卧病在床。事实证明，他雇来替他照顾鸡的朋友并不称职，麦卡锡一走，他的企业也倒闭了。此后不久，麦卡锡在大丘特镇西北 30 英里的马纳瓦镇（Manawa）找了份工作，负责经营一家新开业的杂货店。

麦卡锡把经营养鸡生意的技能套用过来，在马纳瓦也取得了成功。一到镇上，他就开始像搞政治竞选一样，挨家挨户敲门介绍自己，宣

布杂货店开业的消息。他很受欢迎，这让“现金流”（Cashway）杂货店也火了起来，成为这个小型农业社区工作之余的聚会场所。就连马纳瓦镇上的竞争对手也会早早关门，只为加入杂货店的闲聊。马纳瓦的分店很快成为该连锁品牌业绩最出色的一家，尽管它的规模最小。麦卡锡这次的成功还要直接归功于他的辛勤工作和沟通客户的能力。他比竞争对手的营业时间更长，并愿意帮助任何有需要的人。当地大部分鸡感染鸡瘟时，麦卡锡为邻居家的农场提供了援助。他虽然是外来的，但镇上的人喜欢他、接纳他，于是他成功了。他和蔼可亲、乐于助人、风趣幽默、朴实无华。[8]

在马纳瓦镇，他寄住在弗兰克·奥斯特罗斯（Frank Osterloth）夫人家，这位夫人的子女都已成年，丈夫在威斯康星州北部做伐木工。乔决定重返校园，很大原因是这位夫人的鼓励。21 岁生日前不久，他在马纳瓦镇上的小沃尔夫高中（Little Wolf High School）参加了速成班。到了 1930 年春天，乔已经修满了高中毕业所需的学分，仅在一学年内就获得了高中文凭。[9]

高中结束后，麦卡锡于 1930 年秋天进入密尔沃基市（Milwaukee）的马凯特大学修读电气工程专业。他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一是学费相对低廉，二是学校的天主教背景。为了支付学费，麦卡锡接了大量的兼职工作：泊车员、洗碗工、快餐厨师、加油站服务员、面包师、卡车司机、轮胎推销员、电梯操作工、拳击教练。他还经常大量赌博赚钱。在密尔沃基的酒吧密室玩扑克时，麦卡锡会不计后果地加大赌 82
注，信心满满地投入大笔资金，吓得对手以为他的底气是一手好牌，故而选择放弃。麦卡锡往往是空手前去，玩完一夜的扑克牌后满载而

归。据报道，有一次麦卡锡在匹兹堡观看马凯特大学的足球比赛，赢的钱足够支付一个学期的费用。[10]

麦卡锡在马凯特大学很受欢迎。校报刊登了他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完成高中学业的壮举，这让他在学校名声大噪。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花花公子，这个形象让他在这所男校里赢得了朋友和崇拜者。他加入了校内拳击队，第一次比赛就有近千名观众。他还参加了腕力比赛，下注自己会赢过所有人。光顾脱衣舞俱乐部也是他的爱好。麦卡锡会和朋友凑钱买一张票，然后偷偷溜到俱乐部的后门，放等在那里的朋友进来。大家都说，麦卡锡在大学期间是个典型的男人中的男人（archetypical man's man）。[11]

也许是课外活动太花时间，起初麦卡锡的专业课成绩并不出众。但这个专业对他也失去了吸引力，第二学年结束时，他决定攻读法律学位。工程专业需要精准细致，相比之下，法律专业似乎更富于变化，从业者只要能与他人建立联系，就会获得成功。而与人交际绝对是麦卡锡的天赋之一。他加入了德尔塔·西塔·斐兄弟会（Delta Theta Phi，这是一个为其成员提供以往的诉讼摘要和学习资料的法律界兄弟会），住进了兄弟会位于西基尔伯恩大道（West Kilbourn Avenue）的房子，每晚喝酒、吸烟、狂欢、打牌。[12]1932 年秋天，麦卡锡进入了马凯特大学法学院，1935 年取得了法律学位。

大四学年，麦卡锡竞选班长职务。他和对手查尔斯·柯伦（Charles Curran）公开做出承诺，无论竞选期间发生什么，两人在选举日都会把票投给对方。计票结果显示，麦卡锡以两票之差险胜。柯伦怀疑道："乔，你把票投给自己了吗？""当然，"麦卡锡迅速回答道，"你

也希望我把票投给最合适的人，对吗？”[13] 柯伦最终原谅了麦卡锡的诡计，很大原因是麦卡锡确实招人喜欢。那年晚些时候，柯伦的父亲去世了，麦卡锡借了些钱，请假去参加葬礼。“他这么做是为了我，” 83
柯伦回忆说，“他永远都是我的朋友。”[14]

毕业之后，麦卡锡搬到了马纳瓦西南部的小城市沃帕卡（Waupaca）。他计划开办一家小型律师事务所，先赢得声望再参加政治竞选，这是他在马凯特大学时就许下的愿望。麦卡锡通过一次纸牌游戏赢得了办公家具，后来又在贷款与产权契约大楼（Loan and Abstract Building）租下了场地。但麦卡锡在沃帕卡并不像在马纳瓦时那么受人欢迎。据报道，他咄咄逼人，野心勃勃，这让许多居民感到不快，他的策略也没有让他在当地的法律圈交到任何朋友。沃帕卡律师埃德·哈特（Ed Hart）回忆道：“我一直觉得，乔的道德观和我们格格不入。他只会问自己两个问题：我想要什么？我该如何得到它？一旦他要做某事，别人都得靠边站。就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点类似无政府主义。”[15]

离开沃帕卡的时机一出现，麦卡锡就立刻抓住了它。1936 年，他接受了沙瓦诺县（Shawano）律师迈克·埃伯莱因（Mike Eberlein）抛来的橄榄枝，沙瓦诺是格林贝市（Green Bay）西北部一个较大的社区。麦卡锡推断，人口数量越大，政治可见度越高。作为当地最出名的律师埃伯莱因的得力助手，麦卡锡很快摆脱了外来者的身份；他与埃伯莱因的往来让他立刻获得了人们的信任。他对各种邀请来者不拒，曾在沙瓦诺的商人俱乐部和兄弟会发表演说，与每个重要人物都建立了联系，并为自己树立了前途无量的年轻律师的形象。

麦卡锡很快转向了仕途。即使在新政的巅峰时期，威斯康星州农村地区的民主党人也几乎是凤毛麟角。麦卡锡没有把民主党人的稀缺视作劣势，反而抓住了这个机会。竞争小意味着能分到的本州民主党官员的关注越多。1936 年，他作为民主党人竞选地方检察官，但以惨败收场。麦卡锡知道，这次竞选他希望渺茫，他只是想吸引公众的关注。[16]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不再参与政治竞选，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律师业务，最终成为公司的指定合伙人。1939 年，他宣布参加巡回法官的竞选，这个职位对党派背景不做要求。[17] 麦卡锡再次面对势力稳固、声名显赫的对手埃里克·华纳（Eric Warner），这是个艰巨的挑战。但麦卡锡知道，当地的许多律师并不支持华纳。麦卡锡抨击了对手的薪资水平，并暗示华纳在年龄问题上撒谎。但麦卡锡真正的优势在于
84 他对竞选成功的不懈追求，他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挨家挨户拜访选民，与他们握手并介绍自己的名字是“乔”。一位农民是这么描述麦卡锡的：“他根本不认识我。但不知为何，他知道我的名字，我妻子的名字，孩子的名字，还有我家的狗的名字。我走到前门时，看到他递给我女儿一根棒棒糖，还和我儿子掰手腕玩……他问我是否能让他给奶牛挤奶，说他想保持手感。他挤得很好。”[18]

这则轶事揭示了麦卡锡政治生涯中的许多秘密。他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避免直截了当地谈论政治，专注于与听众相关且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并证实了自己坚实的劳动阶层根基。这样纯粹的乔与威严庄重的法学家华纳形成了鲜明对比，华纳并不喜欢竞选斗争。麦卡锡把自己描绘成劳动阶级男性气质的缩影，他本人就是这种性格的检验

标准：坚韧、有力、勇敢、直率、活跃、勤劳。这样的政治身份十分高明，他的竞选风格、对司法机构的态度和他的个性都体现了这一点。麦卡锡在竞选中轻松击败了华纳。

麦卡锡刚就任巡回法官一职，就开始以务实的态度（批评者则称之为草率）处理堆积已久的备审案件。作为威斯康星州最年轻的巡回法官，在履职的过程中，他有着与之相称的活跃能量，有时为了处理积压的案件，甚至一直工作到午夜。有报道称，他可以在 10 分钟内走完整个离婚程序。这种积极高效的工作方式似乎并没有影响工作质量，麦卡锡的裁决以高于平均水平的速度通过了该州最高法院的审查。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提前完成了任务，于是他选择继续帮助巡回法院的其他法官，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此举与其说是为了给同僚提供帮助，不如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好让他熟悉不同区域，竭力争取民众支持，并在政治上讨好有影响力的威斯康星州人。通常情况下，只要能得到回报，麦卡锡就不介意耗费劳力。[19]

担任巡回法官期间，麦卡锡更加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也更加关注媒体对他的报道。他加入了麋鹿俱乐部（Elks）[①] 和哥伦布骑士团（Knights of Columbus）[②]，对演讲邀约几乎来者不拒。1942 年 6 月，麦卡锡的秘书玛格丽特·玛丽·德格鲁特（Margaret Mary DeGroot）给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寄去一张麦卡锡的照片，她解释说："当地媒体希望麦卡锡法官拍摄一张近照。由于贵社近期的一篇报道中用

---

① 麋鹿俱乐部于 1868 年成立于美国纽约，为邀请制的兄弟会社团，成员必须为年满 21 岁、信仰上帝、品行良好的美国公民。

② 哥伦布骑士团于 1882 年成立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以"慈善""团结""兄弟情谊""爱国主义"为原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会兄弟会志愿者组织。

85 的是他很久以前的照片，我想这张新照片可能会派上用场。”[20] 麦卡锡也把这张照片发给了《密尔沃基新闻报》（*Milwaukee Journal*），虽然对方并未开口索要。[21] 这种积极性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目的，不如说是虚荣心在作祟，麦卡锡深知，与新闻界搞好关系会带来回报。

这位年轻法官对公众形象的关注，同样体现在二战爆发时对服役问题的处理上。彼时麦卡锡已经 30 岁出头了，他认为凭自己的年龄和社会地位可以得到特殊对待。1942 年 1 月，麦卡锡试图在军队中谋求一个可以发挥才智的职位。[22] 这一请求必然是失败了，就在几个月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总顾问约翰·罗德·奥布莱恩（John Lord O’Brian）的信，信上说“目前没有空缺”。[23]

麦卡锡明白，战时服役对他的政治前途至关重要，于是他不放过任何兵种，只为求得一个军官资格，但他还是没能收到满意的答复。他似乎别无选择，只好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从签署应征文件的那一刻起，他就吹嘘自己是以二等兵身份自愿加入海军陆战队的，尽管他已经申请并获得了军官的委任。[24] 当然，这意味着尽管他有政治背景，但他并不希望得到任何优待，甚至主动加入了条件最为苛刻的军事部门。数十位朋友和陌生人给他写信，赞扬他做出的决定。他的朋友詹姆斯·德菲（James Durfee）写道：“实话实说，我特别高兴看到你选择了最艰苦的部队，而不是舒舒服服地待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美国人民厌倦了浮夸和虚伪，他们需要行动和思想上的勇气。兄弟们（We of your own clan）都为你选择了这条道路感到无比自豪。”[25]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还充满了兄弟情谊，最后一句的“兄弟们”

有多重含义。和麦卡锡一样，德菲也是有着爱尔兰血统的天主教徒，也是威斯康星州人，而且似乎也是一名律师。但对共同归属的认可超越了地理、宗教、种族或职业的界限。麦卡锡在决定加入海军陆战队时承认，尽管他在法律和政治上都取得了成绩，他公众身份的核心仍然是忠于劳动阶级的朴实价值观。他是否真的信仰或坚持这种无形的价值观并不重要，关键是麦卡锡能让他人相信，他仍坚持与自己代表 86
的人民保持联系。就像最杰出的政治家一样，麦卡锡成了一块空白的画布，选民可以在画布上描绘他们希望看到的模样。

***

在个人生活中，年轻有为的律师兼法官约瑟夫·麦卡锡仍保留着学生时代的诸多特质。闲暇时，他会喝酒、赌博、游泳、远足、滑雪、钓鱼、打猎、追女人。简而言之，他就像个普通男性。

麦卡锡的私人信件大多是在计划与朋友旅行度假。信里既谈到工作业务，也说起娱乐消遣，他的会计师和贷款经纪人经常在信末邀请他小酌一杯或一起钓鱼。最值得注意的是，贯穿信件的是某种男性情谊和类似兄弟打趣的玩笑。这种玩笑往往围绕着女人。在 1941 年 3 月的一封信中，一位朋友开玩笑地问麦卡锡什么时候结婚。[26] 就麦卡锡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如何处理法律文书的问题，法院书记官沃尔特·A. 埃弗斯（Walter A. Evers）建议他让秘书“负责邮件，当然，沾有香水的情书除外”。[27]

人们认为他是四处留情的浪子，对此麦卡锡无甚反应。他说自己对婚姻没有什么兴趣，“如果我每隔半小时就要给家里打电话，我就无法从事政治工作”。[28] 女人可有可无，但政治是永恒的。他的朋友

似乎都认为他是个摇摆不定的单身汉，当麦卡锡向德菲提到，一位女性朋友想同他和他的朋友共度周末，却难以得到母亲的允许时，德菲回信说，可能她母亲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她就像我一样了解你”。[29] 熟人把他的恋爱关系比作一扇旋转门，起初非常甜蜜，但乔最终都会失去兴趣。传记作家拉里·泰伊（Larry Tye）写道，麦卡锡年轻时曾两度与人订婚，但两段关系都在他竞选参议员之前就结束了。[30]

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的浪漫故事与许多因素有关。首先，这说明
87 他早期希望塑造单身形象。与其说麦卡锡是青春焕发、放荡不羁的“都市单身汉”，不如说他志不在此，无暇为每个女人付出超过一夜的时间。其次，他前卫的约会生活给后来人们指控他是同性恋提供了一点把柄。最后，这符合麦卡锡野蛮粗鲁的形象，对女人来说，他绝非丈夫的合适人选。[31] 麦卡锡作为硬派男性气质的践行者，或至少也是粗野的工人阶级代表，这种形象当之无愧。他从未停止赌博，据传他当律师时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牌局。[32] 就连当上巡回法官后，他还是会定期赌博。他不喜欢啤酒，爱喝烈酒，时常喝得酩酊大醉。正如往来信件所显示的那样，他对女性的态度并不明朗。

他的信件也展现了他对男性气质的定义。在 1942 年 12 月的一封信中，麦卡锡表达了对朋友小马克·卡特林（Mark Catlin Jr.）加入海军陆战队的支持：“我自担任法官以来就很熟悉卡特林先生。在我看来，他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人选。他善于分析，为人十分正派坦率，胆气非凡。一直以来，他都坚持体育锻炼，显然身体状况良好。”[33] 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只能由最坚韧、最阳刚的军人来保卫，而麦卡锡从他朋友的分析头脑、运动能力、身体素质和难以形容的品质“胆气”

（guts）上看到了男性气质的存在。在举荐另一位朋友担任海军军官的信中，麦卡锡也用了类似的措辞："科恩先生的抱负、智慧、干劲都远远超过普通年轻人。他有过人的'胆气'，我强烈认为他是理想的军官人选。"[34] 麦卡锡从不详细说明胆气到底是什么，怎样才能获得胆气，或胆气为什么是可取的，他似乎相信，不必明说，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就能理解这种无形的属性有多珍贵。

综合来看麦卡锡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社会阶层是影响他和他的自我认知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但事实证明，这也是麦卡锡与他身处华盛顿的天然盟友胡佛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胡佛在城市的舒适环境中长大，因此他相信，必须积极营造自己的男性气质，通过不断散发活力来对抗软弱萎靡。对胡佛和他所在的阶级来说，男性气质是必需的。而对麦卡锡来说，男性气质从不需要刻意追寻，这本来就是他的理想形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起初，人们并不认为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可以培养活力，这只是维持生计、赢得尊重的手段。两人的成长经历天差 88
地别，这可能是导致胡佛无法把麦卡锡放在平等位置上的主要因素。虽然两人关系不错，也结成了政治联盟，但胡佛认为麦卡锡太过粗鲁，永远无法真正掌权。

***

1945 年 2 月，约瑟夫·麦卡锡上尉辞去了海军陆战队的职务，回到威斯康星州，开始准备竞选参议员。日本宣布投降的整六个月前，他正式退役。1946 年的选举实际上是麦卡锡第二次竞选参议员，1944 年时他曾参加共和党的提名竞选，不过根据军事条例，他不得在服役期间发表候选宣言。初选那天，他被时任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

（Alexander Wiley）轻松击败。[35]

1946年的共和党初选中，麦卡锡的对手是小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te Jr.），他是传奇参议员“斗士鲍伯”罗伯特·拉福莱特（“Fighting Bob” Robert M. LaFollette Sr.）的长子，大家也称他为“小鲍伯”（Young Bob，“鲍伯”是罗伯特的昵称）。1925年9月的特别选举中，拉福莱特首次当选参议员，继承父亲的席位。小罗伯特原本是共和党人，但1934年他放弃了共和党，与弟弟菲利普（Phillip）创立了威斯康星州进步党（Wisconsin Progressive Party）。[36]作为进步党人，他分别在1934和1940年赢得连任，但他未能实现成立美国进步党的愿望，1946年3月，威斯康星州进步党进行投票清算。尽管受到了民主党领导人的追捧，小罗伯特还是决定跟从大多数进步党人的选择，重新加入共和党。[37]

虽然小罗伯特人气不低，且出身威斯康星州最出名的官僚家庭，但他的劣势也给了麦卡锡可乘之机。进步党解散让小罗伯特失去了以往的根基，他又没能在共和党保守派中赢得相应的支持，他们不相信小罗伯特会在当下时机转向右翼。作为竞选人，他是不合格的。小罗伯特沉默寡言，动作笨拙，没有继承父亲在选民面前的轻松姿态。最重要的可能是，小罗伯特得到消息，共和党的提名人选内定为他，于是1946年夏天，他继续待在华盛顿，直到初选前的十一天才回到威斯康星州。[38]

尽管如此，麦卡锡当选的可能性依然渺茫。要想击败拉福莱特，
89 他必须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把自己与观点相似的对手区分开来。麦卡锡与对手的观点在意识形态方面差异不大，他更多的是强调自己的个性

特征。尽管此时已经获得了中上阶层的支持，麦卡锡并没有放弃根植在他所谓的男性气质中的工人阶级身份：他的职业道德和贫寒出身，随和的性格，以及他“自愿服役”的经历。这样一来，他的形象比富有、幸运的对手更接近普通的威斯康星州人。

麦卡锡的勤勉工作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这让他赢得了工人阶级选民的喜爱，并展现出真诚硬朗的男子气概。麦卡锡放大了蓝领工人和白领职员之间的文化差异，男子气概的真实性也正体现在这种差异上。埃德加·胡佛努力证明白领工作实际上可以促进男性气质，麦卡锡则与之相反，暗示他的蓝领出身和工人阶级价值观让他免受白领工作的女性化影响。初选结束后，《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拉福莱特先生还在华盛顿忙来忙去的时候，麦卡锡先生（在威斯康星州）四处奔走，和所有看起来达到投票年龄的人握手拉票。”[39]

竞选期间，麦卡锡到处分发《消息闲谈》（*The Newspapers Say*），这本花里胡哨的小册子上写满了对麦卡锡的吹捧，夸他出身贫寒、工作勤勉。册子鲜红的封面后，印着从报纸文章和访谈中截取的内容，麦卡锡被描述为一位努力工作、诚实守信的退伍老兵，华盛顿迫切需要他注入民众的思想意志。这本册子是不错的个人传记，但在政策说明方面有所欠缺（唯一讨论的立法问题是麦卡锡支持通过一项提高退伍军人待遇的法案），更注重美化麦卡锡的公众形象。其中一节引自《柏林日报》（*The Berlin Journal*），强调麦卡锡出身工人阶级，称他“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一路上经历的艰难困苦磨炼了他的身心。他即将在竞选中大放光彩，保护选民远离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错误引导，让大家回到美国生活的正轨上”。[40]这本册子还引

用了麦迪逊市一位政治作家的话，指出麦卡锡“在农舍出生长大，直到同龄男孩上高中的年纪才离开家”。[41] 它还引述了《沙瓦诺县报》（*Shawano County Journal*）的论点，称“麦卡锡的主观能动性和勤奋工作的能力是他作为农民、杂货店负责人、律师、法官、士兵取得成功的原因”。[42]

90 竞选过程中，麦卡锡更多强调的是养鸡和管理杂货店的经历，而非后来作为律师和法官取得的成功。当谈到从事司法工作的记录时，他表示自己的成功来自辛勤劳作和热爱法学知识的双重作用：“担任法官期间，他能够把法律知识和基本常识（horse sense[①]）结合在一起，继而在短时间内伸张正义，这也是人们钦佩他的地方。”[43] 其言外之意是麦卡锡出身农村（对应了马的隐喻），即使后来成为法官，他也没有忘记成长过程中获得的观念和常识。为了进一步强调自己出身平凡，麦卡锡把拉福莱特说成是“弗吉尼亚州的绅士人物”，原因是他在华盛顿郊外买下了一座农场。[44]

初选期间，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强调自己有多平易近人，麦卡锡开车跑遍了整个威斯康星州，从不因某个小镇或村庄规模不大就放弃走访。麦卡锡一般都穿休闲装，上身是工作衬衫，下身为卡其布裤子。这一策略也凸显了他愿意为拉票竭尽全力，不像拉福莱特总是表现得不情不愿。麦卡锡希望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工人阶级出身让他具备了靠裙带关系上位的拉福莱特所欠缺的积极特质。早在乔治·W. 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连任大选的五十年前，麦卡锡就成为选民“最想与之共饮啤酒”的政客了。麦卡锡对个人独立的倡导也影响了他的

---

① 含义类似于“老马识途”。

政治哲学。他展现出一副反对新政的保守派模样，指责“参议员拉福莱特和新政支持者认为，我们面前的每一个问题都该有立法部门或其他联邦机构参与。但我认为，立法部门参与得越少，权力越分散，各州能做的就越多，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好”。[45]《消息闲谈》呼应了这一观点，认为麦卡锡将给国会带来效率意识和紧迫感，改变联邦政府一贯的官僚作风。

1946 年 4 月，麦卡锡来到繁荣的小城斯特金湾（Sturgeon Bay）开展巡回演说。[46] 其间他主要在斯沃博达酒店（Hotel Swoboda）活动，多尔县（Door County）的共和党青年在此为他举办了晚宴。酒店外墙是老化发旧的砖块，往西北方向两个街区就是当地的主要造船厂。当晚麦卡锡发表的演说与他竞选期间的其他演说类似。他的重点是和平年代的军队构成和退伍军人待遇，主张停止征兵，改为全部招募志愿兵，提高军人收入吸引大家自愿报名，并给予全体士兵晋升军官的机 91
会。麦卡锡还表示，他相信以后申请陆军和海军院校不再需要政治任命。此外，他还推动提高退伍军人的补贴，特别是那些“残疾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47]

表面上看，麦卡锡的提议都很温和。但这背后暗藏的叙事线索说明，他的参选还有更深刻的主题。麦卡锡的每项主张都是出于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抨击精英主义，赞扬能者居上，煽动选民怀疑联邦政府，并声称自己为“普通人”代言。麦卡锡还在演说中概述了军队的发展方向，一家报纸将其总结为“打破军队的等级制度”，并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让所有人拥有晋升机会。麦卡锡表示发放给退伍军人的抚恤金还没有“救济金”多，在福利制度趋于崩溃的背景下，麦卡锡

还是支持加大对伤残老兵的补贴力度。[48]

麦卡锡初选获胜，不仅震惊了威斯康星州的观察员，更震惊了全国上下。自由派政治杂志《国家》（*The Nation*）认为，拉福莱特落选是因为进步党人在原党派解散后转向了民主党，这才让中间派麦卡锡有了可乘之机。《国家》并不太看好麦卡锡，认为他的策略其实很简单，就是“支持拉福莱特反对的一切立场”。[49]

初选获胜后，麦卡锡在大选中延续了民粹主义倾向。在与民主党人霍华德·麦克默里（Howard J. McMurray）的辩论中，一名听众问麦卡锡“有什么资格与政治学教授麦克默里相比”。麦卡锡则回答：“我只是个农家小子，不是什么教授。”[50]一家报纸形容麦卡锡在大选中的表现延续了他“从白天工作到黑夜的模式”，还得出结论，“这样看来，他的付出会得到回报”。[51]

麦卡锡的民粹主义倾向也表现在他的个性上。竞选期间，他照搬了在马纳瓦管理杂货店时的作风。7月份，《密尔沃基新闻报》报道称：“当前麦卡锡的手段主要是私人接触，基本要素就是有力的握手，麦卡锡式的笑容，以及个人性质、非正式的拉票行为。”[52]麦卡锡的粗鲁时有时无，即使暴露出来也显得平易近人。从1944年的提名竞选起，他就表现得很明显了，当时《新闻报》报道了时任上尉的麦卡锡和一名记者的对谈：“当被问到男孩子讨论最多的是什么时，上尉笑着说：‘你觉得呢？’他指的是什么？‘和你想的一样。’上尉回答。”[53]这次心领神会的交流说明，麦卡锡处在精英地位，但这不意味着他脱离了自己想要代表的群体。

类似的暧昧回答也出现在麦卡锡赢得共和党提名后的活动报道

中。在详述了麦卡锡的深夜庆祝活动后，《新闻报》是这么形容第二天一早出现在法院门口疲惫不堪（很有可能是宿醉）的麦卡锡法官的：“雪莉（福尔斯曼［Foresman］，麦卡锡的秘书）从楼下的监室给他端来了一杯咖啡。咖啡太烫，根本喝不下去。‘麻烦给我拿点冰块来，美丽的夫人。’麦卡锡说。‘我找不到冰，我帮您吹吹（blow，也有“吹箫”义）吧，参议员阁下。’秘书回答道。她也是这么做的。”[54] 这就是单身汉麦卡锡，一个可爱迷人的无赖角色，他对遇到的所有人眨眨眼，说说谎，就能走进对方心中。他给秘书的昵称带着轻微的厌女情绪，在生活中驱使女人为他做事，对女人拥有正常的欲望，无须给出任何条件就能与下属私下保持男女关系。这再一次说明，麦卡锡只是众多男性中的一个，只不过他比大多数人更为成功。

或许，他的民粹主义男性气质表现得最明显的就在于其服役经历。麦卡锡上尉确实有过入伍经历，这无疑值得称赞，但作为候选人，麦卡锡需要把故事包装得更激动人心。麦卡锡的竞选带有某种步步紧逼的军事色彩。《密尔沃基新闻报》有报道称，在走访威斯康星州中南部的一个村镇时，麦卡锡的手段是“近身交流”（hand to hand），这就让人联想到近距离搏斗。[55] 1946 年竞选时，他提到自己在太平洋作战时曾在俯冲轰炸机上担任后机枪手，由此得名“尾炮手乔”，他还在竞选材料的结尾总结说，“国会需要一名尾炮手”。[56] 竞选海报上，他身穿全套飞行装备，包括飞行员的皮质头盔和架在头顶的护目镜，仿佛英雄一般。在这张仰拍照片中，麦卡锡露出一丝笑容，满怀希望地凝视着天空。

《消息闲谈》把麦卡锡描绘成一位无私奉献的战争英雄，引用切

斯特·尼米兹（Chester W. Nimitz）上将的话说，麦卡锡“腿部严重受伤……但仍拒绝入院治疗，继续高效执行任务”。[57] 册子还引述了海军陆战队空军少将费尔德·哈里斯（Field Harris）对麦卡锡的赞誉：

93 “我很高兴看到麦卡锡在服役的三十个月中取得了不俗成绩，特别是在战斗方面。”[58] 尼米兹这段话实际上出自他应麦卡锡的指挥官要求签署的文书，至于内容本身，几乎可以确定是麦卡锡自己写的。为了进一步美化自己的经历，麦卡锡抨击拉福莱特没有在战争爆发时参军报国，指责他通过投资密尔沃基无线电台“大发战争财”。[59] 麦卡锡还批评了拉福莱特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认为他没有勇气向国外派驻美国军队。[60]



图 5. 1946 年大选期间，麦卡锡在他的竞选总部。这张身穿飞行装备的照片是他的重要营销手段。
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

为了突出自己的服役经历，麦卡锡反复强调他是以二等兵身份入 94
伍的。他从太平洋战争归来后，威斯康星州的一家报纸发文宣称："虽然应征时间自动延迟了，但麦卡锡主动离开法院，作为二等兵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他被送到一所军官学校，并在那里获得了少尉军衔。"[61] 这些内容（很可能是麦卡锡自己写的）非常有启发性，这说明麦卡锡是靠自己的努力晋升军官的，而非基于他入伍前的官职。虽然麦卡锡没有把自己说成是威斯康星州的奥迪·墨菲（Audie Murphy）[①]，但他夸大了自己的军事战绩，足以让选民相信，海军陆战队这段经历证明了他坚韧刚毅、勇猛强壮等男性化主张。

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麦卡锡于 1942 年 8 月开始服役，最终被分配到海军陆战队 235 侦察轰炸中队（VMSB-235）。麦卡锡担任了两年半的情报官，1943 年春末随 235 侦察轰炸中队来到南太平洋。麦卡锡的职责主要限于在飞行人员轰炸日本控制的岛屿之前通报地面情况，并在他们结束轰炸返航后询问任务情况。据同一战区的海军陆战队员说，他们最大的敌人是无聊。虽然麦卡锡后来感叹，他不得不给死去战友的父母妻子写信，告知这个悲伤的消息，但 235 侦察轰炸中队在整场战争中并无伤亡。[62]

麦卡锡确实有个"尾炮手乔"的诨名，但这个名字更多是出于讽刺而非赞美。这是因为麦卡锡在一次任务中消耗了太多弹药，甚至打破了军方记录。在花了一个下午扫射椰子树后，麦卡锡"荣获"了这个称号，中队的公共关系代表还迅速向几家威斯康星州报纸散发了新

---

① 奥迪·墨菲（1926—1971），二战时期美国受勋最多的军人之一，后成为电影明星。

闻稿讲述此事。几周后，麦卡锡收到了寄来的文章，据说他当时兴高采烈地告诉朋友，这次宣传“对我来说价值五万张选票”。[63] 麦卡锡虽然是情报人员，但他确实自愿充当了十几次尾炮手，其间飞机可能多次遭到敌方射击，不过他肯定算不上自我描述的那种战火英雄。[64]

在麦卡锡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未放弃夸耀自己的战争经历。据报
95 道，1946 年竞选期间，他声称自己走路时要穿矫正鞋垫，因为他“腿部残留着 10 镑重的弹片”。[65] 1952 年，麦卡锡开始撰写自传《麦卡锡主义：为美国而战》（*McCarthyism: The Fight for America*），他在书里写道，“那是我第一次坐在 SBD 轰炸机的后座上，向日本在南太平洋的防线要害、布干维尔岛南端的卡西利进行轰炸”，并指出这架飞机在轰炸时躲开了日本的防空炮火。[66] 这里麦卡锡使用了军队俚语“SBD”，飞机的原名其实是“道格拉斯无畏式侦察轰炸机”（Scout Bomber Douglas Dauntless），这是一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用来作战的俯冲轰炸机。这样的用词巧妙地体现了麦卡锡的军事素养。[67]

而麦卡锡所说的战争创伤，其实是在“尚德卢尔号”舰船（USS Chandeleur）上遭遇恶意的迎新仪式所致，这艘水上飞机勤务船负责将 235 侦察轰炸中队由夏威夷送往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他也因此被授予了紫心勋章。1943 年 6 月 22 日，船上的许多人都参加了首次穿越赤道的庆祝仪式（有时也被称为“老水手”仪式）。每个未曾穿越过赤道的人都必须穿过一排正在挥桨的水手。仪式还要求每个人在脚上绑一只水桶，这让任务变得更加艰难。麦卡锡在奔跑时摔了一跤，从船梯上掉了下来，脚上的骨头断了几根，走路一瘸一拐。[68] 这是他在战争中唯一一次受伤。

麦卡锡把自己说成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这与他受民粹主义影响的男性表现的其他要素完美契合。对麦卡锡的男性气质来说，这种形象不仅仅是为了竞争而虚张声势的产物，也不是他努力将自己与拉福莱特和麦克默里区分开来的自然结果。在劳资纠纷、新政下联邦政府发展壮大以及共产主义蔓延的大背景下，这场表演让麦卡锡获得了保守派选民的支持。尽管此时的政治环境对麦卡锡确实有利，包括大多数共和党人对拉福莱特持怀疑态度，本该支持拉福莱特的自由派和工人阶级选民产生了分歧，但如果麦卡锡不努力利用他得到的机会，他也不可能获胜。

1946 年，一场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劳资关系因此成为中期选举的核心问题之一，许多选民担心资方和工会的长期纠纷会带来严重经济后果。煤矿工人、肉类加工厂工人、钢铁工人、机械师、卡车司机、木材工人、铁路工程师、汽车工人都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八个月内参与了罢工。截至 1946 年，约有 460 万人参加罢工，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69] 由于恢复到和平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工人正面临裁员，军人 96
重返劳动力市场更是加剧了这一局面。根据工人运动历史学家乔治·利普席兹（George Lipsitz）的说法，“对大萧条再次袭来的恐惧，对战时牺牲自身利益的积怨，对战后工资和工作条件下降的愤怒，引发了席卷全国的罢工和示威浪潮”。[70]

全国最激烈的劳资纠纷发生在威斯康星州西阿利斯（West Allis）的密尔沃基郊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CIO）的当地分会（威斯康星州最大的工会组织）的 248 名工人因无法同阿利斯－查默斯汽车制造公司达成新的协议而选择罢工。罢工开始于 1946 年 4 月 30 日，

正值初选开始之时。作为回击，阿利斯－查默斯汽车制造公司指责该工会的领导层“受到共产主义影响，密谋破坏美国工业”，并在《密尔沃基前哨报》（*Milwaukee Sentinel*）上刊登文章，称工会被共产党人渗透。[71] 这场罢工持续了十一个月，其时间之久、强度之大，在全国媒体上引发了广泛关注。毫无疑问，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影响了选民；1946 年，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竭力主张会众登记成为民主党人，其中大部分人曾是进步党人，1940 年时把选票投给了拉福莱特。[72] 麦卡锡强调了拉福莱特过去对工会组织的支持，称他“太过恭顺驯服”。[73] 在此背景下，麦卡锡的“白手起家”说也可以被解读为反对工会，这说明他明白自力更生的价值，而不奢求社会主义性质的“施舍”。[74]

麦卡锡的男性独立说（masculine self-sufficiency）很好地呼应了保守派选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直到 1946 年，联邦政府在处理物价过高、住房短缺、消费品供应不稳定等问题上似乎都没有什么作为。公众对肉类短缺感到尤为沮丧，牲畜生产者联合起来，拒绝肉类制品进入市场，公开反对继续实行战时价格管制。10 月中旬，杜鲁门总统做出了让步，但这也无济于事，大选还没开始，民主党已经受到了严重打击。[75] 麦卡锡利用民众的怨恨情绪，表现出一种独立公正、积极进取的态度。报纸始终坚持把他写成现实生活中的霍瑞修·阿尔杰（Horatio Alger）①，称他“在十三年内的活动和成就比大多数人一生都要多”。[76] 初选获胜后，麦卡锡对一家报纸说：“威斯康星州的人民，

---

① 霍瑞修·阿尔杰（1832—1899），美国著名教育家和小说家，以“奋斗与成功”的创作主题著称。

特别是农民，已经受够了官僚主义的愚弄和束缚，新政下的官僚机构渗透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77] 97

麦卡锡能在 1946 年的大选中获胜，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选民对共产主义死灰复燃的恐惧。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煽起了美国的反共情绪。1946 年 3 月 5 日，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Fulton）发表演说，警告美国人民，横跨东欧地区和西方世界的苏联“铁幕”已然落下，共产主义间谍正意图在西方掀起一场动乱。因此，国家安全成了大选的焦点问题，联合专栏作家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在自由左派报纸上撰文，称共和党人“主要通过红色恐慌”[78] 控制了国会，这与主流观点不谋而合。

显然，威斯康星州的选民同样无法免受恐惧情绪的影响。拉福莱特多次拉响共产主义的警报，承诺要成为参议院中最凶残的共产主义捕手。但他的承诺无法与麦卡锡的斗士（字面意义上的）经历相媲美，麦卡锡将自己描绘成孔武有力的老兵，事实证明，他还有能力保卫国家。[79] 在大选中，麦卡锡给对手霍华德·麦克默里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指出麦克默里得到了共产主义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支持，说他也是他们的同行者（意为麦克默里也是“共产主义者”，麦卡锡解释说）。[80] 为了向共和党展示自己的诚意，拉福莱特写了些社论文章支持麦卡锡，承诺相比于民主党的候选人，他这位昔日对手将更严厉地打击共产主义。[81]

麦卡锡的民粹主义男性气质还有最后一个优势。对于经历了社会和经济巨变而感到惴惴不安的保守派选民来说，麦卡锡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容易理解。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选民对麦卡锡存在情绪反应，

但他在初选中奇迹般地获得了胜利，又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他与选民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麦卡锡在人际交往方面颇具天赋，一家报纸形容他有“似乎耗不尽的精力和热情来与人结交”。[82] 在那个年代，实况广播和新闻短片可以跨越距离抵达远方，这些大众媒体的创新产物似乎让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失控，但麦卡锡的个人魅力和谦逊风度让他赢得了选民的青睐。

麦卡锡给自己的定位是热爱祖国、勤奋工作、自力更生等“传统”
98 价值观的代言人，以此对抗社会和文化领域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快速变化。[83] 具体而言，他的男性身份强调的恰恰是许多美国人担心正在消逝的理想特质。威斯康星州的工人阶级担心社会正在倡导懒惰和理所当然的特权感（entitlement），麦卡锡的保守价值观正有利于缓解这种恐惧，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麦卡锡的男性身份之所以能很好地起到安抚作用，正是因为许多保守派选民都在关注性别规范变化背后的社会问题。男性投身战争的同时，女性在经济、民权、社会领域的自主权都得到了延伸，等他们退伍归来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1940 年，只有 26% 的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到 1945 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 36%。[84] 1940 至 1944 年间，“从事制造业工作的女性比例增加了 140%”，尽管许多女性起初只是打算临时工作一段时间，但到了 1945 年，四分之三的职业女性都表示希望继续在外工作。[85] 这种渴望加剧了本就紧缩的就业市场的压力。

截至 1946 年初，325 万名女工要么主动辞职，要么被解雇，工作领域的性别隔阂比 1900 年还要严重。[86] 人们认为，让女性重返家庭很

有必要，因为她们现在能够侵占“男性”空间只是钻了战时动荡的空子。[87] 为达此目的做出的诸多尝试收效不一，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年，有 275 万名女性开始了新工作，性别变革早已大浪滔天。[88]

退伍军人同样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和道德问题。正如性学历史学家约翰·德埃米利奥（John D’Emilio）和埃斯特尔·弗里德曼（Estelle Freedman）所说，“战时需求吸纳青少年成为有偿劳动力，同时削弱了家庭和社区对其行为的影响……一战时期的道德改革者关注的是卖淫的危险，而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道德家的重点转向了‘兼职女性’（amateur girls）的行为，她们通常被称为穿卡其服装的疯女人（khaki wackies），胜利女孩（victory girls），只顾玩乐的夏洛特（good-time Charlottes）”。[89] 道德家和主流群体都决心重申“传统”的性别差异。

在战后动荡的美国社会，麦卡锡的保守价值观是许多威斯康星州选民的避风港。战争经历让他与退伍军人及其家人产生了联系，并表明他有资本对抗不断扩大的共产主义威胁。单身状态和传统意义上的男性目标证明了他对父权社会的忠诚。对自力更生的反复强调则让他有别于看似有资格坐上参议员位置的拉福莱特，也让他与霍瑞修·阿尔杰的传奇密不可分。或许最重要的是，麦卡锡努力强调自己谦逊淳朴，与威斯康星州人民情谊深厚，这正合选民的心意，他们本就对联邦政府的不近人情和新政的官僚作风备感失望。

1947 年 1 月，麦卡锡走马上任，成为最年轻的参议员。在参议员生涯的早期，麦卡锡一直维持着竞选期间的人设。竞选获胜后，麦卡锡立刻对记者说：“我不能说我会比下一任更聪明，但我会在接下来

的六年时间里付出他两倍的努力。”《密尔沃基新闻报》抓住了他的自述，指出“毫无疑问，干劲十足、雄心勃勃的麦卡锡知道该如何工作。这个出身奥塔加米县农场的男孩的全部成就都是通过艰苦的方式取得的”。[90] 这些溢美之词出自中间偏左立场的《新闻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最后成了麦卡锡的主要反对者。但就目前而言，《新闻报》还是很乐意以麦卡锡的宣传手册的腔调恭维这位新上任的参议员，形容他“活力四射、精明强干、富有魅力、进取心强”，还得出结论，他是最符合“霍瑞修·阿尔杰优良传统”的人。[91] 一周后，《新闻报》继续称颂麦卡锡，描述了麦卡锡和朋友为了庆祝竞选胜利，同游“威斯康星州北部度假小镇”蓝多湖的经历。《新闻报》再一次强调了这位参议员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在崎岖的旅途中也能保持轻松自若。在这场长达 14 英里的远足中，麦卡锡“以 198 磅的体格和修长的身材”轻松超过了两个同伴。[92] 不光威斯康星州的报纸会奉承麦卡锡，报道他的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后来也刊登了一篇文章，称他是“一位身长六英尺，皮肤黝黑、英俊健壮的单身汉……在社会上很受欢迎。他善于交际，和蔼可亲，喜欢参加聚会，也爱骑马。去年春天，在国家新闻俱乐部的一次郊游中，他获得了骡子赛跑比赛的胜利”。[93]

麦卡锡与许多彬彬有礼的国会同僚截然不同，他是威武阳刚的腹地人民和自力更生的单身汉的缩影。有一次，《密尔沃基新闻报》在刊载关于麦卡锡的长篇传略时，旁边附了一条介绍他的“单身汉伎俩”的短评：“年轻的乔·麦卡锡是全美最炙手可热的单身汉之一……他有个单身汉伎俩，你们女孩可能会感兴趣。他晚上会把裤子放在床垫

底下压实。而且，他不像大多数无趣的已婚男人那样用磨刀石，而是 100
用手掌磨他的双刃剃须刀（原文如此）。他说这个办法很管用。”[94]
麦卡锡不仅自谦是个单身汉，还拥有一双劳动人民的手，粗糙得足以磨好剃须刀。麦卡锡所谓的粗犷再次展现了出来，这也证明了他未来有资格成为某个幸运女孩的伴侣。据麦卡锡早年在华盛顿结识的朋友回忆，他约会频繁，但大多数关系都很短暂，且更多是肉体关系而非感情关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经的特别助理约翰·W. 哈内斯（John W. Hanes）回忆说，麦卡锡在社交时表现得很粗鄙，还经常醉醺醺的，说他“粗野无礼，动不动就不守规矩。他经常带着一群妓女寻欢作乐。不然他就开始跟国会的所有女孩调情，包括我的妹妹”。[95]

1946 年的几张照片似乎证实了麦卡锡自诩的工人阶级独身生活和朴实无华的面貌。从击败拉福莱特获得共和党提名，会见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尔特·S. 古德兰（Walter S. Goodland），到大选获胜成为参议员，麦卡锡都穿着同一件双排扣细条纹西装并打着同一条花领带，好像自己只有这一套“正式”服装。虽然麦卡锡在进入国会后曾试图提升着装品位，但他仍然有意去穿“不合身、不协调、不怎么熨烫”的西服，显然，用床垫压平衣服的把戏并不是那么奏效。[96]

麦卡锡虽然是都市黄金单身汉，但他参加的许多娱乐活动都是传统意义上工人阶级才会去的，包括赌博和嫖娼。[97] 当然，这些不是他官方宣传的公众形象，面对记者的提问，他甚至回答说他不会掷骰子，但他可是被誉为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化身，这些传言就有了一定的可信度。[98] 午后时光，麦卡锡经常去大华府地区的诸多赛马场赌马，作

陪的一般是埃德加·胡佛（可能还有克莱德·托尔森）。[99]

大多数人认为，麦卡锡并没有因为这些娱乐活动耽误参议员的职责，也没有因此懈怠工作，至少最初是这样的。1948 年秋天，国会休会期间，麦卡锡和一位朋友在北达科他州的农场收割小麦。在雇佣协议上签字时，麦卡锡用了化名，他“吃着德国菜，喝着啤酒，讲着恶俗笑话，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100] 目前尚不清楚，麦卡锡接下这份工作是因为缺钱（他的财务时常处于混乱状态），还是想逃离服务公
101 众的压力，放松一下。但他坚持使用化名，这说明他的工人阶级形象至少不完全是装出来的。

虽然麦卡锡在参议院的前三年并不引人注目，但有几个关键时刻，足以说明他的个性和媒体形象。每次，麦卡锡都会表现出他对操纵舆论的嗜好，以及他暴躁的脾气和争强好斗的性格。

麦卡锡初登全国新闻头条是在首次任期开始后不久，他卷入了一场道德纠纷。麦卡锡在急需钱财的情况下，收下了百事可乐公司说客的两万美元资助，随后主张放宽战时食糖配给。这份报酬虽不违法，但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其他参议员都在批评麦卡锡的行为，嘲笑他是“百事可乐之子”。麦卡锡进行了猛烈回击，（错误地）辩称食糖短缺从未出现，还捏造数据，声称美国农业部正准备额外提供食糖用于罐头生产（事实并非如此）。他甚至指责共和党内的两位资深同僚，称佛蒙特州的拉尔夫·弗兰德斯（Ralph Flanders）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查尔斯·托比（Charles Tobey）合谋在可供消费的糖量问题上撒谎。[101] 食糖供应管制最终得以解除，麦卡锡虽然略占上风，但在参议院的声誉已因此受损。

大约在同一时间，即 1947—1948 年间的五个月内，麦卡锡曾担任一个研究住房问题的联合委员会的副主席，他趁主要竞争对手的拥护者不在国会之时赢得了这个职位。[102] 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解决全国范围内的住房严重短缺问题，这是战后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住房短缺的根源在于经济大萧条期间建筑业普遍停滞，但由于战后的繁荣，住房问题成了一场危机。承建商为了赚取巨额利润，纷纷开发高尔夫球场、酒店、酒吧、餐馆，价格适合的住房则无人问津。结果令人震惊：到了 1945 年，全美约有 500 万个家庭无房可住。平均而言，他们没有能力承担超过 6000 美元的购房费用或每月 50 美元的租金。[103] 报纸上充斥着大量退伍军人寻求住房的广告。一则典型的广告写道："不需要同情或施舍。只想要个住处，无论您能提供的条件如何。我们并不完美，只是普通人。一家三口，老兵与他的妻子和孩子。请给我们打电话好吗？"另一则广告叹息道："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真的想要一个家，这样我和妻子（没有孩子或宠物）就可以团聚了。我厌倦了旅馆，也受够了没完没了的失望……可承受的租金可达 60 美元。"[104] 伯格伦先生的广告与众不同："注意了，傻瓜们。喝得烂醉的广告经理与赌博成性的妻子和一岁左右的笨蛋小鬼急求两间卧室，现代化的独栋住房或公寓都可。但邻舍必须一流。"[105]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住房短缺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疲弱的住房市场可能削弱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自由的基础，继而破坏民主政治。

国会调查后的主要对策是《塔夫特－艾琳德－瓦格纳住房法案》（Taft-Ellender-Wagner [TEW] Housing Act），旨在促成未来十年内新建 1500 万套公共住房，其中的 50 万套由联邦政府负责建造和运营。[106] 麦

卡锡公开反对这项法案，声称公共住房干扰了自由市场，会导致贫民窟增多。麦卡锡计划担任联合委员会副主席时，《住房法案》已经获得了参议院批准，却在众议院遭遇巨大障碍，承建商、银行家、房地产经纪人形成了反对派联盟。麦卡锡以征求公众意见为借口，在全国33个城市正式举行了公开听证会，最终听取了1286份证词。[107]这场听证会旨在尽可能多地吸引媒体报道，有点像是麦卡锡的全国性新闻之旅，每到一个城市，他就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和合照活动。

这些活动还让麦卡锡得以再次利用“赤色”概念下套。总而言之，反对的呼声主要集中在公共住房项目的社会主义倾向上。维护房地产商利益的保守派人士指出，联邦和地方的公共住房都存在“社会主义危险”，他们声称，这是出于共产主义的阴谋。[108]听证会在构建阴谋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麦卡锡甚至利用小组委员会的部分预算聘请了一家公关公司散播这个消息。听证会期间，麦卡锡会打断并恐吓支持公共住房的证人，声称“支持公共住房的人就是打着为弱势群体提供住房的幌子，最终目的是实现住房公有”。[109]他还批评道，这些住房计划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庇护所。麦卡锡参观了纽约皇后区的雷哥公园退伍军人住房项目，称其为“联邦政府出资精心打造的贫民窟……滋生共产主义者的温床”。[110]麦卡锡自诩为支持退伍军人的民粹主义者，对那些夸大住房成本、控制建筑材料供给，从而阻碍大规模建设住房的赘余中间商表示不屑。这种策略十分灵活，麦卡锡在倡导有利于房地产商的政策的同时，也摆出了消费者代言人的姿态。

这场公关活动最终取得了成效，参众两院都通过了一版更折中的《住房法案》。面对公众的住房需求，麦卡锡帮助策划了一场广泛运动，

消灭了任何建立健全公共住房体系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罗斯琳·巴克森德尔（Roslyn Baxandall）和伊丽莎白·尤恩（Elizabeth Ewen）总结道："关于住房问题的国会听证会，加上私人房地产商的公关团体在多个媒体上的集中游说，成功重塑了有关经济适用房的公众舆论。"[111]从根本上说，公共住房的反对者将对《住房法案》的讨论变成了"新政下城市社会供应品该何去何从的全民投票"，从而让麦卡锡得到机会，实施他在选举期间承诺的反新政政策。[112]住房开发商威廉·莱维特（William Levitt）用带有性别色彩的语言赞扬了麦卡锡，这与麦卡锡1946年的竞选材料是一致的："麦卡锡先生首先是一名退伍军人，其次是一位美国参议员，还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年轻人，是你从现在开始可以指望的国会领导人选，最后，他对住房问题表现出了极致的强烈兴趣。顺便补充一句，他也是一位共和党人。"[113]

此后不久，麦卡锡卷入了一场如何处置德国战俘的争论。阿登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也称"突出部战役"）中，在约阿希姆·派普（Joachim Peiper）上校的指挥下，德国装甲师杀害了353名美国战俘，此事后来被称为马尔梅迪大屠杀（Malmedy massacre）。[114]二战结束后，参与屠杀的74名德国士兵因战争罪行受到审判。他们全部被判有罪，一半以上的人被判处绞刑，其中包括派普。本案的辩护律师，陆军上校威利斯·M. 埃弗雷特（Willis M. Everett）坚信，这场审判并不公正。上诉过程中，许多德国战俘"出庭作证，称自己遭受了各处狱警和战争罪行调查队的毒打和虐待，目的是获取他们的口供"。[115]

这些指控被发表在美国报纸上，引发了公众愤怒，尤其是在德国人密集分布的中西部地区。作为回应，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

立了小组委员会，核实有关不当行为的报告。虽然麦卡锡并不属于军事委员会，但他要求作为观察员出席听证会，并得到了盘问证人的资格。[116] 甚至在小组委员会开始调查之前，麦卡锡就主张对 6 名被判死刑的德国战俘予以减刑，因为他们的供词是在胁迫下做出的。

104

在 1949 年 5 月举行的听证会上，麦卡锡大发脾气，起因是小组委员会拒绝对陆军调查人员进行测谎，这预示着他随后的举动。他愤怒地走出听证室，告诉媒体，这次调查是“一场可耻的闹剧”。10 月，小组委员会发表了调查报告，麦卡锡认为这是“严重的司法不公”，并质疑小组委员会的成员立场是否客观，因为他们与陆军审讯小组存在工作联系。[117]

最终，没有一名德国战俘被处以死刑，且全部免于长期监禁。1956 年，派普成为这批战俘中最后获得假释的人。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希望与西德保持友好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宽大处理。尽管有人认为，麦卡锡的愤怒是为了吸引他所代表的大量德裔选民，但其他人则大胆猜测，他的举动大概率是出于对媒体宣传的渴望。出于道德原则为一个不受欢迎的群体辩护，这肯定会引起公众注意，而冷战的首要地位意味着，支持德国军人（他们可能成为美国对抗苏联侵占东欧的盟友）在政治上并不像五年前那样冒险。[118]

但他的判断出错了。麦卡锡的公众形象再次蒙上阴影，主要是因为人们认为，他这种行为直接损害了军队信誉。麦卡锡在竞选时提出的唯一重要议题就是改善退伍军人的待遇，但现在大家却嘲讽他不够爱国。经过这次风波，这位年轻参议员一定明白了被指控为“非美国的”是多么可怕。另一个奇怪的点是，马尔梅迪事件可能是后来麦卡锡被

指控为反犹主义者的根源所在；他不止一次暗示，犹太裔审讯者是出于“种族”仇恨而虐待德国战俘的。

值得注意的是，种种争议表明，在与他人意见相左时，麦卡锡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哪怕在不太重要的辩论中也是如此。麦卡锡的暴脾气和他满含怒火的指控让公众产生了深刻印象。麦卡锡之所以在参议院表现得咄咄逼人，一个原因在于，他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可他又渴望获得归属感。尽管麦卡锡为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感到骄傲，他还是一心想要被国会接纳，毕竟它被称为“世界上最高端的精英俱乐部”。既然不能靠阶级地位获得认可，麦卡锡选择通过男性化的幽默打入国会。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参议院是男性的天下，第 80 届美国国会中没有女性参议员，而麦卡锡本人在国会工作期间只与四位女性共事过。[119] 麦卡锡欣然参加了同僚们喜欢的男性娱乐活动，包括打扑克牌、打高尔夫、外出打猎或钓鱼，以及普通的聚餐喝酒。某种程度上说，麦卡锡肯定认为自己的参议院席位来得问心无愧，即使公开抨击了同僚，麦卡锡随后也会释放出善意，希望与他维持友谊。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H. 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把麦卡锡比作“一只杂种狗，一会儿奉承讨好你，一会儿又想咬掉你的腿”。[120] 但麦卡锡本人似乎认为，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是割裂的，这样的观点或许导致了麦卡锡在政治斗争中的酷烈表现。在食糖配给、住房小组委员会和马尔梅迪事件中，麦卡锡毫不犹豫地对其政敌发起人身攻击，而且对使用如牵连定罪、断章取义、蓄意误导等手段毫无顾忌。

105

麦卡锡在参议院的早期活动证实，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媒体的力量，也明白媒体给他刻画的形象。尽管他操纵媒体的才能直到 20 世

纪 50 年代初才得以充分体现，但从一开始，他就已经会熟练应付全国的新闻媒体了。他甚至在进入国会的第一天，在宣誓就职之前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121] 麦卡锡最大的天赋在于，他认识到，媒体报道可以像推动故事进程一样改变现实事件的发展轨迹，而向新闻界发声对议题的影响之深，可能不亚于参议院的政见或听证室的证词。因此，麦卡锡很少在不发布新闻稿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政治身份建立在经典的美国形象上，例如白手起家和战争英雄，但他利用媒体宣传这些形象的手段显然是现代化的。同样特殊的是，即使在进入参议院之后，他仍保持着一副鲁莽率直的模样。

最重要的是，麦卡锡意识到，对问题或事件的认知往往比事实本身更能影响最终结果。他对公共住房听证会的态度最明显地体现了这
106 一观点。很多民众希望得到政府资助的住房，但麦卡锡利用听证会改变了他们的看法。[122] 研究住房问题的历史学家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es）认为，“作为联合委员会的副主席、自封的异端审判官，麦卡锡经受了一次学徒训练，学会了连续猛击（sledge-hammer）的战术，后来他熟练运用这项战术挖出了潜藏在国务院深处的共产主义阴谋分子”。[123]

同时，1947—1949 年间，麦卡锡取得的胜利并不突出，且常常为了取得胜利付出过高的政治资本。他冒犯了自己的同僚，引起了伦理委员会（Ethics Committee）的关注，还落了个“急性子”的名声。1949 年，一项针对 128 名华盛顿记者的调查显示，麦卡锡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参议员。[124] 任期过半，1952 年大选在即，麦卡锡仍在寻找能让他大放异彩的方法。

第四章

年轻的权力掮客

还在蹒跚学步时，罗伊·科恩就接受了一次鼻子整形手术。这个纯粹的美容手术是在他母亲多拉（Dora，全名为多萝西·马库斯［Dorothy Marcus］）的坚持下进行的。罗伊的鼻梁上有一个小肿块，从1927年2月出生那天起就一直困扰着他。尽管包括罗伊的父亲在内，家里没有人觉得这个肿块有什么问题，多萝西还是坚持要通过手术把肿块去除。多萝西从曼哈顿雇来的外科医生把手术搞砸了，结果罗伊的鼻子上留下了一道疤痕，伴其一生。[1]

罗伊还会将来自父母影响的其他印记带到成年。多萝西·马库斯和阿尔伯特·科恩（Albert Cohn）的儿子与他们一脉相承——他痴迷于外表，被权力所吸引，专注于阶级地位，雄心勃勃，擅长政治交易。这些个人品质使得科恩在25岁之前就能熟练应对华盛顿的强权政治。他们还培养了科恩的一种理所应当的特权感，这激起了其竞争对手的仇恨。他们最终认为科恩的背景值得关注，不是因为他年轻时取得的

成就，而是因为其荒谬的模式。对手试图用他的童年来解释他的个性，包括他的人际关系、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如果说胡佛成年时是一名中
108 产阶级新教道德家，而麦卡锡是一名有着粗犷情怀的蓝领奋斗家，科恩则被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投机分子，他一直认为自己属于美国的权力精英，但从未受到过美国权力精英的充分欢迎。

当约瑟夫·麦卡锡在参议院的第一个任期内取得成功时，罗伊·科恩正忙着塑造一个相关的政治身份，该身份也依赖于男性化的表现，作为在美国这个战后安全国家中获得更大权力的一种手段。和麦卡锡一样，科恩拥护反共主义，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男子气概，提高自己的公众形象，并推动自己在联邦政府中获得晋升。科恩还巧妙利用媒体，特别是八卦媒体来打造和传播有利于他职业发展的公众形象。麦卡锡将自己的工人阶级背景视为权力的来源（因为这能让他与公民建立联系，并宣扬自己的民粹主义诚意），科恩则通过宣传自己的上层阶级身份来寻求影响力。与此同时，科恩的经验证实，仅有特权背景并不足以确保成功。科恩在政府任职的头几年表明，所有具备监视国家男性气质的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进取心，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事实上，过度依赖上流社会的权力途径，如财富、家庭关系或精英教育背景，可能会使男子气概的彰显变得更有必要。在与媒体建立联系并积极“寻猎”共产主义者的同时，科恩也在刻意塑造一个专业的公众形象，以便能够加入权力精英行列。科恩能进入这个稀有领域取决于他的日常表演。他通过突出“传统”异性恋男子气概的个人特征，来掩盖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性取向，原本这两项他都不合乎规范。

***

在一定程度上，科恩直率的世界观是父母婚姻相互利用的产物。阿尔伯特·科恩是布朗克斯区的一名助理检察官，他需要增加个人财富并加大对民主党的金钱支持，才能被任命为法官。多萝西·马库斯是一位有政治背景的银行行长的女儿，她马上就面临着针对中年单身女性产生的社会孤立。1924 年 1 月 11 日两人举行了婚礼。这场婚礼是双方为解决各自问题而精心策划的。阿尔伯特获得了多萝西的家族财产，而多萝西则通过嫁给一位前途无量的知名律师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对夫妇在欧洲度过了为期五周的蜜月。这不是恋人的度假，而是为了满足他们笃信的所属阶层的期望。[2]

109

不出所料，科恩夫妇将婚姻视为商业交易的安排并没有带来幸福。阿尔伯特的一位同事后来回忆说，这两人的婚姻是“我所了解的最悲惨的婚姻”，并补充说，阿尔伯特和多萝西“彼此憎恨，不留余地”。[3]虽然两人关系冷淡，但阿尔伯特·科恩的财务状况得到了改善，这的确让他很快成为一名县法官。对政治盟友的忠诚让他受益匪浅，他的事业也稳步发展。1929 年，他被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命为州最高法院三部的成员。八年后，他加入了州最高法院的上诉庭，并担任该职位直到 1959 年去世。[4]

推动阿尔伯特崛起的是他在布朗克斯民主政党机器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当民主党因政治或个人原因需要阿尔伯特以某种方式行事时，他会坚持到底。当他们需要他支持某个特定的候选人时，他会给予支持。当一位朋友兼民主党同僚的儿子在一场车祸中致使一名年轻女子死亡时，阿尔伯特深夜来到警察局，“把事情摆平了”。[5]

罗伊记得，阿尔伯特是爱德华·J. 弗林（Edward J. Flynn）的“主要副手”（chief lieutenant）。弗林是民主党要员，1929—1939 年担任纽约州的州务卿，1940—1943 年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堪萨斯城的汤姆·彭德加斯特（Tom Pendergast）去世后，弗林成了“美国最有权势的政坛领袖”。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忠实朋友，在政治事务上对罗斯福的影响超过了政府内外的任何人”。[6] 弗林说服罗斯福在 1944 年选择哈里·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作为竞选伙伴；杜鲁门在 1948 年总统选举中意外获胜，弗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 此外，正是弗林在 1929 年说服当时的罗斯福州长任命阿尔伯特·科恩担任法官。

据罗伊回忆，父亲只有一次背弃了爱德华·弗林。那是在 1937 年，当时弗林提议任命一位叫卡拉汉（Callahan）的法官担任州上诉法院的一个职位，而这个职位阿尔伯特垂涎已久。阿尔伯特告诉 10 岁的罗伊，他因不是爱尔兰人而被排除在法官席位之外。他还争取到了几个对现任州长赫伯特·雷曼（Herbert Lehman）有影响力的朋友，来收集支持他任命的签名。这一策略奏效了，阿尔伯特于 1937 年 4 月 27 日加入了上诉法院。个人忠诚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到妨碍职业发展的地步。[8]

阿尔伯特对爱德华·弗林和民主党的支持并不局限于他的法官办
110 公室。位于南布朗克斯区沃尔顿大道 975 号的科恩家庭公寓成了该行政区民主党核心成员的聚会场所。罗伊·科恩记得“那座大楼群英云集。地方检察官，最有影响力的法官，邮政局长，顶级商人”。[9] 因此，科恩是在一个政治和家庭交织的环境中长大的。尽管阿尔伯特不是每

天都出现在报纸或广播上，他的儿子仍然能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宣传报道固然很好，但一个人不需要在公众视线中就能发挥重要作用；在布朗克斯公寓，一张铺满油毡的餐桌上，就可以达成许多重大交易。

科恩很快就学会了利用父亲的权力和名声进行交易。在纽约布朗克斯区霍瑞斯曼男校（Horace Mann School for Boys）权贵子女们的簇拥下，科恩确保他的同龄人知道，他的家族掌握着权力。[10] 十多岁的时候，“罗伊会突然给市长办公室打个电话，并与（纽约市市长）‘比尔·奥德怀尔’（Bill O’Dwyer）进行简短交谈，这会让他的朋友们大吃一惊”。[11] 他并没有把这种权力和关系的展示限制在他的私人朋友圈：

罗伊的一位同学记得，当时十六七岁的罗伊走进一场会议，一些小男孩正在与一名管理员交谈。罗伊打了个招呼，然后拿起电话。负责人问：“罗伊，你在干什么？”罗伊回答说：“我得打个电话。只要一分钟。”电话接通了，其他男孩听到罗伊说：“是十二警区吗？我想和负责人谈谈……不，我想和负责人谈谈……哪个中尉？……奥马利（O’Malley）中尉，我是罗伊·科恩，科恩法官的儿子。我相信您知道我父亲是谁。如果您现在不知道，您以后肯定会知道的。您的一名警官［罗伊提供了姓名和警徽号码］在西区高速公路上给我的老师开了一张交通罚单。我的老师在一个时速 40 英里的限速区以每小时 42 英里的速度行驶，这张罚单必须取消、撕毁并扔掉。必须这样。他不会来您的辖区。我不想让他受到打扰，就这样。”这位同学回忆道：“然后他说，

办完了给我打电话，不然我就给您打电话。罗伊的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胜利的表情，这不过是16岁左右的孩子一天的工作而已。”[12]

这个故事除了表明少年科恩的特权感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选择在一个更私密的地方打电话，而是在会散播信息的听众面前打
111 电话。除了向电话另一端的警官展示自己的权力外，罗伊还希望他的同学们能意识到他的影响力。此外，毫无疑问，罗伊从他父亲和父亲的朋友那里学到了这种通过特殊渠道解决问题的方法。

虽然科恩受父亲的影响很大，但母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罗伊出生起，多萝西就明确表示，她将塑造罗伊的童年，据说她曾告诉他，孩子是她的，阿尔伯特不会参与罗伊的抚养。[13] 她信守诺言；家人都记得，罗伊和父亲之间很少联系。相比父系家族，多萝西尽其所能地确保儿子更多地接触母系家族。此外，她还会就家庭的社会地位、外表的重要性、社会关系的价值等问题发表意见。

多萝西·马库斯·科恩出身富贵。她的父亲约瑟夫·S. 马库斯（Joseph S. Marcus）在 1913 年用 10 万美元设立了美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该银行通过迎合纽约庞大的移民人口特别是犹太社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家银行是一家私营机构，但约瑟夫如此命名他的企业，或许是为了让人以为这是联邦政府合法机构。这种微妙的曲解旨在吸引他的新客户。1929 年股市崩盘之前，这家银行在纽约市已经拥有 59 家分行。约瑟夫的儿子伯尼（Bernie，多萝西的兄弟，因此也是罗伊的舅舅）担任银行行长，管理着 2525 万美元的资本。[14] 这一成功终结于 1930 年 12 月，当时有关该银行在合并失败后陷入困境的

传言导致其多家分行出现挤兑。尽管银行职员试图安抚其客户，纽约州审计机构还是在 1930 年 12 月 11 日正式关闭了该银行。截至当时，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银行倒闭案；那场灾难现在被认为是全国性恐慌的开始，而这场恐慌将迫使数百家银行在 1933 年 3 月份之前关闭。在银行关闭六个月后，伯尼和两名合伙人被判挪用银行资金罪。伯尼被判处三至六年监禁，在新新监狱（Sing Sing）服刑二十七个月后，雷曼州长赦免了他，这得益于伯尼的妹夫阿尔伯特·科恩的游说。[15]

但赦免并不能挽回家族的声誉；这一丑闻使马库斯家族在纽约的犹太社区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美国银行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这两个地区犹太居民的投资，而它的失败给科恩家族联系最紧密的集团带来了巨大困难。多萝西仍然是这个家族地位和声誉的坚定捍卫者。她告诉儿子，伯尼是反犹阴谋的替罪羊，科恩直到临终时也依旧如此宣称。但伯尼舅舅的经历给了罗伊一个 112
重要教训，那就是，即使对一个社区的忠诚是基于种族关系、宗教迫害的共同记忆和跨代商业关系，也不足以使一个人免受强权政治的残酷现实伤害。[16]

多萝西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儿子抚养成行为举止与其地位相称的人。她允许儿子像对待奴仆一样对待他的保姆，并在高级餐厅鼓励他退回不合胃口的饭菜，而他确实是这样做的。这种荒谬的权力等级和错误的成熟感充斥着科恩的生活。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罗伊就像中年商人那样整日西装革履。1940 年，他的成年礼在公园大道的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Astoria）举行。一位家庭成员回忆道，对多萝西来说，罗伊“不是她的儿子。他是她的王储，而她是女王”。[17] 在这个“皇

室家族”中，国王几乎没有容身之地。年幼的罗伊意识到谁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的掌权者，他开始模仿母亲的轻蔑态度。尽管罗伊依靠科恩家族的名声在整个纽约市都如鱼得水，但很明显，由于阿尔伯特无法像对待工作一样控制家庭事务，罗伊对父亲并不尊重。

但家庭和职业这两个世界，实际上也是分不开的。唯一能阻止阿尔伯特在民主党步步高升的人是他妻子。当阿尔伯特得到奥尔巴尼州上诉法院的晋升机会时，多萝西告诉丈夫她不会离开纽约市，阿尔伯特不得不拒绝了这份工作。后来，多萝西觉得布朗克斯区配不上她了，于是游说阿尔伯特搬到曼哈顿的一个地方。阿尔伯特不愿意，但她还是搬走了，在门上留下了一张纸条：“亲爱的阿尔伯特：我已经搬到了公园大道 1165 号。你的家具在那里。你的晚餐在那里。如果你想吃，今晚就去那里。”[18] 于是阿尔伯特徒步前往曼哈顿。

科恩在精英私立学校接受的正规教育，再次证明了他的特权感。无论在菲尔德斯顿低年级学校（Fieldston Lower School），还是霍瑞斯曼男校，他都是一名优等生，老师们都因他的非凡才智记住了他，[19] 科恩的同学们注意到他忠诚地坚持着父亲的自由民主党路线，并回忆起他曾勇敢地对抗一位历史老师的反犹主义。[20]

高三结束时，科恩大胆宣称他“已经得到了能从霍瑞斯曼男校那里得到的一切”，并说服校长让他跳级，免修高四。[21]1944 年 1 月，
113 17 岁生日之前，科恩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科恩才华横溢，战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要求宽松，再加上家庭关系，科恩得以跳过一系列课程，在短短三年内就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和法律学位。因为不满 21 岁，科恩等了将近一年才有资格参加州律师考试。[22]

尽管年轻有为，对权力的渴望和私下被压抑的性别身份一直是科恩面临的基本冲突。这个世界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权力并重，而且经常重叠。在学习如何被这样的世界接受的同时，科恩还表现出不同于他游走两端的个人特点，尤其是他迅速发展的同性恋倾向。历史记录并没有保留科恩家族内部生活的内容，科恩也从未在他的著作中详述异性恋对男性气质的期望如何塑造了他的青春。但是，我们可以追溯科恩所在阶层和种族的年轻人会遇到的影响和文化态度。

在某个时刻，科恩发现了自己对男性的性吸引。根据他的朋友兼合著者西德尼·锡安（Sidney Zion）的说法，科恩的医生声称，16岁时，也就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年，罗伊·科恩开始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23] 他的父母似乎从比较早的时候就开始担心儿子的性别身份。据科恩说，父母让他从菲尔德斯顿学校转学，因为他们在家长日探访时看到儿子在上缝纫课，他们认为课程太不传统，而且偏女性化。科恩声称，他很感激“我父亲发现我在一圈正针、一圈反针地做编织”，并毫无讽刺意味地指出，如果学校“没有家长日，谁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呢”。[24]

然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显示，科恩在菲尔德斯顿读了整整五年，一直读到六年级。他的父母一定是在那之前就知道了这门课程；这所学校由社会改革家菲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创办，至今仍被认为是教学方法开明、坚持进步的教育平台。[25] 或许阿尔伯特和多萝西开始担心这些课程对他们青春期的儿子产生了什么影响，因为他开始表现出一些所谓的女性化倾向，比如拒绝参加体育活动，而且一直在意自己的外表。

科恩一家对菲尔德斯顿课程的反应是值得注意的，因为科恩选择将这个故事写入他的自传，并操纵了可以查证的事实，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并担心自己对性别身份的认知。科恩试图强调两方面不
114 可动摇的本质：一是他自身的男子气概，二是父母希望他遵守社会对年轻男子的期待。简而言之，科恩正在改写历史，以使自己显得更有男子气概。

阿尔伯特和多萝西可能怀疑罗伊与其他男孩不同，因为他对典型的男性活动几乎没有兴趣。罗伊·科恩曾经的保姆彼得·博南（Peter Bonan）回忆说，罗伊是个“胖乎乎的小孩，每个人都喜欢逗他玩……他不是个典型的男孩子”。[26] 罗伊的表哥尤金·马库斯（Eugene Marcus）回忆道：

> 当时罗伊大约13岁……那是一个美好的春日。阿尔伯特脱下夹克，卷起衬衫袖子。当然，罗伊总是穿着一件夹克，非常得体……［阿尔伯特］说：“来吧，罗伊。”我记得很清楚：“把你的夹克放回去，然后到车道上来。我想和你玩接球游戏。”……但罗伊真的很生气。“好吧。”［罗伊］说。你知道该怎么把球扔给一个小女孩吗？阿尔伯特当时就是这样扔的。罗伊没接到球，球跑出很远，然后他就站在那里。阿尔伯特说：“好吧，去追球。你没有接住球。至少你能追球。”然后，正在观看这场游戏的多萝西转过身来，对阿尔伯特说：“你竟然让他跑到马路上去？马路上有汽车啊。你去捡球！”这是一条安静的小街，半个小时才有一辆车来。阿尔伯特对她耸了耸肩，他的确让罗伊跑到了马路

上。他拿到了球。然后罗伊就不见了。[27]

罗伊被表哥比作小女孩。科恩一家对美国经典场景的演绎，说明罗伊在男子气概模式方面缺乏训练，而这种训练在美国社会看来甚至是最基本的。由于他的年龄，这一时刻变得更加重要，13 岁，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他被期望从男孩过渡到男人，通过他的着装、兴趣、对异性的爱慕和运动能力来公开表达和证实他迅速发展的男子气概。

科恩缺乏男性榜样，这不仅是因为父亲的缺位，还在于母亲在塑造儿子方面太过强势。科恩性格的许多方面都可以直接归因于母亲的影响，包括不在意金钱，痴迷于美学（包括字面意义上的美学以及别人对事物的看法），过剩的特权感，以及对那些身份不如他的人不甚友善。

这种母子关系被科恩的许多同代人从“妈咪主义”（momism）的角度来看待，这是社会评论家菲利普·威利（Philip Wylie）在 1942 年创造的一个词。威利认为，现代的母亲由于技术进步和社会习俗的变化摆脱了传统的家务劳动，她们对自己的儿子产生了极大影响。这 115
种过度保护的态度意味着，她们的儿子“在蒙昧时期或是在童年，不能得到合理的发展……而且妨碍了他迈向成熟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因此，儿子对他人的同情都被母亲曲解为“对她的多愁善感”。[28]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妈咪主义”成为一种流行心理现象，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沟通。

无论威利尖锐的评论适用与否，毫无疑问，科恩和母亲的关系符

合一种刻板印象，在他的青少年时期，这种印象引起了全国上下极大的关注。人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段母子关系的某些方面，尤其是科恩成年后仍决定和母亲一起生活这件事，被他的政敌和盟友们用来解释他看似软弱的行为。科恩意识到对他的这种看法很明显，于是特别努力地去反驳，公开表明自己仍处在主流男子气概概念的范围内。事实证明，科恩以反共律师和乔·麦卡锡亲密顾问的公众形象出现，是履行这一承诺的最佳舞台。[29]

正如威利的理论所论证的那样，理想化的男子气概有时被消极定义，有时被积极定义，两种情况不相上下。没有什么比同性恋更能妨害一个男人的阳刚之气了。同性恋通常被认为与男性正派、基督徒式仁慈友爱和得体的属性格格不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性恋的迹象似乎无处不在，这让美国人深感不安。1936 年，在《性与人格》（*Sex and Personality*）的研究中，路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和凯瑟琳·考克斯·迈尔斯（Catherine Cox Miles）概述了这些男性怪异行为的先兆：“母亲过于情绪化、过度表露对孩子的爱，父亲冷漠、专制、残暴、远离家乡或离世，把男孩当作女孩对待，再加上缺乏鼓励，或是缺乏与其他男孩结交并参加较为粗鲁的男性活动的机会；过分强调整洁、精致、灵性。”[30] 就像妈咪主义一样，这些概念在大众媒体上传播，塑造了父母抚养孩子的方式，并帮助定义了哪些特征可以被视为同性恋。

潜隐型同性恋最明显的迹象是对异性缺乏兴趣。青年男子迷恋妙龄女子无可厚非。1938 年出版的指南书《绅士不是娘娘腔》（*Gentlemen Aren't Sissies*）以青年男子与女子的关系为背景，提出了较为全面的

生活建议，内容涵盖了用餐礼仪、体育活动、职业选择等。甚至这本书对汽车驾驶的建议，也表现出了对女性意见的关注，告诫年轻男性 116
“不要冲动地向劳拉和她的朋友们展示你有多么擅长急速停车。大多数女孩认为那是青春期的做派”。[31] 接受任何挑战的主要原因都是为了给女孩留下深刻印象。

虽然试图定义科恩的性别身份和性取向很有诱惑力，但我们可以很谨慎充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没有满足社会对男性异性恋的期望。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科恩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缺陷。尽管从不承认自己有不称职的感觉，但他一直有意识地试图在公开场合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男子气概的典范，比如强调自己众多的约会记录，与同龄人和对手开男性间的玩笑，这表明他意识到，他的“官能”性别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缺乏的，而这会阻碍他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对科恩来说，这些期望变得更加明确，因为他成长在一个性别规范不断变化的家庭，而且在超级男性化的二战时期进入了一所全男生预科学校，直至成年。由于阿尔伯特和多萝西在某种程度上转换了性别角色，他们展示的这种家庭生活和男女关系的模式，与那个时代的普遍期望截然相反。罗伊只有通过大众文化和在家庭以外的经历，才能够了解大多数美国家庭应有的运作模式。此外，我们记得，科恩夫妇决定将儿子从菲尔德斯顿转校到霍瑞斯曼，也是为了将儿子从男女同校的环境转移到全男性的环境中。[32] 虽然这一改变可能是科恩夫妇磨炼罗伊的一种尝试，但该计划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它将科恩与男女同校的交往隔绝开来；很多朋友后来评论科恩和女性在一起时很尴尬，这种尴尬有时近乎彻底的仇恨。[33]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科恩在霍瑞斯曼求学期间，社会对男子气概的强调更加激进。就像那个时期所有的美国人一样，霍瑞斯曼学校的小伙子们被描绘成一支超级男性化的战斗部队。士兵们被描绘成“比在以往的战争中更勇猛、更有型、更好斗的男子汉”。[34] 这样的形象在流行文化中无处不在，包括招聘海报、新闻短片和普通宣传等官方表现形式。[35] 此时步入成年给科恩的性别认知带来了更大负担。最重要的是，这促使他完全认同这样一种信念，即寻求权力的男人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履行传统的男性角色。科恩知道，他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实现他成长过程中的崇高目标。即使在早期律师生涯的几年里，
117 他就开始践行他所向往的生活所要求的男子气概。

如果说约翰·埃德加·胡佛正在努力构建一种新形式的白领男子气概，约瑟夫·麦卡锡体现了一种受民粹主义影响的蓝领男子气概，那么罗伊·科恩则代表了一种展现金领（a collar of gold）的男性身份。其男子气概主要建立在职业地位、上流社会关系以及与精英教育机构的联系上。基督教伦理影响了胡佛的白领男子气概，但科恩并不忠诚于基督教伦理。虽然胡佛致力于维护法治，至少在公众场合如此，但必要时科恩完全可以轻松地颠覆法治。科恩的男子气概就像他的个性一样，比胡佛和麦卡锡更浮夸。胡佛彬彬有礼，科恩却粗鲁无礼。麦卡锡在逢迎，科恩却在评判。尽管科恩和麦卡锡都表现出一种男性的傲慢，但他们成长的家庭属于不同阶级，因而这种傲慢又有所不同。

对科恩来说，男子气概就是权力的代名词。真正的男人是有影响力的：他们与其他有权势的人交往和做生意；他们知道该打的电话号码；他们与其他重要人物有联系。他们的地位使他们能够超越限制他

人的规则。科恩似乎依靠构成他金领男性身份的一系列个人特征来克服他的种族宗教、性取向和性别身份所带来的障碍。科恩表现出的金领男子气概让他得以进入国家安全领域的强大圈子，同时掩盖了他个性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可能会削弱他的职业晋升机会。

科恩的男子气概表现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他的反共主义。在担任联邦检察官的短暂时期内，他有意识地树立了一个致命的“赤色猎人”的名声。这一身份把科恩与一场典型男性化运动联系到了一起。1955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写道：“在这个奇怪的时代，新的两极词汇被引入了政治话语，但肯定没有比‘强硬’（hard）和‘软弱’（soft）的划分更奇怪的了……如果一个人认为国内共产主义者带来的危险很小，那么他可能就是‘软弱’的；而‘强硬’的反共主义者则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和国内共产主义者没有区别。”[36] 甚至像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这样的左翼社会评论员也指出，软弱是“胆小如鼠的进步派”反对共产主义的核心障碍。[37] 与麦卡锡一样，罗伊·科恩也希望被视为“强硬”派，越“强硬”越好。 118

对于寻求权力的个人来说，在二战后的几年里与共产主义作战，也是一项明智的公关举措。1954年，《华盛顿邮报》的爱德华·T. 福利亚德（Edward T. Folliard）总结道：“要想从默默无闻攀升到跻身头条新闻，美国的赤色追猎已经成为一种百试不爽的‘良方’。”[38] 因此，科恩强烈抗拒他的家族血统，并与一个更为保守的反共阴谋集团结盟，以促进他的职业发展。[39]

科恩在社会和职业层面都构建了自己的男性身份。在这两个领域，

他都试图塑造一个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有所建树的青年形象。与胡佛和麦卡锡一样，科恩也擅长通过操纵媒体来树立自己的公众形象。他与媒体成员结成联盟，向八卦专栏作家提供信息，以换取媒体对他的职业和个人努力的正面报道。利用父亲的人脉和母亲灌输给他的傲慢、自负和坚持不懈等性格特征，科恩在纽约和华盛顿度过了他的早期职业生涯，拓宽了自己的人脉，发展了个人技能。这些确保了他在权力精英中的地位。[40] 从 1948 年 5 月起担任联邦检察官到 1953 年初为麦卡锡工作的这段时间，科恩一直热衷于管理媒体，他有追猎共产党人的天赋，最重要的是，他有能力将自己融入超男性（hypermasculine）的强权政治世界。

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科恩立即利用父亲的人脉，在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欧文·H. 塞波尔（Irving H. Saypol）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份助理律师的职位。[41] 烦琐的工作落到了最年轻的员工身上，有时科恩星期六也需要在办公室加班。在 1949 年 2 月 19 日的轮班中，科恩得到消息称，特勤局逮捕了一名持有 1 万美元假币的男子。在传讯过程中，一名记者问科恩，这些钱是否来自一个全国性的造假团伙。科恩快速回应说是的，尽管他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但当晚《纽约世界电讯报》（*New York World-Telegram*）头版的文章报道说：“美国助理检察官罗伊·M. 科恩今天称，昨晚两名城市探员逮捕了三名男子……‘他们将能帮我们找到国内造假集团的一些高层。目前正在积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我们预计会有进展。’”[42] 科恩很走运：被捕的男子确实
119 和一起大型造假活动有关，这一团伙还印制假邮票，走私毒品、皮草和威士忌。接下来的十八个月里，各大报纸接连不断地报道，这些非

法勾当逐渐被破获，并且几乎都是引用科恩提供的信息。[43]

在那次规模较大的造假案调查中，科恩批准了夏洛特·怀特赫斯特（Charlotte Whitehurst）的缓刑请求。夏洛特是位 25 岁的离异女性，来自弗吉尼亚州，被指控为造假者送货。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怀特赫斯特需要在弗吉尼亚州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才能返回田纳西州与父母同住。科恩对该协议的唯一辩护是，这名女子有“良好的家庭背景”。[44] 要求怀特赫斯特住在父母的屋檐下，这表明了国家对家庭制度的信任，相信家庭制度可以让一名误入歧途的年轻妇女恢复正常生活。这件小事也很符合科恩为宣扬自己的男性气概所做的努力：这使他能够表现出自己的仁慈和侠义，对女性的软弱意志很敏感，因此愿意原谅怀特赫斯特的罪行。[45]

造假案的报道提高了科恩的知名度。在纽约市，人们开始认可他，不再仅仅因为他是“法官科恩的儿子”。罗伊从小就意识到了媒体的力量，特别是八卦媒体。13 岁的时候，他开始为《布朗克斯本地新闻》（*Bronx Home News*）八卦专栏写文章。十几岁时，他还曾给《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八卦专栏作家伦纳德·莱昂斯（Leonard Lyons）当过学徒。[46] 但这起造假案，让科恩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如此显眼地出现在报纸上。他喜欢这种曝光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感；一位同事称，科恩案卷中的每一份起诉书都伴随着一份新闻稿。这位同事还声称，通常被告会被起诉多次，这样科恩就可以分发多份新闻稿。这位同事又称，科恩“要对大量子虚乌有的起诉书负责……科恩是办公室里被嘲笑的对象，因为他喜欢抛头露面，还会起诉任何人”。[47]

科恩对媒体形象的痴迷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1952 年 9 月，

他被提拔为司法部长詹姆斯·P. 麦克格兰里（James P. McGranery）的特别助理。不出所料，这次升职的消息被泄露给了多家主流报刊，不过很可能是科恩本人泄露的。[48] 上任的第一天，科恩在等待宣誓就职时（这一程序在法律上是多余的，只是因为科恩要求这样做），查看了宣布自己升职的官方新闻稿，并注意到他的新头衔没有包括“特别助理”部分。科恩走出就职仪式现场，要求重写新闻稿，让他的父母和司法部长等着。[49]

120

科恩开始让一些有影响力的记者围绕在他身边，首先是全国八卦专栏作家莱昂斯。莱昂斯让科恩熟悉了以夜总会和政府大楼为中心的政治报道的闲聊风格。更重要的是，莱昂斯把科恩介绍给了沃尔特·温切尔，温切尔可是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八卦专栏作家。温切尔与保守派专栏作家威斯布鲁克·佩格勒和乔治·索科尔斯基（George Sokolsky）一起，成为科恩最强大的拉拉队员，也成为塑造公众对科恩看法的关键人物。[50]

莱昂斯、温切尔、佩格勒和索科尔斯基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国家八卦产业中的风云人物。《都市话题》和《百老汇简讯》的成功催生了一大批模仿者。《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创刊于 1919 年，是最早在文章里用图片展示犯罪、堕落和腐败的小报之一。该报刊的标志上一直有一个相机，这说明了摄影对该报精神的重要性。《纽约每日新闻》几乎一举成功，1921 年发行量达到 40 万份，1925 年达到 80 万份，1930 年达到 130 万份。[51]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试图借鉴《纽约每日新闻》的成功并运用到自己的小报上，于 1924 年创办了《纽约每

日镜报》（*New York Daily Mirror*）。

但是，无论是《纽约每日新闻》还是《纽约每日镜报》，都无法与《纽约图文晚报》（*New York Evening Graphic*）的淫秽性相提并论。《纽约图文晚报》创办于 1924 年，创始人是媒体大亨和健身倡导者伯纳尔·“肉体爱好者”·麦克法登（Bernarr “Bodylove” Macfadden）。该报追求轰动效应，痴迷于性，努力呈现事件中最淫秽的版本，在语气和内容上都充满了暗示。[52]《纽约图文晚报》的图片编辑弗兰克·马伦（Frank Mallen）回忆说，他从创始编辑埃米尔·高夫罗（Emile Gauvreau）那里得到的唯一指示是，“在每个头版都要特写性，大写特写。在内页上，［高夫罗］希望它像小点心上的黄油一样摊开”。[53]对性的重视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麦克法登还是许多时尚性猎奇杂志的出版商，其中就包括《真实故事》，这是林德夫妇调研过的米德尔敦居民中最受欢迎的性猎奇杂志。

《纽约图文晚报》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给予八卦新闻的两份礼物。首先，它开启了沃尔特·温切尔、路易斯·索博尔（Louis Sobol）和埃德·沙利文的职业生涯。温切尔的作品成为现代八卦专栏的蓝图，使他拥有了大量的追随者，这让他能够与胡佛、麦卡锡和科恩建立友谊。其次，《纽约图文晚报》开创了“合成图像”的使用：合成图像描绘的场景要么是想象的（如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到达天堂），要么是难以拍摄的（如名人闺房）。该报首次或许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一次使用该技术是在 1924 年，爱丽丝·琼斯·莱茵兰德（Alice Jones Rhinelander）和基普·莱茵兰德（Kip Rhinelander）离婚审判期间，当时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张合成照片，

121

照片中裸露上身的莱茵兰德夫人向陪审团展示了她的身体。该报夸张地描绘了一位模特上身一丝不挂地背对镜头，一群“陪审员”盯着她赤裸的身体。[54] 这张照片受到了媒体评论家的广泛嘲笑，却促使报纸销量飙升。20 世纪 20 年代后半期，《纽约图文晚报》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巅峰。但该报最终被大萧条和来自其他小报的残酷竞争所摧毁，被迫在 1932 年宣布倒闭。

《纽约图文晚报》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采用有道德问题的创新策略来吸引读者的报纸。这十年也见证了所谓的“肌肉新闻”（muscle journalism）的传播，其中包括“绑架、窃听、盗窃、贿赂的温和艺术，还有狡猾和无限的勇气”。[55] 其中最狂热的从业者似乎主宰了 20 世纪头 10 年末和 20 年代的芝加哥新闻，他们专门报道黑社会的杀戮事件。这场运动获得了足够的文化恶名，激发了百老汇喜剧《头版》（*The Front Page*）的创作灵感。这部喜剧轰动一时，后来成为两部电影的基础。在将肌肉新闻的策略应用到八卦新闻的女性化领域时，温切尔等专栏作家帮助重新划定了报业的性别界限；因为他通过协助联邦调查局寻找失踪的林德伯格婴儿和促成黑帮之间的谈判等任务，证明了自己的男子气概，所以温切尔可以报道好莱坞明星的社交生活，而不牺牲自己的男性气质。

温切尔将科恩塑造成一个美国自由的坚定保护者，一个“明星反共检察官”，意图“追捕共产党人直到天涯海角”[56]。1951 年夏天，温切尔报道他目睹了“联邦法官西尔维斯特·瑞安（Sylvester Ryan）、美国检察官欧文·塞波尔和罗伊·科恩在法庭上挫败 17 名共产党人”，这个场景指的是一场审判，其中许多“共产党领导人”

因叛国罪受到审判，包括推理小说作家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温切尔间断性的报道赞扬了检察官，生动地说明了法官是检方的盟友，而不是公正的裁判："法官就是山姆大叔——充满威严。从 10：30 直到被告入狱，联邦检察官和他们的猛烈抨击很受记者们的欢迎。美国的执法官都穿戴整洁，看起来就像美国人应该有的样子……贝蒂·甘内特（Betty Gannett）是其中一名被指控的共产党人，其真实姓名是里夫卡·亚雷舍夫斯基（Rifka Yareshefsky）……其中一位共产党人的妻子（她的丈夫从法官那里得到了喘息的机会）离开时对着一位美国检察官嘟哝道：'你这个狗杂种！'"[57] 温切尔强调了 122
共产主义及其支持者的"非美国性"；美国执法官们"衣冠楚楚"，其中一名被指控的共产主义者却狡猾地把自己的名字美国化了。

就像与温切尔的关系一样，科恩支持反共主义的举动很可能经过了精心策划，目的是提高他的公众形象和职业声望。科恩作为反共检察官的职业生涯始于对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的指控。虽然通过造假案和一系列其他案件，科恩已经名声大噪，但对共产主义者的起诉才让他真正登上了国家舞台。希斯案也是科恩长期停留在公众视野中的一个重要起点，因为它围绕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对科恩试图塑造的形象至关重要，包括性别身份、性取向、爱国主义和忠诚等问题。

1948 年，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证词中，《时代周刊》（*Time*）编辑兼前苏联间谍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指控一些政府官员与共产主义者有联系。[58] 名单中包括阿尔杰·希斯。希斯是一名律师，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时期曾在国务院任职，并在 1945 年陪同罗斯福参加了雅尔塔会议。当希斯被指控作伪证时，他的

案件举国关注。[59] 科恩声称，起初他认为希斯是一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但在与一些联邦调查局特工共进午餐时，科恩看到了不利于希斯的证据，随后，他很快改变了主意。用科恩自己的话讲，从那一刻起，他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60]

不过，希斯一案也清楚地表明，反共主义是如何帮助科恩登上权力高位的。尽管他在起诉中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主要是写备忘录，但当审判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和电台最受欢迎的新闻节目播出时间时，这就给了他一个坐在前排的位置。[61] 如果科恩在寻求增加公众曝光率，那么对共产党人的追捕就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除了清楚地说明共产党员的威胁以及与之斗争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希斯案还向科恩证明了在公众的想象中，共产主义和同性恋之间存在着明确无误的关联。钱伯斯在一封给联邦调查局的密封信件中先发制人地承认，他在担任苏联间谍期间参与过同性恋活动，这一供词证实了当时的偏见。正如历史学家大卫·肯尼斯·约
123 翰逊（David K. Johnson）所指出的，“虽然当时没有公开披露，但围绕着希斯－钱伯斯争议的谣言和暗讽不仅将国务院与同性恋联系在一起，而且在许多公职人员、安全官员和舆论领袖的心目中，共产主义与同性恋也被联系在一起”。[62] 不可避免地，这些主流声音的判断最终渗透到了公众之中。在希斯的两次审判中，谣言四起，称“希斯和钱伯斯的关系即使不包括性行为，至少也涉及性嫉妒”。[63] 相关谣言甚至在 1948 年被私下编成了一部连环画，暗示希斯和钱伯斯是恋人关系。[64] 如果罗伊·科恩质疑同性恋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不确定同性恋的指控对一名政府职员的职业生涯造成的损害程度，

那么作为希斯一案的直接当事人，他肯定已经消除了这些疑虑。

希斯被定罪后，科恩协助塞波尔对 33 岁的政府经济学家威廉·雷明顿(William Remington)进行起诉，后者被控向苏联间谍伊丽莎白·本特利（ Elizabeth Bentley ）传递敏感信息。作为一名富有、英俊、成绩优异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雷明顿代表了东海岸权势集团。而科恩就像麦卡锡一样对此表示不屑，尽管他也曾试图加入其中。科恩在此案中的责任与他在希斯审判期间的角色相比显著扩大了。他制定了证人名单，让他们为审判做准备，并负责法庭质询。雷明顿案的审判巩固了科恩在东海岸权势集团中的反共声誉，同时也表明，这位年轻的检察官会使用他掌握的一切手段来达到他所期望的结果。[65]

第一个策略是指导证人提供误导性的或虚假的证词。罗斯科·康克林·贾尔斯（ Roscoe C. Giles ）是雷明顿在达特茅斯的一个熟人。他作证说，他们一起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会议。第二天，报纸的标题是雷明顿“与赤色招募有关”。[66] 然而，贾尔斯的早期声明并没有最终确定雷明顿是共青团成员。此外，贾尔斯本人早已否认与共青团有任何关系，这削弱了他接触共青团的声明。贾尔斯的证词很可能是由科恩指导的，这意味着“政府在热心于给雷明顿定罪的过程中，允许证人提供错误的或故意伪造的证词”。[67] 尽管贾尔斯的声明后来因为没有证据价值而从记录中删除，但他的说法已经在媒体上广泛传播。为了制造有利的头条新闻而征用容易被推翻的证词，这正是科恩和麦卡锡在他们的公职生涯中热衷于使用的策略。

科恩还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来推进对雷明顿的指控。当科恩得知 124
辩方证人比尔·古德曼（ Bill Goodman ）与科恩家族的一位朋友结婚，

同时还是他以前同学的姐夫时，据称科恩给这位同学打电话威胁说："你最好告诉比尔·古德曼不要出庭作证，否则我们将会逮捕他！"[68] 后来，当控方的一名关键证人因逃离事故现场而被拘留时，科恩打电话给康涅狄格州警察局局长，"告诉他，他们拘留了雷明顿审判中的一名重要证人，要求立即释放她。下午 5 点，她在未获担保的情况下被释放，重新驾车上路"。[69]

科恩在雷明顿审判期间取得的所有成就并非都来自不诚实的手段。正如自己的名声一样，科恩运用他在政治、文化和法律方面的丰富知识，在法庭上表现得娴熟而坚韧。[70] 陪审团经过四个半小时的商议，才对雷明顿做出有罪判决。雷明顿被判处五年监禁并罚款 2000 美元。他上诉失败，最终因作伪证被判额外刑期。[71] 1954 年 11 月 22 日，另外 3 名囚犯袭击了雷明顿，用砖头击打他的头部。代理典狱长告诉雷明顿的妻子："这不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只是几个被共产党人的宣传激怒的暴徒所为。"[72] 两天后，雷明顿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这是少数几起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麦卡锡主义的谋杀案之一。[73] 科恩是否曾对雷明顿之死感到懊悔，没有记录可查。值得注意的是，科恩声称雷明顿之死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一场夸张的性动机谋杀"。[74] 鉴于这种理论缺乏证据，科恩可能是想通过把雷明顿归为最恶劣的叛徒来为自己开脱，即认定他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性变态。

一对来自纽约的犹太人夫妇——朱利叶斯（Julius）和埃塞尔·罗森博格（Ethel Rosenberg）——被控向苏联泄露核机密，这一事件巩固了科恩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一名反共人士的声誉。科恩又一次动用了他所能动用的一切手段来赢得有罪判决，包括捏造证词和达成幕后交

易。作家兼调查记者约翰·韦克斯利（John Wexley）指出，他“坚信，罗伊·科恩是那场美国人民对朱利叶斯·罗森博格等人的审判中，对司法的愚弄负有最大责任的人之一”。[75] 不管审判是不是一种嘲弄，围绕它的宣传都让科恩将自己定位为正义的斗士，一个不惜一切代价抓捕那些威胁美国者的独行侠。用科恩的话说，“罗森博格案把我推到了舞台中央”。[76] 这也有助于让乔·麦卡锡注意到他。

在那次审判中，23 岁的科恩再次担任塞波尔的主要助手。他采 125
取了非常傲慢的立场，例如建议塞波尔继续追查有可能暴露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简称 AEC）认为敏感的信息的线索。[77] 虽然原子能委员会的领导人反对科恩的做法，但一些证人还是回答了此类问题。他们认为科恩鲁莽，但也承认他“非常聪明，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聪明的人之一”。[78] 联合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Drew Pearson）和《纽约时报》的作者都指控科恩为政府证人和前共产主义者哈维·马图索（Harvey Matusow）捏造证词，以便在证人席上使用。[79] 对于美国检察长办公室，尤其是科恩而言，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将有共产主义嫌疑的人绳之以法。

尽管有大量证据证明朱利叶斯·罗森博格有罪，但对埃塞尔的指控要弱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在丈夫和弟弟大卫·格林格拉斯（David Greenglass）会面时是否进行过打字记录。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由此产生的文件最终被传递给了朱利叶斯和大卫的苏联联系人。在 2003 年的一次采访中，格林格拉斯声称，科恩指示他作证，他的姐姐在这些会议期间担任速记员。格林格拉斯照办了，并指出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证词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和法律学者

普遍认为，格林格拉斯的虚假声明是对埃塞尔做出有罪判决的关键因素。[80]

如果科恩 1988 年的自传是可信的，那么科恩通过与审判法官欧文·考夫曼（Irving Kaufman）的关系，在罗森博格案中留下了自己最大的印记。科恩写道，他的父亲“帮助欧文·考夫曼获得了联邦法官的职位，（而）我也帮助将欧文·考夫曼分配到罗森博格案中”。[81] 与科恩的许多宣称一样，没有证据支持他的说法，但这确实表明了科恩希望被视为终极业内人士的愿望，即使他的主张明显违反道德规范。[82]

甚至一些确信罗森博格一家有罪的历史学家也指控，科恩在审判期间与考夫曼不正当地串通，并有可能说服法官判处死刑。有关这些不当行为的传言甚嚣尘上，以至于美国律师协会被迫在 1977 年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不过这两人都获得了清白。[83] 科恩极力否认这些指控，只是在他死后出版的自传中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在自传中声称：“在审判之前、之中和之后，控方团队，尤其是我和欧文·塞波尔，一直与考夫曼法官保持着联系。我指的是在没有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
126 私下的或者律师所说的单方面沟通。”[84] 在这些秘密会议中，科恩评估了考夫曼对案件各个方面的看法，并努力确保法官会判处死刑。[85] 科恩甚至背着他的上司警告考夫曼，称过分尽职的塞波尔计划使用一种可能导致审判无效的策略。考夫曼听从了科恩的警告，先发制人地否认了塞波尔带来的证据，使得该案可以继续审理下去。[86] 根据科恩自己的说法，他还成功说服考夫曼法官把朱利叶斯和埃塞尔都送上了电椅。在宣判期间，考夫曼将朝鲜战争的责任归咎于罗森博格一家，

并称他们的罪行“比谋杀更严重”。[87] 经过漫长的上诉程序，尽管公众强烈抗议，他们还是在 1953 年 6 月 19 日晚上 8 点后被处决。

最终，罗森博格案成为科恩最引以为豪的判决之一。在余下的岁月里，科恩会抓住任何机会来突出他在其中的作用。他在审判中的表现巩固了他在权力精英中顽强反共的名声。这也确保了他第一次广泛地暴露在公众面前的角色，是一个强调道德力量，才智刚毅、爱国奉献的角色。由于对政府使用不当手段的指控一直不为人所知——这些消息直到 1955 年才被广泛报道——科恩因帮忙扳倒 20 世纪美国最臭名昭著的间谍，而在国民意识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罗森博格案一结束，科恩就被转调到了华盛顿的司法部。在早期为司法部长工作期间，他领导了一个大陪审团，调查联合国雇用的近 2000 名美国人中是否有共产主义者，以此继续他的反赤色运动。[88] 尽管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个人与共产主义或所谓的非美活动有关，但仅仅是暗示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就足以结束他们的职业生涯，毁掉他们的生活。1952 年 5 月，6 名联合国职员接受了科恩大陪审团的“安全风险调查”，随后被解雇，虽然没有受到犯罪指控，他们的合同却被终止了。[89] 联合国法律总顾问，一个叫亚伯拉罕·费勒（Abraham Feller）的美国人，在调查期间从他的十二层公寓跳了下来。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韦·赖伊（Trygve Lie）将他的自杀归咎于为“捍卫联合国秘书处的美国成员”承受的压力，“反对不分青红皂白的诽谤和夸大的指控”，他指的显然是大陪审团。[90] 这些指控在司法部内部引发了分裂，但科恩没有被吓倒，仍继续向前推进。

在此期间，科恩与联邦调查局密切合作。由此产生的联邦大陪审 127

团报告赞扬了科恩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据报道，杜鲁门政府曾试图掩盖这份报告。很快，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开始对这些指控展开自己的调查。据《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报道，“众议院的调查有望揭示科恩在抵抗高层权力机构的压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大陪审团报告特别提到了科恩，称赞他‘不懈的热情’。在同一份报告中，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因其‘有效合作’而得到嘉奖”。[91] 尽管科恩和胡佛还没有建立起社会联系，至少根据当时的报道是这样，但他们似乎在共产主义威胁的效力上达成了一致。

在与媒体建立联系并积极追捕共产主义者的同时，科恩也在致力于打造适合权力精英的职业和公众形象。他通过日常表演来完成这项任务，他强调的个人特征被认为是传统的、异性恋男子气概的核心。[92] 科恩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有时是下流的男子气概，模糊了他更典型的女性特征。他努力向他的律师同事证明他与他们是合得来的。他的穿着和同龄人一样，乌黑的头发向后梳，穿着传统的灰色法兰绒西装，掩盖了他华而不实的个人风格。[93] 他会在曼哈顿最高档的餐厅享用有多道菜的丰盛晚餐，下班后小酌一杯，聊些粗俗的话题。

在那些外出的夜晚，他会像他的同事一样追求女人。正如一位同事回忆的那样：“罗伊·科恩当时是个异性恋。我知道。我知道他是个异性恋，这是事实。”[94] 另一名助理检察官声称，科恩当时经常光顾妓女，而且“可能在与非性工作者的女性交往时遇到了麻烦”。[95]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他开始出现在八卦专栏上，科恩抓住每一个被拍到与女性约会的机会（无论是群体聚会还是个人私会），出现在精英夜生活的热点地区，比如斯托克俱乐部的卡布室（Stork

Club's Cub Room）。就像之前的胡佛一样，他努力地与老板谢尔曼·比林斯利交朋友。

科恩最常联系的女人是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在沃尔特斯的回忆录中，她描述道，科恩曾多次向她求婚，尽管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肉体上的关系。沃尔特斯描述了她和科恩的一次约会：在那次约会中，科恩选择在高峰时间把他的车停在曼哈顿西 52 号街的中央，而不是在车流中等待。[96] 科恩当然意识到了这会给别人带来 128
不便，但他根本不在乎。除了突显个性中的主导性和重要性——这是大多数描述会提到的两个方面，科恩还经常表现出傲慢。这也表明，他认为男性的侵略性是影响力和权力的标志。

科恩的男子气概体现出女性陪伴的重要性，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对女性产生强烈的厌恶，这是他性格中的一个元素，很多朋友都记得，并经常（或许出于刻板印象）将其归因于科恩与母亲的复杂关系。科恩透露了自己对性别的偏见，他曾对一位女性朋友说："我喜欢你是因为你很坚强，你很聪明。大多数女人都很柔弱，她们会哭哭啼啼……"[97] 也不难想象，科恩在担任检察官的初期，在智力上贬低女性，同时在身体上剥削女性的习惯，让他受到了超级男性化同事们的喜爱。

虽然科恩的自负可能激怒了许多同事，但他的冷酷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科恩对共产主义追捕毫不留情的态度强化了他的男子气概，证明了他在反共追求中，即使涉嫌非法行为，也会不择手段。这些方法让科恩把自己定位成日场戏中与阿帕奇人（Apaches）有世仇的牛仔。这种极端主义被原谅甚至被鼓励，因为共产主义者已经取代纳粹党和法西斯分子，成为这个国家"最具威胁的敌人"。虽然科恩

的激进策略很可能出于他对权力的渴望，也可能出于他需要被认为“是个男人”的诉求，但他的侵略性很容易就帮助他实现了这两个目标。

在自传中描述早年担任检察官的那部分，科恩强调了自己在应对比他年长、脾气暴躁的上司们带来的挑战时，他所表现出的耐力。不管上司让科恩重写多少次法律摘要，他都坚持到完全完成任务为止。[98] 他进一步加入兄弟会的举动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上级对他的年少轻狂会眨眨眼，点头示意，比如那位法官就劝勉他说：“科恩先生，你的结案陈词几乎和你想象的一样好。”[99]

彩排结束后，科恩似乎准备进入更明亮的聚光灯下。1952 年 12 月 30 日，有新闻报道称，科恩将加入约瑟夫·麦卡锡的团队，担任麦卡锡的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10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年里，麦卡锡和科恩都利用对社会转型和不确定的
129 全球政治局势日益增长的焦虑，在新兴的国家安全状态中确保了自己的影响力。他们把自己描绘成男子气概的源泉，能够承担保卫美国不受国内外敌人攻击的紧急任务。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这些表演是否已经准备好登上舞台的中央。

第五章

丑闻作为政治艺术

乔·麦卡锡最不愿意去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市（Wheeling）。而共和党官员派他去那里，正因为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任务。对于许多保守派人士来说，这个曾经被他们视为后起之秀的人，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辜负了大家对他的期待。在参议院的头四年里，麦卡锡曾接受多次道德调查，遭到许多同僚痛恨，并被封为美国最糟糕的参议员。因此，当共和党领导人为庆祝林肯生日制定周末活动的日程时，他们给麦卡锡安排了些最不受欢迎的档期。他的第一站将是惠灵，然后是盐湖城（Salt Lake City）、里诺（Reno）、拉斯维加斯（Las Vegas）和南达科他州的休伦市（Huron）。

1950年2月9日上午，麦卡锡飞往惠灵市。一股冷空气正在袭来，预计会下雨。[1] 麦卡锡前往麦克卢尔酒店（McClure Hotel），准备在俄亥俄州县共和党妇女俱乐部赞助的活动上发表演讲。据报道，麦卡锡向大约275名忠实的共和党人发表了讲话："我手上有一份205人

131 的名单，据国务卿所知，这些人是共产党员，尽管如此，他们仍在国务院工作并制定政策。”[2]这一讲话注定会改变历史进程。

这个大胆的断言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多数主流报纸在星期五的版面上都没有提到这件事，而出现的文章也被压下去了（《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第五版有三段文字提到了这一讲话，旁边是一则针对情人节购物者的棉手套广告）。主流媒体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直到麦卡锡于星期五在盐湖城重新提出指控，声称他知道目前有 57 名共产党员受雇于国务院。星期六，麦卡锡抵达内华达州时，媒体已经揪住这件事不放了。麦卡锡在里诺机场遭到一群记者的伏击，他们要求他提供指控证据。麦卡锡翻遍了自己的公文包，然后声称他把名单放在了托运行李里。[3] 麦卡锡并没有拿出这份文件，但已助长了这种滚雪球式的宣传。他给杜鲁门总统发了一封公开电报，重申了他的指控，并争辩说，不对国务院进行调查将会“给民主党贴上与国际共产主义同流合污的标签”。[4] 尽管麦卡锡的动机很明确，但那是选举年，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继续跟进这件事，意图证明（或反驳）他的说法。

这是一个长达五十三个月的漫长时期的开始。在此期间，麦卡锡可以说是美国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最能制造分歧的政治家。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表明的那样，虽然麦卡锡并没有创造出以他名字命名的全民性狂热，但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显著的成就，是因为他利用了日益高涨的对共产主义渗透担忧的狂热，而且似乎很少有人理解这一点。麦卡锡的指控来得正是时候。就在惠灵市发表演讲的十五天前，阿尔杰·希斯因作伪证被判处五年监禁；而就在六天前，原子科学家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因涉嫌向苏联泄露核机密而在伦敦被捕。[5]

不到两周前，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科学家正在制造氢弹。杜鲁门最近还确立了政府信息保密的最高级别，即“最高机密”。[6]在 1950 年初的氛围中，关于联邦政府内部间谍活动的指控对媒体和公众来说都是可信的。

但麦卡锡的指控不仅仅建立在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之上，正如他在惠灵演讲三个月后发表的另一次重要演讲中所表明的那样。5 月初，麦卡锡出席了在芝加哥举行的中西部青年共和党委员会大会。星期六晚上，他的演讲通过全国广播进行了现场直播，可见他是多么吸引国民的注意力。在这些活动中，他把矛头对准了杜鲁门政府，嘲笑其联邦政府对共产主义颠覆分子的调查不够充分，并将其称为“粉饰行动”（Operation Whitewash）。整个过程中，麦卡锡都使用了性别歧视的语言，将共产主义者和那些与之斗争时表现不佳的人都称为娘娘腔。他声称，菲利普·杰塞普（Philip Jessup）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这两名被怀疑同情共产主义的政府雇员，与“喷涌出共产主义路线污水”的出版物有关联。[7]他提到了被广泛接受的同性恋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提议在约翰·埃德加·胡佛的领导下成立一个忠诚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拥有“无限的权力，以清除那些对莫斯科政党路线大加模仿的人”。[8]麦卡锡在谈到受阶级影响的批评时声称，“（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他克里姆林宫的好同志们，业余外交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9]同时，麦卡锡强调他拥有对抗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男子气概，对指责其公开调查使美国在全世界面前陷入尴尬的责难，他做出了回应，说道：“我要么毫不留情地做这项工作，要么和许多好心办坏事的人一样遭受同样的失败——过去五年

132

里，他们试图小心谨慎地做这件事，却以失败告终。”[10]

将娘娘腔和同性恋与共产主义关联起来，将男子气概与保护主义关联起来，这正是麦卡锡公众形象和论点的基础。这样的联想并非偶然；他们谈到了麦卡锡最热心的支持者的焦虑，特别是他们相信，由于道德衰落，美国越来越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这种发展明显体现在同性恋者、“不纯洁”女性、失去男子气概的男性、蓝血官僚，甚至联邦社会项目的剧增上。麦卡锡的演讲揭示了在道德恐慌时刻，对非规范性别和“反常”性取向的恐惧与政治激进主义是如何重叠的。为了利用这一恐慌，麦卡锡采用了八卦行业盛极一时的标志性策略，包括暗讽、影射、牵连定罪、哗众取宠、暗语，甚至是摄影操纵手法。此外，他还利用该行业的专栏作家、杂志和小报来打击他的敌人，并宣传自己的男子气概。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八卦对于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的兴起都必不可少。

***

133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高举反共旗帜的政客和人物并不少见，包括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参议员帕特·麦卡伦（Pat McCarran）、保守派权威人士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以及约翰·埃德加·胡佛本人。但没有人像麦卡锡那样与第二次红色恐慌密切相关。那么，为什么麦卡锡会成为这场运动最引人注目的代言人，尤其是考虑到他在 1950 年 2 月之前的参议院记录中乏善可陈？[11]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复杂的，但主要集中在麦卡锡如何调动他的民粹主义和男性形象，来解决冷战初期困扰美国社会的问题。

一个老生常谈的传言认为，麦卡锡在为 1952 年连任竞选寻找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后，无意中加入了反共阵营。这种说法认为，麦卡锡在 1950 年 1 月与三个有影响力的天主教朋友——埃德蒙·沃尔什神父（Father Edmund Walsh），乔治城大学的查尔斯·克劳斯（Charles Kraus）教授，还有律师威廉·罗伯茨（William Roberts）——共进晚餐时，对自己的连任前景表达了失望。罗伯茨说服麦卡锡，公众对联邦政府内共产主义间谍的恐惧，将成为他竞选活动中一个具有挑衅意味的议题。这篇报道称，麦卡锡抓住了这个想法。大约一个月后，他在惠灵市发表了那篇演讲，因此扭转了局势。[12]

虽然几乎可以肯定那次晚宴确实存在，但参与者对它的回忆却各不相同，其中一人甚至认为那次谈话很轻松，没有聊到政治。然而，这场晚宴的故事流传了很久，被用来证明麦卡锡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雇佣兵，他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采取了反共主义立场。此外，这一传言表明麦卡锡对反共主义的拥护是一时兴起的，这种解读将他定位为一个快乐的傻瓜，不过是偶然发现了一个缔造职业生涯的契机，而非慎重地挑选出这个问题加以发挥。

无论认为麦卡锡是唯利是图之人，还是认为他是狗屎运的受益者，两种观点都经不起仔细推究。如前所述，麦卡锡在此之前就已经给他的政治对手投下了红色诱饵。更重要的是，将麦卡锡的崛起描述为误打误撞的副产品，则忽视了他对主题选择和攻击方法精打细算的本质。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议题，反共主义让麦卡锡发挥了他的长处，同时重申了他男性形象的关键元素，包括他的爱国主义、军国主义、坚韧和对公众的忠诚。这也使得他在全国新闻中持续占据一席之地；在追求 134

公众注意的过程中，麦卡锡的大男子主义和反共主义得到了相互强化。

反思麦卡锡的成功，记者理查德·罗维尔（Richard Rovere）认为，麦卡锡“只是让许多人相信他说的是基本事实；他制造出冲天的滚滚浓烟，以至于许多不易上当受骗的男男女女都相信，这一切下面一定有一团火”。[13] 沿用罗维尔的隐喻，那么麦卡锡是如何用这么少的燃料制造出如此多的烟雾的？他又是如何让公众看到这些烟雾的？因此，要理解麦卡锡的影响力，关键在于他如何向听众传达自己的主张，以及听众的政治立场。媒体是一种联系公众的工具，麦卡锡对其力量的了解比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政治家都更深。麦卡锡追求新闻头条不仅仅是因为他自负；他争取新闻头条，以此当作支配政治对话术语的手段，并在周围形成一种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这一过程中，麦卡锡熟练运用了 20 世纪初以来八卦记者所采用的策略来操纵媒体和公众。

八卦杂志、小报和八卦专栏作家不仅启发了麦卡锡的许多策略，而且确保了公众基本能流利地使用他们的行话。通过这些信息来源，美国人对辩论策略更加熟悉，如影射、牵连定罪、夸张、危言耸听，以及阴阳怪气的讥诮、地下俚语和摄影操纵技术。冷战开始了，八卦杂志恰好在同一时刻蓬勃发展，双方都在强化对方的反共精神和男性主义的性别政治。因此，1950 年 2 月，公众第一次集体接触麦卡锡和他的策略时，是有备而来的。

《都市话题》《百老汇简讯》《纽约图文晚报》等八卦杂志的美学衣钵，在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初期由一系列色情杂志、“真实犯罪”杂志和“真实故事”杂志所继承。那个时代尤其是“真实犯罪”杂志

的全盛时期，如《头条侦探》（*Headline Detective*）、《侦探大师》（*Master Detective*）、《聚焦侦探》（*Spotlight Detective*）、《犯罪自白》（*Crime Confessions*）以及长期发行的《国家警察宪报》（*National Police Gazette*）。[14] 就像紧随其后的八卦杂志一样，真实犯罪杂志在20世纪40年代末激增，部分原因是战时纸张限额配给制度结束了。这些色彩丰富、廉价印刷的期刊为耸人听闻地描写“真实生活”创造了市场，而这种所谓的“真实生活”强调暴力、性、危险和阴谋。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推广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国家认可的权威人物，如警察侦探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应该体现出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冒险故事中应有的那种男子气概。通过讨论淫秽的话题，他们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俚语知识，尤其是那些与性有关的俚语。最后，他们专注于揭示所谓的隐秘叙事，同时含蓄地辩称，主流出版物并未向阅读公众讲述完整故事。

135

正是在这种战后的文化氛围中，美国八卦杂志的黄金时代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初，约瑟夫·麦卡锡主导政治话语的时候，没有什么八卦杂志比《机密》更受欢迎了，它是资深色情杂志出版商罗伯特·哈里森（Robert Harrison）的畅销作品。哈里森拥有无可挑剔的小报履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纽约图文晚报》一个低级跑差，后来在该报最后八个月的报道中担任记者。升职后，哈里森开始出版自己的色情杂志，包括《选美大游行》（*Beauty Parade*）、《满眼》（*Eyeful*）、《窃笑》（*Titter*）、《眨眼》（*Wink*）、《耳语》（*Whisper*）和《调情》（*Flirt*），这些杂志把美女照片与据称真实的猎奇和丑闻故事结合在一起。[15]

《机密》还加入了名人和政治八卦，以及消费者意识的故事。

哈里森注意到，他的员工和家人密切关注着 1950—1951 年凯弗维尔（Kefauver）集团犯罪听证会的新闻报道，他由此受到启发，开始发表有关政客的八卦。公众的兴趣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听证会播出的那个月里，卖出的电视机比之前十五个月的总和还要多。[16] 哈里森新杂志的名字很可能是从记者杰克·莱特（Jack Lait）和李·莫蒂默（Lee Mortimer）的“机密”系列丛书中剽窃来的，《机密》系列畅销书据称揭露了美国主要城市的犯罪、恶习和腐败的真实故事。[17]

《机密》采用民粹主义语调，声称会解决其他出版物忽略的问题，旨在为普通人发声。“与您在电影中看到的相反，”该杂志在其第一期中吹嘘道，“许多报纸不会在不考虑谁会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刊登所有新闻。很多时候，报纸刊登的报道或照片都是为了取悦广告商。广告是报纸的生命线。如果出现一种情况，需要在得罪一名付费客户和报道真实新闻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就把赌注压在前者上。”[18]《机密》向读者承诺，它不会进行自我审查。虽然《机密》保留了哈里森其他杂志的主要内容——真实犯罪故事和暴露的女性照片，但它将焦点放在了名人和政界人士的八卦上。第一期杂志于 1952 年 11 月在各
136 大报摊上架，鲜红色的封面提示这些新闻是“未经审查和非官方记录的”。封面还表明了该杂志的方向，（在乔·路易斯的照片下）宣布“运动员是糟糕的恋人”，询问前纽约市市长威廉·奥德怀尔（William O’Dwyer）是“圣人还是罪人”，以及承诺写一篇揭露“联合国之爱”的故事。

该杂志第一期的销量不佳，随后哈里森向沃尔特·温切尔示好，用八卦专栏作家的正面报道换取温切尔的认可。很快，《机密》就在

报摊上畅销开来，并逐渐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八卦杂志。1954年夏天，就在陆军-麦卡锡听证会结束后，它的发行量达到了100万份。[19] 1955年，其销量达到顶峰，报摊销量已经超过了《电视指南》（*TV Guide*）、《生活》（*Life*）、《时代周刊》、《展望》和《星期六晚邮报》。该杂志在1955年7月刊创下了全国报刊亭销量的纪录。[20]

虽然人们的刻板印象认为八卦杂志的读者主要是女性，但有间接证据表明，《机密》及其大量模仿者读者群体广泛，涵盖各个性别。《机密》杂志的广告直接向男性推销产品，其中一则广告告诉读者："你也可以快速轻松地训练出一副全新的成功的猛男（he-man）嗓音！"[21]1955年8月刊的《秘密》杂志（*On The Q.T*），《机密》的克隆版，刊登了一些相互竞争的广告，鼓励男人们通过购买"曼利"（Manly）品牌的健康护具（说穿了就是一种男性的腹带），或者在乔莱特健身训练学院的帮助下，从娘娘腔变成男子汉。[22]有一个人肯定读过《机密》，他就是麦卡锡的助手杰拉德·大卫·席因。在陆军-麦卡锡听证会期间，有人看到他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里藏了一本八卦杂志。[23]

就像之前的《百老汇简讯》一样，《机密》宣称它愿意点明八卦的对象；后来的宣传语承诺，该杂志"说出事实，指名道姓"。《机密》以美国出版界前所未见的程度参与了名人八卦。虽然像《影戏》（*Photoplay*）和《电影故事》（*Motion Picture*）这样的电影爱好者杂志也会刊登八卦和谣言，但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支持而不是批评电影行业，因此，它们与明星、经纪人和电影公司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机密》则站在了规范的另一端，充满批评、内容淫秽、有损报道对象的声誉。

哈里森避免诉讼的策略是，刊登的报道比杂志所掌握的信息略少（例如，报道某演员有婚外情，但不透露其与未成年少女幽会），以便在需要时阻止法律诉讼。[24]

137 效仿政府情报机构的做法在华盛顿层出不穷：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于 1947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随后于 1952 年成立。《机密》培养了一支付费线人大军，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城市警察、妓女、演播室工作人员、特工、律师、小演员、街坊邻里、酒店工作人员和仆人。这些线人将把信息传递给该杂志的纽约总部，随后又传递给在好莱坞的分部办公室。《机密》的记者和线人使用了伪装成手表的录音机、藏在手提包里的摄像头、窃听电话等类似于胡佛政府特工的监视手段。因此，《机密》声称的内容都经过了充分研究，而且往往由多个确凿来源构成。媒体史学家亨利·斯科特（Henry Scott）表示，该杂志的大部分报道“被证明是真实的”。[25]

在内容上，《机密》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或许是它对所谓的政客私生活的名人式八卦。19 世纪，记者把对政客们的个人羞辱视为一种对抗游戏，他们详细地讲述了涉及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丹尼尔·西克尔斯（Daniel Sickles）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性丑闻。但在 20 世纪初，一种更精细、更专业的政治报道方式发展起来，记者们开始遵守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排除公众人物令人尴尬的个人细节。这种妥协的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记者对采访的需求，随着联邦政府不断壮大，政客和官僚们受到了一小批工作人员的保护，记者们被迫与他们的政治对象合作，以免受到阻碍。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的风流行为

都是华盛顿记者们未公开的秘密。《生活》杂志记者哈尔·温戈（Hal Wingo）回忆说，1963 年约翰逊就任总统后不久，他曾警告一群记者："我在白宫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看到我在几个女人的卧室里进进出出，但请记住，这与你们无关。"[26]

《机密》之所以能够打破这些不成文的规定，部分原因在于其独立的信息收集业务，这使得它能够避免向政界人士（以及好莱坞的公关人员和电影公司负责人）卑躬屈膝。该杂志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两篇探讨政界恶习的文章。前纽约市市长、时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比尔·奥德怀尔被指控与集团犯罪有关，而《爱在联合国！》揭露了许多性丑闻，包括一些涉及谋杀、自杀、通奸和谍报的丑闻。[27]1953 年 4 月，《机密》报道说，1946 年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赦免了犯罪集团"幸运儿卢西亚诺"（Lucky Luciano），称这是卢西亚诺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协商的直接结果。[28] 四个月后，《机密》杂志指出，前波士顿市长安德鲁·詹姆斯·彼得斯（Andrew J. Peters）败坏了社交名媛斯塔尔·费斯福（Starr Faithfull）的名声，后者于 1931 年被发现死亡。[29] 总的来说，《机密》对政治人物道德缺陷的报道，对政治领袖的神化起到了破坏作用，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中达到了高潮。

该杂志的另一个关键元素是它明确的反共主义色彩，尽管哈里森声称对政治和麦卡锡主义一无所知，说"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就像欧洲一样陌生"，但它还是采取了反共主义立场。[30] 编辑霍华德·拉什莫尔（Howard Rushmore）在温切尔的推动下，于 1952 年加入《机密》杂志，他的加入强化了《机密》的政治性。拉什莫尔增加了政治报道

的数量，利用该杂志发表了大量反共材料，包括许多指控：往好了说是延伸，往坏了说是诽谤。

拉什莫尔曾是《工人日报》的电影评论家，在被这家共产主义报纸解雇后，他成了保守派的宠儿。拉什莫尔把自己改造成了一名反共专家，并开始为《纽约美国人日报》（*New York Journal-American*）撰稿。在 1947 年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听证会上，他提供了有关《工人日报》运作的证词，并指认了好莱坞的共产主义同情者。拉什莫尔夫妇与温切尔和科恩成了朋友，有时还会与科恩及其女友在斯托克俱乐部的高级会所“卡布室”共进晚餐。[31] 在 1954 年正式加入《机密》之前，拉什莫尔曾担任麦卡锡的调查员。

1953 年 11 月，拉什莫尔发表了一篇题为《赤色谋杀公司》（“Red Murder，Inc.”）的文章，警告说：“此刻在美国，有 1000 名曾在莫斯科秘密接受训练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①]，正等待消息，以瘫痪工业，清除反赤色的高层！”拉什莫尔声称，“被赤色谋杀小组标记为死亡目标”的前四名目标是约翰·埃德加·胡佛、麦卡锡、温切尔和电视布道者富尔顿·约翰·申（Fulton J. Sheen）主教。胡佛被形容为“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更了解赤色分子最高机密的人……胡佛成功地在赤色分子内部安插特工的做法，使赤色分子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赤色分子很早就决定，要想接管美国，必须早点干掉联邦调查局局长”。同样，拉什莫尔写道，“参议员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不遗余力地将共产党特工赶出政府，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公众支

---

①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领导人之一，后转投英军阵营，在美国一直被视为叛徒而饱受非议。

持，但同时也使他成为赤色分子‘清洗’名单上的头号目标之一……
最近，他所在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透露，一名受过军事训练的共产主 139
义者被派去刺杀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这惊人地证明了他的名字在清理名单上高居前列”。[32] 这篇报道不仅强调了胡佛和麦卡锡的反共事迹，而且彰显了他们为了国家安全而英勇无畏、甘冒生命危险的男子气概。

《机密》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对同性恋的关注；记者莫里斯·佐洛托（Maurice Zolotow）曾经说过，哈里森和《机密》都是“为酷儿而生”（queer for queers）。[33] 在哈里森的领导下，该杂志开始专注于曝光同性恋个人（在“出柜”这个术语出现之前），并刊登与同性恋有关的故事。文章将同性恋与违法犯罪联系起来，并指出性倒错是同性恋最常见的症状。[34] 一些当代评论员认为，《机密》大量报道这个话题并非因为哈里森恐同，而是因为他相信这样的故事有助于杂志的销售。仅在20世纪50年代，《机密》就报道了关于约翰尼·雷（Johnnie Ray）、泰布·亨特（Tab Hunter）、范·强生（Van Johnson）、丽莎贝斯·斯科特（Lizabeth Scott）、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丹·戴利（Dan Dailey）、瑞典国王、臭名昭著的银行劫匪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继承人彼得·奥顿（Peter Orton）以及哈佛大学整个宿舍的同性恋谣言。1955年，《机密》杂志准备发表一篇报道，指控洛克·哈德森（Rock Hudson）有同性恋行为，但环球影城说服了该杂志，让它放弃了这一报道，取而代之的是刊登演员罗里·卡尔霍恩（Rory Calhoun）曾因侵犯他人而入狱的报道。[35] 该杂志发表同性恋故事的频率，尤其是对同性恋的揭露帮助普及了这

样一种观念，即同性恋者和共产主义者一样，既危险又潜伏在每个角落，甚至是人们最不可能发现的地方。

《机密》杂志上有关同性恋的文章也让它的读者接触到一些俚语，包括 lavender（薰衣草，暗指男同）、fire（烈火，喻指同性欲望）、faggot（基佬，同性恋的贬称）、scared（躲躲藏藏的，指隐瞒性向者）、lonely（形单影只，指隐蔽的同性恋者）、wimpering（［原文如此，应为 whimpering］怯生生的，指胆小的同性恋者）、double-gaited（双性做派，指男女气质混杂者）、secret（深柜，指未公开性向的同性恋）、abnormal（异类，同性恋的贬称）、drag（伪娘，特指男扮女装者）、daughter（丫头，社群内年长男性对年轻男性伴侣的戏称）、gay（同性恋，男同）、woman（娘们，指比较女性化的男同）、Mary（以及其他女性名字，因刻板印象认为其气质女性化的男同）、never married（光棍到底的，暗指男同）、queer（酷儿，怪胎，同性恋的贬称）和 lifelong bachelor（老光棍，暗指男同）。tomboy（假小子）、going for dolls（追玩偶，搞姑娘，指女同性恋行为）、both sides of the street（两边都沾，指双性恋）、baritone babes（男中音宝贝，低音妞儿，指男性化女同性恋者）、lesbian（蕾丝边，指女同）、strange girl（怪丫头，指女同）和 never married（小姑独处的，暗指女同）等词汇也被用来指代同性恋女性和女同性恋行为。她们经常被描绘为穿着男装，姿态咄咄逼人。总之，《机密》使用了这些俚语，将其双重含义普及到广大受众，使读者在对话或阅读其他出版物时能够认出它们。

该杂志对政治八卦和同性恋的兴趣经常发生冲突。《机密》杂志第三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基本是在指责前伊利诺伊州州长、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是同性恋。在这一点上，《机密》的情报收集系统获得了回报：哈里森通过联邦调查局的熟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谣言。[36]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从来没有指名道姓（只是指出它“反映了［史蒂文森的］男子气概”），而在讨论这条消息的传播时采用了一种怀疑的语气：“造谣史上最讨厌、流传最广的传闻开始于此。电话里，飞机和火车上，从嘈杂的工厂流水线到安静的医院病房，从大城市的时髦人士到质朴的村庄，这谣言令一个国家耳根发烫。”[37]麦卡锡本人早在1952年就知道了围绕史蒂文森的谣言。专栏作家马奎斯·蔡尔兹（Marquis Childs）称，麦卡锡准备“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电视攻击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麦卡锡吹嘘说，他会说这场竞选是由粉色（pinks）、朋克（punks）和脂粉男子（pansies）组成的”①。这句俏皮话也表明，麦卡锡精通“粉色”和“朋克”等恐同俚语。[38]

140

141

《机密》关于史蒂文森报告的主旨在两个方面符合该杂志的利益。首先，它促进了对杂志本身的讨论，将其定位为“了解内情”，并向读者提出建议，他们需要阅读该杂志，以便跟上“令一个国家耳根发痒”的最新八卦。其次，《机密》没有发布谣言，因而可使自己免受诽谤指控。该杂志对前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的指控更为明确。《机密》1956年5月号详细报道了1947年1月发生的一件事，称醉酒的威尔斯在克利夫兰一家汉堡店向一名年轻男子求婚。[39]

《机密》杂志引领了一场八卦杂志革命，并启发了40多个模仿者，包括《未经审查》《最高机密》《内幕故事》《名流》《删节消息》《秘密》《幕后》《内幕》《神秘》《曝光》《私人生活》《锐舞》

① 三个词都可指男同性恋。

《真相》《爆炸新闻》《冒险》和《密告》。[40]正如它们的刊名所示，这些杂志承诺不仅涵盖传统的八卦话题，而且将揭露隐藏的真相。许多杂志的刊名采用了冷战萌芽时期的隐晦语言：《删节消息》《密告》《秘密》《内幕》。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刊名是《最高机密》（*Top Secret*），这个词 1950 年初才进入美国词典，当时杜鲁门总统授权将其作为安全等级。这些杂志使用“安全国家”的行话，暗中将自己与美国最著名、最受尊敬的秘密和信息收集者联系在一起——保护美国不被颠覆的联邦情报机构。

八卦一直存在于美国社会中，但冷战时期恐惧、焦虑、怀疑和保密的时代精神使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八卦业产品显得更有意义。这些杂志成功的关键在于，它们重新强调了这样一种观念：信息本身既意味着权力，又可能十分危险。冷战初期，人们对信息权力的信任源于对间谍的长期恐惧，这种恐惧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广为人知的间
142 谍案，以及国会对“好莱坞十人组”（Hollywood Ten）[①]等艺术创作者的调查。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比如同事与左翼联盟关系暧昧，或者大学室友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产生学术兴趣，也会产生新的含义，且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职业生涯和名誉。

143 “思想和观念可能构成威胁”的概念有着悠久历史。但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共产主义在流行文化中被描绘成一种智识性传染病，可

---

① 1938 年，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为调查“好莱坞被共产党渗透的程度”，传讯大批好莱坞电影界人士。其中有 10 人拒绝作证，不愿透露任何人的政治背景和思想倾向，因此被判蔑视国会罪，并处以监禁与罚款，另有大批艺术家受到波及。此事件后称“好莱坞十人案”（Case of Ten Hollywood People）。

America, on Guard:

HOMOSEXUALS, INC.

Don't sell the twisted twerps short! Once they met in secret. Today, they've organized as the "Mattachines" . with a goal of a million members and a $6,000,000 bankroll!

By KENNETH FRANK

A NATION-WIDE ORGANIZATION with one million homosexual members and an annual income of $6,000,000 — that's the aim of a one-year-old California corporation, the Mattachine Foundation!

It's an aim that shouldn't be put down as a "gay" day dream; for, according to a top official of the Mattachines, it can happen here. They figure it this way: Kinsey and other more or less reliable authorities estimate there are at least 6,000,000 sex devi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only one-sixth of them become members of this coast-to-coast hands-on-hip hook-up and pay dues of as little as 50 cents a month, the Mattachine Foundation will reach its goal.

And an organization with a yearly income of at least $6,000,000 can throw plenty of weight around, politically and socially! That's why we decided to uncover who's behind it, how it started, what it expects to accomplish, and why. Here's what we found:

First, the name stems from "Los Mattachines," a group of court jesters of the medieval ages who banded together to fight for certain soci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Held Secret Meetings Behind Locked Doors

Three years ago, when it was quietly organized, the Mattachine Society, as it was then known, had only five members. Today, its membership in California alone totals more than 9,000. Yet as recently as two years ago, the group held secret meetings, under the guise of "discussion forums," behind locked doors in the Wilshire and Hollywood districts of Los Angeles.

The Mattachines are out in the open now. They have a central headquarters in downtown Los Angeles. They have a branch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another in Oakland, and 14 active chapters in seven principal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including New York and Chicago. From a secret society of homosexuals whose "message" was passed by word-of-mouth from meeting to meeting, and from "gay bar" to "gay bar," the organization has progressed to the status of a non-profit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under California law.

Even before the end of its first year, this deviate group was conducting openly more than 25 so-called discussion groups in Los Angeles. Occasionally, a prominent doctor, lawyer, psychiatrist or movie personality — some of them homosexual, some double-gaited, and some neither — attended the meetings. In addition, the Society also attracted the swishes who make up the Cafe Gala-Maxwell's — Golden Carp crowd of Hollywood's twisted twerps.

Screams of Protest Hit a New High

Politics, rather than the problems of sex deviates seemed, at that time, to take up a major part of the night's business at each meeting. When Harry Hay, one of the group's leaders, was mentioned in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the screams of protests hit a new high. And when the Society's steering committee hired attorney Michael Snider to set into motion the machinery necessary for incorporation under California law, there were wholesale resignations among the Pollyannas. Deciding that if the association wasn't Red, it was decidedly pinko, hundreds of outraged queens spread their wings and flew as far away as possible.

The Red scare was temporarily by-passed when Dale Jennings, a top official, was tossed into the pokey. The L.A. vice squad claimed that Jennings had picked up one of its flatfeet in Westlake Park and invited him to his apartment. When the Society learned that one of its most "respected" members was behind bar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orried and wailed. One of them ran all the way to Mexico City. Yet, strangely enough, the Jennings case, instead of giving the Mattachines notoriety, gave them a boost, instead.

Jennings volunteered to become the Society's "guinea pig," offering to declare himself a homosexual in court and enter a plea of not guilty. The queen bees went to work

图 6.《机密》1954 年 5 月号在陆军－麦卡锡听证会期间出版，其中包括对该国最早的同性恋权利组织之一马太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进行了恐同式的披露。
图片来源：私人收藏。

以感染任何宿主，并将个人洗脑成社会主义机器。文化历史学家马修·邓恩（Matthew Dunne）指出，“在许多电影情节中，包括《火星入侵者》（*Invaders from Mars*，1953）、《宇宙访客》（*It Came from Outer Space*，1954）、《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1956）、《外星大脑》（*The Brain from Planet Arous*，1957）、《我的老公是异形》（*I Married a Monster from Outer Space*，1958）和《食脑人》（*The Brain Eaters*，1958），外星人侵者拥有模仿普通美国公民的能力，控制他们的思想，并将他们变成冰冷、无人性的奴隶”。信息是如此强大，以至于那些“感染了共产主义瘟疫”的人需要被隔离并接受治疗。[41]

八卦杂志向读者承诺，他们可以获得这些有力的信息。《锐舞》（*Rave*）标榜自己是“亲密接触杂志”，并声称自己是“不适合白痴的杂志”，而《密告》（*Tip-off*）则标榜自己是“内部独家新闻杂志”。[42] 人们普遍认为，任何重大事件的全部细节，无论是名人恋情还是地缘政治阴谋，都不会向公众公开，这也让八卦行业受益匪浅。八卦杂志给人的感觉是：大多数公开报道都是不完整的，有幕后动机和演员在起作用，只有“扒粪”的调查记者才会揭露不为人知的事实。《秘密》杂志向读者承诺“刊登报纸没有的故事”，并声称“自己是一本讲述完整故事的杂志”，而《耳语》则宣称自己讲述的是“头条背后的故事”。[43]

《机密》和其模仿者依靠暗示、牵连定罪、委婉语和夸张等八卦工具，来克服两个主要的挑战。首先，杂志通常需要从信息碎片中构建主张，就像用一张不完整的蓝图建造一座房子。他们的消息来源几乎都是中心故事的第三级：捕捉到一点谈话的餐馆服务员，把喝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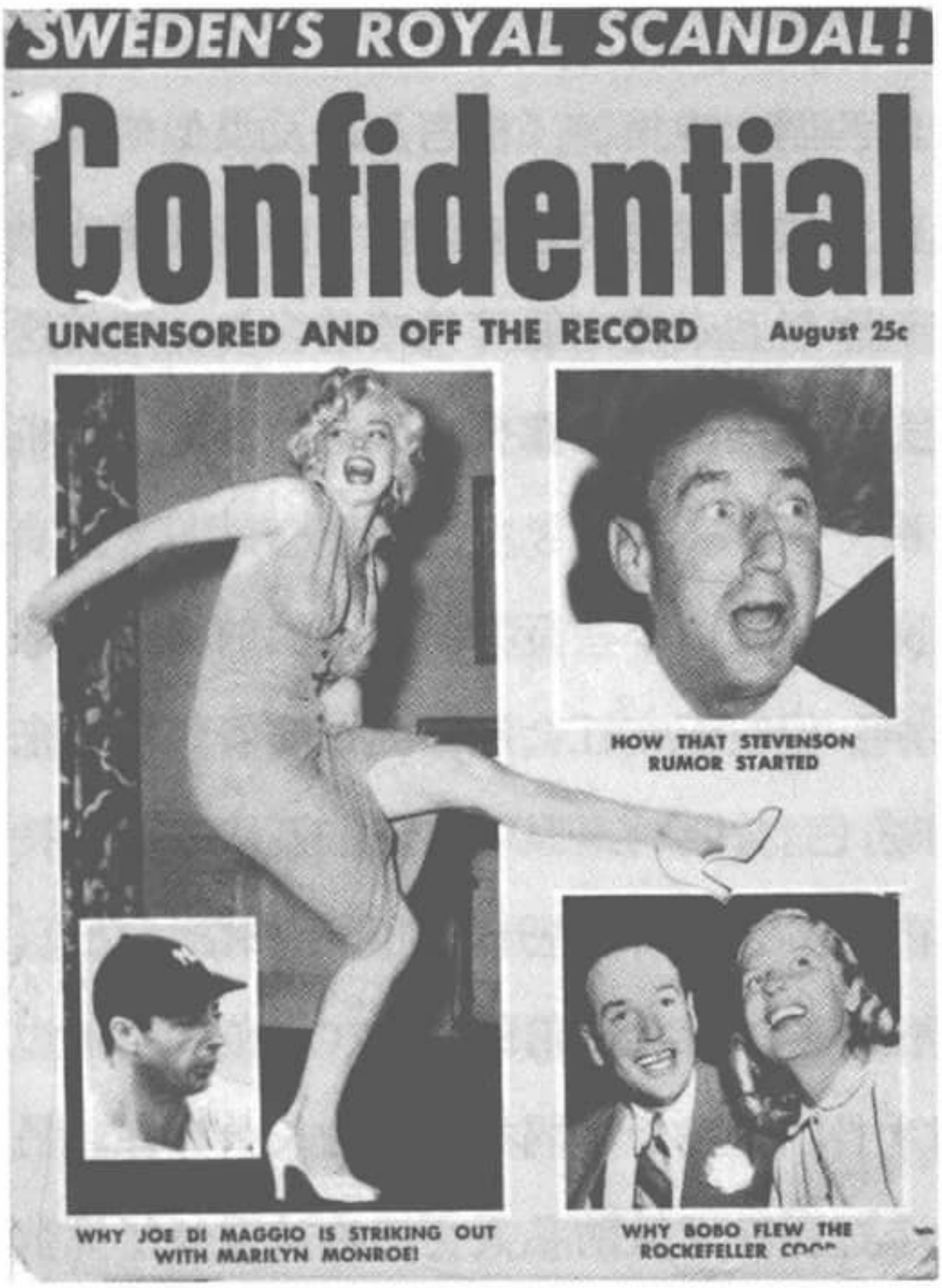


图 7.《机密》1953 年 8 月号中有一篇报道称，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是同性恋。图片来源：私人收藏。

小明星送回家的出租车司机，或者传播前伴侣新男友丑闻的被抛弃的恋人。其次，这些说法的范围必须足够广，这样杂志才能躲过诽谤指控。按照一定的顺序呈现事实，使用特定的暗语，或给文章配上生动的插图，这些都让他们将明确关系的任务留给了读者。《机密》的另一个风格特征是回收八卦，通过把已经流传的故事包装起来，构建“合成事实故事”（composite-fact story）。这些故事符合杂志的利益，它们“提供了可信的时间顺序，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读者可能在报纸的八卦专栏、传统的粉丝杂志、其他丑闻杂志和小报，有时甚至在主流媒体的专题报道中读到过”。[44]

144

八卦杂志的流行使公众熟悉了它们使用的语言和辩论工具。《都市话题》《百老汇简讯》《纽约图文晚报》《机密》以及类似的出版物使八卦工具作为传播信息的合法手段普及开来。由于拥有阅读八卦杂志的经验，公众能够认识到影射和牵连定罪等策略的含义。即使这些工具所支持的主张在法庭上站不住脚，但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也往往被认为是可信的。

此外，八卦杂志帮助定义和监督了哪些行为是可接受的。尽管八卦杂志素有粗俗和低级的名声，但它们在社会层面上扮演着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属于八卦的保守角色。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克·K. 福斯特（Eric K. Foster）总结道："在群体层面，那些开始于私下的信任交流，后来变成了社区、文化和其他有限的社会身份的知识、规范和信任边界……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八卦消息确保了同类成员的长久存在，另一群体的成员则被排斥，这个过程在无数的私人交流中被重复了无数次。"[45] 通过全国大众媒体传播的八卦也有类似影响，它描述了哪些行为可能导致社会排斥。在战后不稳定的情况下，建立这样的规则尤为重要。《机密》始终认为，尽管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经历了迅速变化，但同性恋、跨种族婚姻、非一夫一妻制关系、非婚生子、通奸、娈童和同情社会主义者等行为仍是不受欢迎的。尽管《机密》杂志及其同行通常不会对其主题及这些行为做出明确判断，但一个话题出现在杂志上就标志着它是"值得八卦的"，因此值得公众监督。

乔·麦卡锡试图提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公众形象时，开始采用《机密》及其竞争对手采用的许多相同主题和策略。与此同时，他继续强调自己的民粹主义男子气概。这种性别认同的特征在麦卡锡对美

国国务院提出的指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950 年初，副次卿约翰·皮里福伊（John Peurifoy）透露，91 名同性恋者因存在“安全隐患”而被国务院开除，在此之前，外交使团就遭到了特别的怀疑。保守派专 145
栏作家杰克·奥唐奈（Jack O’Donnell）在其声明中捕捉到了这种警惕，他说：“甚至在二战之前，美国的外交政策都是由一个无所不能、高度机密的核心圈子所主导的，这个圈子由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务院处于社会高位的性取向不适应者组成，他们都很容易被勒索，都容易受到外国同性恋者的奉承。”[46] 1950 年 6 月，《纽约客》刊登了一幅漫画，利用公众对最近几起解雇事件的关注，描绘了一名求职者对自己工作经历的解释：“的确，先生，国务院解雇了我，但那完全是因为我能力不足。”[47] 1950 年中期，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Stewart Alsop）兄弟讲述了一件轶事：当一位记者让出租车司机载他去新的国务院总部时，司机说：“男同（fruits）……那里都是男同。尽是男同和叛徒（treachers）。”[48]

麦卡锡把国务院作为攻击目标，这让他在抨击敌人的同时，也强调了自己的男子气概。他经常把最尖刻的谩骂指向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艾奇逊是格罗顿和耶鲁毕业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代表人物，而麦卡锡厌恶这种官僚。这些攻击有的是直接的。麦卡锡在批评艾奇逊容忍国务院内的共产主义同情者时指出：“我希望国务卿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说‘这是我的宝贝（baby）’，并为此承担责任。我建议艾奇逊先生能像个男人一样站起来。”[49] 麦卡锡还谴责了“阿谀奉承的虚伪自由主义者，他们把华盛顿搞得一团糟，用他们愚蠢的论点扰乱美国人的思维”，阻碍了他对政府颠覆分子的调查。[50]

在其他方面，麦卡锡用阶级语言批评了他在国务院的对手缺乏男子气概。在 1950 年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大会的主题演讲中，麦卡锡抨击艾奇逊是一个试图用“蕾丝手帕、丝绸手套和哈佛口音”与共产主义斗争的人。[51] 麦卡锡的分析受到了媒体的关注；麦卡锡在惠灵演讲后不久，专栏作家霍尔姆斯·亚历山大（Holmes Alexander）指出，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年轻粗俗的参议员在重提“那熟悉的美国故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势利、傲慢的纨绔子弟被铁轨对面的男孩打了一记耳光。这就是那位老兄受到报应的故事”。[52]

就连约翰·埃德加·胡佛对麦卡锡的赞扬也是基于这位参议员的男子气概。1953 年夏天，胡佛和麦卡锡一起度假，胡佛说：

麦卡锡曾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是位业余拳击手，还是个爱尔兰人。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将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个体，而不是被别人左右……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很有价值。他们有传唤权。如果没有传唤权，一些重要的调查就无法完成……我视他为朋友，相信他也把我当朋友。当然，他是个有争议的人。他很认真，也很诚实。他树敌不少。无论何时，只要你攻击任何一种颠覆分子，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法西斯主义者，甚至三 K 党（美国极右翼秘密组织），你就会成为最恶毒批评的受害者。[53]

胡佛对麦卡锡拳击运动的描述不仅仅是基于大学故事。在华盛顿，麦卡锡曾多次与人发生肢体冲突。他最著名的对手是联合报业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在目睹麦卡锡攻击敌人的残暴行为后，皮尔森早期

对麦卡锡的支持减弱了。20 世纪 50 年代，皮尔森发表了许多攻击麦卡锡及其盟友的专栏，其中包括指控麦卡锡故意雇用性变态员工。结果，麦卡锡把目光对准了皮尔森。[54]

1950 年 12 月 13 日，在华盛顿的萨格瑞夫俱乐部（Sulgrave Club）举行的一次晚宴上，两人爆发了冲突。社交名媛、派对组织者路易丝·安斯贝里（Louise Ansberry）在皮尔森不知情的情况下邀请了麦卡锡。唇枪舌剑之后，皮尔森试图无视麦卡锡，但在晚上派对结束时，俱乐部的衣帽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经过多轮争吵，喝醉了的麦卡锡两次用膝盖击打皮尔森的腹股沟，后来他声称，他认为皮尔森要从外套口袋里拿武器。这场混战最终被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拉开，尼克松后来对一个朋友说，“如果我没有把麦卡锡拉开，他可能会打死皮尔森”。记者们很快就得知了这起打架事件，并将其记录了下来。20 多名参议员打电话给麦卡锡，称赞他给了皮尔森一次罪有应得的教训。他未来的对手、参议员亚瑟·维维安·沃特金斯（Arthur Vivian Watkins）对麦卡锡说：“乔，关于你打了皮尔森哪个部位，我听到了不同的描述。我希望都是真的。”[55]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皮尔森和麦卡锡不断以诽谤罪起诉和反诉对方。几年后皮尔森开始报复，他助长了麦卡锡性取向有问题的谣言。

麦卡锡通过对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的攻击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粗犷的男子气概。1950 年 5 月，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青年共和党联盟的一次演讲中，将国务院的同性恋者称为“在性方面存在特殊心理异常的人”，人们的回应是肯定和窃笑。[56] 这个说法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强调同 147
性恋者偏离正常，二是将麦卡锡与同性恋者偏离的“正常”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麦卡锡本人的异性恋也得到了强调，沃尔特·温切尔报道了麦卡锡与贝兹·米勒和珍妮·克尔（Jean Kerr）的恋情（就像温切尔对胡佛和科恩所做的那样）。[57]

像许多其他政治家和公共评论家一样，麦卡锡把同性恋（或者用当时的说法，“性变态”［sexual perversion］）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早期的报纸报道了麦卡锡对政府颠覆分子的指控，通常认为他指控“国务院有通共和性变态的罪名”。《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威廉·富尔顿（William Fulton）明确将“麦卡锡主义”定义为“把共产主义者和性变态者赶出国务院的要求”。[58] 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一次演讲中，麦卡锡坚定地表示：“共产主义者和同性恋者使美国国民陷入催眠状态。有人认为共产主义者和同性恋者神圣不可侵犯，他们是在盲目地走向同样的悬崖，面对他们可怜的尖叫，我拒绝坐视不管。”[59] 麦卡锡私下里对两位记者讲得更直接。“伙计们，如果你们想反对麦卡锡，”他说，“你们要么是共产主义者，要么是基佬（cocksucker）。”[60]

1950 年的前几个月，美国人对性变态问题特别敏感，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近期发生了大量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性犯罪，尤其是在城市地区。1949 年 11 月 20 日，《匹兹堡新闻》（*Pittsburgh Press*）的第二版刊登了五篇报道性犯罪的文章。一周后，美联社一篇广为传播的文章指出，全国知名的法官塞缪尔·莱博维茨（Samuel Leibowitz）与胡佛和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一道，敦促人们对“当前爆发的儿童性谋杀”保持警惕。在 12 月 1 日的一份新闻稿中，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敦促国会“颁布并执行严格的联邦法律，以消除今

天在我国如此普遍的强奸威胁”。退伍军人协会的呼吁是对一种流行观念的回应，即没有“足够强大”的法律来预防和惩罚性犯罪；报纸报道了许多“被定罪的性罪犯”获释后，却继续攻击妇女和儿童的案例。[61] 虽然很难确定是否真的出现了一个犯罪高峰，但在 1947—1955 年期间，这种人们认为的犯罪潮导致 21 个州通过了针对“性变态者”的立法。[62]

胡佛早在两年前就提出过类似观点，认为“软弱的法律助长了性恶魔的猖獗”。在《美国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中，胡佛声称：“增 148
长最快的一类犯罪是由堕落的性犯罪者造成的……在美国，每 43 分钟就有一起犯罪袭击事件发生，不分昼夜……比野兽还野蛮的堕落人类，被放任几乎随心所欲地在美国游荡。”[63] 历史学家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观察到，“一些观察家认为同性恋事实上是危险的，但即使是最仁慈的作家也会把同性恋与其他有害行为和状况放在一起讨论，因此，同性恋肯定会被污名化”。[64] 在美国人对性的想象中，“变态”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包括各种各样的性危险，从手淫到强奸再到同性恋，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源于一些男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性冲动。[65]

显然，很多美国人将性变态的扩散归咎于“新政”，他们认为，联邦政府的扩张终结了传统价值观，取而代之的是国家领导人的罪恶价值观。[66] 这种信念在中西部和西部尤为强烈。爱达荷州博伊西的一位银行家声称：“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美国的道德沦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开始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67]

出于类似原因，在公众的想象中，同性恋和性变态都与共产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大卫·肯尼斯·约翰逊认为，“不断将共产主义者和

同性恋者相提并论，导致许多［美国］人将他们视为难以区分的威胁。其中一个群体渗入政府的证据被认为证实了另一个群体也犯有同样的罪行”。[68] 希斯－钱伯斯案为旁观者提供了这种联系的一个具体案例。正如约翰逊所指出的那样，“这两个群体似乎都包含着隐藏的亚文化，有着各自的聚会场所、文学作品、文化规范和忠诚的界限。人们害怕联邦政府内部的共产主义‘细胞’，同样他们也害怕同性恋者的‘巢穴’”。[69] 同性恋者也因为容易受到勒索而为人所忌惮，尽管有记录的唯一一个同性恋勒索影响军事政策的例子发生在 1907 年的德国。[70] 当自由派记者马克斯·勒纳询问政府有关美国同性恋勒索的消息来源时，他被告知，这类案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但保持警惕是合适的，因为“约翰·埃德加·胡佛说，同性恋者更容易”受到勒索。[71]

对性变态的指控，尤其是在国务院，让华盛顿当权派感到担忧。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星期六晚邮报》上问道：“华盛顿为什么发疯了？”在 1950 年 7 月的那篇文章中，
149 出身精英阶层的艾尔索普兄弟为政府机构进行了辩护，并描述了国务院高素质的员工正准备辞职，而不是应对其“知性主义”遭受的攻击。这篇文章特别指出麦卡锡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人，他在“每张床下都能找到一个赤色分子”：

> 去一趟国会山的麦卡锡老巢，就像是被带到了好莱坞一部小成本惊悚片的片场。接待室里通常都是鬼鬼祟祟的角色，他们看起来像是被收买了的国务院官员。尽管麦卡锡逐渐谢顶，不断的

颤抖使他的头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摇晃，但麦卡锡被塑造成一个好莱坞版大下巴的私家侦探。来访者可能会看到，他体态佝偻，弓着沉重的肩膀，大手拿着电话，对着某个神秘的盟友大声发出神秘的指令……这出戏因有重要的舞台表演而更加精彩。因为参议员麦卡锡在讲话时，有时会用铅笔敲打电话的话筒。按照华盛顿的民间传说，这应该会让任何隐藏的窃听设备都听不到。也就是说，国务院担心参议员麦卡锡的朋友在监听它，麦卡锡则担心国务院的朋友在监视自己。[72]

艾尔索普兄弟也谴责了“在芝加哥及西部大声宣扬的这种观念……即政府现在掌握在变态和叛徒手中”。他们批评了参议员肯尼斯·维利（Kenneth Wherry）提出的对政府同性恋员工进行调查的主张，称“性变态对美国安全构成明显威胁”的想法是“低级的蠢事”。[73]

在东部权势集团知识分子与“芝加哥及西部”危言耸听的“庸夫俗子”的较量中，艾尔索普兄弟发现了冷战开始时政府内部的一个关键摩擦：东部权势集团倾向于将远离东北地区传统知识、文化和商业中心的地方视为乡里乡气。许多保守的阴谋集团带头调查政府内部的颠覆分子，前者来自中西部和西部各州：威斯康星州的麦卡锡；内布拉斯加州的维利；伊利诺伊州的众议院议员诺亚·梅森（Noah Mason）；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帕特·麦卡伦；加利福尼亚州的尼克松。这些人寻求扩大影响力时，经常依靠对性变态、精英主义和共产主义（或对共产主义的同情）进行相互交织的指控，把对手描绘成反美和脱离了勤劳的普通美国人关切的人。麦卡锡的民粹主义男子气概就是 150

这种做法的例证，它激发了长期当权的人对他的仇恨，也激发了其蓝领支持者对他的忠诚。

1950 年 8 月 8 日，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演讲，回击了出身名门的艾尔索普兄弟。他认为他们的文章“讽刺了美国中西部和西部的人民，而那是美国的心脏”，对此他特别愤慨。他声称，“一旦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其领导人的道德沦丧掉以轻心，那么这个国家就离完蛋不远了。例如，当统治阶级变得道德败坏、腐化堕落时，伟大的罗马帝国就走到了尽头”。麦卡锡在参议员可免于诽谤指控的掩护下，暗示约瑟夫·艾尔索普是同性恋，并指出，“坦率地说，我知道你们一些编辑人员不相信参议员维利的努力，他试图完成拖延已久的任务，即把变态从我们的政府中清除出去，而这被一些编辑认为‘粗俗’或‘恶心’。当然，我能理解为什么乔·艾尔索普会认为这是‘粗俗’和‘恶心’的”。[74] 结果，《星期六晚邮报》基本上不再刊发有关麦卡锡的报道，这可能是麦卡锡恐吓成功的唯一一家出版社。[75]

麦卡锡的盟友赞扬他在打击所谓性变态方面取得的成功，几乎与赞扬他对共产主义的讨伐一样频繁。麦卡锡在惠灵发出指控三个月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前成员诺亚·梅森声称，麦卡锡已经“迫使国务院解雇了 91 名性变态”。[76]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麦卡锡的指控，参议院批准了 1 万美元用于调查“政府工作中的同性恋者和其他性变态者”，给以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克莱德·霍伊（Clyde Hoey）为首的调查小组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新任务。[77] 由此，麦卡锡明确地帮助促进和扩大了由政府资助的对同性恋的骚扰，史称“薰衣草恐慌”（Lavender Scare）。

麦卡锡与约翰·埃德加·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协助确立了他的男子气概。1947 年，麦卡锡抵达华盛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胡佛，两人很快就开始一起进行社交活动，在五月花酒店附近的哈维餐厅吃饭，参观赛马场。在“办公室一个金发大美女”的陪同下，麦卡锡与胡佛一起观看了 1949 年的普利内斯赛马会，据说胡佛给了麦卡锡一个提示，说哪一匹马会赢。[78]（这匹马后来输了。）他们与克莱德·托尔森、麦卡锡的秘书珍妮·克尔等下属一起在对方家里吃饭，后来罗伊·科恩也加入了进来（据说胡佛是位完美的客人，他总是给主人带一瓶葡萄酒）。1948 年，胡佛邀请麦卡锡为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当年的毕业生发表演讲。两年后，珍妮·克尔在夏威夷度假时，胡佛指派了一名休班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护送她。克尔在一次事故中髋部骨折，康复期间被迫留在夏威夷，胡佛通过檀香山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发来的电报密切关注她的康复情况。[79]

151

这种社会关系有助于培养一种职业的关系。胡佛秘密指示他的特工向麦卡锡提供联邦调查局大量疑似共产主义者档案的笔记，甚至在麦卡锡公开提出指控后指示他们仔细梳理联邦调查局的记录，希望能找到足够证据使指控成立。此外，胡佛还让麦卡锡接触到路易斯·布登兹（Louis Budenz）等前共产主义者证人，并推荐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与麦卡锡共事。胡佛的公关沙皇卢·尼科尔斯（Lou Nichols）建议麦卡锡在指控中使用更宽泛的语言，从而帮助他掌握了影射的技术。尼科尔斯建议用“共产主义同情者”或“忠诚风险者”这样的语言来确定他的目标，而不是用难以证明的罪名来指控一个人是“正式的共产党员”。[80]

最重要的是，麦卡锡与胡佛的合作最终使这位原本默默无闻的参议员在美国公众眼中的形象合法化。在冷战初期，胡佛可以说是美国最受尊敬的公职人员。他被誉为“国家抵御共产主义颠覆的最重要堡垒”，以至于在 1950 年 5 月，麦卡锡在中西部青年共和党委员会的演讲中，曾游说成立胡佛领导下的忠诚委员会。[81] 这样的声明没有引起强烈的抗议，这证明了胡佛在其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是多么受广大美国人的信任。有一段时间，这段关系让两人都受益匪浅。麦卡锡获得了认可、赢得了合法地位，获取了有助于他反共运动的信息。胡佛在立法部门找到了一个关键盟友，并获得了一种秘密泄露材料的方法。但是，基于利益交换形成的伙伴关系，只有在双方都有权力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

麦卡锡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与广大公众建立情感联系的能力，尤其是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他们崇尚保守的民粹主义价值观，
152 如民族主义、亲属关系、地区自豪感、宗教忠诚、自力更生，以及“努力工作”这一无形而强大的概念。这种忠诚源于他民粹主义男子气概的构成要素：沟通方式直截了当，与人相处轻松自在，又是退伍军人身份，在国家防御堡垒上的自我定位突出。1954 年，参议员亚瑟·维安·沃特金斯担任调查麦卡锡的特别委员会主席，从他收到的数百封信中可以看出支持者对麦卡锡投入了多少情感。由于写给麦卡锡本人的信件要么丢失，要么被销毁，要么被保存在密封的档案中，沃特金斯的信件提供了关于麦卡锡支持者如何在公众当中表达支持的最佳见解。支持麦卡锡的声音称赞他是“最伟大的爱国者”和“100%

的美国人”。[82] 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约瑟夫·A. 德雷波夫人（Mrs. Joseph A. Drapeau）赞同其他人的观点，她认为“参议员麦卡锡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与共产主义的斗争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斗争。他无所畏惧，无论他得罪了谁，他都有能力完成他开始的一切。我对他和他的方法非常有信心，因为没有人能以温和圆滑的手段对待共产党人，这点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明”。[83]

麦卡锡和他的运动所激起的情感，让许多书信作者唤起了一种更崇高的力量。内奥米·巴纳德夫人（Mrs. Naomi Barnard）问道：“你们怎么敢把一个将全部身心献给国家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选择阻力最小的道路是最容易的。乔·麦卡锡完成了你们所有人都知道需要做但又不敢面对的工作。现在他已经让这个国家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就想除掉他。”[84] 类似的说明通常充满了宗教语言。“谢天谢地”（Thank God）和“上帝保佑他”（God Bless Him）是支持者们倾注在乔·麦卡锡身上的常见情感，麦卡锡经常被描绘成一个为更伟大的利益而牺牲的殉道士。在作者们经常引用的《圣经》经文中，最常见的段落是基督告诫“无罪之人才能扔下第一颗石头”，这表明，支持者们虽然承认了麦卡锡的错误，但仍然接受他的领导。[85]

麦卡锡让人们如此忠诚的部分原因是他与人交流的方式，特别是他发起指控时的坚定语气和他在提交证据时使用的行话。麦卡锡夸张的指控充斥着美国报纸。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参与了“一场无比巨大的阴谋和黑暗的恶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冒险都相形见绌”。[86] 艾斯特·布鲁诺尔（Esther Brunauer）是美国国务

院的一名工作人员，麦卡锡声称，她与许多共产主义前线组织有联系，
153 这是麦卡锡遇到过的“最离奇的案例之一”。[87] 哈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是国务院官员，负责一个帮助欠发达国家的项目，他是“最聪明、最圆滑的”管理者之一，“他肩负着一项使命，一项使全世界共产化的使命”。[88] 被麦卡锡认定的共产主义者不是那些假装的共产主义者或者较低级别的间谍，而是一场全球阴谋的关键人物。

即使在多数证据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麦卡锡还是愿意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这一策略让一些观察家认为他是一个顽固的煽动者，但在他的支持者看来，这让他看起来很有原则。一些评论家将麦卡锡的策略比作“弥天大谎”（big lie），这是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提到的一种宣传手段，即“说谎的实践如此深刻，以至于公众不会相信有人会编造这样的谎言，因此，他们会将谎言当作真相来接受”。在公众的想象中，弥天大谎与某句话联系在一起，而这句话经常被错误地认为语出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如果你撒了一个很大的谎，并不断重复它，人们最终会相信它。”[89] 1952 年大选前夕，赫布罗克的一幅社论漫画描绘了麦卡锡一边粉刷篱笆，一边查阅一页题为《弥天大谎的诀窍》的文章，这一页是从面带微笑的约瑟夫·斯大林手中的《共产主义手册》上撕下来的。[90] 甚至杜鲁门总统也指责麦卡锡主义的共和党人撒了弥天大谎。

麦卡锡与公众沟通的能力无疑也得益于他利用流言蜚语进行指控的方式。虽然麦卡锡的诸多指控都是有据可查的，但从这一点出发，审视他反共运动第一年的一些具体案例还是很有启发性的。[91]

麦卡锡最早的攻击对象是专门研究中亚和中国问题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兼美国国务院顾问：欧文·拉铁摩尔。麦卡锡使用了他典型的夸张语言，声称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可能“已经对这个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且无法弥补的伤害”。[92] 1950 年 3 月底，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攻击拉铁摩尔，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勇敢的战士，愿意冒着政治和职业灾难的风险来寻求正义。“在与一些朋友讨论此事时，”他说，“他们向我指出……今天我打算讨论的人，谁胆敢试图曝光，道路上就会布满他们的政治尸体……大家都很担心我可能会退出这场战斗。我现在想向他们保证，用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①] 的话来说，‘我才刚刚开始战斗’。”[93] 麦卡锡因此突出了他强硬、勇敢和坚持原则的天性。他是一名战士，就和美国独立 154
战争中的那位海军英雄一样。他强调对手的刚毅，以此来增强自己对抗对手的勇气。他揭露拉铁摩尔威胁的建议也引起了阴谋论的共鸣，并与公众对红色恐慌的偏执相呼应。麦卡锡在演讲中使用了八卦杂志特有的夸张语言，称拉铁摩尔的情况是“离奇古怪”“前所未闻”“耸人听闻”“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的。除了强调他所提供服务的重要性之外，麦卡锡选择的术语也明显试图点燃听众的激情。

拉铁摩尔从阿富汗（他在那里为联合国收集事实材料）返回美国，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强烈否认麦卡锡的指控。为了反击拉铁摩尔，麦卡锡传唤前共产主义者路易斯·布登兹作证。布登兹得到了公众的广泛信任，因为他帮助证实了惠特克·钱

---

① 约翰·保罗·琼斯（1747—1792），苏格兰裔，美国海军军官、军事家，号称“美国海军之父”。

伯斯对阿尔杰·希斯的一些证词。宣誓后，布登兹声称拉铁摩尔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他被派去协助一个红色阴谋，把中国出卖给共产主义者”，他的说法是基于他声称拥有的苏联公报。[94] 布登兹的证词主要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凿证据。在盘问中他讳莫如深，但能避开所有的批评。《时代周刊》等主流出版物似乎都相信布登兹的话。[95] 麦卡锡随后叫另一位前共产主义者弗雷达·阿特利（Freda Utley）前来作证。阿特利承认她不认识拉铁摩尔，而且和布登兹一样，她也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拉铁摩尔支持共产主义。但她的证词也登上了报纸头版，包括在《华盛顿邮报》头条宣布，“弗雷达·阿特利告诉参议员，拉铁摩尔表现得像个红色共产主义者”。[96] 麦卡锡明白，新闻标题比下面细致的内容更能引起公众注意。

麦卡锡对头条新闻的叙事决定力的信念，在 1950 年对《美亚》（*Amerasia*）事件的调查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美亚》是一本专注于东亚政策的小型杂志。1945 年，由于怀疑该杂志持有政府机密文件，联邦特工对该杂志的纽约办公室进行了突击搜查。在此次搜查中，虽然发现了国务院、海军、战略情报局等部门的数千页文件，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文件没有一份被转交给外国势力，因此对《美亚》编辑的处罚相对较轻。麦卡锡在 1950 年揭露了这一事件，
155 并指控政府向公众隐瞒了《美亚》的罪行，而当时人们认为这起事件早已解决。这样一来，麦卡锡就建立了自己的“合成事实故事”，这一策略后来被《机密》推广开来，通过利用（并重复）知名人士报道过的案件中已知的方面来使指控合法化。[97]

麦卡锡拜访了前战略情报局特工弗兰克·布鲁克斯·比拉斯基

（Frank Brooks Bielaski），他作证说，对《美亚》办公室的突击搜查发现了一份有关原子弹的被窃情报文件。比拉斯基的说法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中尤其令人担忧：苏联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震惊了西方分析人士，并在美国引起了广泛恐慌。虽然比拉斯基的证词可能有助于解释苏联是如何迅速追赶上来的，但在当天晚些时候的盘问中，他关于掩盖事实的主张被彻底推翻。

但麦卡锡对此基本漠不关心；他已经采取措施控制媒体的报道。在比拉斯基出庭之前，麦卡锡在首都最受欢迎的报纸《华盛顿明星报》（*Washington Star*）上公布了他的证词预览。麦卡锡的这一做法确保了在对比拉斯基进行盘问之前，他的指控将被传阅。[98] 麦卡锡从卢·尼科尔斯那里学到了这一战术，卢·尼科尔斯是联邦调查局的公关专家，也是胡佛最信任的顾问之一。[99] 对于麦卡锡和他的联邦调查局盟友来说，情况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体可能产生的看法。

麦卡锡最明显地使用八卦工具是在 1950 年大选期间，他和他的办事人员使用了一种看起来像小报的竞选邮件《记录在案》（*From the Record*）来败坏参议员米勒德·泰丁斯（Millard Tydings）的名声。[100] 麦卡锡推翻泰丁斯的艰苦努力开始于几个月前，在这位马里兰州民主党人对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进行道德调查之后。泰丁斯曾发誓要让麦卡锡难堪，他说："让［麦卡锡］在公开听证会上待三天，他就再也不会在参议院露面了。"[101] 调查结束时，所谓的泰丁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 300 页的报告，得出结论说，麦卡锡对共产主义的调查是"对美国参议院和美国人民的欺诈和骗局"，他们制造了"可能是共和党历史上最邪恶的半真半假的运动"。[102]《纽约时报》的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指出："这份报告使用了参议院历史上很少使用的严厉措辞，并为每一个被参议员麦卡锡指控的人洗清了罪名。"[103] 随后，泰丁斯花了两个半小时攻击麦卡锡，称他的指控是"欺诈、骗局和谎言"，
156 并表明他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华盛顿邮报》记者阿尔弗雷德·弗里德利（Alfred Friendly）称这是"参议院有史以来最赤裸裸的个人谴责"。[104]

作为报复，麦卡锡和他的工作人员在夏天和初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努力确保泰丁斯无法连任。麦卡锡的员工帮忙给泰丁斯的对手约翰·马歇尔·巴特勒（John Marshall Butler）管理竞选捐款，他们经常把钱从麦卡锡的办公室运到巴特勒在巴尔的摩的竞选总部。麦卡锡和他的代理人很可能负责起草巴特勒的整体竞选策略，包括与芝加哥公共关系总监乔恩·M. 琼克尔（Jon M. Jonkel）的合作。麦卡锡的工作人员还为巴特勒进行竞选和宣传工作。[105]

《记录在案》是这些努力的集中体现。据编辑露丝·麦考密克·"贝兹"·米勒（Ruth McCormick "Bazy" Miller）说，这个想法来自麦卡锡本人。麦卡锡在米勒的报纸《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招募员工，在助理总编加文·坦克斯利（Garvin Tankersley）的指导下制作内容，麦卡锡经常与他一起聚会和狂欢。[106] 写邮件者通过模仿广为阅读的报纸格式，引用据称可靠的消息来源，如《国会记录》和联邦调查局报告，以及反复出现在有口皆碑的主流出版物中的内容，如《辛辛那提问询报》（*Cincinnati Enquirer*），《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和《洛杉矶时报》，来为自己披上合法外衣。该报转载了约翰·埃德加·胡佛的一封信，信中说胡佛为人"坦诚直率"，因此他的话"在美国一字千金"，以

此作为泰丁斯在麦卡锡调查案上撒谎的证据。

与此同时，《记录在案》通过断章取义、夸大渎职报道、合成图像和阴谋的总基调，积极地操纵读者。有一篇头版报道称，泰丁斯“赞助了关于苏联的拉铁摩尔讲座”，将麦卡锡最喜欢的两个目标联系起来。这篇文章还指出，泰丁斯的岳父约瑟夫·爱德华·戴维斯（Joseph E. Davies）是“前驻俄罗斯大使，也是《莫斯科使命》一书的作者”，但并未给出他的服务背景或书的内容，该小报的大部分文章都致力于说明泰丁斯委员会报告充满错误，并反复使用麦卡锡最喜欢的表述词语：“粉饰”（a whitewash）。

另一则标题则宣称，“泰丁斯委员因朝鲜战场的惨重伤亡而遭受指责”，文章称，批评人士“认为参议员泰丁斯……应为朝鲜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负责……泰丁斯是参议院委员会的负责人，该委员会控 157
制着国防部，而国防部未能向国家提供必要的装备来保护在朝鲜牺牲的士兵、海员和海军陆战队”。这显然是麦卡锡反复使用的策略，即与应征入伍的士兵站在一起，反对所谓的官僚不作为行为。文章还质疑了泰丁斯的男子气概和爱国主义，称他为“向政府摇尾乞怜的哈巴狗”，并指责他未能恰当支持军队。和其他小报一样，《记录在案》甚至把自己定位为消费者权利的保护者，抱怨联邦政府每年花费“超过5500万美元”来出版题为“西瓜的性别、形状和高度基因的相互作用”之类的书，尽管泰丁斯与这个项目没有任何关系。

《记录在案》借鉴了《纽约图文晚报》的做法，在第四页的底部（邮件封底）放了一张合成图。这张照片把泰丁斯的照片和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的照片拼合在一起，让人感觉 158

当白劳德抚着下巴发表观点时，泰丁斯在若有所思地倾听。由于白劳德经常出现在该地区的主要报纸上，马里兰州的选民会一眼认出这两人。虽然图片说明标明了这是一张“合成照片”（可能是为了防止诉讼），但这张照片显然是为了暗示两人之间的联盟。选举前的那个周末，共有 303206 份《记录在案》在马里兰州各地分发。

这一策略奏效了。据《纽约时报》报道，尽管马里兰州的投票倾向于民主党，但登记在册的民主党人约有 60 万人，登记在册的共和党人只有 25 万人。巴特勒以略高于 53% 的得票率获胜。[107] 这是泰丁斯担任公职三十年来首次竞选失败。

四天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P. 康诺利（James P. Connolly）写道，“许多因素导致了参议员米勒德·泰丁斯的失败”，“但竞选活动中对这位资深民主党人最强烈的谴责是，他否认了麦卡锡对国务院共产主义渗透的指控”。[108] 泰丁斯呼吁进行调查，声称巴特勒的竞选活动是围绕着“一系列谎言”展开的，这一系列谎言以《记录在案》为代表，并使用了摄影操纵手法。一个由两党组成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一致得出结论，认为巴特勒的竞选活动以卑鄙的方式进行，麦卡锡参与了这些欺骗行为，但他们也承认，他们没有办法解除巴特勒或麦卡锡的职务。泰丁斯回到了自己的农场，而巴特勒在参议院的两个任期基本上平淡无奇，确立了他作为保守派坚定支持者的地位。

麦卡锡方法的胜利最明显的例子是菲利普·杰塞普的提名事件。1951 年 10 月，杜鲁门总统提名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外交家、法律学者为联合国大会代表，这部分是因为杜鲁门打算开始与麦卡锡摊牌。1950 年 3 月，麦卡锡在泰丁斯委员会作证时声称，



COMMUNIST LEADER Earl Browder, shown at left in this composite picture, was a star witness at the Tydings committee hearings, and was cajoled into saying Owen Lattimore and others accused of disloyalty were not Communists. Tydings (right) answered: "Oh, thank you, sir." Browder testified in the best interes ts of those accused, naturally.

图 8.《记录在案》中米勒德·泰丁斯和厄尔·白劳德的合成图像。

图片来源：马里兰大学档案馆。

时任国务院顾问的杰塞普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着“不同寻常的亲近”。[109]

杰塞普反击说，“参议员麦卡锡的指控和影射不仅是虚假的，而且完全不负责任，这种情况显示了对国家利益的严重漠视”。[110]

杰塞普的提名被提交给了由三名民主党人和两名共和党人组成的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麦卡锡在作证时，指控杰塞普与许多共产主义前线组织有联系，包括赞助美俄研究所举办的一次晚宴，以及在美国

159 法学院学生协会的顾问委员会任职。在麦卡锡看来，杰塞普经历了“共产主义路线的所有曲折”。[111] 最富戏剧性的是，麦卡锡声称，杰塞普在中国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过程中负有罪责。小组委员会成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阿肯色州民主党人）多次要求麦卡锡拿出杰塞普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确凿证据，谴责麦卡锡依赖“牵连定罪”并攻击杰塞普的妻子。富布赖特的严厉质问最终导致麦卡锡勃然大怒。[112] 杰塞普是自己最好的辩护人，他把麦卡锡使用的明显伪造的复印照片比作当时臭名昭著的泰丁斯合成图。[113]

看来，麦卡锡的指控已经彻底被推翻。但令人震惊的是，小组委员会仍然投票反对杰塞普的提名。在 3 比 2 败北的情况下，超越党派的民主党小组委员会议员盖伊·吉列特（Guy Gillette）称赞杰塞普是“智力超卓的人，诚实正直的人，认真研究国际事务的学者，国际事务经验丰富的国际法老师”，并批评麦卡锡的指控是“歪曲事实”。与此同时，吉列特声称公众对杰塞普缺乏信心，尽管这种看法是“针对他的不公平和无原则的集中攻击”的结果。[114] 他的解释说明了八卦策略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公众舆论是如此强大，它可以超越基本事实造成的限制。如果麦卡锡等人能够控制国民对个人、机构、事件的看法，就能成功地推进自己的议程。八卦工具给事情的真相带来了困扰。

1952 年的中期选举进一步证明了麦卡锡的策略是多么成功。如果说麦卡锡把反对共产主义作为确保连任的一种手段，那么这种策略是有效的。在与美国前检察官托马斯·爱德华·费尔柴尔德（Thomas Edward Fairchild）的竞选中，麦卡锡赢得了 54.2% 的选票。尽管许多同时代的报道指出麦卡锡“落后于其他共和党候选人”，这意味着共

和党总统候选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和州长候选人沃尔特·科勒（Walter Kohler）都获得了比麦卡锡更多的选票，但麦卡锡仍然以相当大的优势获胜。[115] 此外，艾森豪威尔和科勒都是温和派，能够吸引更多的自由派选民；麦卡锡的粗暴态度很难说服选民改变党派。麦卡锡的战略是为了动员自己的保守派基础，而不是为了吸引更广泛的选民。

1952 年的选举使共和党人当选总统，并控制了参众两院。在选举 160
日之前写给《华盛顿邮报》编辑的信中，许多作者认为这次投票是对麦卡锡的公投。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评论人士都认为，支持任何共和党候选人都等于支持麦卡锡。[116] 在罗伊·科恩看来，“除了艾森豪威尔，没有哪个政治家比麦卡锡站得更高，麦卡锡甚至比艾森豪威尔更强，他将参议院转向了共和党”。[117] 参议院占多数的共和党人都确信麦卡锡将被任命为某个委员会主席，并可以拥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来发表他的指控。

麦卡锡对八卦工具的依赖并非偶然，就像他拥护反共主义一样绝非偶然。麦卡锡采用的这种策略符合他傲慢的个性，使他能够利用自冷战初期开始让美国陷入窒息的多重焦虑，并使他能够向准备用这种语言表达恐惧的一部分民众发出声音。他在使用这些工具方面的成功，也帮助开启了美国政治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信息传递的风格往往与其所包含的内容一样重要。

第六章

弧光灯下

1953 年 9 月 29 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华盛顿的圣马修大教堂举行婚礼。1200 名受邀嘉宾和 3500 名祝福者聚集在教堂，向 44 岁的新郎和他的新娘珍妮·克尔（麦卡锡的长期秘书）表示祝贺。麦卡锡身穿黑色晨礼服，燕尾服配真丝阔领带和条纹裤子，而新娘则身穿白色礼服，搭配帝国式紧身胸衣和长长的教堂式拖尾。出席的嘉宾有罗伊·科恩，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西奥多·弗朗西斯·格林（T. F. Green）和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 Kennedy），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哈罗德·斯塔森（Harold Stassen），华盛顿名媛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斯（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电影明星康斯坦斯·贝内特（Constance Bennett）和职业拳击手杰克·登普西（Jack Dempsey）。[1] 众星云集、政治背景各异的嘉宾名单，以及媒体的广泛报道，都展示了麦卡锡是如何成功将政治和名人结合在一

起的。报纸上明确提到，新郎亲吻新娘不是在圣坛上，而是在教堂和接待大厅之间的豪华轿车上。这对新婚夫妇在华盛顿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第二天就动身去英属西印度群岛度了三周的蜜月，因为担心受到骚扰，这个地方一直保密。这段假期只过了一周就结束了，当时 162
科恩（据报道是唯一可以直接联系到这对夫妇的人）打电话给麦卡锡让他回华盛顿商谈“紧急事务”：麦卡锡小组委员会对新泽西州蒙茅斯堡（Fort Monmouth）美军基地间谍活动的调查出现了中断。[2]

麦卡锡在他权力最大的时候回到了美国。共和党在 1952 年大选中获胜，这给了麦卡锡领导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机会，他曾利用该委员会来打击联邦政府所谓的安全风险问题。他得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报纸专栏作家的支持，包括沃尔特·温切尔、乔治·索科尔斯基、大卫·劳伦斯（David Lawrence）和威斯布鲁克·佩格勒。艾森豪威尔总统签发“10450 号行政命令”，授权对所有联邦雇员进行调查，以确保他们对美国“完完全全、矢志不渝的忠诚”，这似乎也使麦卡锡的调查有了法律效力。同年 10 月下旬，《纽约时报》的一篇头版报道称，1456 名政府雇员在四个月内被美国政府以“安全隐患”为由革职。[3]

蒙茅斯堡调查被认为是麦卡锡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调查。该要塞位于曼哈顿以南约 30 英里处，是美国陆军信号部队（Army Signal Corps）研究部门的所在地。该要塞因涉嫌窝藏共产主义间谍“团伙”而接受了近十年的调查，二战期间朱利叶斯·罗森博格曾在此工作，使得这一指控变得可信。现在，在联邦调查局报告的帮助下，麦卡锡小组委员会似乎即将破获这个“团伙”。整个 1953 年的秋天，麦卡

锡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有报道称，他和科恩采用的严厉审讯策略使证人承受不了压力，承认他们参与了一个大范围的阴谋。[4]

与此同时，想把麦卡锡和科恩赶下台的力量也在不断涌现。两人都试图为杰拉德·大卫·席因争取军方的优待。席因是麦卡锡的一名员工，也是科恩的朋友，最近刚刚应征入伍。科恩一再提出威胁性要求，这让麦卡锡和美国陆军走上了冲突的道路，矛盾最终在 1954 年春天举行的一系列具有变革意义的国会听证会上爆发。在其他地方，比如小报和杂志的版面、八卦专栏作家的暗语以及鸡尾酒会上的低声交谈中，流传着这样的谣言：科恩和麦卡锡以及胡佛有一些“变态”性倾向，而他们曾谴责过对手身上的这种倾向。甚至有传言称，麦卡锡最近的婚礼其实是为了平息这种谣言。尽管对麦卡锡的个人崇拜帮助共和党人在1952年赢得了重大胜利，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些成员认为，
163 关于麦卡锡和其员工的谣言可能并不是无中生有。[5]

从 1953 年 1 月科恩加入麦卡锡的团队到 1954 年夏天科恩辞职，这个使两人青云直上的环境恰恰导致了他们的垮台。具体来说，麦卡锡和科恩的对手将这两人描述为“有缺陷的人”，因为他们二人对监视国家男性气质有着同样的理解，而男子气概正是他们崛起的关键。这些对手依赖于麦卡锡和科恩使用过的许多策略和途径，包括在八卦杂志上使用夸张的指控，以及在较庄严的场合使用暗语。这些谣言能广泛传播，既因其可信度，更因当时举国上下对国家情报能力和强势男性气质的双重执迷。这种执迷，在那样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正左右着政治话语的框架。

***

罗伊·科恩看到了一个攀登权力阶梯的机会，于是在 1952 年 12 月，他请求一位共同的朋友把他介绍给麦卡锡。科恩知道麦卡锡最近被任命为政府行动委员会（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简称 CGO）主席后，希望说服麦卡锡聘请他担任该委员会最重要的小组委员会——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两人在纽约阿斯特酒店初次见面时，紧张的科恩认为自己搞砸了面试，但他得到了这份工作，于 1953 年 1 月成为该委员会职员。[6]

组织工作和政治是麦卡锡聘用科恩的两个原因。麦卡锡以追捕共产主义者而闻名，但他缺乏调查本身所需的实地经验和法律技巧。而科恩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能力：他是美国最有经验的反共诉讼律师之一，且拥有敏锐的法律头脑。尽管科恩的背景相对优越，但他还是让麦卡锡相信，他和麦卡锡参议员一样，对华盛顿建制派精英深恶痛绝。[7]科恩就读于纽约最好的预科学校和一所常春藤盟校，但他的粗野举止与华盛顿精英阶层的男性截然不同。雇用犹太裔的科恩也帮助麦卡锡反击了他自 1950 年以来一直在对抗的反犹主义指控。意识到这一点的科恩，通常把自己的宗教背景作为帮助其上司的一种方式。[8]就麦卡锡本人而言，他对反复出现的指控非常敏感，以至于他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在公开场合提及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博格，尽管他们是当时最著名的共产主义颠覆分子。[9]他还请保 164
守派专栏作家兼朋友乔治·索科尔斯基对反诽谤联盟的主要成员进行民意测验，来调查反犹主义指控的根源（索科尔斯基的结论是反诽谤联盟并没有与麦卡锡对立）。[10]尽管麦卡锡做出了这些努力，

反犹主义的指控仍在继续纠缠着他；1954 年 1 月号《机密》杂志的一个标题质问道："参议员乔·麦卡锡是反犹主义者吗？"[11] 聘用科恩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得到了麦卡锡的两个强大支持者——索科尔斯基和赫斯特集团首席执行官理查德·E. 柏林（Richard E. Berlin）的支持。[12]

科恩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罗伯特·F. 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他刚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曾在司法部工作，1952 年离职，负责哥哥约翰·肯尼迪的参议员竞选。[13] 长期以来，罗伯特颇具影响力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一直是麦卡锡的支持者，但麦卡锡对是否聘请一位爱尔兰同胞犹豫不决，而且罗伯特来自一个著名的民主党家庭。此外，在约翰·肯尼迪竞选期间，约瑟夫已经在麦卡锡身上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在此期间，麦卡锡没有为共和党现任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助选。事实证明，这是场势均力敌的竞选，因此麦卡锡这么做对肯尼迪家族来说是一种恩惠。约瑟夫·肯尼迪知道麦卡锡已经帮助了他的一个儿子，所以没有再强迫这位参议员雇用罗伯特。[14] 约翰·埃德加·胡佛、当选副总统尼克松以及 20 名参议员参加了庆祝科恩入职的私人聚会。[15]

科恩一下子就成为麦卡锡最信任的知己。记者弗雷德·J. 库克（Fred J. Cook）写道，"麦卡锡和科恩的组合是同心同德的伙伴关系，两人都助长了对方的过激行为"。[16] 科恩的直接责任包括收集线人、组织证词、准备证人讯问以及管理无处不在的媒体。"他是个聪明的年轻人，"麦卡锡这样评价科恩，"他工作很卖力，对我很忠诚。我认为没有他我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就。"[17] 记者们很快就认识到了科恩的重

要性，不仅在法律问题上，而且在两人反共运动的整个结构上，他都是麦卡锡行动的智囊。[18] 名义上，科恩是麦卡锡的助理，后来他成了参议员麦卡锡的秘书、法律顾问、代行职务者、新闻联络员、商业伙伴、人形备忘录、咨询对象、旅行代办人和知己。

科恩还在麦卡锡的员工中加入了志同道合的盟友。科恩的第一个行动是建议麦卡锡聘请大卫·席因担任无薪顾问。席因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哈佛毕业生和酒店继承人，科恩在 1952 年底通过乔治·索科尔斯基或欧文·塞波尔认识了席因。[19] 科恩和席因同年出生，两人很快就成了朋友，经常在纽约市的夜生活圈活动。女演员派珀·劳里（Piper Laurie）当时正在和席因约会，并最终和他订婚。她回忆说，她和席因约会时，科恩“总是搂着一个漂亮女孩”。[20] 席因之所以被聘用，据说是他在反共方面有专长：他写了一本六页的反共小册子，放在席因家拥有的每家酒店的《基甸圣经》（Gideon Bible）旁边。科恩还错误地声称，席因研发了一种“心理战项目，目前正在美国海军使用”。[21] 165

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这本小册子和他的作者荒谬可笑。在哈佛大学就读时，席因聘请了一位秘书替他上课，并有豪车在校内接送。在社交圈中，他以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雪茄收藏而闻名。[22] 对于那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记者理查德·罗维尔指出：“这本小册子记载的俄国革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与事情发生的年份不符。把列宁的名字写错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分不清，还混淆了马克思和列宁。”[23] 杰拉德·大卫·席因有很多优点，但他不是一个反共专家。

那么，科恩为什么要让麦卡锡聘用席因呢？让这个问题变得更有趣的是，席因的个人资料包含了科恩和麦卡锡声称厌恶的建制派特征：

他的家庭很富有，他曾就读于东海岸的精英学校（安多弗和哈佛），如果没有权力，他一文不值。[24] 尽管许多记者和历史学家都认为，科恩之所以要求雇用席因，原因是席因对他有性吸引力（甚至是因为两人已经在一起了），但他们的合作似乎主要是基于科恩希望利用席因家族的社交和媒体关系来获得更多的宣传。[25]

科恩完全接受了新上司的策略，包括攻击美国国务院是同性恋者的避难所等。艾森豪威尔就职不到一周后，科恩在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一次执行会议（那是一次闭门会议）前，对国务院官员约翰·E. 马特森（John E. Matson）进行了质询。[26] 马特森作证说，对于被指控有同性恋行为的国务院雇员，定罪文件被从他们的人事档案中移除了，这个行动许多国务院官员都有参与。马特森甚至指出，在一些案件中，在受到指控很长时间后，仍有涉事员工继续领取工资。马特森的指控导致国务院记录部门的另外五名成员被解职，他们受到了麦卡锡和科恩咄咄逼人的盘问。在出席执行会议两周后，马特森在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作证，声称国务院掩盖事实、监管松懈，使得“一个活跃的同性恋小团体”在国务院内肆无忌惮地发展壮大。[27] 麦卡锡利用马特森的证词来证明他要求加强对国务院官员的审查是合理的，并指责马特森的上司“不称职”，犯下了“我见过的最不可宽恕的过错”。[28]

166

在为麦卡锡工作的头几个月里，科恩还利用同性恋指控攻击了外交官塞缪尔·雷伯（Samuel Reber）——时任驻德国副高级专员。雷伯毕业于格罗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艾森豪威尔政府成员开始接管国务院工作时，他受到了严格审查。3 月 17 日和 19 日，雷伯接受了

一项“安全调查”，在此期间，他接受了一系列讯问，并被威胁需要接受测谎。[29]

麦卡锡的工作人员是如何知道雷伯在大学本科期间有过同性恋行为的，目前尚不得而知，但这个消息可能来自胡佛。尽管胡佛的说法与此相反，但联邦调查局确实“收集并整理了有关雷伯的信息，这些信息被放置在‘性变态档案’中，其目的是将同性恋者从联邦政府中清除出去”。[30] 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是胡佛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科恩和麦卡锡，但似乎存在这种可能。科恩亲自找到雷伯，告诉这位外交官，如果他拒绝辞职，他的过去就会被曝光。雷伯屈服了，在5月底辞职。[31] 虽然当时的新闻报道没有给出雷伯辞职的原因，但麦卡锡后来表示，雷伯被“撤职”，是因为他暴露出了“安全隐患”，这是对同性恋者常用的一种委婉说法。[32] 雷伯辞职后，小亚瑟·施莱辛格在写给阿德莱·史蒂文森的信中总结了国务院的担忧。他指出，在国务院，“人们正因为最极端、最脆弱、最没有根据的指控而被解雇或被迫辞职，或因政治指控，或因性指控。近期最著名的受害者是塞缪尔·雷伯，他显然是因为一项15岁时模糊的同性恋指控而被迫辞职的。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了……在这些暴徒看来，指控的事实本身就使一个人成为未来的风险”。[33] 施莱辛格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自己在1949年出版的《关键中枢》（*The Vital Center*）一书中，[167] 也一直在倡导外交政策要采取“强硬”的阳刚态度。

查尔斯·惠勒·泰耶（Charles W. Thayer）或许是科恩早年为麦卡锡工作时最有影响力的攻击对象。泰耶一生都在从事外交工作，1947年到1949年曾领导美国国务院国际广播部门（俗称“美国之音”），

后来又在美国驻德国领事馆担任过各种职务。泰耶温文尔雅、人脉广博，是国务院的典范：他打马球、抽烟斗，还曾在圣保罗中学接受教育，那是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的一所保守的预科学校。虽然泰耶毕业于西点军校，但仅仅几个月后，他就辞去了军职，加入了外交部门。[34] 麦卡锡在收到一系列匿名信后开始调查泰耶，匿名信指控这位外交官参与同性恋活动，同情共产主义。对泰耶的调查并非史无前例。20 世纪 40 年代末，这位外交官公开抱怨联邦调查局对新员工的安全检查速度太慢，从而激怒了胡佛。随后，胡佛对他进行了调查。

泰耶的政治关系使他躲过了胡佛早期的攻击。他是麦卡锡另一个目标查尔斯·“奇普”·博伦（Charles “Chip” Bohlen）的妻弟。麦卡锡声称，博伦和国务院的其他盟友在保护泰耶不被解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胡佛向麦卡锡和科恩提供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概述了联邦调查局对泰耶同性恋倾向的了解，至此这种保护性光环似乎已经破裂。[35] 3 月末，泰耶被迫辞职后，麦卡锡宣布获胜，并向《华盛顿邮报》暗示泰耶下台是由于他在负责“美国之音”时犯了错误。[36] 实际上，泰耶辞职是保守派的国会共和党议员与白宫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以泰耶的辞职换取博伦的驻苏联大使任命。麦卡锡反对这项协议，但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略胜一筹。

麦卡锡和科恩对泰耶的调查更进一步，他们开始调查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国际信息署（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 IIA），该机构负责通过图书馆、印刷出版物和广播向外国受众提供有关美国的信息。科恩和席因在纽约华尔道夫大厦的席因家族私人套间外开展调查，他们采访了数十名国际信息署员工，以寻找共产主义

特工或他们的出版物被渗透的证据。[37] 这些采访未能提供任何阴谋的 168
证据，反倒让科恩和麦卡锡在为自己造势的同时，给国务院带来了进一步的麻烦。

1953 年 4 月，科恩和席因扩大了调查范围，前往西欧调查国际信息署的活动。这次旅行的确切目标似乎连科恩和席因自己都不清楚。此前，科恩圆滑地声称，此行的目的是“收集证词或宣誓口供，以帮助参议院委员会节省美国纳税人的钱，并提高美国新闻处的效率”。[38] 然而，科恩后来表示，当时他和席因在“调查信息项目和为此工作的人”。此外，在列举他们担任这一职务的资格时，科恩援引了他和席因的反共资历，而不是任何管理或会计经验。[39]

实际上，这次旅行是一次反共钓鱼行动和宣传攻势。在十八天的时间里，科恩和席因访问了 9 个城市，在每个城市醒着的时间很少超过十二个小时。[40] 虽然有人批评他们的调查过于简短，他们仅仅花了半个小时就确定慕尼黑自由欧洲（Free Europe）电台的 1200 名员工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几乎在每个城市都抽时间召开了记者招待会”。[41] 胡佛应麦卡锡的要求，在科恩和席因抵达之前，给欧洲的联络人发了电报。但胡佛似乎对这次考察持怀疑态度，并敦促下属保持克制，在给巴黎法律专员的信中指出，“如果（科恩和席因）与你联系，表现出惯常的礼貌，但要谨慎行事，避免泄漏任何机密文件”。[42]

外交人员私下抱怨科恩和席因的访问损害了美国声誉和国务院的士气。1953 年陪同阿德莱·史蒂文森进行海外访问的一名记者在日记中写道，驻维也纳的一名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声称，“科恩和席因的访问对我们在奥地利的声望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尤其是大使馆还不得

不给这两个小丑贵宾级的待遇”。[43] 波恩市长表示，“麦卡锡在八个月内在海外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比苏联宣传机构在八年内造成的伤害还要多”。[44] 日记显示，外交使团的成员对麦卡锡主义既恐惧又蔑视。毫无疑问，麦卡锡和其下属影响力颇大，一位外交官告诉史蒂文森，“麦卡锡的间谍对国务院的渗透是如此广泛，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Bedell Smith）如果想向大使提交机密信息，就必须通过中央情
169 报局提交，以防间谍向麦卡锡报告”。[45] 虽然科恩和席因令人畏惧，但他们也很容易被愚弄。美国驻贝尔格莱德的临时代办伍迪·瓦尔纳（Woody Walner）承认，“他对科恩和席因要来贝尔格莱德的消息感到有些震惊，并认为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他们来之前把事情搞定。于是，这两人刚到机场，瓦尔纳就宣布，‘伙计们，你们现在身处欧洲反苏斗争最激烈的国家’。两人对此非常满意，访问期间没有制造太多麻烦”。[46]

美国国务院官员并不是仅有的对科恩和席因的访问感到不安的一方。在越来越尖刻的报道中，欧洲媒体将这两位美国人称为“卑鄙的窥探者”“病态的豺狼”，以及“现代法西斯主义”的践行者。[47] 两人在罗马亮相后，英国《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评论称，“他们词汇量有限、自满自大、思想匮乏，再加上他们掌握了巨大权力，这足让人们对不得不屈服于此的所有级别的美国外交人员感到同情”。[48] 科恩和席因离开英国时，《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发表了一篇充满讽刺的送别文章，用的是一首基于歌舞杂耍表演的诗歌。[49]

虽然科恩和席因被美国外交使团和欧洲媒体视为一个一点都不好笑的笑话，但他们的行为还是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们出访欧洲

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国际信息署进行了一次大范围审查。数百名员工被解雇或被迫退休，“美国之音”的许多外语节目被削减，海外国际信息署的许多图书馆要么被关闭，要么是一些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文本遭到清理。[50] 迫于舆论压力，艾森豪威尔还提出方案，重组美国国际新闻部门，将其从国务院的监管下剥离出去，最终成立了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清除联合国的同性恋员工，并向盟友施压，让他们清除自己政府中的同性恋。科恩和席因对国际信息署的调查代表了“薰衣草恐慌”的国际化。[51]

科恩和席因的欧洲之行也因媒体对两人关系的报道而备受关注。欧洲报刊将他们描述为不幸而困惑的人、一对无人监督的童子军或笨手笨脚的蜜月夫妇。二人在德国一家酒店大堂里的争吵引发了很多讨论。德国法兰克福《晚邮报》（*Abendpost*）报道说，由于席因缺乏组织能力而产生分歧后，“有人看到，席因用卷成一筒的杂志打了科恩的头。随后两人离开公众视线，在席因的房间里待了 5 分钟。后来，客房服务员发现烟灰缸和烟灰在房间里洒得到处都是。家具也被掀得东倒西歪”。[52] 这些报道的语气故意暗示了这是一种“恋人间的争吵”。一家英国报纸甚至将一篇报道的标题定为“科恩和席因，两个伦敦恋人”。[53] 毫无疑问，科恩和席因知道他们的旅行可能会被这样解读；在入住酒店时，他们要求入住相邻但分开的房间，并向周围的人反复强调“他们不是为国务院工作”。[54] 后来，当一家酒店把科恩和席因安排进一个房间时，科恩又重复了同样的笑话。[55]

美国报纸转载了许多此类趣闻轶事。特别是反对麦卡锡主义的人开始暗示，科恩和席因的关系超越了友谊。为此，这些作家和编辑使

用了许多形式的影射，有些甚至更微妙。席因当时的女友派珀·劳里回忆说，她在洛杉矶许多报纸上读到的文章，都暗示科恩对席因有“性趣”。[56] 这是美国人首次接触到这样的暗示：科恩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阳刚。此前，媒体对科恩的报道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这得益于温切尔和索科尔斯基等支持他的专栏作家。一些评论人士甚至把科恩描绘成一个救世主，指出他的法律专长和与共产主义斗争的经验将有助于控制麦卡锡的一些极端倾向。

科恩和席因的欧洲之行改变了这种说法。这场欧洲之行让他们看起来缺乏经验，准备不足，无法评估共产主义的威胁，还引发了公众对他们关系的审视。最重要的是，这次访问激起了人们对他们男子气概的质疑，即使科恩和席因不是同性恋，他们的行为也不正常，而且越轨了。科恩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阳刚的形象：一位聪明、机敏、有人脉的领导者，能够处理复杂的情况。但在欧洲，他困惑、笨拙、无能。这场出访的失败也招致了对麦卡锡的进一步批评。他的公众形象建立在蓝领力量的基础上，但现在他却与两个行为令人大跌眼镜的人联系在一起。这是浮在表面的一条裂缝，而这条裂缝将在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破碎。

***

171 1953 年夏天，席因被重新列为符合征兵条件者。麦卡锡的宿敌德鲁·皮尔森报道称，席因和科恩都用了站不住脚的借口逃避兵役，这个报道也使得席因的身份被重新审视。[57] 麦卡锡和科恩试图为席因争取到一个职位，其中包括陆军和海军位于华盛顿的职位，以及中央情报局或者国防部的职位，以便让他继续担任小组委员会的顾问。但他

们的努力失败了，9 月份席因以二等兵身份加入了陆军。[58]

科恩竭尽全力为他的朋友争取优待。他试图让席因成为一名军官，让他驻扎在华盛顿或纽约附近，并让他得到一些特权，比如额外的周末假期，并免除现役军人较繁重的任务。在九个月的时间里，科恩通了 65 次电话，组织了 19 次会面游说陆军高层。[59] 陆军拒绝了科恩的要求，他因此感到越来越沮丧，开始粗俗地怒斥陆军领导人，包括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Robert Stevens）和陆军总顾问约翰·G. 亚当斯（John G. Adams）。尽管麦卡锡对席因的看法并不是很坚定，但这位参议员对科恩的忠诚使他支持他的首席法律顾问席因。[60]

虽然有人认为，科恩的态度包含了对席因的浪漫迷恋，但更有可能的解释是，这种咄咄逼人的男子气概是科恩作为权力掮客身份的必备要素。科恩已经非常强大，为所欲为，因此当陆军拒绝立即屈服于他惯用的幕后交易和公然欺凌策略时，他很可能感到震惊。在意识到陆军不会与他交易后，科恩恢复了边缘政策，以证明他自己、麦卡锡和他们的盟友拥有比陆军更大的权力。

科恩的态度惹怒了陆军。1954 年 3 月 11 日，陆军代表向媒体公布了科恩为席因争取优待的清单。最重要的是，报告列举了科恩对陆军领导层的诸多威胁。[61] 这份文件最初有 70 页，但陆军决定审查科恩的一些粗俗语言，认为不适合公开记录，因此删减到原来一半的长度。[62]《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称：“陆军指控麦卡锡和科恩威胁陆军为席因争取优待。”[63]《纽约时报》写道，“本报道援引科恩的话，他有一次威胁要‘摧毁陆军’，并确保罗伯特·T. 史蒂文斯不再担任陆军部长”，“还有一次……‘科恩对约翰·亚当斯先生说，他会教

会亚当斯越权是什么意思’”，然后得出结论，“预计这份报告将引发越来越多要求科恩下台的呼声”。[64]

报告发布的第二天，麦卡锡和科恩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否认了陆军的说法。此外，麦卡锡还“严厉指控军方企图敲诈，以阻止他曝光共产党人”。[65] 为了支持这一指控，麦卡锡和科恩编造了 11 份内部备忘录，并回溯其日期，让它们看起来像是对军方企图“敲诈”的回应，然后向媒体公布了这些伪造的文件。这些备忘录据称包括许多陆军负责人提出要求的谈话记录，其中包括指控陆军顾问约翰·G. 亚当斯敲诈科恩和麦卡锡，让他们为他在纽约市一家律师事务所谋得年薪 2.5 万美元的职位。[66] 科恩在 3 月 14 日的《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节目中指控说，陆军把席因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并表示，如果麦卡锡和科恩同意“不再插手”蒙茅斯堡的安全问题，陆军就会给予席因特殊待遇。科恩还指控说，陆军试图用“一个具体的提议”来引诱他和麦卡锡，“要我们去调查一个空军基地，亚当斯先生告诉我们，那里有许多性取向不正常的人，［这样的调查］将为我们带来一场很好的听证会”。[67] 科恩的措辞“很好的听证会”，暗示了听证会既是鉴定性的，也是表演性的，不仅是为了收集信息，也是为了吸引关注。

考虑到双方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呼吁对所有指控进行全面调查，尤其是对科恩的行为。四天后，在一次激烈的闭门会议上，委员会达成了一项协议。据《纽约时报》报道，“委员会当天投票决定，将麦卡锡与陆军之间最近的争议全部公开。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决定要求对在争议中可能涉及伪证和其

他不当行为的指控进行全面调查，并宣誓作证”。[68]麦卡锡向媒体强调，他是自愿把目前的主席职位让给南达科他州的卡尔·厄尔·蒙特（Karl E. Mundt）的，他似乎相信自己仍能操纵整个过程。听证会定于 1954 年 4 月 22 日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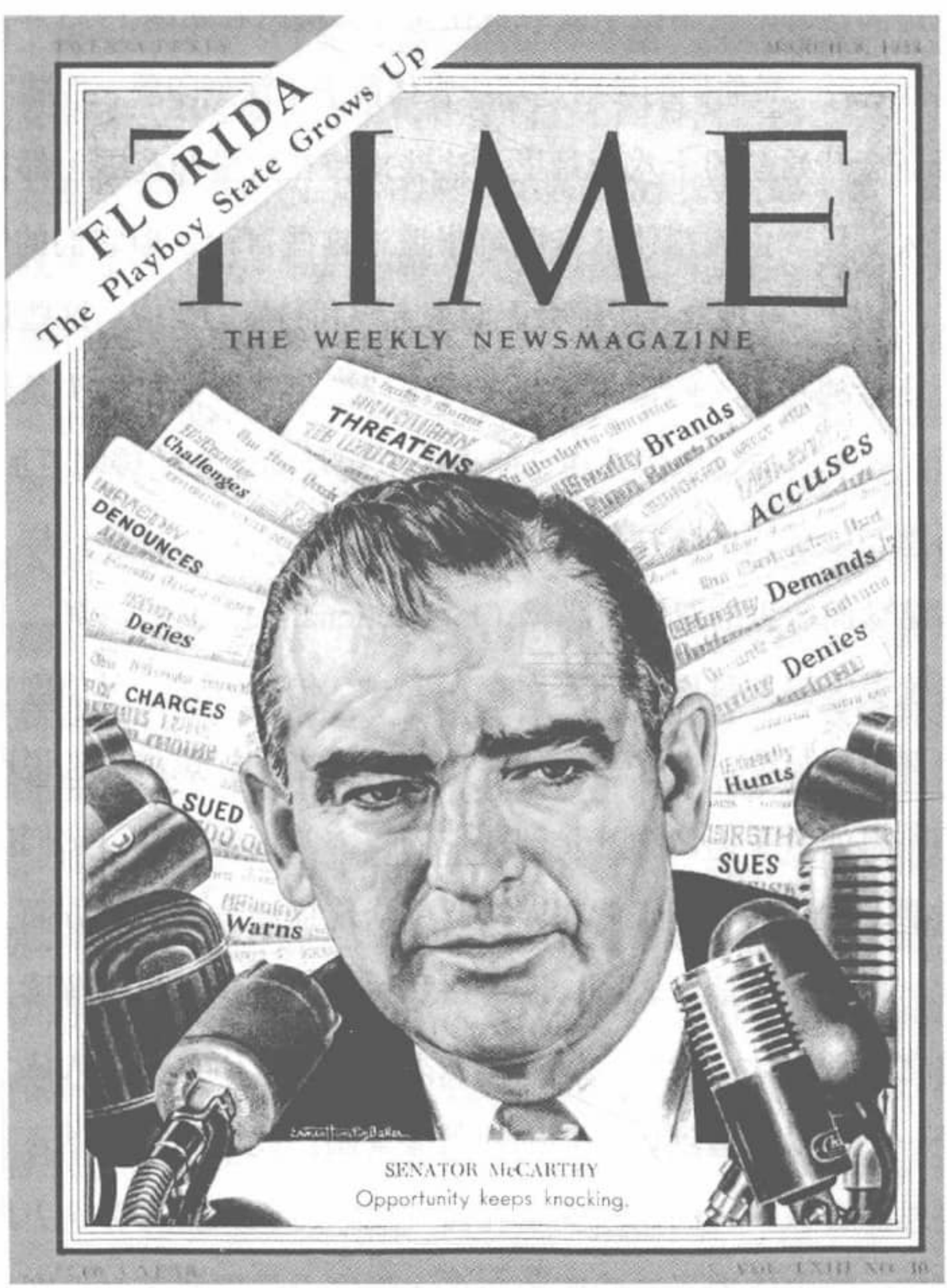


图 9. 1954 年 3 月 8 日《时代》杂志封面上的麦卡锡。

图片来源：欧内斯特·哈姆林·贝克（Ernest Hamlin Baker），时代公司。

***

173 在陆军－麦卡锡的听证会之前，还有第二场闹剧上演，这一幕发生在冷门报纸的专栏、主流政治记者的间接引用、鸡尾酒会上的谈话以及八卦杂志的版面上。自1950年初麦卡锡成为全国焦点的那一刻起，

174 声称他是同性恋的故事似乎就一直在流传。科恩和席因1953年春天的欧洲之行之后，对他们的影射显然给媒体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陆军－麦卡锡听证会开始前的十八个月里，这些指控在数量和范围上都有所增加和扩大。尽管主流媒体从未明确报道过这些言论，但它们的传播范围之广，足以影响观众在听证会上对麦卡锡和科恩的反应。这些谣言将影响听证会的基调，就像关于要求特殊待遇和获取信息的头条新闻争论一样。麦卡锡与科恩的交往，使得麦卡锡是同性恋的传闻更加可信，就像科恩与麦卡锡的交往使科恩是同性恋的传闻更加可信一样。这是一起因结党而产生的双向罪恶感（bidirectional guilt）的案例。

关于麦卡锡和科恩的谣言在存在形式、传播方式、可信度和影响力方面都效果显著。这些谣言的存在说明了当下的焦虑，也说明了麦卡锡和科恩的对手们认为这是削弱他们权力的最好方式。它们的传播方式说明了大众的复调媒体在向广泛受众传播谣言和暗示方面力量日益强大。它们的可信度表明，麦卡锡和科恩的公众角色被解读为“不够男性化”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广大美国人认为同性恋者是一个可以渗透到权力职位的阴谋集团。此外，这些谣言对麦卡锡和科恩能否在新兴的国家安全和监视国家方面保持其影响力地位产生了影响，集中体现了这些实体在多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性别和性的家长式的、恐同的理解而构建的。

有关麦卡锡的谣言的起源几乎无法确定，但似乎是从威斯康星州开始的。1950 年 2 月，麦卡锡的指控使他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政治力量，在此之前似乎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谣言在流传。从某种意义上说，谣言似乎是麦卡锡在全国范围内名声大噪之后才开始传播的，这一事实表明，这些谣言是为了诋毁他。但也有可能，这些谣言一直存在，但直到麦卡锡名声大噪，才值得在报刊上不断重复。

有关麦卡锡性取向的八卦的最大传播者是他的宿敌德鲁·皮尔森。皮尔森收集了关于麦卡锡的各种八卦，包括他酗酒、赌博、财务不当和性生活的故事（比如麦卡锡在恋情公开之前很早就和珍妮·克尔上床了）。但从 1950 年开始，皮尔森建立了一个特别强大的与麦卡锡 175
和同性恋相关的信息库，其中包括自称与麦卡锡有过同性恋经历的人或知情人的口供。在 1950 年 5 月的一次广播中，皮尔森首次报道了这个问题，他指控麦卡锡的一名员工因同性恋行为被捕。[69] 皮尔森此前曾攻击麦卡锡在马尔梅迪大屠杀案审判期间的行为，攻击他接受了卢斯特龙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的资金，攻击他无力（或拒绝）偿还银行贷款，攻击他与集团犯罪有关嫌疑人有联系，攻击他以可疑方式资助竞选活动，还攻击他在威斯康星州担任法官期间允许“闪离”。他甚至派出手下最优秀的两名调查记者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和罗纳德·梅（Ronald May）到威斯康星州去挖掘更多证据。在所有这些指控中，麦卡锡对皮尔森指控自己员工是同性恋最为恼火，他抱怨说，“因为皮尔森没有说出该男生的名字，所以在（麦卡锡）办公室工作的所有男性都遭到了怀疑”。[70] 皮尔森知道麦卡锡对这个故事私下的反应，因为皮尔森团队的研究员弗雷德·布卢门撒尔（Fred

Blumenthal）在麦卡锡不知道他为谁效力的情况下采访过麦卡锡。布卢门撒尔的调查向皮尔森证明，同性恋故事最能激怒他的敌人麦卡锡。1951 年 9 月，同性恋员工的故事最终在《纽约邮报》一个抨击麦卡锡的长达十七部分的系列文章中反复出现。[71]

在皮尔森的档案中，关于麦卡锡本人的同性恋传闻最早出现在 1950 年 5 月，来自爱荷华州沃特卢 W. O. 贝瑞（W. O. Berry）的一封信。在这封表示支持皮尔森的信中，贝瑞附上了一封他寄给“雅各布·R. 麦卡锡先生［原文如此，疑误，应为约瑟夫·R. 麦卡锡］”的匿名信副本，信中指控该参议员为性变态：“对于性变态者——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话题，而且已经公之于众——人们说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好不到哪去。你的低级思维害人反害己。想必［原文如此］你只是用大脑的前部思考，其他部分都没派上用场。我们都讨厌你的粗俗。”[72] 虽然贝瑞并没有直接指责麦卡锡是同性恋，但考虑到政府官员和媒体成员使用“变态”一词是个什么意思，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提到的“变态”就是这样一种影射。贝瑞给麦卡锡写这封信的原因，可能是皮尔森在广播中报道了麦卡锡的一个工作人员是同性恋，因为这封信是在节目播出后不到两周内寄出的。贝瑞的指责虽然含糊不清，但可以看出，早在 1950 年春天，有关麦卡锡“性变态”的谣言就已经传开了。

176 同月，皮尔森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首府时报》（*Capital Times*）编辑、麦卡锡的长期批评者比尔·埃维尤（Bill Evjue）进行了通信。皮尔森似乎在尽可能多地联系麦卡锡的对手，以寻求有力证据。埃维尤促使皮尔森从同性恋的角度出发，说有个熟人听说“麦卡锡收到了很多信，问他为什么还是单身，为什么他对女性没有好

感”。[73] 埃维尤还向皮尔森提供了署名为“一名大学生”的匿名信。他认为，麦卡锡对同性恋话题的痴迷和种种下流笑话意味着“这位参议员本人就是被压抑的同性恋者”。[74]

最有价值的证据来自那些声称目击了麦卡锡和其他男性发生性接触的人。在一份由梅和安德森亲眼见证的手写签名声明中，一个名叫R. 加斯·刘易斯（R. Garth Lewis）的人说，他的朋友威廉·麦克马洪（William McMahon）是密尔沃基县共和党青年会的官员，“他向我描述了他和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一段经历。麦克马洪告诉我，在威斯康星州沃索市举行共和党青年州大会期间，他曾与参议员麦卡锡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共度良宵。麦克马洪还进一步向我表示，他和参议员麦卡锡在酒店房间里发生了性行为。麦克马洪还给我看了他保存下来的酒店收据。我在密尔沃基的白马旅馆遇到过几次那里的同性恋者，我知道他们经常谈论，麦卡锡参议员在其他时候也有过同性恋行为”。[75] 虽然声明没有注明日期，但似乎是在 1951 年秋天发表的。安德森和梅都试图联系麦克马洪来证实这一说法，但显然没有成功。[76]

1951 年 10 月 20 日，安德森向皮尔森总结了他在威斯康星州收集到的丑闻，其中包括一份报告。报告称麦卡锡得知自己当选参议员后，“欣喜若狂地冲进一间酒店房间，亲吻了年轻的共和党主席劳埃德·泰格（Lloyd Tegge）的嘴”。安德森还提供了该事件一名目击者的地址。[77] 安德森对麦卡锡性生活的调查不只是针对同性恋；他还向皮尔森转述了一个谣言，说麦卡锡一直和他的另一个秘书米基·约翰逊（Mickey Johnson）有染。[78]

皮尔森对麦卡锡八卦的兴趣如此出名，以至于华盛顿的盟友们

也开始与他分享信息。1951 年 12 月，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向皮尔森转交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美国军方的
177 一名中尉。这名军官声称麦卡锡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沃德曼酒吧”接上他，“把我带到他家。当我喝得半醉的时候，对我实施了鸡奸……我认识的其他一些军官也和他有过类似经历”。在信件的档案副本中，删掉姓名的作者在结尾处写道：“如果你想让我为你作证，我很乐意这么做。”[79] 当时，类似的故事似乎也在威斯康星州流传；《密尔沃基新闻报》的记者后来报道称，他们还收到了其他男子的证词，声称与麦卡锡发生过性关系，但该报拒绝刊登这些消息。[80]

谣言经司法部长詹姆斯·霍华德·麦格拉思（J. Howard McGrath）传到了约翰·埃德加·胡佛的耳中，麦格拉思在收到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卡尔·海登（Carl Hayden）转交的中尉的信后联系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随后，胡佛联系了麦卡锡，麦卡锡要求联邦调查局调查这封信的来源。麦卡锡似乎认为，这封信可能是在皮尔森或本顿的办公室里写的，建议联邦调查局调查这两个办公室的打字机。[81] 或许着眼于与皮尔森正在进行的官司，麦卡锡想确保联邦调查局的调查“非常谨慎”（用胡佛的话说）。这样，就可以将任何公开泄密都归咎于皮尔森。[82] 胡佛在给联邦调查局副手的一份备忘录中说，“麦卡锡非常希望该调查深入彻底地进行，并且他预计在选举前会有更多这样的谣言”。[83] 随后的调查发现了另一封信，这封信写于 1951 年 11 月，由一名平民署名。信中重复了对麦卡锡的类似指控，尤其是他“在酒吧里闲逛，目的是带男子去他的一处公寓”。[84] 胡佛最终得出结论，这两封信都是伪造的，很可能是因为麦卡锡“攻击了那些本该在政府

效力的人，同性恋者对他非常不满，因而以这种方式进行报复”。[85] 麦卡锡也对皮尔森进行了直接反击。他呼吁支持者们抵制皮尔森的广播赞助商之一——亚当·哈特公司（Adam Hat Company），并对皮尔森提起了一系列民事诉讼。[86] 弗雷德·布卢门撒尔提醒皮尔森，麦卡锡已经派了他的两名调查员去调查皮尔森的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消息让皮尔森担心麦卡锡会曝光皮尔森曾意图性侵一名非裔美国男孩的旧指控。[87] 1951 年 2 月，皮尔森给他的律师寄去了一份陈述书，里面描述了那次遭遇的“真实情况”，为一场从未提起的诽谤诉讼做准备。[88]

尽管证据充足，但皮尔森从未在他的专栏、电台或电视节目中直接指控麦卡锡是同性恋。鉴于安德森和梅很难从那些声称与麦卡锡发 178
生过性关系的男子那里获得宣誓证词，皮尔森可能担心他是否有能力在诽谤诉讼中为自己辩护。相反，他选择将收集到的信息传递给《拉斯维加斯太阳报》（*Las Vegas Sun*）的老板兼编辑汉克·格林斯彭（Hank Greenspun），他会把得到的信息印刷出来。

格林斯彭是一名狂热的反共分子，但也将自己标榜为个人自由的捍卫者。由于这些承诺，他在他的每日社论专栏中批评麦卡锡，称麦卡锡为“威斯康星州的爱哭鬼”。[89] 1952 年，麦卡锡来到拉斯维加斯为乔治·“莫利”·马龙（George “Molly” Malone）游说时，对他进行了报复，称格林斯彭是“前共产主义者”，并指责他的报纸是当地版的《工人日报》。[90] 当时在观众席上的格林斯彭走近舞台，试图大声将麦卡锡轰下台去。麦卡锡面带微笑，出奇地冷静，向人群脱帽致意，然后走下舞台，留下一个空着的麦克风。接下来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

间里，格林斯彭一直站在麦克风前猛烈抨击麦卡锡。[91]

这件事之后，格林斯彭联系了皮尔森和比尔·埃维尤，以获取可以用来对付自己新大敌的信息。皮尔森与之分享了麦卡锡的“同性恋事件”，格林斯彭随即在 1952 年 10 月 25 日的专栏中发表了相关报道。他首先讨论了对麦卡锡的两名工作人员——查尔斯·戴维斯（Charles Davis）和埃德·巴布科克（Ed Babcock）的指控，声称戴维斯因“承认是同性恋”而被海军不光彩地开除，而巴布科克则因教唆同性恋的指控被华盛顿的一支缉捕队逮捕。格林斯彭采取了皮尔森拒绝使用的手段，即提供了两人的姓名。随后，格林斯彭将矛头转向了麦卡锡本人。“乔·麦卡锡是一个 43 岁的单身汉，”格林斯彭写道，“他很少和女孩约会，即使他约会，也会笑着说这是装门面。”格林斯彭直接从皮尔森的档案中找到证据，指控麦卡锡在青年共和党大会上与威廉·麦克马洪有“非法行为”，并报告说，“密尔沃基的同性恋者在白马旅馆见面时常说，参议员乔·麦卡锡经常参与同性恋活动”。最后，格林斯彭指出了一条他的读者听到过的所谓证据：“在内华达州，听过麦卡锡电台讲话的人都认为他的笑声最妖里妖气（queerest）。的确。他确实如此。”[92]

很难知道格林斯彭的说法传播得有多快多广。格林斯彭向皮尔森转发了一份他 10 月 25 日专栏文章的副本，并在附注中指出，该文已
179 成为他最著名的文章。[93] 麦卡锡的传记作家大卫·奥辛斯基（David Oshinsky）说，“到 1953 年，国会山已经在自由讨论这些传闻”，“新闻记者甚至是参议员都拿麦卡锡办公室的男士开玩笑”。[94] 虽然麦卡锡似乎被这些谣言深深困扰，但反诽谤联盟的一名律师建议他，针对

格林斯彭的诽谤诉讼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麦卡锡被迫在宣誓的情况下回答控告方的问题。麦卡锡显然不愿意冒险进一步公开或在法庭审理中留下记录，因此拒绝了在那个时候起诉格林斯彭。不过后来，格林斯彭预言麦卡锡会以暴力收场时，麦卡锡以“煽动暴力”的罪名指控了格林斯彭（该诉讼被驳回）。1953 年 9 月麦卡锡与珍妮·克尔结婚时，有传言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平息关于他性取向的流言。不管谣言的准确性如何，那种谣言似乎确实让麦卡锡更加注意他的性形象了。据报道，在 1954 年去密尔沃基的旅行中，当麦卡锡得知薄荷酒吧是“同性恋聚会”场所后，便冲出了酒吧。[95]

皮尔森确实在他的全国联合专栏中暗示了科恩和席因之间的恋情。[96]在这个专栏中，皮尔森也利用了朋友和调查人员提供给他的信息。1953 年 4 月，纽约市公共关系官员、皮尔森的朋友贾斯特斯·劳伦斯（Justus Lawrence）写信证实了科恩和席因在欧洲像夫妻一样争吵的报道，他声称，“今年冬天在博卡拉顿酒店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这家酒店的老板是席因的父亲迈尔斯·席因，当时两个男孩都去了这家酒店。两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搏斗，身高 1.9 米多的席因打了身材瘦削矮小的科恩”。[97]1953 年 7 月，皮尔森称这对组合为“一个‘杂耍’团队……两个莽撞的年轻人……去年冬天［原文如此］，他们在欧洲各地狂飙，每到一站，都大出风头，登上新闻头条”，强调每个人都是单身。皮尔森形容席因是一个“英俊、高傲、眼神迷离的 25 岁男孩，有时会像宿舍室友一样打科恩”，并将两人戏称为“麦卡锡的两名初级联邦探员”。[98] 同年 9 月，皮尔森报道称，观察人士认为科恩和席因“（在欧洲）行动有点不寻常”，并表示麦卡锡的参议员同僚们“在

国会大厦的衣帽间里妙语连珠，称麦卡锡的办公室将会是年轻精神病医生崭露头角的好地方”。[99]

次年3月，在陆军－麦卡锡听证会前夕，皮尔森讲述了科恩和席因在法兰克福发生的口角，并问道：“为何科恩对（for）席因如此依恋？为何他近乎粗暴地要求把席因调回纽约？答案：两人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已有一段时间了。”[100]通过使用“for”这个词来描述科恩对席因的感情，而不是用语法上更合适的“to”，皮尔森暗示了科恩对席因更依赖的关系。[①]由于皮尔森名声很大，他的暗示更有分量；读者们开始期待皮尔森的专栏里会有个人八卦。

在发表这些暗示之后，皮尔森收到了几封个人来信，这些信件或支持或呼应了他的指控。1954年6月2日，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的读者写信报告说：“我到处都听说麦卡锡、科恩和席因是同性恋。你和艾尔索普兄弟的专栏都提到了这一点。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曝光，彻底摧毁这个可怕的人吗？”[101]一个月后，皮尔森与菲利普·H. 巴格比（Philip H. Bagby）通信，后者是一名前外交官，声称掌握了科恩和席因参与同性恋活动的证据。[102]与此同时，有一名男子给皮尔森写了一封信，该男子的大学室友认识席因一家，信中提供了席因娘娘腔的证据，包括他“怕疼”、逃避服兵役，还有一次“打网球被小女孩打败”。[103]

皮尔森和他的读者并不是唯一对科恩和席因的传闻感兴趣的人。麦卡锡去世二十年后，《华盛顿邮报》记者默里·马德（Murrey

---

① be attached to 为固定搭配，语法上“to”比“for”合适。

Marder）回忆说：“很多记者皱起眉头，心存怀疑等等。不时会有一些模糊的影射出现……不过当时也有一个幌子，那就是席因非常有钱。所以即使在那时，也说不准窃笑者们的疑问到底是由于席因有钱，可以用连锁酒店的钱来买单，还是因为同性恋关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104]1954 年 3 月 15 日，在陆军公开“科恩和麦卡锡为席因提供优待”的记录四天后，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兄弟在专栏中写道：“参议员麦卡锡、委员会顾问罗伊·科恩和他们的红人二等兵大卫·席因的污秽故事，让整个美国和国会都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然而，如果陆军部门把事情的全部经过都讲出来，震惊的程度会大大加深。”艾尔索普兄弟声称，陆军从报告中删除的一篇关键文章中“包含了一些对麦卡锡—科恩—席因关系性质的暗示，暗示科恩对麦卡锡拥有特殊的权力”，并写到“科恩极度渴望为席因服务”（Cohn’s feverish desire to be of service of Schine）。[105]

在白宫，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对麦卡锡及其在政府中无休止地 181
搜寻颠覆分子感到越来越沮丧，他们开始寻找削弱麦卡锡及其盟友的方法。国防部副部长弗雷德·西顿（Fred Seaton）的档案中有一张手写的便条，介绍了白宫工作人员为查找麦卡锡及其员工的不利材料做了哪些努力。这张纸条似乎是西顿在 1954 年初的一次电话交谈中写下的：“夏因［Shine，原文如此］的司机知道科恩—夏因的事 / 可视为愿意出庭作证 / 驾车从迪克斯堡出发——与科恩到费城和纽约 / 在汽车后座上发生同性恋行为。”纸条最后列出了司机珀西·B. 韦斯特（Percy B. West）的电话号码和地址。[106] 西顿的文件似乎没有进一步提到席因的司机，也没有采纳任何证词。但这份报告表明，艾森豪威

尔政府和国防部都有意利用同性恋指控来对抗麦卡锡。这种策略并不是政治专栏作家和八卦记者的专利。

虽然这个话题从未在主流媒体上公开过，但麦卡锡的同性恋传闻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传播。最重要的两个载体是两部格林斯彭作品的再版。1954 年 4 月，《拉斯维加斯太阳报》将格林斯彭关于麦卡锡的专栏作为小册子出版。其中包括格林斯彭 1954 年 2 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文章对麦卡锡的政治活动、手段、性格进行了进一步的攻击。格林斯彭质疑麦卡锡的男子气概，在提到麦卡锡时给“男人”一词加了引号，并写到该参议员“平常的步态……有点不够阳刚”。他还重申了自己对麦卡锡是同性恋的指控，包括声称珍妮·克尔在得知麦卡锡的“弱点”后，曾胁迫他与她结婚。格林斯彭借用施乐兹啤酒的著名营销口号，称麦卡锡是“使密尔沃基出名的酷儿”。[107]

此后不久，格林斯彭的专栏被改编为八卦杂志《锐舞》的一篇文章。《锐舞》通常会把《机密》中的名人八卦和一些健全的海报照片混合在一起。1954 年 6 月，《锐舞》的封面故事承诺让我们看看“简·拉塞尔(Jane Russell)的内心世界”，这位好莱坞性感偶像最近和玛丽莲·梦露一起出演了《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那期杂志于 5 月在各大报摊上架，还刊登了《乔·麦卡锡的秘密生活》（*Secret Lives of Joe McCarthy*），这是一篇长达 15 页的揭露丑闻的文章，以略微重组的叙述方式刊登了格林斯彭从皮尔森那里收集来的资料。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华盛顿耳语的离奇故事”，它让读者可以了解到麦
182 卡锡的性取向。据说，这些信息在首都圈子内众所周知。[108] 就像冷战初期的许多政治八卦一样，它把联邦政府描述为一个充满秘密的堡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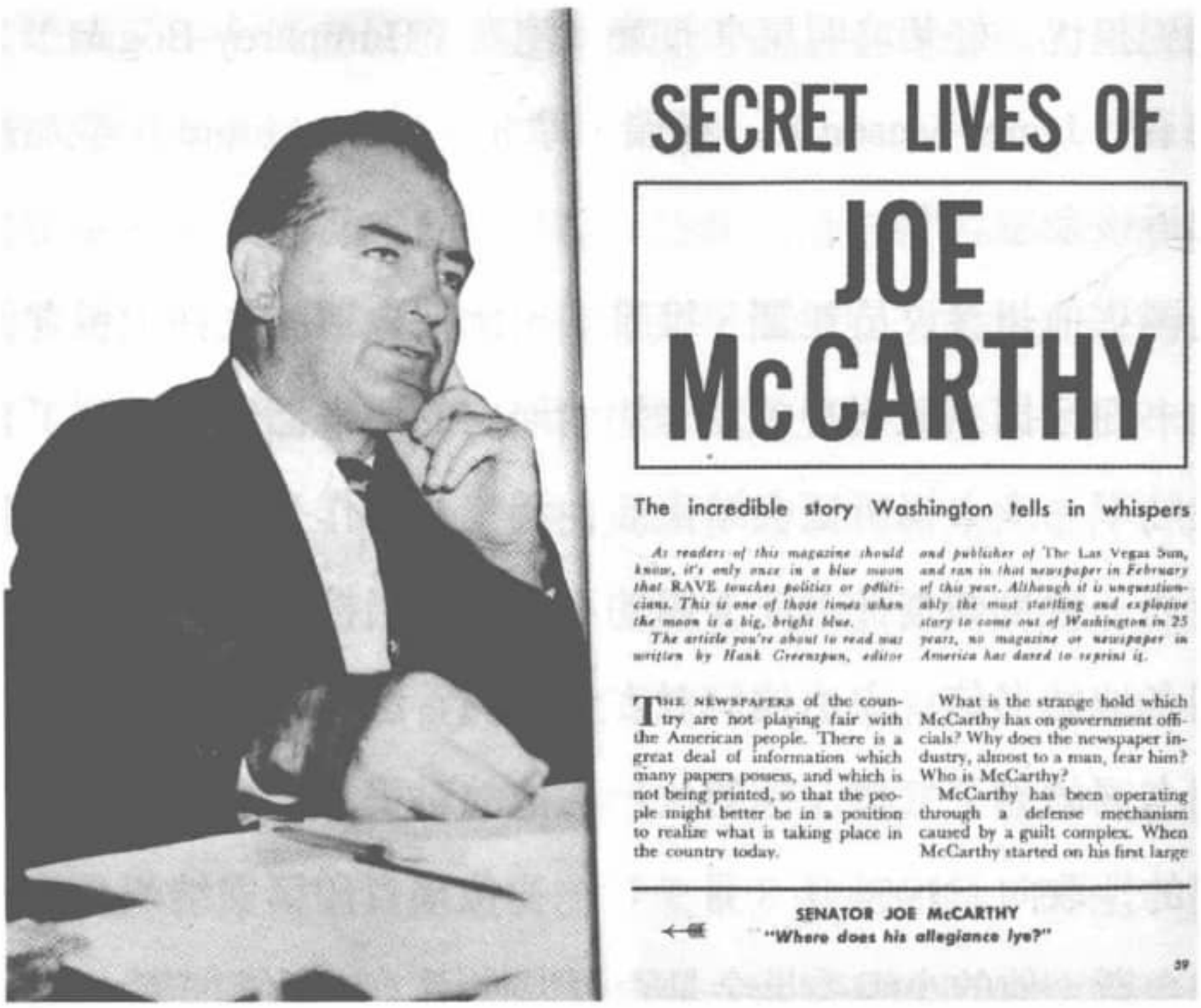

SECRET LIVES OF
JOE
McCARTHY
The incredible story Washington tells in whispers
As readers of this magazine should know, it's only once in a blue moon that RAVE touches politics or politicians. This is one of those times when the moon is a big, bright blue.
The article you're about to read was written by Hank Greenspun, editor and publisher of The Las Vegas Sun, and ran in that newspaper in February of this year. Although it is unquestionably the most startling and explosive story to come out of Washington in 25 years, no magazine or newspaper in America has dared to reprint it.
THE NEWSPAPERS of the country are not playing fair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which many papers possess, and which is not being printed, so that the people might better be in a position to realize what is taking place in the country today.
What is the strange hold which McCarthy has on government officials? Why does the newspaper industry, almost to a man, fear him? Who is McCarthy?
McCarthy has been operating through a defense mechanism caused by a guilt complex. When McCarthy started on his first large
SENATOR JOE McCARTHY
"Where does his allegiance lye?"
39

图 10.《锐舞》1954 年 6 月刊转载了汉克·格林斯彭关于麦卡锡是同性恋的指控。
图片来源：私人收藏。

另一家八卦杂志《名流》在 1954 年 8 月号上刊登了一篇封面故事，标题是“麦卡锡生活中的男人”。《名流》在 6 月中旬“陆军 – 麦卡锡听证会”结束后发表的文章也没有明确提到麦卡锡的性取向，但这篇文章确实很有启发意义。文章开篇说“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男子，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他同床异梦”，把这群人放在了一个隐喻的闺房里。[109]

同样，很难判断有多少人听到过麦卡锡的谣言。《锐舞》在 1953 年 4 月至 1958 年 1 月期间只出版了 23 期，其发行量也无从得知。[110] 也就是说，五年的运行表明该杂志拥有足够大的读者群，在此期间，它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财务问题。其发行量也足以让这些淫秽故事的主

183 人公感到担忧，好莱坞明星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泰瑞·摩尔（Terry Moore）等人曾以诽谤罪起诉该杂志。[111]

美国犹他州参议员亚瑟·维维安·沃特金斯的文件中包含了一些仅有的书面证据，证明有关麦卡锡性取向的谣言已经传播到了普通大众。在陆军－麦卡锡听证会结束后，沃特金斯作为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调查针对麦卡锡的不当行为指控，他收到了数百封来自美国各地的书信，表达他们对麦卡锡的看法。这些书信中，有很多提到麦卡锡的男子气概、他的伙伴和他的对手，也有少数明确提到了麦卡锡的性取向。1954 年 8 月 7 日，一位来自印第安纳州曼西的作家问沃特金斯，他的小组委员会是否可以使用《拉斯维加斯太阳报》和《锐舞》上格林斯彭的文章作为指控麦卡锡的证据。[112] 谈到对谣言的看法时，沃特金斯回答说："除非作者能证实其指控，否则杂志上的文章不能（被委员会）接受作为证据。"[113] 宾夕法尼亚州科尔特的一位信件作者在信中附上了《拉斯维加斯太阳报》的小册子，并威胁说："如果这本书封面上的说法是真的，你们这些人还不解雇那个阴险小人（Jesuit，原意为耶稣会会士）乔·麦卡锡，将其清理出华盛顿的话，只要他还与立法有任何关系，那么所有与这个外国势力控制的代表有关系的人，要么愚蠢如牛，要么和乔·麦卡锡一样狡诈。不要以为人们不了解那些紧闭的房门后发生的事情，如果继续下去，这个国家将会群情激愤。如果参议院想保住这个国家人民的好感和尊重，那么你们这些人就得把乔·麦卡锡扫地出门。"[114] 除了其攻击性的姿态和反天主教的偏见之外，这封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者坚信政府

向公民隐瞒了一个机密议程，这种情绪可能是由更敏锐的保密精神和怀疑精神催生出来的。

到陆军－麦卡锡听证会开始时，公共话语已被一套牢固确立且很少受到质疑的信念所影响，这套信念关乎国家安全与性别认同之间的关系。其中的核心信念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男性身份（以及一种交织在一起的异性恋身份）不仅是保护美国整体福利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专门对抗共产主义者的具体条件。虽然这一概念在美国政治史上有着很深的根基，但它是在第一次红色恐慌时期开始流行，在约翰·埃德加·胡佛领导联邦调查局时逐渐成熟，最近又因麦卡锡和科恩在反共 184
调查中把恐同症作为工具而重新流行起来。与此同时，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有许多美国人已经认识到麦卡锡、科恩和席因的性别和性身份有问题。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三个男人是同性恋，甚至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人知道他们是同性恋的传言，但媒体上似乎已经有足够的证据、猜想和影射表明这三个男人的性别和性身份都是非典型的，即使这种异常尚不明确且定义不清。最后，许多美国人似乎都认为麦卡锡—科恩—席因关系的完整故事尚未曝光。这种怀疑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冷战时期人们对保密和情报的普遍痴迷，但也源于人们认为信息是对抗国际共产主义的关键武器，还因为八卦杂志日益流行，以及政治阴谋开始成为八卦的来源。另外，陆军所掌握的有关麦卡锡和科恩代表席因进行幕后活动的详细资料也证实了上述怀疑是有道理的。这份文件借鉴了推动八卦杂志发展的政治文化时代精神：每条主流新闻都有“更多”内情，存在只有少数知情人士了解的一系列秘密事件。陆军－麦卡锡听证会有望揭开许多谜团。

***

事实证明，听证会对麦卡锡和科恩来说都是一场政治灾难。当代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对他们的大多数分析都集中在陆军律师约瑟夫·韦尔奇对麦卡锡的著名指控“难道您不讲一点体面吗”（have you no decency）之上，认为这是全国对麦卡锡和科恩策略的厌恶情绪的高潮。在这些说法中，麦卡锡倒台是因为他偏离了可接受的政治礼仪；其垮台不是因为政治信仰有何问题，而是因为他缺乏风度（politesse）。但这样的描述流于短视。麦卡锡和科恩垮台是因为他们没能达到他们帮助定义的监视国家男性气质的标准。他们凭借自己的男性气质获得了“国家卫士”的称号，而听证会让前所未有的庞大观众看到了他们在这一面的失败。

听证会是为数百万观众精心准备的一场演出。用媒体历史学家托
185 马斯·多赫蒂（Thomas Doherty）的话来说，“陆军－麦卡锡听证会被证明是一个媒体里程碑，不仅是因为这一事件的内在意义，还因为电视报道本身决定了该事件的意义……让参议员们和观众们都感到新奇和惊讶的是，这场对决既是电视节目，又是政治斗争”。[115] 美国的四大广播公司中，美国广播公司（ABC）和杜蒙特（DuMont）两家提供电视直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每晚都会播报听证会的要点。[116] 正如凯弗维尔听证会促使罗伯特·哈里森将政治八卦作为《机密》的焦点一样，它也促使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总监弗里茨·利特约翰（Fritz Littlejohn）对麦卡锡听证会进行了详细报道。据估计，至少有 4500 万观众观看了听证会的部分直播，1.2 亿人观看了晚间新闻报道或阅读了纸质报道。在波士顿，美国广播公

司子公司的报道获得了迄今为止最高的收视率，当年 5 月初，美国广播公司和杜蒙特的现场报道占到了电视总收视率的 60%。[117]《纽约先驱论坛报》描述了曼哈顿观众是如何全神贯注观看节目的：“曼哈顿中城的酒吧和餐馆里，人们屏息凝神，专注于听证会电视节目，正常的闲聊都停下了……许多人通过收音机和电器商店橱窗里的电视机看到了听证会的部分过程。有三人一起外出吃午饭，他们停了下来，打算看一小会儿节目。20 分钟后，其中一人说：‘走吧，我们走。我饿了。’他的一个同伴让他闭嘴，说：‘不走，你听着，这很重要。即使我不吃午饭，也要一直待到他们中午休息吃饭的时候。’三人留了下来。”[118] 最终，188 小时的现场报道被播出，这一系列听证会成为早期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直播节目。

对许多观众来说，电视带来的不仅仅是广泛的传播。甚至在听证会之前，感兴趣的观察人士就认为，电视将会揭露一个被纸质媒体记者掩盖的麦卡锡的“真相”。在 1952 年写给《华盛顿邮报》编辑的一封信中，一名信件作者反对美联社一篇报道麦卡锡的文章，称：“你和美联社应该很清楚，电视将强加给你一个标准，而你以前从未有义务达到这个标准。你们的很多读者都知道，参议员麦卡锡并没有给‘一群欢呼雀跃的群众发表一通吵吵嚷嚷的演讲’。诚然，我们带有偏见，但我们就在现场。”[119] 这封信表达了电视发展初期的一个普遍假设，即媒体的即时性带来了两个启示。首先，它将为观众提供一种对事件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不受报纸记者和电台评论员偏见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电视保证了他们可免于记者的操纵。其次，人们相信电视会 186
揭露那些出镜者的真相。电视，尤其是现场直播，投射出了某种氛围，

为观众提供了一种与国家大事互动的新方式。此外，许多观众表达了对媒体的信任，无论他们对麦卡锡本人的看法如何；一些人认为，电视直播会暴露出他是一个恃强凌弱的煽动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电视直播会揭露出全国媒体对麦卡锡的不公平对待。

当宣布 1954 年末有关参议院是否应该谴责麦卡锡的那几场听证会将不在电视播出时，这些情绪再次浮现。谴责委员会主席亚瑟·沃特金斯的办公室收到了大量抗议这一决定的公民来信，许多信件作者认为，电视报道很有必要，因为印刷新闻本身就带着偏见，无法提供“真实”或“准确”的报道。[120] 新泽西州贝维尔的 E. S. 赫什夫人（Mrs. E. S. Hersh）写信表达了她的沮丧：

> 除了看电视，我们还能怎么分辨？看报纸我们是分辨不出来的。另一场听证会（陆军－麦卡锡听证会）就是证据。我们每天都听都看其他的听证会，然后在晚上读报纸上的报道。其中有两份费城的报纸，一份是纽约的，日报和纸媒从来不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都反对乔·麦卡锡，这些报纸的记者要么写他们希望已经发生的事情，要么就是他们对已发生事情的阐释。这些都不是真的。我再也不会相信我在报纸上读到的任何东西了……请对听证会进行电视直播。[121]

其他信件作者则以担心审查制度（经常被称为“共产主义”或“纳粹”的战术）、公众的知情权、“揭露真相”的欲望等理由反对该禁令。那些相信电视“揭露真相”的力量的人在麦卡锡问题上再次分成了两

派，一些人认为“真相”会揭露反麦卡锡一派的共产主义阴谋，而另一些人则相信“看到麦卡锡所作所为的人越多”，就越能看清他的“邪恶”本性。[122] 在谈到即将到来的谴责听证会时，持保守主义倾向的《纽约每日新闻》的一篇社论认为，该报“正饶有兴趣地等待着，看看许多反麦卡锡的报纸是否会对这次调查的报道有所偏向和抹黑。他们对麦卡锡－科恩－席因－史蒂文斯听证会进行了相当恶毒的诽谤，直到 187
他们意识到电视观众正在核查他们的不诚实行为……当然，《纽约每日新闻》没有偏颇报道”。[123]

陆军－麦卡锡听证会占领了包括电视、报纸和广播在内的新闻界。《纽约时报》每天早上都在头版刊登文章，并附有听证会亮点内容转写。在主要的大都市，广播听众可以听到大部分现场直播，尤其是下午的会议。[124] 听证会上挤满了摄影记者，以至于蒙特主席被迫在证人发言之前宣布“闪光灯环节”结束。[125]

媒体的持续关注向与会者表明，他们是在拥挤的核心会议室表演给场外的观众看。由于安装了大型摄像机和强烈弧光灯，与会者应该特别在意自己在电视上的表现。毫无疑问，每一位与会者都尽力采取一种让观众喜欢的姿态，展示自己的领导气质。衡量这些表现的标准聚焦在男性气质问题上。如果说麦卡锡和科恩已经习惯了表现出监视国家的男性气质，那么在听证会上，这种表现变得更加真实。和房间里的其他男士一样，他们试图展示冷战时期美国所认为的男性气质标志：自信、大胆、咄咄逼人、异性恋、富有力量、胸有成竹、聪颖、坚忍和机智。

听证会上弥漫着一种男性对决的气氛。每位主要与会者都是男性，

所有证人也都是男性。在这个口头交流占主导的空间里，许多与会者试图通过提高嗓门，用“程序质询”（points of order）和其他一些议事规则来喝止对方，从而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做法与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相吻合，他们发现男性会试图利用自己声音的音量和音色来控制谈话，保持自己的主动权。[126] 与会者相互讽刺的习惯甚至可以被看作现代版的“对诗互骂”（flyting），这是“北欧的一种传统，双方互相辱骂或自我吹嘘，这种方式粗俗而污秽，但同时也有技巧和创意”。[127] 虽然蒙特名义上是会议主席，但他对会议进程的控制是脆弱的，主要参与者争先恐后地填补由此产生的真空。

麦卡锡和科恩都努力继续他们的男子气概表演。科恩试图表现出他的聪颖、机智和决心，在适当的时候大笑，同时极力口述证词的要
188 旨。一如既往，科恩经常试图通过秘密渠道让别人感受到他的权力。他私下告诉罗伯特·肯尼迪，他计划“报复［民主党委员会成员，麦卡锡的反对者亨利·M.］杰克逊（Henry M. Jackson）”。[128] 他还对肯尼迪进行人身威胁，当时的一些报道指出，在 5 月初某天作证之后，两人在党团会议室外发生了肢体冲突。[129]

麦卡锡本人在听证会上的表现也有些荒谬。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好斗，像一个老拳击手试图通过蛮力来实现他的意志。他经常对他的对手大喊大叫，冷嘲热讽，就像这次与约瑟夫·韦尔奇的交锋一样。韦尔奇是波士顿的一名律师，受雇来代表陆军出席听证会：

韦尔奇先生：当您宣誓要说出全部真相时，您有没有一些私人的保留意见，让您对您将要作证的事情做出判断？

参议员麦卡锡：答案是毫无保留，只说真话。

韦尔奇先生：谢谢您，先生。那就告诉我们是谁把文件交给您的！

参议员麦卡锡：答案是否定的。你不会得到这一信息。

韦尔奇先生：那么，您希望我们对您的誓言做出自己的解释，而不告诉我们全部的真相吗？

参议员麦卡锡：……你可以继续努力，直到世界末日。那些靠我来保护的线人的名字，你一个也得不到。[130]

这种口头上的较量并不罕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语气上。麦卡锡试图将自己定位为“真相”的终极捍卫者，呼应他早些时候的呼吁，之前他曾号召掌握颠覆分子信息的公民规避无情的政府，直接向他提交证据。他还使用了直截了当的绝对主义语言（例如“直到世界末日”）来表明他对事业的信心和忠诚。麦卡锡不是在强化自己的男性气质，就是在忙着质疑对手的男子气概。在一轮交锋中，麦卡锡反复向史蒂文斯建议，如果他累了，他可以要求休庭；由于不想示弱，史蒂文斯拒绝了。[131]

麦卡锡还继续用同性恋问题来诱导他的对手。听证会第一天的主要内容是迈尔斯·雷伯少将的证词，他指控科恩向他施压，让他任命席因为陆军军官。雷伯少将是国务院官员塞缪尔·雷伯的哥哥，科恩 189
和麦卡锡在得知塞缪尔·雷伯承认几十年前曾参与同性恋活动后，曾迫使他辞职。为了反驳雷伯少将的指控，麦卡锡问雷伯少将：“你是否知道，由于委员会的调查，你的兄弟曾被指控存在严重安全风险而

被允许辞职？”[132] 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安全风险”一词的含义，因为小组委员会法律顾问雷·詹金斯（Ray Jenkins）当天早些时候在提到蒙茅斯堡的同性恋调查时使用了这个词。[133] 雷伯少将纠正了麦卡锡的说法，声称他的弟弟是“退休”而不是“辞职”，并声称他以前没有听说过他的弟弟受到过麦卡锡小组委员会的调查。麦卡锡接着谈到了另一个问题，他显然对自己将塞缪尔·雷伯描述为“安全风险”的说法被记录在案感到满意。

同时，麦卡锡也试图以男性身份与他的陆军对手建立联系。有时麦卡锡似乎会故意冲他的对手微笑，好像所有人都在参与某个盛大的玩笑。听证会进入出了名的类似于更衣室的那种互相吹捧的氛围时，他的脸上经常会闪现这样的微笑。听证会第二天，陆军部长罗伯特·T. 史蒂文斯作证说，麦卡锡曾要求“大卫·席因休假几周……也许是为了照顾大卫的闺蜜们”。[134] 这个措辞让在场的人哄堂大笑，其中包括麦卡锡，还有反应慢了一拍的科恩。另外，当陆军法律顾问约翰·G. 亚当斯作证说，在南方某州的一个基地里存在着“将军同性恋团伙”的传闻时，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John McClellan）和法律顾问雷·詹金斯打断了亚当斯的证词，并让亚当斯确认，南方的这个州不是他们的家乡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这段插曲引发了观众的一阵笑声，然后参议员蒙特要求亚当斯确认该基地也不在南达科他州，并开玩笑说，有人可能错误地将其定位在“南方”。接着又是一阵哄堂大笑，麦卡锡和科恩也笑了。[135]

男性气质不仅是听证会上的男性所关心的问题，对那些从电视上观看听证会的人来说也至关重要。1954 年末发给亚瑟·沃特金斯的

信件就是例证。信件作者经常提到麦卡锡的男性气质，不管是为他辩护还是对他进行抨击。一位来自新墨西哥州的信件作者指出，美国人“有权听到和看到麦卡锡作为一名参议员，尤其是作为一名男人为这种行为辩护”。[136] 另一封支持麦卡锡的信将这个关键词的首字母大写：“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麦卡锡是美国的真男人。要是我们有更多像他那样的人就好了。任何像他那样给共产党制造麻烦的人，都会被共党分子惧怕。所以我们必须把他留在参议院，让他能发挥最大作用。”[137] 还有人形容麦卡锡是“当今参议院中最伟大的男人”和“所有人中最伟大的爱国者”，他“作为一名男性闪耀着光芒，是当今华盛顿最伟大的男人”。[138]

休斯敦的一名律师为麦卡锡的傲慢行为辩护道：“我在得克萨斯州西南部的响尾蛇群中长大，我不知道如何用温和、纵容、和平、安静、害羞、亲切和同情的态度来成功应对它们的致命攻击。我认为，任何谴责参议员麦卡锡对待共产主义同情者方式的人都犯有‘过失杀人罪’，这适用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139] 另一位得克萨斯人附和道：“打击颠覆活动需要一位粗暴而坚韧的战士。用粉扑你是打不过的。”[140] 持类似观点的信件作者认为，虽然麦卡锡可能粗鲁、没文化，还言语粗俗，但至少他是站在“正义”的一方。此外，他需要足够强硬才能对抗得了那些无耻的共产主义对手。

堪萨斯州威奇托市的一位信件作者的评论表明，麦卡锡的蓝领男性形象影响了他的政治声誉：“麦卡锡很坚强，是个斗士。他通过艰苦努力达到今天的地位，令人钦佩。他了解自己正在为之奋斗的美国，在这里，只要你有雄心和能力，并且足够努力，想走多远就可以走多

远。在麦卡锡遭受的共产主义阴谋和共产主义洗脑者所进行的集中攻击面前，你不能软弱无力，否则就无法坚持下来。”[141] 一位来自新泽西州南奥兰治的信件作者将麦卡锡比作那个时代的三个阳刚典范：海军陆战队、美国将军兼总统、美国最好的拳击手，并写道：“我认为，那个脾气暴躁、具有猎杀共产党人天赋的麦卡锡应该受到鼓励。他确实搞砸过几次，那又怎样，海军陆战队也搞砸过，我们伟大的总统也搞砸过，杰克·登普西也搞砸过。但麦卡锡从未停止努力，不是吗？我还认为陆军部长是我们有史以来最软弱的人，却领导着世界上最勇敢的军队。”[142] 一位来自纽约州北部的信件作者表达了他的观点，认为男子气概对成功治理美国至关重要。他问沃特金斯：“参议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站出来，像男人一样行事？”[143]

191 公民给沃特金斯写信批评麦卡锡时也经常使用性别化语言。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市的信件作者谴责麦卡锡说：“他应该被审查。参议院的男子气概出了什么问题？参议院里有一群娘娘腔吗？他们惧怕麦卡锡吗？难道他们没有勇气和个性站出来对抗他吗？”[144] 一位信件作者将麦卡锡和他的员工描述为“一群‘所谓的男人’，卑鄙无耻，难以形容”[145]。另一封信提到了麦卡锡最近遭遇的一场车祸：“说到勇敢，懦弱的参议员麦卡锡会因为胳膊肘划伤而住院！！！”[146] 同样，反对麦卡锡的信件作者们用性别化的语言把麦卡锡的对手正面描述为“真正的男人”“热血勇敢的美国人”，并祝贺他们“以男子气概捍卫了美国”。[147] 一位信件作者直接称赞了沃特金斯：“我很高兴，我们至少有一个参议员不是懦夫，而且有反对麦卡锡主义的男子汉原则。”[148]

对麦卡锡和科恩男性气质最严厉的指控来自听证会的电视直播和晚间重播。两人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电视上的形象与报纸上的正面报道不符。虽然两人此前都曾出现在《会见新闻界》等电视新闻节目中，但听证会是广大观众第一次有机会长时间地看到他们，并且是以一种不那么照本宣科的形式。同样有问题的是，作为“被告”，麦卡锡和科恩在听证会上一直处于防守状态，通过向听众暗示辩护是必要的，对他们的指控得到了合法化。

科恩在出庭前基本保持沉默，但其肢体语言暴露了他的不安。镜头转向他时，他通常都是低着头，很少微笑。科恩在电视上的形象是一个矮胖的年轻人，面容浮肿，嘴唇肿胀，耳朵很大。深陷的眼窝和浓重的眉头在他脸上留下的阴影，因他伏坐的姿势而变得更暗。他的眼睛不停地在房间里搜寻，好像在寻找一条逃跑路线。这与报纸上刊登的科恩与席因在城里四人约会的照片大相径庭。有好几次，特别是当麦卡锡犯了特别明显的判断错误时，电视镜头捕捉到科恩处于无声的折磨中，似乎在寻找一个方便的藏身之处。

科恩一开口说话，就给人一种傲慢自大、自命不凡的印象。在一系列自我膨胀的时刻，科恩以第三人称自述，宣称“罗伊·科恩在这里代表罗伊·科恩发言，陈述事实”。[149] 他浓重的纽约口音使发言听起来更加混乱，这损害了他的公众形象，让他听上去更像是一名装卸工，而不是权力大厅里的主要角色。

192

科恩不断做出否认，使用令人困惑的法律术语，这根本无法与陆军律师约瑟夫·韦尔奇那种见多识广的上镜妙语相提并论。韦尔奇是一位慈父般的人物，每次说俏皮话时，似乎都会对着镜头眨眨眼，无

论他的话是多么尖锐。各大报纸纷纷在专栏中介绍韦尔奇的智慧，并强调说，韦尔奇善于使用大众语言，从而与大众建立了联系。[150] 令人遗憾的是，科恩无法参与这样的玩笑，这使他不同于韦尔奇，而这种差距明显伤害了科恩的自尊心，也损害了他作为法律专家和熟练诉讼律师的地位。

虽然麦卡锡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如科恩迷人，但在调查能力和领导能力方面，这位威斯康星州人仍有一定的声誉。但在电视上，他也未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冷酷的犯罪小说和好莱坞黑色电影中出现的侦探没有胡佛的调查局特工那么干净利落，但观众们还是期待侦探英雄能表现出一定的温文尔雅。此外，他们还期望那些被委以领导国家重任的人具有一定程度的修养。

但与此相反，麦卡锡显得邋里邋遢。他的发型遮不住他后退的发际线和秃顶，他不合身的衣服总是显得皱巴巴的。用科恩的话说，“他那容易爆发的脾气，他那咄咄逼人的语调，他那不苟言笑的面容，以及他那一成不变的胡茬，让他［麦卡锡］看起来确实是个典型的反派。演员表中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角色了”。[151] 麦卡锡似乎犹豫不决，在他的问题和陈述中加入了无数的“嗯”和“啊”。更糟糕的是，麦卡锡似乎错误地认为他的发言和韦尔奇一样机智和迷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在5月30日这样批评麦卡锡：

> 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缺乏教养。每次会议都有人被他的毒舌中伤。作证本可以顺利进行一个小时，但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一进来，通常就会带来一场争吵。没有人能逃过他的

矛头——美国总统、陆军部长，甚至小组委员会成员或其顾问都无法逃脱。他当着1000万人或更多人的面勒令参议员塞明顿（Symington）："哦，安静！"他傲慢地将63岁的韦尔奇称为"这个年轻人"。他怂恿政府职员违抗总统和司法部长的命令。他诋 193
毁约瑟夫·艾尔索普的尊贵姓氏，并将反对他的报纸称为《工人日报》……曾经，他几乎指控所有对手说谎，而这通常是出于不良动机。他把自己描绘成立法者、调查员、警察、法学家和法官，讨论反共主义，好像是他发明了这个词一样。[152]

麦卡锡的批评者越来越多，对他们而言，电视报道显示，麦卡锡并非像他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斗志昂扬的自由捍卫者，而是一个恶霸，正如韦尔奇的名言所说，"不讲体面"。

更重要的是，麦卡锡和科恩的对手们故意暗示他们是同性恋，从而攻击他们的男性气质。这种奇怪的行为开始于听证会的第一天，当时史蒂文斯认为麦卡锡和科恩为席因所做的努力是"对权力的滥用"。[153]考虑到"滥用"（perverted）一词的隐含义[①]，史蒂文斯（或他的演讲稿撰写人）选择它很可能是因为它含沙射影的价值。这句话在第二天登上头条新闻，出现在《纽约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的头版。事实上，《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的标题是"麦卡锡和助手们滥用权力使大卫·席因获得晋升，史蒂文斯在陆军调查中作证"，并放上了科恩和麦卡锡

① "pervert"一词另有"性变态"之义。

的照片。照片中两人面对面，倾身向前，仿佛在接吻。这种排版意味着，读者第一眼可能只会看到“变态的麦卡锡和他的助手”。[154]

麦卡锡和科恩也因为与大卫·席因的关系而被质疑性取向，席因的性取向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听证会进行不到一周，雷·詹金斯就询问了史蒂文斯部长，问他是否知道席因在军队期间受到了优待，包括不用在基地厨房干活、在基地不穿制服、坐在卡车驾驶室里，而他的战友则待在车厢里。有一次，詹金斯问史蒂文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叫大卫·席因的士兵雇用他的战友，付钱让他们为他擦枪？”[155]对于席因让他的（男性）同伴为他“擦枪”的暗示，观众和与会者在这个通常严肃的仪式上哄堂大笑。包括麦卡锡在内的许多参议员都乐得捧腹，而科恩却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无论这种双关语是否是有意为之，绝大多数在场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围绕席因和科恩的谣言。

两天后，约瑟夫·韦尔奇讯问了麦卡锡的助手吉姆·朱利安纳。
194 科恩和麦卡锡之前曾把一张席因和史蒂文斯相视而笑的照片当作证据，他们试图表明，如果史蒂文斯像陆军描述的那样受到压力，这样的善意是不可能存在的。经过一些调查，陆军法律团队发现，这张照片是一张大照片的裁剪版，该照片实际上是史蒂文斯在对第三个人——肯尼斯·布拉德利上校微笑。麦卡锡的工作人员朱利安纳将照片放大用于听证会，他被传唤到证人席上，以确认是谁指使他裁剪这张照片的。和当时在场的所有人一样，韦尔奇知道这些改动的幕后主使是科恩，他只是很难让朱利安纳宣誓承认。[156]

这一刻导致了著名的“精灵—仙子”对话。朱利安纳一再声称不



图 11. 约瑟夫·麦卡锡在 1954 年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罗伊·科恩和杰拉德·大卫·席因分列两侧。图片来源：伊芙·阿诺德（Eve Arnold），玛格南图片社。

知道这张照片的确切来源，而韦尔奇问他是否认为这张照片“来自一个小精灵”。[157] 韦尔奇的这番话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一时的沮丧，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确实符合他在听证会上冷嘲热讽的风格。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的笑声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针对科恩的。对科恩来说，当乔·麦卡锡愚蠢地暗示陆军的律师是这方面的老手时，这一刻变得更糟。韦尔奇看到了机会，他的讽刺更加尖锐，他回答说“小精灵是小仙子的近亲”，并问他的定义是否启发了麦卡锡。[158]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美国英语中，“仙子”和“精灵”一直是“同性恋”的代名词。“仙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晚近时在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畅销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中，作为士兵使用的俚语出现。[159] 从《百老汇简

195

讯》到《机密》，各种八卦小报都出现过“仙子”一词，如果用得低俗，就会被《好莱坞生产守则》根据“亵渎”一节明令禁止。[160] 记者弗兰克·马伦在 1954 年的《男女无别》（*Sauce for The Gander*）[①] 中，用“fairy”来指代男同性恋者。《男女无别》是他在《纽约图文晚报》工作的回忆录。“精灵”则出现得更晚，犯罪小说家詹姆斯·M. 凯恩（James M. Cain）1937 年的小说《小夜曲》（*Serenade*）是最早使用该词的印刷作品之一。[161] 因此，韦尔奇指的是一种共同的文化方言，许多观看听证会的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都理解这种文化方言。他还暗示，除了参与同性恋活动，科恩还有一种特别女性化的性格。即使一些电视观众没有立马领会其中的含义，但由此产生的酒会闲谈——“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嘲笑那段对话？”——也会助长科恩的同性恋话题，可能还会助长围绕麦卡锡的谣言。

虽然在听证会上也有其他隐语提及科恩和席因被指控为同性恋，但“精灵—仙子”对话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这是听证会最明确地提及科恩、麦卡锡或席因是同性恋的传言。此外，这种对话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多年来通过暗号或地下渠道传播的流言。最后，它向全国观众直播了谣言。由于发行的限制，格林斯彭的专栏、再版的小册子、《锐舞》的文章，甚至对麦卡锡和科恩谣传的男同行为更主流、更微妙的提及，都没有培养出足够关键的群体来深刻影响全国性的对话。而听证会的电视转播被数百万人即时看到，因此比之前的任何谣言都更有可能影响公众对麦卡锡和科恩的讨论。

196

---

① 出自谚语“What's sauce for the goose（母鹅）is sauce for the gander（公鹅）”，意为适用于此者也应适用于彼，应该一视同仁而非区别对待。

这种影射还在继续。就在“精灵—仙子”对话发生一个月后，科恩再次成为暗讽的对象，这一次，他站在了证人席上：

詹金斯先生：科恩先生，平心而论，［席因］是您最好的朋友之一，这不是事实吗？我们都有最好的朋友。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批评您。

科恩先生：是的，当然没有，先生。

詹金斯先生：我们有我们爱的朋友。我也是。在过去的两年里，您和大卫·席因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不是吗？

科恩先生：是的，先生。他是我引以为豪的众多好朋友之一。

詹金斯先生：您是在社交场合认识他的吗？

科恩先生：是的。

詹金斯先生：去过他家吗？

科恩先生：去过，先生。

詹金斯先生：他来过您家吗？

科恩先生：来过，先生。

詹金斯先生：也许你们两个各自带女友一起约过会。这说明不了什么。据我们了解，你们俩都是单身男子。

科恩先生：我们是四人约会，先生……[162]

这些信号很微妙，但对于知道科恩和席因谣言的人来说，詹金斯加入“爱”这个词的原因很明显，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两个男人置于对方家中，并提到了两人的婚姻状况。还有一次，詹金斯询问陆军顾问

约翰·G. 亚当斯时，他问亚当斯是否试图“委婉地告诉”科恩，席因可能会被派往海外，这再次引起了听众的大笑，因为这句话暗示科恩—席因的关系十分密切，亚当斯告诉他这个坏消息时需要一定程度的温柔。[163] 詹金斯的暗示性言论尤其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与他询问证人时通常缺乏自信的做法截然不同。在这一点上，就连胆小的詹金斯在听证会上也采用了咄咄逼人的口吻。

197 但这种暗讽并非只是律师们的专长。参议员麦克莱伦在对科恩进行讯问的一开始就暗示科恩和席因之间可能存在性关系：

参议员麦克莱伦：首先，我想问问您是否对席因先生有什么特殊兴趣？

科恩先生：我不明白您说的“特殊兴趣”是什么意思。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参议员麦克莱伦：我指的是友谊或其他能让您和他绑得比和普通朋友更紧密的东西。

科恩先生：没有。他是我引以为豪的众多好朋友之一。我很幸运，我有很多好朋友。[164]

这位来自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以这种方式开始提问，不仅提醒了观众科恩性取向可疑，他还暗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可以导致患者的行为不合逻辑，受欲望束缚，以至于他们会超越一般行为准则的限制（就像科恩与军队打交道时那样），更不用说其他责任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麦克莱伦使用了“绑”（bind）一词，因为它暗示了施

虐与受虐，这在当时显然与同性恋男子的性行为联系在一起。[165] 在麦卡锡—科恩—席因的关系中，谁在控制谁？

麦克莱伦质疑科恩的时机尤其值得注意。当天早些时候，在委员会的一次执行会议上，人们就听证会实际会持续多久以及应该持续多久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麦卡锡或陆军的法律团队是否计划传唤更多证人，其间一度发生了这种看似无伤大雅的交流：

参议员塞明顿：谁是你不打算公开传唤的证人？我们之间没有秘密，是吗？

韦尔奇先生：没有。您是在说我们昨天要求的证人吗？

参议员蒙特：是的。

韦尔奇先生：是二等兵席因之前的一名司机。

韦尔奇显然指的是珀西·B. 韦斯特，此人声称看到科恩和席因在豪华轿车里“发生过同性恋行为”。目前还不清楚，麦卡锡的强烈反对者塞明顿是否知道韦尔奇的拟议证人可以这样作证。但塞明顿对自己“有秘密”的调侃点头应允，同时他促使韦尔奇尽量重新考虑传唤韦斯特，这表明塞明顿知道司机的证词会对科恩和麦卡锡不利。尽管 198
韦尔奇最终没有传唤韦斯特，但他提出了这样做的可能性，这无疑是对乔·麦卡锡的一个警告。[166]

不出所料，一些重要报纸专栏作家的文章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暗示。虽然温切尔和索科尔斯基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但在听证会期间，对麦卡锡和科恩的大多数社论新闻报道都是批评性的。韦尔奇控诉其“不

讲体面”的言论爆发后的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的一篇社论指出，主流观点认为“参议员麦卡锡被证明以不当和专横的方式使用了参议院授予他的调查权；科恩先生已经被证明是为了他的朋友二等兵席因而荒唐地纠缠不休”。[167] 温切尔担心自己两个朋友的形象会受到影响，于是一天下午他威胁《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默里·马德，警告他：“我们会逮到你的。”[168]

这些威胁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随着听证会的进行，媒体对麦卡锡和科恩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消极。在为麦卡锡工作之前，科恩的公众形象一直是个聪明而坚定的反共战士，一个年轻的城市单身汉，他最大的缺点可能是野心太大。关于他的战术和男子气概的质疑是在他和席因一起访问欧洲期间开始出现的。3月份陆军公布他的行动记录后，这种质疑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媒体逐渐把科恩描述成一个不负责任的粗俗蠢货，他对自己的兴趣超过了一切。这种说法在听证会上达到了高潮。爱德华·罗斯科·默罗（Edward R. Murrow）的《现在请看》（*See It Now*）节目强调了科恩的粗鲁和傲慢，以及他性格中的负面因素如何掩盖了他的智慧和奉献精神。其中特别臭名昭著的是1954年3月9日播出的《关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报告》。同样，默罗批评麦卡锡是一个不道德的恶霸。[169]

大概在同一时期，德鲁·皮尔森开始大胆质疑麦卡锡、科恩和席因的男性气质和性取向。在很多专栏中，皮尔森都强调了科恩极力逃避服兵役，这是这位年轻律师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隐瞒的个人经历细节。[170] 5月4日，皮尔森重提席因在陆军服役期间“雇用了一名列兵给他擦枪”的事实，还提到了“在迪克斯堡给席因擦枪的那

个人”，这一影射让这个军事基地的名字（Fort Dix）成为双关语。[171] 6月5日，皮尔森写道，在科恩和席因巡访欧洲期间，“麦卡锡的这两位侦探似乎异乎寻常地专注于调查所谓的同性恋者”；他还转载了 199
一则轶事，描述了“两人在酒店登记不同房间时的情景，两人大声说他们不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皮尔森进一步指出，科恩和席因在巴黎借了600美元买香水，这是一件让两人在购物和理财方面都显得女性化的轶事。[172]

除了影响公众舆论，负面的媒体报道可能还影响了约翰·埃德加·胡佛，让他与麦卡锡和科恩的关系降温。虽然胡佛最初支持两人，但在两人说服联邦调查局特工弗兰克·卡尔（Frank Carr）加入麦卡锡的调查团队后，胡佛的耐心开始减弱。胡佛特别担心如果他们继续从联邦调查局挖走特工，麦卡锡和科恩会获得过多的联邦调查局专有信息，包括机密线人的名字。[173] 胡佛给听证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对他的评价一直充满虔敬，各界人士都称赞他是美国最杰出的反共人士。在后来评论听证会的信件中，一些公民指出，他们依赖胡佛的意见来塑造自己的观点。“约翰·埃德加·胡佛认为麦卡锡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一位公民写道，“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174] 但其他人已经开始把麦卡锡和胡佛视为不可避免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如果麦卡锡的调查开始侵占调查局的地盘的话。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威胁，其中一位写道：“但我们不要采取麦卡锡式的歇斯底里和组织不善的方法。相反，我们可以利用约翰·埃德加·胡佛和我们优秀的联邦调查局的专家服务。”[175]

1954年春天的某个时候，胡佛决定从与麦卡锡和科恩的交往中抽身。作为一个对公众舆论了如指掌的人，胡佛显然很快就意识到听证

会对他的盟友们来说是一场灾难。胡佛对麦卡锡的拒绝微妙而明确。听证会开始两周后，麦卡锡拿出了一份副本，他声称这是胡佛写给陆军的一封信，警告他们蒙茅斯堡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问题。史蒂文斯部长拒绝在没有胡佛明确允许的情况下阅读这封信，并指出这封信被标记为“私人和机密”。[176] 这是一个关键证据，可以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即陆军忽视了关于蒙茅斯堡安全风险的警告；胡佛只需要证明其真实性。但胡佛向委员会报告说，他从来没有寄过这样的信，而受到斥责的麦卡锡被迫承认，他所掌握的只是一份“备忘录摘要”。[177] 尽管麦卡锡相信他能够在不损害自己声誉的情况下摆脱争议，
200 但胡佛在朋友需要帮助时拒绝给予帮助，这一事实没变。[178] 胡佛的行动不仅标志着两人政治联盟的结束；而且标志着反共主义中右翼排斥麦卡锡的关键时刻。麦卡锡和科恩依靠他们的男性形象来确保自己在国家安全中的影响力，他们遵循了胡佛认可的剧本。但在听证会期间，两人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来的酷儿气质和女性化达到了顶峰，这意味着他们在一位历史学家所称的国家安全领导人的“帝国兄弟会”（imperial brotherhood）中的地位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

201 或许，麦卡锡和科恩政治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是在党团会议室外敲下的。6 月，佛蒙特州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在参议院发言时谈到了麦卡锡主义的问题，他将麦卡锡称为“淘气阿丹”（Dennis the Menace），以热衷于搞破坏的连环漫画人物命名，并明确提到了围绕麦卡锡及其员工的同性恋谣言：

> 但委员会尚未深入探究这一谜团的真正核心。这一谜团涉及

陆军士兵、助理和参议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其次，还有助理与陆军士兵的关系。[科恩]希望留住一位能干的合作者是很自然的，但[科恩]对留住他似乎有一种近乎狂热的焦虑。为什么？

此外，还有参议员本人。有时，他似乎急于摆脱整个混乱，然后，至少在他的助理在场时，他又强烈支持助理的努力，以确保陆军士兵席因能继续为他服务。助理是掌握了参议员的什么把柄吗？会不会是我们那位善于给长辈制造麻烦的“阿丹”，最后自己也惹上了麻烦？委员会是否打算调查真正的利害关系？[179]

弗兰德斯说出某些单词和短语来放大它们的影响，抛出“近乎狂热的焦虑”和“把柄”，以提醒听众关注他看似无关痛痒的问题背后的意图。他的言论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并在国会山引起了广泛讨论。弗兰德斯发言后，前纽约国会议员维托·马坎托尼奥（Vito Marcantonio）否认了与科恩存在政治关系，他说：“根据参议员弗兰德斯的说法，我不是那种会想从任何人身上索要东西的人，有人放任自己用‘近乎狂热的焦虑来留用二等兵席因’，让我们的政府在全世界面前难堪。科恩明白我的意思。”[180]麦卡锡和科恩无法起诉弗兰德斯，因为他享有参议院豁免权，不会因在参议院的发言而受到诽谤指控，这也是麦卡锡本人在制造反共声浪期间所依赖的一种保护。

弗兰德斯的演讲是有关麦卡锡和科恩八卦的一个高潮。虽然弗兰德斯没有明确指控科恩或麦卡锡是同性恋，但他显然在一个重要而正式的场合引用了正在流传的谣言。结果，这些谣言不仅进入了公众的意识，而且进入了政治辩论的官方记录。谣言从最底层爬到最高层，

并在途中捕捉到了一种国家时代精神的元素。弗兰德斯继续攻击麦卡锡，他同时也是 1954 年秋天召开的谴责委员会听证会的幕后推手。最终，麦卡锡没有受到官方的公开谴责，但他的同僚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声明“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麦卡锡先生的行为不符合美国参议院议员的身份，违背了参议院的传统，而且常常使参议院名誉受损”。[181]

弗兰德斯发表演讲的当天下午，愤怒的麦卡锡利用听证会做出了反击。他又回归了惯用的策略，指责弗兰德斯是一个宗教和种族偏见者。[182] 然而，这一次，媒体和他的参议员同僚基本上忽略了麦卡锡的言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的夸夸其谈。至少在国会山，形势已经不利于麦卡锡和科恩。很快，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几乎所有成员都要求科恩辞职。

在加入麦卡锡团队之前，科恩就已经利用了对同性恋的恐惧、男性的攻击性和八卦工具来推进其反共主义和职业议程。作为麦卡锡最信任的助手，科恩继续使用这些策略，并敦促他的上司也这样做，无论是调查国际信息署、侦察蒙茅斯堡的间谍活动，还是在两人与陆军的较量中。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策略似乎奏效了：利用媒体操纵明显的事实，宣传自己的男性气概，同时贬低竞争对手的男性气概，这为麦卡锡和科恩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有关麦卡锡和科恩性取向的谣言也是沿着类似途径传播的：八卦专栏、小报、八卦杂志，以及较保守媒体的微妙引用。这些谣言影响了陆军－麦卡锡听证会的基调和措辞，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听证会承诺将揭露日益壮大的联邦机构秘密行动背后的真相。与此同时，关注听证会的公民来信、出席听证会的记者评论以及

参与者自己的言行都表明，男性气质被用作衡量是否适合保卫美国的标准。最后，麦卡锡和科恩的失败，既要归因于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性取向和性别身份，也要归咎于他们拒绝保持在体面的范围内。

后记

监视国家男性气质的经久不衰

面对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越来越严厉的批评，1954年7月20日，罗伊·科恩辞去了首席顾问的职务。约瑟夫·麦卡锡声称："共产主义分子及其同党一定对罗伊·科恩的辞职感到无比满意。罗伊所遭受的诽谤和压力表明，一个有力的反共人士无法在华盛顿的舞台上长期存在。"[1]

八天后，科恩的欢送会在纽约市阿斯特酒店的宴会厅举办，这也是他和麦卡锡初次见面的地方。参加宴会的两千多名宾客每人支付了7美元的费用，这场晚宴时长五个小时，由拉比本杰明·舒尔茨（Rabbi Benjamin Schultz）负责组织，反共联合会（Joint Committee Against Communism）提供赞助。反共联合会的成员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纽约分会、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天主教战争退伍军人组织，以及美国二战退伍军人协会。舒尔茨在开场白中说道，科恩"为上帝和国家而战，他激励了美国"，并表示还有六千人希望获

得晚宴门票，但自己不得不拒绝了他们。保守倾向的组织向科恩赠送了十几块纪念牌。在晚宴上发表演讲的有专栏作家乔治·索科尔斯基、保守派电台主持人富尔顿·刘易斯、美国犹太反共联盟主席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Alfred Kohlberg）、保守派作家威廉·巴 204
克利和福特汉姆法学院教授戈弗雷·施密特（Godfrey Schmidt）。[2]台上坐着许多保守运动人士，包括法官罗伯特·J. 莫里斯（Robert J. Morris）、圣母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克拉伦斯·马尼恩（Clarence Manion）和金融家 E. F. 赫顿（E. F. Hutton），还有美国商人罗伯特·沃格勒（Robert Vogeler），他曾被匈牙利共产党人监禁了十七个月。麦卡锡是当晚的主讲人。

晚宴期间，科恩和麦卡锡都接受了多次起立鼓掌，举办方不得不要求宾客待在台下，不要冲上讲台。[3]科恩被说成是“美国的德雷福斯”，该称谓引自世纪之交一起臭名昭著的法国反犹主义案件。发言者不断抨击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备受批评的还有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4]舒尔茨以民粹主义的口吻赞扬了科恩，表示“罗伊·科恩几乎可以胜任当今美国的任何职位……科恩象征着人民对软弱叛国的政客、胆小怯懦的教授、对希斯和奥本海默轻描淡写的作家的反抗……人们知道，失去科恩就好比失去了十几艘战舰”。正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预测的那样，尽管麦卡锡“可能政治势力有所削弱，但麦卡锡主义不会被轻易肃清”。[5]

监视国家男性气质也是如此。陆军－麦卡锡听证会后的六十年里，“美国领导人理应拥有强硬、坚韧的男性气质”的观点一直在影响着政治文化，也说明了胡佛、麦卡锡、科恩的方法拥有强大效力。另外，

这段时间还证实了作为政治信息来源和载体的八卦具有持久的力量，这也导致谣言和现实的界限变得愈加模糊。

虽然麦卡锡避开了参议院同僚的申斥（决议的措辞是比较温和的“谴责”［condemn，其程度轻于“censure”］一词），但他的权力显然被削弱了。他还在继续推动反共议程，但无论在华盛顿还是美国其他地区，此举都受到了排斥。到了 1954 年 8 月，麦卡锡的净支持率从八个月前的正 21 高点跌落到负 15 低点。[6] 1955 年春天，一项针对高校校报编辑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麦卡锡主义已经是“过去式”了。[7] 传记作家大卫·奥辛斯基写道：“他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噩梦……他对参议员的职责失去了兴趣，回避和选民见面，
205 1956 年时还缺席了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8] 他开始放纵自己，酗酒成瘾，健康状况大不如前，1956 年底，他接受了肝炎、酒精戒断和肝硬化的治疗。1957 年 5 月 2 日，麦卡锡死于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终年 47 岁。不到四年前，他曾在圣马修大教堂举办婚礼，如今他的大弥撒同样在此举行，胡佛、科恩、理查德·尼克松和 77 名参议员出席了这一仪式。[9] 第二天，麦卡锡被安葬在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福克斯河沿岸的圣玛丽教区公墓。

关于麦卡锡主义的叙述都随着他的死亡而尘封，但以约瑟夫·麦卡锡命名的政治时刻却将长存。正如科恩的“辞职欢送会”到场人数所表明的那样，这个国家从不缺少狠毒的反共分子。麦卡锡掀起的政治运动在他垮台后再次复苏，这次的精神领袖是埃德加·胡佛。1956 年春夏，胡佛正着手通过联邦调查局扩大政府对颠覆分子的侦查。1956 年 3 月 8 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胡佛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

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默许，可以使用非法手段追捕共产主义颠覆分子，包括电话监听、邮件监控、窃听和“秘密进入”办公室或住宅。[10] 两个月后，联邦调查局开始制定一项规模庞大的反间谍计划，后被称为“COINTELPRO”（“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的缩写），旨在瓦解和消灭各种类型的颠覆分子。反间谍计划总共包括2340次秘密行动，对象涵盖了全部政治组织，包括共产主义附属团体、三K党、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工会、黑豹党（Black Panthers）、青年基督会（Young Lords）、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和南部基督教领导联合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尽管在联邦调查局工作期间，胡佛就一直对反颠覆的非法手段颇有兴趣，并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批准，但由于需要获取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这些非法活动在50年代中期可能已经停止（或至少是大大减少）。然而，麦卡锡主义夸大了共产主义对美国公民和联邦政府的威胁，这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总统需要去支持非常规（和非法）的手段，以此对抗共产主义和其他任何形式的颠覆活动。反间谍计划并非麦卡锡主义的直接产物，但麦卡锡煽动反共主义，为胡佛推进他的国内监视计划创造了理想条件。

胡佛本人也为培育这种“时代精神”付出了许多努力。他让普通民众成为他的盟友，直接对抗颠覆活动和他所谓的“外来主义”威胁，这种做法不容小觑。简而言之，二战时期的反间谍经历让美国人对冷战的焦虑情绪做好了准备，他们习惯于用审视的眼光看待同胞。同样，经历了第一次红色恐慌、战时的国内监视和反颠覆运动，美国民众也

熟悉了在法庭或舆论上检举嫌犯的概念，当然，这种嫌疑是基于思想而非行为。

在构建和宣传调查局特工的形象时，胡佛帮助美国建立了国家安全的多项规范，特别是国家安全与政府效率和攻击性男性气质相结合时的标准。每到关键时刻，家长式的、自信果决的男性气质就会被写入国家监视和安全国家的社会和法律框架。通过领导联邦调查局，构建个人崇拜，胡佛在推动社会认识男性气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胡佛的所作所为帮助麦卡锡和科恩界定了男性气质，特别是“保护美国”的男性理应如何行动、成为什么样的人物。作为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胡佛让国家安全和对男性气质的短视理解的密切关系趋于合法化、规范化、坚实化，这些理解自 20 世纪初以来就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正如反间谍计划获得通过所表明的那样，麦卡锡主义燃起了民众对颠覆活动的焦虑情绪，胡佛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这样一来，胡佛和麦卡锡成就了彼此对权力的追求。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最终让胡佛走下了神坛。由于麦卡锡的越权行为，美国人愈发怀疑政府官员利用个人信息攻击独立个体（如胡佛通过窃听破坏民权运动）的做法。事后来看，麦卡锡的倒台也是一个机会，联邦政府本来可以趁此阻止国家监视和安全国家制度继续发展。然而，麦卡锡主义成了隐藏着恐怖秘密的私室，美国人把对政府过度干预和扩大监视范围的忧惧搁置其中，因为他们相信，一旦麦卡锡死去，他的策略就会随之消亡。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却明确证实，这个推测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说，称那个时代为“麦卡锡时代”是有道理的，但这样的命名会导致错误地划分历史时期。麦卡锡的策略并没有伴随

他走向坟墓，反而融入了美国的政治文化，持续对政治话语施加影响，直至今日。

胡佛依靠监视国家男性气质攫取政治权力，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现如今人们记起他时，脑海中出现的还是这幅形象。在胡佛生前，其对手曾试图利用所谓的同性恋谣言破坏他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他死后，这些谣言变得更加大胆，流传范围更广。其中最出名且流传最久的说法是胡佛爱穿女装。这个说法的出处是刘易斯·罗森斯蒂尔（Lewis Rosenstiel）的前妻苏珊·罗森斯蒂尔（Susan Rosenstiel）。她是一位酒业巨头，也是科恩和胡佛共同的朋友。在接受采访时，罗森斯蒂尔夫人告诉记者安东尼·萨默斯（Anthony Summers），她曾两次看到胡佛打扮成女性，参加罗伊·科恩在纽约市广场酒店举办的“同性恋狂欢”。罗森斯蒂尔夫人表示，她是被双性恋丈夫（她还声称曾将丈夫和科恩“捉奸在床”）邀请参加小型性爱派对的。她还谈到自己目睹的这两次派对的细节，话语甚是生动。据称，第一次是在 1958 年：

> 罗森斯蒂尔夫人声称，埃德加打扮得像个女人，身着正装。“他穿了一件非常蓬松的黑色连衣裙，裙子还有褶皱镶边，套着蕾丝长袜，脚蹬一双高跟鞋，头戴卷曲的黑色假发。他化了妆，还戴了假睫毛。因为那条裙子很短，他坐在（酒店）套房的客厅里，交叠着双腿。罗伊［科恩］向我介绍他叫‘玛丽’，于是他只说了句‘晚上好’，就好像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一样。很明显，他不是个女人，你甚至能看到他下巴上残留的胡茬。这是胡佛……接下来，几个年轻的金发男孩走进来了。我猜大概十八九岁吧。随后罗伊

发出信号，让我们去卧室……他们走进卧室，胡佛脱下了他的蕾丝短裙和长袜，裙子下面还有一条短短的小吊袜带。他躺在双人床上，两个男孩用手在他身上爱抚，其中一个戴着橡胶手套。”[11]

一年后，罗森斯蒂尔夫人又来到广场酒店，再次参加了科恩的派对。

科恩把罗森斯蒂尔夫妇领进一间套房，埃德加正等在里面，这次他又穿了女装，不过风格变得更加古怪。“他穿着一件红色连衣裙，”她回忆道，“脖子上挂着黑色的羽毛围巾。他穿得像个旧时的摩登女郎，就像大家在旧锡画上看到的那样。大约半个小时后，男孩们又进来了，这次他们穿的是皮衣。胡佛拿着一本《圣经》。他想让其中一个男孩朗读《圣经》。那个男孩一边读，我忘了读的哪一段，另一个男孩就戴着橡胶手套和胡佛嬉戏玩闹。然后胡佛抓起《圣经》扔在一边，让读《圣经》的男孩也加入他们的性爱。”[12]

208

1993年，苏珊的故事出版成书，这本《官方和机密：J. 埃德加·胡佛的秘密生活》（*Official and Confidential: The Secret Life of J. Edgar Hoover*）引起了巨大轰动。小报和八卦杂志注意到了这个故事，政治漫画家则大展拳脚，给丰腴的胡佛画上了女装和细高跟鞋。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有记忆点，部分原因在于它几乎体现了所有对男同性恋的刻板印象：追求年轻男孩，打扮过于夸张，妆容俗艳，充

满反宗教激情，使用女性化名（而且是圣母的名字）。研究联邦调查局历史的学者阿森·西奥哈里斯（Athan Theoharis）指出，罗森斯蒂尔的故事存在许多疑点，其中女性被邀请参加“男同性恋狂欢”这点就很荒谬，事实上，她在离婚诉讼中从未提到丈夫所谓的同性恋行为，而且截至20世纪90年代，所有的当事人都已经过世。[13]

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它之所以能在美国文化中长期流传，就在于相关的历史问题。首先，这个故事是堕落糜烂的，人们很容易相信，一个依靠收集他人秘密获得权力的人，自己也会藏有一个惊人的秘密。这个故事似乎也证实了人们对胡佛和同性恋人士的普遍偏见，即胡佛本人是个同性恋，以及同性恋人士实践着被美国主流文化认定为极端或异常的性行为。这个谣言能持续这么久，另一种解释还要回到监视国家男性气质上。越战和水门事件后的时代，民众对联邦政府充满了讽刺和怀疑，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在公众面前表现出英雄般的阳刚之气、信仰虔诚、道德高尚、高效专业的人，其实背地里与他的主张截然相反，这是说得通的。这样看来，胡佛的异装癖传闻被广泛接受和传播，证实了男性气质在他的公众形象和职业成就中的核心地位。无论这个故事真实与否，令人唏嘘的是，一个因善于利用八卦消息而掌握权力的人，如今却注定要和自己无法控制的谣言联系在一起。

***

科恩回到纽约后，仍和胡佛保持着密切联系。科恩的一位律师朋友回忆说，科恩和胡佛经常通过电话进行长谈，科恩每年都会收到一盒古巴雪茄，这是胡佛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尽管美国对这个地处加勒 209

比海地区的共产主义国家实行禁运，但胡佛还是能弄到这种雪茄。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开始调查科恩的保险诈骗行为，据说此时胡佛向科恩泄露了政府掌握的信息。科恩律所里的一名律师表示，“政府起诉期间，我认为他是从胡佛那里得到的消息……罗伊·科恩受审期间，胡佛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向罗伊提供有关政府的消息，我认为这点很明显”。[14] 至于科恩，他充当了联邦调查局和八卦记者的中间人，把从胡佛那里得来的消息传递给丽兹·史密斯（Liz Smith）等专栏作家。[15]

最终，科恩又做回了有权有势的律师，他的客户都是名人，包括洋基队老板乔治·施泰因布伦纳（George Steinbrenner），54俱乐部老板史蒂夫·卢博（Steve Rubell）和伊恩·施拉格（Ian Schrager），犯罪集团头目卡迈恩·加兰特（Carmine Galante）、约翰·高蒂（John Gotti）、托尼·萨莱诺（Tony Salerno）。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前期，科恩在纽约的名流和政界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他继续在21俱乐部作威作福，还是里根政府的常客。他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领取少量工资，却用公款账户支付了几乎所有的花销，这种创造性的报销做法，导致他的纳税申报单连续二十年受到美国税务局审查。80年代，他感染了艾滋病，但由于艾滋病与同性恋有关，他拒绝承认诊断结果，在私人和公开场合都坚持说自己患有肝癌。1986年，就在他死前几周，纽约州剥夺了他的律师资格，起因是有人指控他骗取客户钱财，其中包括苏珊·罗森斯蒂尔的前夫刘易斯。[16]

科恩最有名的客户，在未来也将是影响力最持久的一个。1973年，科恩在曼哈顿东区的乐俱乐部（Le Club，是一家时尚的会员制酒吧、餐厅、迪斯科舞厅）结识了房地产开发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此后不久，特朗普聘请科恩为自己和父亲共同拥有的房地产公司辩护，以应对司法部的种族歧视指控。尽管特朗普家族与联邦政府最终选择和解，导致旗下的公寓楼被迫迎来多元住户，但科恩和 210
特朗普还是宣告胜利。事后，科恩告诉特朗普，媒体报道比事件本身更为关键。《村声杂志》（*Village Voice*）记者韦恩·巴雷特（Wayne Barrett）回忆说，到了 70 年代中期，科恩“成了唐纳德的导师，是他在生意和私人生活中的重要顾问”。[17] 据报道，科恩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特朗普的照片，上面还有特朗普的签名，“致罗伊，我最好的朋友——唐纳德”。[18]

有报道称，特朗普在得知这位导师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后，就把他踢出了核心圈子。[19] 然而，科恩的影响贯穿了这位房地产大亨的商业战场和从政生涯。2016 年初，特朗普竞选总统时，选择了罗杰·斯通（Roger Stone）担任竞选顾问。斯通是有名的保守派政治调停人物，两翼肩胛之间纹着理查德·尼克松的头像；他还是科恩的密友，自从 1980 年两人在罗纳德·里根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共事以来，他就一直把科恩视为良师益友。斯通也把男性气质当作政治工具。2008 年，《纽约客》刊载了一篇关于斯通的简介，随附的照片中，他脱掉了衬衣，展示着自己的胸肌，那种姿势让人不由得联想起伯纳尔·麦克法登。[20]

从许多方面来讲，唐纳德·特朗普都是监视国家男性气质的终极实践者，包括他的阳刚人设，他对专有信息的武器化，和他对八卦渠道的利用。[21] 从这一角度看，特朗普体现了罗伊·科恩的男性气质：依赖财富和人脉关系，一心追求权力，把男性气质同权威等同起来。但特朗普的政治基础是教育水平低下的保守派白人男性，他们对政府持

怀疑态度，害怕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被“外人”抢走，这个群体更像是 1946 年支持乔·麦卡锡进入参议院的民粹主义选民。为了吸引这些选民，特朗普完全采取了男性主义的论调，针对现实和想象中的敌人，在演说中加入了各种咄咄逼人的言论。换句话说，特朗普是唯一一位公开提到自己阴茎大小的美国总统候选人。面对共和党初选对手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的冷嘲热讽，特朗普回应道：“卢比奥说到我的手，‘如果手很小，那里也一定很小’，我向您保证我没有问题。我保证。”[22]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他的厌女言论和种族主义论调是他勇于说出内心想法的表现，这在认为“政治正确”无聊、软弱且过于敏感的选民中引发了共鸣。

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建立在他对八卦工具的熟练运
211 用上。特朗普首次竞选总统期间，其团队省下了电视广告的大笔开销，因为他本人已经在不停霸占新闻头条。特朗普经常使用八卦杂志的典型手段，如夸张、影射和牵连定罪。他利用推特与支持者直接对话，这与麦卡锡利用八卦杂志和小报如出一辙。通过推特这个非官方渠道，特朗普可以使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他作为民粹主义煽动者的所谓“真实性”。

特朗普把科恩的教导铭记于心，认为表达应比内容本身更让人难忘，于是他经常在竞选演说中歪曲事实或公然撒谎。哪怕后来担任了总统，他也还这么干。《华盛顿邮报》事实核查员格伦·凯斯勒（Glenn Kessler）认为，在入主白宫的二十八个月里，特朗普总共发表了超过一万次“错误或误导性的言论”。[23] 作为总统，特朗普甚至依赖图片篡改的伎俩。2019 年，在椭圆办公室听取情况简报时，特朗普放出了

一张飓风多利安的预测路径图，但这张图被修改过，目的是证实他那莫须有的猜测，即飓风可能袭击阿拉巴马州。[24] 虽然因此产生了小小的丑闻，媒体称其为“记号笔门”（Sharpiegate），但随着新闻界转向特朗普的其他荒谬言行，“记号笔门”很快就被遗忘了。

特朗普最常攻击的目标就是他乐于称之为“假新闻”的媒体平台，而任何在当时与他意见相左的媒体都会被扣上这顶帽子。不过，跟之前的胡佛、麦卡锡、科恩一样，特朗普与许多支持他的媒体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其中最出名的有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com）、资讯战争网（InfoWars.com）等右翼网站的八卦记者。特朗普与福克斯的日间新闻节目《福克斯和朋友们》（*Fox and Friends*）的蜜恋是个传奇，节目的三位主持人通过奉承他，换取他本人和他的班子成员优先考虑出席本档节目的机会。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作为福克斯新闻最受欢迎的主持人之一，曾在竞选性质的集会上与特朗普同台。特朗普在任的第三年伊始，历史学家尼科尔·海默（Nicole Hemmer）发表观点，称福克斯新闻“是我们最接近国家电视台的渠道”。[25]

特朗普与超市小报《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的关系不亚于同盟。据报道，他在《国家询问报》上散布了不少总统竞争对手的故事，他曾暗示特德·克鲁兹（Ted Cruz）婚内出轨，名医本·卡森（Dr. Ben Carson）的手术失败导致部分病人终生瘫痪。[26]《询问报》中也有一些文章署着特朗普的名字，通常会提供特朗普成功背后的“内幕消息”。特朗普还把《国家询问报》当作合法新闻的来源，引用了该报 212
上的故事，故事称特德·克鲁兹的父亲与刺杀约翰·肯尼迪的李·哈

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有关。2016年夏天，《花花公子》（*Playboy*）前任模特凯伦·麦克道戈（Karen McDougal）爆出她与特朗普的风流韵事时，《国家询问报》花费15万美元买下了这个故事并将其封存，以免在大选日前爆出丑闻。[27]最后，它也是2016年大选中唯一支持特朗普，且发行量超过20万份的美国报纸。特朗普获胜后，《纽约邮报》报道称，《国家询问报》的母公司美国传媒（American Media）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大卫·J. 佩克（David J. Pecker）正在考虑担任大使一职。

《国家询问报》的历史很适合作为本书的结尾。它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份大报起初名为《纽约晚间询问报》（*New York Evening Enquirer*），其创始人的资金来自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贷款。三十年后，报纸（当时已改名为《纽约询问报》［*New York Enquirer*］）濒临倒闭，被一位名为小詹纳罗索·波普（Generoso Pope Jr.）的年轻投资者收购。波普有着丰富的出版业经验，这要归功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一家意大利语报纸《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征程》（*Il Progresso Italo-Americano*）从临时工做到了老板的职位。波普领导的头五年里，改名后的报纸举步维艰，发行量一直徘徊在17000份左右。但在1957年，波普决定效仿《机密》《最高机密》《锐舞》等八卦杂志，把《国家询问报》改为哗众取宠的小报。1957年至60年代中期，《国家询问报》专注于血腥故事和性爱故事，这与20年代的《纽约晚报》不尽相同。直到1967年，《国家询问报》为了将超市纳入销售范围，才终于学会了克制。

关于《国家询问报》的成功，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个疑问，波普

是从哪里筹集到收购杂志的资金的？毕竟他的父亲于1950年去世后，他就失去了家庭财产。其实，大约一半的资金来自他的教父，黑手党头目弗兰克·科斯特洛（Frank Costello），这个消息早有传言，不过直到最近才被《迪茹尔杂志》（*DuJour*）的调查证实。另一半则来自波普在霍瑞斯曼高中读书时的朋友：罗伊·科恩。[28]

致谢

213 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够进行，大部分要归功于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基金会、哈里·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基金会、查尔斯·里德西方研究基金会、布朗大学美国研究系、布朗大学研究生院的慷慨资助。布莱恩·格林斯彭（Brian Greenspun）和威廉·斯特劳（William Straw）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厄尼·拉泽尔（Ernie Lazar）的贡献也无与伦比。史蒂文·雷米（Steven Remy）友好地分享了他尚未出版的作品《马尔梅迪大屠杀》（*The Malmedy Massacre*）中的一章。史蒂夫·勒纽斯（Steve Lenius）向我介绍了罗伯特·比恩维努（Robert Bienvenu）的作品。布朗克斯历史学会的史蒂文·佩恩（Steven Payne）帮忙搜索了《布朗克斯本地新闻》的记录。克莱尔·波特对本书初稿的第五章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评论。亨利·斯科特的无私帮助极大地改进了本书中关于《机密》杂志的部分。各大机构档案管理员和图书管理员的专业知识也帮助了我很多，包括密尔沃基公共图书馆、马凯特大学档案馆、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哈里·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纽约公
214 共图书馆、马里兰大学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杨百翰大学档案馆。

我很感激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遇到的朋友和导师，尤其是朱迪·吴（Judy Wu），她富有耐心又体恤他人。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也许我

最大的收获是威廉·斯特基（William Sturkey）的友谊，他在历史学方面才智卓著，为人慷慨善良。

在布朗大学，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埃利奥特·古恩（Elliott Gorn）、罗伯特·塞尔夫（Robert Self）和塞缪尔·齐普（Samuel Zipp）的指导。埃利奥特在我研究之初就帮我拟定了计划大纲，启发我创造性地思考男性气质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罗伯特让我在历史事件方面的表达更为精准，把本书进一步推向了20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塞缪尔改进了书中关于美国身份形成的内容，帮助我确立了其叙事思路。

本书得到了圣奥拉夫学院许多同事的支持，包括蒂姆·豪尔（Tim Howe）、史蒂夫·哈恩（Steve Hahn）、迪恩·拉格奎斯特（DeAne Lagerquist）。埃里克·弗尔－斯洛克姆（Eric Fure-Slocum）对本书的导言和第一章慷慨地提出了深刻见解。圣奥拉夫学院的图书管理员以斯拉·普莱蒙（Ezra Plemons）、玛吉·爱泼斯坦（Maggie Epstein）、金·福莱特（Kim Follet）是我在初稿的最后阶段找到资料的关键。在本书的付印过程中，院长办公室和教工生活理事会都提供了支持。

非常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才华横溢、工作勤勉的员工。我最初接触到该社是通过道格·米切尔（Doug Mitchell）。他在项目刚开始时就在鼓励我，他是个知识渊博的人，我非常想念他。蒂姆·梅内尔（Tim Mennel）则让我知道，伟大的编辑能为一本书做些什么，感谢他的洞察力、耐心和敏锐的编辑视角。苏珊娜·恩格斯托姆（Susannah Engstrom）是个完美的引领者，帮助我了解到出版过程的琐碎细节。迈克尔·柯普洛（Michael Koplow）对手稿进行了最终修改。出版社聘请的两位匿名读者对本书的细致评论很有帮助，通过评论我得以明

晰自己的论点，以及读者是如何看待这些论点的。

有两位导师对我的学识进步和职业发展至关重要，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他们。杰克·查特菲尔德（Jack Chatfield）让我对已逝的历史更加欣赏，他身上也有着我作为教师、学者和一个人所追求的特质，我非常想念他。凯文·博伊尔（Kevin Boyle）有着无限的热情和同理心，他的职业建议支撑着我走过漫长旅程。

如果没有朋友和家人的支持，我走不到今天，感谢芭芭拉·福尼尔（Barbara Fournier），汉克·科里尼亚（Hank Corinha），劳伦·埃利阿斯（Lauren Elias），道格和罗蕾莱·斯塔克夫妇（Doug and Lorelei Starck），苏瓦迪普·博斯（Suvadip Bose），本·科伦（Ben Koren），克里斯托弗·米亚图（Christopher Meatto）和迈克尔·皮尔特（Michael Peart）。

215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开始培养我对历史的热爱。在我学会阅读之前，他就给我朗读了《民兵萨姆》（*Sam the Minuteman*），每周带我到安多佛公共图书馆探索“自由之基石”系列，在我表示对越南战争感兴趣时，他为我找来了《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没有他的鼓励，我不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的母亲一直是我的坚实后盾，她对艺术的热情不仅影响了我的文化历史学研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最后，致我最爱的八卦伙伴林赛（Lindsay）：没有你这本书就不会存在。和你在一起是我做过最明智的决定。

缩略词

陆军－麦卡锡听证会（ARMY-MCCARTHY HEARINGS）：参议院对指控和反指控的特别调查涉及：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约翰·G. 亚当斯、H. 斯特鲁夫·亨塞尔（H. Struve Hensel）和参议员乔·麦卡锡，罗伊·M. 科恩和弗朗西斯·P. 卡尔（Francis P. Carr）；文件类型：听证会—数字收集，听证会ID：HRG-1954-OPS-0013，LexisNexis Congressional Hearings Digital Collection

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DDE LIBRARY）：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Abilene, KS

杜鲁门总统图书馆（HST LIBRARY）：Harry S.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Independence, MO

J. 埃德加·胡佛纪念品收藏（JEHMC）：J. Edgar Hoover Memorabilia Collection, 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Museum, Washington, DC

麦卡锡联邦调查局档案（MCCARTHY FBI FILE）：FBI Records: The Vault, “Sen. Joseph (Joe) McCarthy,” https://vault.fbi.gov/Sen.%20Joseph%20%28Joe%29%20McCarthy

麦卡锡文件（MCCARTHY PAPERS）：Papers of Joseph R. McCarthy,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Milwaukee

密尔沃基公共图书馆麦卡锡文献（MPL MCCARTHY）：Milwaukee Public Library, McCarthy Clippings FilePEARSON PAPERS: Papers of Drew

Pearson, Lyndon B. Johns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ustin

沃特金斯文件（WATKINS PAPERS）：Arthur V. Watkins Papers, L. Tom Perry Special Collection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Archives, Provo, UT

注释

引言

1. Michael Straight (迈克尔·斯特雷特), *Trial by Television and Other Encounters* (《电视审判与其他交锋》) (New York: Devon Press, 1979), 126.
2. “麦卡锡主义”，现指冷战初期的一段时间，美国政府采取非常规、不合法的手段打击所谓的共产主义颠覆分子，一般认为其标志性事件是 1947 年开始的国会对娱乐行业的调查。因此，“麦卡锡主义”常被用来指代 1950 年 2 月约瑟夫·麦卡锡发表演讲轰动全国之前的一系列事件。在近来的政治话语中，“麦卡锡主义”和“麦卡锡主义者”被用于指代那些未经证实就攻讦他人，借此吸引民粹主义情绪的政治运动和政客。
3. Margaret Chase Smith (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 “Declaration of Conscience,” (《良知宣言》) June 1, 1950, *Congressional Record* (美国国会记录), 81st Congress, 2nd Session, 7894–7895.
4. Army-McCarthy Hearings, 1954, part 13, p. 15, April 30.
5. 美国首部八卦杂志《都市话题》正是在 1885 年创刊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发生在 1954 年。
6. 本文中我使用的“酷儿”和“娘娘腔”是当时政府公文和媒体报道的原话，事件的参与者在回忆时也是这样说的。“酷儿”通常是对表现出或被认为有同性吸引力的人的蔑称，“娘娘腔”则是形容那些被认为不是真男子汉的男性。“酷儿”一词的发展历史非常曲折，但在 1885—1954 年间大多数时候具有双重贬义，既指“古怪反常的”，又指会被同性吸引（可能还与其保持性关系）的人，通常情况下二者兼有。这种模糊性正是“酷儿”

一词受到欢迎的原因：它给人留下了辩驳的余地。尽管在 1885—1954 年间，“酷儿”的适用范围包括男性和女性，但还是多被用来指代男同性恋。见 Stephen Heath（斯蒂芬·希斯）, “Queer,”（《酷儿》） in *The Keywords Project*（“关键词”项目）, 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and Jesus College—Cambridg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itiative（匹兹堡大学和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合作研究计划）, http://keywords.pitt.edu/keywords_defined/queer.html。关于 J. 埃德加·胡佛“酷儿身份”的学术研究，见 Claire Potter（克莱尔·波特）, “Queer Hoover: Sex, Lies, and Political History,”（《同性恋者胡佛：性、谎言和政治史》）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性学史杂志》） 15, no. 3（September 2006）: 355–381。

7. 关于消费主义下男性气质的前身是“生产主义下的男子气概”，见 Stephen Kantrowitz（斯蒂芬·坎特罗维茨）, *Ben Tillma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hite Supremacy*（《本·蒂尔曼和白人至上主义的重建》）（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106，以及 Martin Summers（马丁·萨默斯）, *Manliness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Black Middle Cla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sculinity, 1900–1930*（《阳刚之气及其不满：黑人中产阶级与男性气质的转变，1900—1930》）（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8. 大约在 1898—1989 年间，监视国家男性气质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开始于 1898 年的美西战争，后在冷战初期得到了充分体现，苏联解体后，伴随着外交关系“软实力”的兴起，又以男性化领导的形式表现出来，唐纳德·特朗普和他领导下的政府则让其关键要素焕发了新生。

9. 监视国家男性气质与“冷战时期的男性气质”关系紧密，但前者的历史比 1945 年后的地缘政治斗争来得久远。我个人认为，冷战时期的男性气质早于冷战本身出现，其特征包括害怕被人打上“软弱”的标签、需要公开显露男性气概和偏好边缘政策。虽然 1954 年的陆军 – 麦卡锡听证会标志着监视国家男性气质达到巅峰，但它至少从一战结束时就渐入高潮了。以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和冷战初期来划分阶段，有助于我们全面研究美国国家安全与同时期的性别政治变革的关系，而非单纯将其与 1945 年后的美苏斗

争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一主张在时间划分和表述上有所创新，但本书并不是在纠正历史学家（主要是 K. A. 科迪莱昂内［K. A. Cuordileone］和罗伯特·D. 迪安［Robert D. Dean］）关于冷战时期的男性气质的已有成果，而是对其扩展延伸，意在为这些研究重新提供更深入的背景框架。通过放宽视野，我尝试去捕捉“生产主义下的男性气质”是如何逐渐退出权力舞台的。参见 K. A. Cuordileone, *Manhood and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Cold War*（《冷战时期的男子气概和美国政治文化》）（New York: Routledge, 2005）；Robert D. Dean, *Imperial Brotherhood: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Cold War Foreign Policy*（《帝国兄弟会：性别与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形成》）（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1）；Kristin L. Hoganson（克里斯汀·L. 霍根森）, *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 How Gender Politics Provoked the Spanish-American and Philippine-American Wars*（《为美国男人而战：性别政治如何挑起美西和美菲战争》）（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 采用不同方法的相关书籍包括 Margot Canaday（玛戈·卡纳迪）, *The Straight State: Sexu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笔直”的国家：20 世纪美国的性行为和公民身份》）（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Douglas M. Charles（道格拉斯·M. 查尔斯）, *Hoover's War on Gays: Exposing the FBI's "Sex Deviates Program"*（《胡佛对同性恋者的战争：揭露联邦调查局的“性偏差计划”》）（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5）；David K. Johnson（大卫·K. 约翰逊）, *The Lavender Scare: The Cold War Persecution of Gays and Lesbian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薰衣草恐慌：冷战时期联邦政府对男女同性恋者的迫害》）（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Jessica Pliley（杰西卡·普利莱）, *Policing Sexuality: The Mann Act and the Making of the FBI*（《对性行为的监督：〈曼恩法〉和联邦调查局的形成》）（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 相比其他类似的研究，本书有三点关键区别。首先，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位高权重的政治家，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媒体、性别和性的纵向发展。其次， 221

本书对八卦的定位是安全国家和性别认同之间的重要纽带。最后，本书认为，对冷战自由主义至关重要的“男性的硬汉形象”要远早于冷战本身（见第 9 条注释）。

12. Charles L. Ponce de Leon（查尔斯·庞塞·德·莱昂）, *Self-Exposure: Human-Interest Journ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Celebrity in America, 1890–1940*（《自我曝光：人情味新闻和美国名人的出现，1890—1940》）(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13. 有关男性气质建构从“品格”到“人格”的转变，参见 Summers, *Manliness and Its Discontents*, 8，以及 Michael S. Kimmel（迈克尔·S. 坎摩尔）, *Manhood in America*（《美国的男子气概》）（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145。关于更广泛地探讨那场革命的论述，参见 Warren Susman（沃伦·苏斯曼），“‘Personality’ and the Making of Twentieth-Century Culture,”（《“个性”与 20 世纪文化的形成》）in *Culture as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作为历史的文化：20 世纪美国社会转型》）（New York: Pantheon, 1984）。

14. Michael J. Hogan（迈克尔·J. 霍根）, *A Cross of Ir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5–1954*（《铁十字：哈里·S. 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国家的起源，1945—1954》）(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另见 Aaron L. Friedberg（亚伦·L. 弗里德伯格）, *In the Shadow of the Garrison State: America's Anti-statism and Its Cold War Grand Strategy*（《在驻军国家的阴影下：美国的反国家主义及其冷战大战略》）（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以及 Douglas T. Stuart（道格拉斯·T. 斯图尔特）, *Crea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History of the Law That Transformed America*（《创建国家安全国家：改变美国的法律的历史》）（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 Hogan, 255.

16. Alfred W. McCoy（阿尔弗雷德·W. 麦考伊）, *Policing America's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Rise of the Surveillance State*（《监控美帝国：美国、菲律宾和监视国家的崛起》）(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 16–17.

17. McCoy., 21–24, 34–35.

18. Kimmel, 88–89；强调为原文所有。

19. Jackson Lears (杰克逊·李尔斯), *Rebirth of a Nation: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1877–1920* (《一个国家的重生：现代美国的形成，1877—1920》) (New York: Harper, 2009), 8.

20. Alan Trachtenberg (艾伦·特拉赫特伯格), *The Incorporation of Americ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Gilded Age* (《美国的一体化：镀金时代的文化和社会》)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美国人在内战后的半个世纪都在寻找重组社会结构的方法。参见 Robert Wiebe（罗伯特·维贝）,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探求秩序：1877—1920》）（New York: Macmillan, 1967）。

21. 有关 20 世纪之交的消费主义和个人身份，参见 Daniel Horowitz（丹尼尔·霍洛维茨）, *The Morality of Spend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in America, 1875–1940*（《消费的道德性：对美国消费社会的态度，1875—1940》）（New York: Ivan R. Dee, 1992）；Jackson Lears, *Fables of Abun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dvertising in America*（《富足的寓言：美国广告文化史》）（Boston: Basic Books, 1995）；Susan Strasser（苏珊·斯特雷瑟）,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Mass Market*（《保证满意：美国大众市场的形成》）（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22. 有关性别观念变革的更全面描述，参见 Peter Filene（彼得·菲林）, *Him/ Her/ Self: Gender Identities in Modern America*（《他 / 她 / 自我：现代美国的性别认同》）, 3rd ed.（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22。

23. Sherwood Anderson (舍伍德·安德森), *Perhaps Women* (《也许是女人》) (New York: H. Liveright, 1931), 7, 42.

24. Summers, *Manliness and Its Discontents*, 9. 也可参见 Anthony Rotundo（安东尼·罗顿多）, *American Manhood: Transformations in Masculinit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Modern Era（《美国人的男子气概：从美国革命到现
222 代的男性气质转型》）（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282–286；Gail Bederman（盖尔·贝德曼）, *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男子气概与文明： 美国性别和种族文化史，1880—1917》）(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0–20；Tom Pendergast（汤姆·彭德加斯特）, *Creating the Modern Man: American Magazines and Consumer Culture, 1900–1950*（《创造摩登男人： 美国杂志和消费文化，1900—1950》）（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1–18；Lewis A. Erenberg（刘易斯·A. 埃伦伯格）, *Steppin' Out: New York Nightlif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外出寻欢：纽约夜生活和美国文化转型》）（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237–238。

25. Kimmel, 89.

26. Bederman, 7. 关于另一位历史学家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参见 Joan W. Scott（琼·瓦拉赫·斯科特）,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评论》）92, no. 5（December 1986）。我对男子气概的理解也可以与约翰·佩特格鲁（John Pettegrew）在《穿西装的野兽：1890—1920 年美国的男性情感》（*Brutes in Suits: Male Sensibility in America, 1890–1920*）（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一书中对男子气概的定义对照："我提出了一种女权主义观点，认为男子气概是一种通过语言、习惯和知识发展起来的思维模式，因此可以通过这些相同的文化形式加以纠正。" Pettegrew, 2.

27. 这个概念（包括它的偶然性）是由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首次提出的，她称之为"性别表现性"。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性别麻烦：女权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28. Kimmel, 4.

29. "霸权的男性气质"起源于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提出的一个理论。尽管这个词有时指的是一种男性统治的形式，它使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但我用它来指代社会对理想男性的一系列特征的定义。我不认为霸权的男性气质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但它的具体方面在本书所涵盖的时代保持了相对稳定。见 R. W. Connell, *Gender and Power*（《性别与权力》）（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也可参见 R. W. Connell, James W. Messerschmidt（詹姆斯·W. 梅塞施密特）,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霸权的男性气质：对该概念的反思》）*Gender and Society*（《性别与社会》）19, no. 6（December 2005）: 829–859。

30. 关于美国男子气概的"危机理论"，参见 Bryce Traister（布莱斯·特雷斯特）, "Academic Viagra: The Rise of American Masculinity Studies,"（《学术伟哥：美国男子气概研究的崛起》）*American Quarterly*（《美国季刊》）52, no. 2（June 2000）, esp. 287–291。特雷斯特并没有像历史学家那样区分该危机是周期性的还是长期性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危机是周期性的，在19 世纪 90 年代、20 世纪 5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的动荡时期不断涌现，而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国男人一直处于危机中，比如迈克尔·坎摩尔。对这一领域的强有力概述见 James Gilbert（詹姆斯·吉尔伯特）, *Men in the Middle: Searching for Masculinity in the 1950s*（《中间派男性：在 1950 年代寻找男性气质》）（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chap. 2。丹尼尔·维克伯格（Daniel Wickberg）对异性恋白人男性进行了分析，参见Daniel Wickberg, "Heterosexual White Male: Some Recent Interven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异性恋白人男性：近期对文化史的一些临床研究》）*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92, no. 1（June 2005）: 136–157。

31. Gilbert, *Men in the Middle*.

32. 有关这一过程的概述，可参见 John D'Emilio, Estelle B. Freedman（约翰·德埃米利奥、埃斯特尔·B. 弗里德曼）,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亲密事务：美国性史》）, 2nd e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半个世纪纽

约市的性意识是如何转变的，尤其是从男同性恋的角度进行观察，参见George Chauncey（乔治·昌西），*Gay New York: Gender, Urban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 1890–1940*（《欢愉的纽约：性别、城市文化和男同性恋者世界的形成，1890—1940》）（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关于现代化时代的性、阶级和种族的交叉，参见 Mary Ting Yi Lui
223 （雷婷仪），*The Chinatown Trunk Mystery: Murder, Miscegenation, and Other Dangerous Encounters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华埠皮箱迷云：世纪之交纽约的谋杀、种族混合及其他危险遭遇》）（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关于犯罪、性别和性行为的交叉，参见 Angus McLaren（安格斯·麦克拉伦），*The Trials of Masculinity: Policing Sexual Boundaries 1870–1930*（《男子气概的考验：1870—1930年对性界限的管制》）（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33. 关于大萧条时期的性行为，请参见 Michelle Mitchell（米歇尔·米切尔），"A 'Corrupting Influence': Idleness and Sexualit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一种"腐败的影响"：大萧条时期的怠惰和性行为》）in *Interconnections: Gender and Race in American History*（《相互联系：美国历史中的性别和种族》）, ed. Carol Faulkner and Alison M. Parker（卡罗尔·福克纳、艾莉森·M. 帕克编）（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2）。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性的影响，参见 Alan Bérubé（艾伦·贝鲁贝），*Coming Out under Fire: The History of Gay Men and Women in World War II*（《在炮火下出柜：二战中男女同性恋者的历史》）（New York: Free Press, 1990），以及 Canaday, *The Straight State*。

34. Melanie Tebbutt (梅兰妮·特布特), *Women's Talk: A Social History of "Gossip" in Working-Class Neighbourhoods, 1880–1960* (《妇女的谈话：1880—1960年工人阶级邻里的"八卦"社会史》) (Aldershot, England: Scolar Press, 1995), 20.

35. Kathleen A. Feeley (凯瑟琳·A. 费利), "Gossip as News: On Modern U.S. Celebrity Culture and Journalism," (《作为新闻的八卦：论现代美国的名人文化和新闻业》) *History Compass* (《历史指南》) 10, no. 6 (2012): 467.

36. Patricia Meyer Spacks (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 *Gossip* (《八卦》)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34.

37. Spacks, 4.

38. Joke Hermes (乔克・赫尔墨斯), *Reading Women's Magazines: An Analysis of Everyday Media Use* (《阅读妇女杂志：对日常媒体使用的分析》) (London: Polity Press, 1995); Graeme Turner (格雷姆・特纳), *Understanding Celebrity* (《了解名流》), 2nd ed. (London: SAGE, 2014), 121–143.

39. Neal Gabler (尼尔・加布勒), *Winchell: Gossip, Power, and the Culture of Celebrity* (《温切尔：八卦、权力和名人文化》) (New York: Knopf, 1994), 80–81.

40. Kathleen A. Feeley and Jennifer Frost (凯瑟琳・A. 菲利、珍妮弗・弗罗斯特), "Introduction," (《导言》) *When Private Talk Goes Public: Gossip in American History* (《当私人谈话公开时：美国历史上的八卦》)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7.

41. Feeley, "Gossip as News," 468. 菲利所引为 Mary Beth Norton(玛丽・贝丝・诺顿), *In the Devil's Snare: The Salem Witchcraft Crisis of 1692* (《在魔鬼的圈套中：1692 年的塞勒姆巫术危机》) (New York: Vintage, 2003)；John Demos (约翰・德莫斯), *Entertaining Satan: Witchcraft and the Culture of Early New England* (《取悦撒旦：巫术与早期新英格兰文化》)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Terri L. Snyder (特里・L. 斯奈德), *Brabbling Women: Disorderly Speech and the Law in Early Virginia* (《嚼舌根的女人们：早期弗吉尼亚州的混乱言论和法律》)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塞勒姆女巫审判也是亚瑟・米勒 (Arthur Miller) 1953 年戏剧《熔炉》(*The Crucible*) 的背景，该剧被广泛解读为对八卦和谣言制造的社会恐慌如何促进麦卡锡主义发展的批判。

42. Feeley, "Gossip as News," 468.

43. Molly M. Wood (莫利・M. 伍德), "Diplomacy and Gossip: Information Gathering in the US Foreign Service, 1900–1940," (《外交与八卦：美国外交部门的信息收集工作，1900—1940》) in *When Private Talk Goes Public:*

Gossip in American History, ed. Kathleen A. Feeley and Jennifer Fro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40.

44. Wood, 151–152.

45. Ponce de Leon, 4.

46. 菲利和弗罗斯特在《当私人谈话公开时》一书中写了许多关于美国八卦史的文章。另见 Ponce de Leon, *Self-Exposure*。关于《机密》杂志兴衰的细节可参考以下资料：Mary Desjardins（玛丽·德雅尔丹）, "Systemizing Scandal: *Confidential* Magazine, Stardom, and the State of California,"（《丑闻系统化：〈机密〉杂志、明星和加利福尼亚州政府》）in *Headline Hollywood: A Century of Film Scandal*（《好莱坞头条：一个世纪的电影丑闻》）, ed. Adrienne McClean and David A. Cook（阿德里安·麦克林、大
224 卫·A. 库克编）（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Henry E. Scott（亨利·E. 斯科特）, *Shocking True Story: The Rise and Fall of* Confidential, *America's Most Scandalous Scandal Magazine*（《令人震惊的真实故事：美国最负盛名的丑闻杂志〈机密〉的兴衰史》）（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10）。

47. 文化评论家苏·布劳尔（Sue Brower）在1990年报道说，美国八卦杂志《星报》（*Star*）估计，每本杂志平均有 3.3 名读者阅读。《人物》（*People*）杂志的出版商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估计过类似的“传播率”。Sue Brower, "Inside Stories: Gossip and Television Audiences,"（《内幕：八卦与电视观众》）i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Language, Performance, Technology, and Media,"（《文化与交流：语言、表演、技术和媒体》）ed. Sari Thomas and William A. Evans（莎丽·托马斯、威廉·A. 埃文斯编）, special issue,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传播学研究》）4 (1990): 225–235.

第一章

1. Robert S. Lynd and Helen Merrell Lynd（罗伯特·S. 林德、海伦·梅里尔·林德）,

Middletown: A Study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9), 239. 林德夫妇估计，米德尔敦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订阅了《美国杂志》，这是一本热门月刊；订阅《星期六晚邮报》《麦考尔》《女士家庭杂志》的则略微少一些。

2. Lynd and Lynd, 242.

3. Lynd and Lynd, 242.

4. Lynd and Lynd, 499.

5. Lynd and Lynd, 500.

6. Lynd and Lynd, 501.

7. 这块地现在被用作国会山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停车场。许多传记作家形容这栋房子是灰泥外坯，但我能找到的唯一一张照片（藏于国会图书馆，肯尼斯·阿克曼［Kenneth Ackerman］的《年轻的埃德加》［*Young J. Edgar*］一书重印了这张照片）显示，它的外侧装有木质墙板。Kenneth D. Ackerman, *Young J. Edgar: Hoover and the Red Scare, 1919–20* (《年轻的埃德加：胡佛和红色恐慌，1919—1920》) (Falls Church, VA: Viral History Press, 2011).

8. 大部分传记作家把胡佛理解成一个成就斐然的官僚，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他冷酷而无情。这些作家的分歧在于他这样做的根本原因、特殊之处和深远意义。理查德·吉德·鲍尔斯（Richard Gid Powers）认为，是胡佛的抱负促使他成为 20 世纪最强势的政治家。Richard Gid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The Life of J. Edgar Hoover* (《秘密与权力：J. 埃德加·胡佛的一生》)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科特·金特里（Curt Gentry）认为，胡佛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正直品格，誓要以自己的传统思维为标尺，保护国家免受堕落糜烂的思潮和人群侵蚀。Curt Gentry, *J. Edgar Hoover: The Man and the Secrets* (《J. 埃德加·胡佛：其人其秘》)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亚森·西奥哈里斯（Athan G. Theoharis）和约翰·斯图尔特·考克斯（John Stuart Cox）强调，胡佛的独裁主义是如何削弱了美国宪法的保障。Athan G. Theoharis and John Stuart Cox, *The Boss: J. Edgar Hoover and the Great American Inquisition* (《老板：J. 埃德加·胡佛和美国大宗教裁判

所》)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最近，道格拉斯·查尔斯（Douglas Charles）和杰西卡·普利莱阐述了胡佛如何通过集结联邦调查局的力量，打击淫秽行为和制品，监视并折磨同性恋人士，建立“特工道德观”。Charles, *Hoover's War on Gays;* Pliley, *Policing Sexuality.* 我的观点和克莱尔·邦德·波特（Claire Bond Potter）的最为接近，她证实了“对犯罪宣战”不仅是司法斗争，同样也是文化运动。Claire Bond Potter, *War on*
225 *Crime: Bandits, G-Men, and the Politics of Mass Culture* (《对犯罪宣战：强盗、调查局特工和大众文化的政治性》)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8).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让读者了解到，胡佛的监视手段和宣传方式有助于启发后来的领导人——麦卡锡和科恩——使用同样的手段。

9.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6–8.

10. Gentry, 63.

11. 迪克森·N. 胡佛致约翰·埃德加·胡佛的信，1904年4月19日，J. 埃德加·胡佛收藏，国家执法博物馆，华盛顿特区，引自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12。

12.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8.

13.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12.

14. 语出乔治·艾伦，引自 Gentry, 63。

15. 成年后的胡佛显然不会在意这个绰号，但他其实只允许几个最亲密的朋友这样叫他，比如弗兰克·鲍曼（Frank Baughman）和克莱德·托尔森。

16. 有些记录说他有 5 英尺 7 英寸（约 1.7 米）高，有些则说是 5 英尺 10 英寸（约 1.78 米）。根据《纽约客》的记载，胡佛“几乎有 6 英尺高”。Jack Alexander (杰克·亚历山大), “Profiles: The Director— II,” (概况：负责人— II) *New Yorker*, October 2, 1937, 21.

17. Gentry, 65.

18. 参见 US Census Bureau（美国人口调查局）, “Table 13, Population of the 100 Largest Urban Places: 1900,”（“表 13，100 个最大的城市地区的人口：1900 年”）https://www.census.gov/population/www/documentation/twps0027/tab13.txt。

19.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9.

20.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22.

21. Jack Alexander, "Profiles: The Director—II," *New Yorker*, October 2, 1937, 21.

22. "Central High School Report of J. E. Hoover, 1911–1912," JEHMC.

23. Hester O'Neill (海丝特·奥尼尔), "J. Edgar Hoover's Schooldays (Part 4)," (《J. 埃德加·胡佛的在校生活（第四部分）》) *American Boy and Open Road* (《美国男孩和阳关大道》), September 1954, 22; J. Edgar Hoover, "Debate Memorandum Notebook," (辩论备忘录) JEHMC.

24. Jack Alexander, "Profiles: The Director—II," *New Yorker*, October 2, 1937, 21.

25.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30–31; Gentry, 61–62.

26. 语出胡佛在中区中学的同学，引自 Gentry, 66。

27. "Population, Housing Units, Area Measurements, and Density: 1790 to 1990," ("人口、住房单位、面积测量和密度：1790—1990")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prod/www/decennial.html.

28. Daylanne K. English (戴兰妮·K. 英格利希), *Unnatural Selections: Eugenics in American Modernism and the Harlem Renaissance* (《不自然的选择：美国现代主义和哈林文艺复兴中的优生学》)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37.

29. Peter Quartermain (彼得·夸特曼), *Disjunctive Poetics: From Gertrude Stein and Louis Zukofsky to Susan Howe* (《断章取义的诗学：从格特鲁德·斯坦因和路易斯·祖科夫斯基到苏珊·豪伊》)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0.

30. Howard P. Chudacoff (霍华德·P. 丘达科夫), *The Age of the Bachelor: Creating an American Subculture* (《单身汉时代：创造一种美国亚文化》)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31. 这里的"白领工作岗位"包括"文书人员、销售人员、政府雇员、技术人员和领薪专业人员"，人数从75.6万涨至560万之多。S. P. Hays（S. P. 海斯），*The Response to Industrialism*（《对工业主义的回应》）（1957），引自 Jeffrey P. Hantover（杰弗里·P. 汉托弗）, "The Boy Scouts and the Validation

of Masculinity,"（《童子军与男性气质的检验》） in *The American Man*《美国男人》, ed. Elizabeth Hafkin Pleck and Joseph H. Pleck（伊丽莎白·哈夫金·普莱克、约瑟夫·H. 普莱克编）（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0）, 291。

32. Kate Upson Clark (凯特·厄普森·克拉克), *Bringing Up Boys: A Study* (《如何教养男孩》) (New York: Thomas H. Crowell, 1899), 102.

33. Clark, 114, 117–120. 克拉克甚至没有提到拳击这项被乔·麦卡锡选中的运动，这可能是因为拳击的暴力本质和无产阶级属性。

34. Clark, 78–80.

35. Frank Orman Beck (弗兰克·奥尔曼·贝克), *Marching Manward: A Study of the Boy* (《迈向男人：一项关于男孩的研究》) (New York: Eaton & Mains, 1913), 41, 54–55.

36. Hantover, 289.

37. James E. West (詹姆斯·E. 威斯特), "The Real Boy Scout,"(《真正的童子军》) *Leslie's Weekly* (《莱斯利周刊》), no. 114 (1912), 448.

38. Beck, 96.

39. 新英格兰观察和护卫协会原名新英格兰反堕落协会，它在阻止伤风败俗的文学作品、电影、戏剧和音乐的传播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造出了一个新短语"波士顿（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大城市）禁售"（banned in Boston）。讽刺的是，这个标签反而刺激了这些作品的整体销量，并受到了作家、出版商和电影制作人的追捧。参见 Neil Miller（尼尔·米勒）, *Banned in Boston: The Watch and Ward Society's Crusade against Books, Burlesque and the Social Evil*（《波士顿禁售：观察和护卫协会对书籍、滑稽戏和社会罪恶的讨伐》）（Boston: Beacon Press, 2010）。

40. Chauncey, *Gay New York*, 147.

41. "Anthony Comstock Dies in His Crusade," (《安东尼·康姆斯托克在他的圣战中逝去》)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1915, 1. 另参见 Anna Bates（安娜·贝茨）, *Weeder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 Anthony Comstock's Life and Career*（《主的花园里的除草机：安东尼·康姆斯托克的生活和事业》）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Nicola Beisel（尼古拉·比塞尔）, *Imperiled Innocents: Anthony Comstock and Family Reproduction in Victorian America*（《身陷危机的羔羊：安东尼·康姆斯托克和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繁衍》）（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众多在线资料显示，胡佛还是个法学生时，就对康姆斯托克及其斗争手段“感到着迷”。但这种说法尚未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另外，尽管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反堕落协会有共同的利益，但在胡佛升任局长后，联邦调查局并未与其保持任何有意义的关系。关于约翰·萨克斯顿·萨姆纳，参见 Jay A. Gertzman（杰伊·A. 格茨曼）, “John Saxton Sumner of the 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 A Chief Smut-Eradicator of the Interwar Period,”（《纽约反堕落协会的约翰·萨克斯顿·萨姆纳：战间时期的首席污秽清除者》）*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美国文化期刊》）17, no. 2（June 1994）: 41–47。

42. Allan Hoben（艾伦·霍本）, *The Minister and the Boy: A Handbook for Churchmen Engaged in Boys' Work*（《牧师与男孩：从事男孩工作的教会成员手册》）(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2), 4.

43. 瑞秋·麦克布莱德·林赛（Rachel McBride Lindsey）近期的一篇论文研究了“强健派基督教”如何在性别、种族形成和宗教象征方面发挥了作用。Rachel McBride Lindsey, “‘The Mirror of All Perfection’: Jesus and the Strongman in America, 1893–1920,”（《“一切完美的镜子”：耶稣和美国的强人，1893—1920》）*American Quarterly* 68, no. 1 (March 2016): 23–47.

44. Hoben, 106.

45. William Byron Forbush（威廉·拜伦·福布什）, *The Boy Problem in the Home*（《家庭中的男孩问题》）(Boston: Pilgrim Press, 1915), 257.

46. 皮尔斯调查了八位大学教授关于“基督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 12 个人”的意见，然后得出了这个结论。在他收集到的96个名字中，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其中“只有拿破仑不是真正的基督徒”。Jason Noble Pierce（杰森·诺布尔·皮尔斯）, *The Masculine Power of Christ; or, Christ Measured as a Man*（《基督的男性力量；或，把基督当作人来衡量》）(Boston: Pilgrim Press, 1912), 5–6, 8.

47. Hoben, 11.

48. Eugene C. Foster (尤金·C. 福斯特), *The Boy and the Church* (《男孩与教会》) (Philadelphia: Sunday School Times Company, 1909), 53.

49. Foster, *The Boy and the Church*, 119.

50. Foster, *The Boy and the Church*, 138.

51. Pierce, 11.

52. Pierce, 14.

53. Robert Warren Conant（罗伯特·沃伦·科南特）, *The Virility of Christ: A New View*（《耶稣的男性气质：一种新观点》）（Chicago: the author, 1915），14，强调为原文所有。

54. Conant, 63–64.

55. Pierce, 2.

56. Conant, 330.

57. Clifford Putney (克利福德·普特尼), *Muscular Christianity: Manhood and Sports in Protestant America, 1880–1920* (《强健派基督教：美国新教中的男子气概和体育，1880—19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

58. Putney, 198.

59. Hoben, 81.

60. Hoben, 74–76.

61. Hoben, 79–80.

62. David Macleod (大卫·麦克劳德), *Building Character in the American Boy: The Boy Scouts, YMCA, and Their Forerunners, 1870–1920* (《培养美国男孩的性格：童子军、基督教青年会及其先驱，1870—192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 29.

63. Hoben, 69–70. 当然，最讽刺的是，到了 20 世纪中后期，基督教青年会在某些圈子里成了男性寻求同性欢爱的地方。

64. Don Whitehead (唐·怀特海德), "Hoover's 30 Years With FBI—From Hack Bureau To Top Agency," (《胡佛与联邦调查局的三十年——从杂务部门到顶

级机构》) *St. Petersburg Times* (《圣彼得堡时报》), May 9, 1954, 11-A.

65. Richard Harwood (理查德·哈伍德), "J. Edgar Hoover: A Librarian with a Lifetime Lease," (《J. 埃德加·胡佛：一个拥有终身租约的图书管理员》)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5, 1968, D1.

66.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15.

67. Session Records of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第一长老会会议记录), courtesy of Reverend Jerry Wheat (由杰里·惠特牧师提供), Archives Representative, National Presbyterian Church (全国长老会), Washington, D.C.

68. Don Whitehead, "Hoover's 30 Years With FBI—From Hack Bureau To Top Agency," *St. Petersburg Times*, May 9, 1954, 11-A. 228

69.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对《残次品》小说化的介绍，引自 Alan Axelrod（艾伦·阿克塞尔罗德），*Selling the Great War: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ropaganda*（《营销世界大战：美国宣传的形成》）（New York: Macmillan, 2009）, 118。

70.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33. 虽然名字叫“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但该组织也欢迎男性成为荣誉成员。

71. Gentry, 68. 疗养院的专长之一就是治疗精神衰弱，其典型症状是虚弱无力、精神紧张和极度疲劳，这种疾病实在太过流行，人们认为它某种程度上算是“现代生活”高度压力下的副产品，而男性白领是这种疾病的高发群体，因为他们从事的不是体力劳动。老迪克森来到疗养院时，疗养院由医生耶西·科金斯（Jesse Coggins）和科尼利厄斯·德威斯（Cornelius DeWeese）负责管理，二人在治疗精神疾病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Kevin Leonard (凯文·伦纳德), "Once a Laurel Landmark, Sanitarium Now Forgotten," (《曾经的桂冠地标，如今被遗忘的疗养院》) *Baltimore Sun* (《巴尔的摩太阳报》), July 10, 2014, http://www.baltimoresun.com/news/maryland/howard/laurel/ph-ll-history-sanitarium-0619-2014 0710-story.html#page=1.

72. Gentry, 67.

73. Andy Logan (安迪·洛根), "That Was New York—Talk of the Town," (《这

就是纽约——城里的话题》) *New Yorker*, August 14, 1965, 37–91.

74. Andy Logan, *The Man Who Robbed the Robber Barons* (《抢劫强盗大亨的男人》) (New York: W. W. Norton, 1965), 130.

75. Logan, *The Man Who Robbed*, 131–132.

76. 曼恩上校后来声称，是激进派共和党人从他手中偷走了胜利果实。Logan, *The Man Who Robbed*, 101–102; Robert R. Rowe (罗伯特·R. 罗尔), "Mann of Town Topics," (《〈都市话题〉中的曼恩》) *American Mercury* (《美国水星杂志》), July 1926, 272.

77. 1926 年，《美国水星杂志》报道称，曼恩上校最喜欢的餐点是“三块英式羊排，佐以烤山药和生菜、番茄、黄瓜沙拉，再配上至少两瓶陈年香槟”。Robert R. Rowe, "Mann of Town Topics," *American Mercury*, July 1926, 272.

78. Logan, *The Man Who Robbed*, 20, quoting a December 1895 issue of *Town Topics*.

79. "Mann Would Reform the Four Hundred," (《曼恩将改造名流》) *New York Times*, August 1, 1905, 7.

80. Logan, *The Man Who Robbed*, 139.

81. Logan, *The Man Who Robbed*, 139. 也可参见 Stephanie Foote (斯蒂芬妮·福特), "Little Brothers of the Rich: Queer Families in the Gilded Age," (《富人的小兄弟：镀金时代的同性恋家庭》)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国文学》) 79, no. 4 (December 2007): 701–724。

82. "Saunterings," ("闲逛") *Town Topics*, February 16, 1893, 7.

83. *Town Topics*, January 5, 1893, 1.《都市话题》最后一次这样宣传似乎是 1893 年 4 月 20 日的那期杂志，它的封面上印着“发行量保证突破 80000 册”。

84. Edwin Post (埃德温·博斯特), *Truly Emily Post* (《真实的艾米莉·博斯特》)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Company, 1961): 143. 塔士多公园是曼哈顿西北部的一个门禁式住宅区，这里是许多镀金时代上流精英的天堂，包括著名银行家约翰·皮尔蓬·摩根（J. P. Morgan）。

229 85. "Other People's Money," ("抢钱世界") *Town Topics*, February 16, 1893, 23.

86. *Town Topics*, August 22, 1895, 27–28.

87. 所有广告参见 *Town Topics*, January 5, 1893, 26。

88. *Town Topics*, April 27, 189327.

89. *Town Topics*, February 16, 1893, 23.

90. Logan, *The Man Who Robbed*, 24–28.

91. Robert Love (罗 伯 特 · 洛 夫), "Shakedown!: The Unfortunate History of Reporters Who Trade Power for Cash," (《敲诈勒索！：用权力换取现金的记者们的不幸历史》)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 45, no. 2 (May/June 2006): 47–51; Mark Caldwell (马克 · 考德威尔), "New York's School for Scandal Sheets," (《纽约的丑闻案学校列表》)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006, A25; Laura Claridge (劳拉 · 克拉里奇), *Emily Post: Daughter of the Gilded Age, Mistress of American Manners* (《艾米莉·博斯特: 镀金时代的女儿，美国礼仪的女王》)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167.

92. Will Straw (威尔 · 斯特劳), "Remembering the Creator of Modern Gossip Journalism," (《纪念现代八卦新闻的创造者》) *Hufington Post* (《赫芬顿邮报》), February 8, 2016, hufingtonpost.ca/will-straw-phd/gossip-king-stephen-g-clow_b_916 9414.html.

93. Will Straw, "Trafic in Scandal: The Story of *Broadway Brevities*," (《丑闻追踪：〈百老汇简讯〉的故事》)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多伦多大学季刊》) 73, no. 4 (Fall 2004): 950.

94. "'Brevities' Owners Indicted for Fraud," (《〈简讯〉所有者因诈骗罪被起诉》) *New York Times*, May 6, 1924, 8.

95. "Night No. 5 in Fairyland," (《仙境中的第五夜》) *Broadway Brevities and Society Gossip* (《百老汇简讯与社会八卦》), May 1924.

96. "Night No. 11 in Fairyland," (《仙境中的第十一夜》) *Broadway Brevities and Society Gossip*, November 1924, 32；省略为原文所有。

97. "Night No. 11 in Fairyland," *Broadway Brevities and Society Gossip*, November 1924, 35–36.《百老汇简讯》虽然在销量上取得了成绩，但最终因克洛的敲诈勒索行为被曝光而倒闭。之所以对《百老汇简讯》开展调查，一个原因

是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力图控制低俗出版物的发行和传播。克洛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服刑两年后出狱，并试图重新创办《百老汇简讯》，然而收效甚微。他穷困潦倒，婚姻失败，于 1941 年 6 月在贝尔维尤医院去世，终年 67 岁。"Stephen Clow Dies at 67," (《斯蒂芬·克洛去世，终年 67 岁》) *New York Times*, June 7, 1941, 19.

第二章

1. Brian Burrough (布莱恩·伯勒), *Public Enemies: America's Greatest Crime Wave and the Birth of the FBI, 1933–34* (《公众之敌：美国最大犯罪潮和联邦调查局的诞生，1933—1934》)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538–542. 需要注意的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急着逮捕卡皮斯时忘了带上"手铐"，而不得不从自己的脖子上扯下领带捆住了卡皮斯及其同伙。
2. "Karpis Captured in New Orleans by Hoover Himself," (《卡皮斯在新奥尔良被胡佛亲自抓获》) *New York Times*, May 2, 1936, 1; "Hoover Leads 20 Agents in Arresting Nation's No. 1 Outlaw," (《胡佛率 20 名特工逮捕了全国第一大逃犯》) *Washington Post*, May 2, 1936, 1.
3. Burrough, 538–542.
4. Alvin Karpis and Bill Treat (阿尔文·卡皮斯、比尔·特里特), *The Alvin Karpis Story* (《阿尔文·卡皮斯的故事》) (New York: Ishi Press, 2011), 230.

230

5. "J. Edgar Hoover Is Quizzed about Work as Sleuth," (《J. 胡佛被问及作为侦探的工作情况》) *Chicago Daily Tribune*, April 17, 1936, 3.
6. "Hoover Leads 20 Agents in Arresting Nation's No. 1 Outlaw," *Washington Post*, May 2, 1936, 1.
7. Lemuel F. Parton (莱缪尔·F. 帕顿), "Beer Bottle Fingerprint Led to Karpis Gang Doom: Writer Learns How J. E. Hoover's Men Work in Battle against Organized Criminals," (《啤酒瓶上的指纹导致了卡皮斯团伙的灭顶之灾：笔者了解到 J. E. 胡佛的手下如何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战斗中工作》) *Los*

Angeles Times, May 14, 1936, 21.

8. "Seize Karpis; Fly Him Away," (《捉拿卡皮斯；或任其逍遥法外》) *Chicago Daily Tribune*, May 2, 1936, 1.《洛杉矶时报》和《亚特兰大宪法报》也用了"亡命之徒"一词。

9. 语出埃德加·胡佛，引自 "Karpis Begs to Be Killed," (《卡皮斯乞求被处死》) *Los Angeles Times*, May 4, 1936, 14。

10. 语出埃德加·胡佛，引自 "Karpis Frightened So He Couldn't Talk," (《卡皮斯被吓得不能说话》) *Washington Post*, May 3, 1936, M4。

11. "Seize Karpis; Fly Him Away," *Chicago Daily Tribune*, May 2, 1936, 1.

12.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41–42. 给胡佛介绍这份工作的是其表兄威廉·希茨（William Hitz），希茨曾为司法部长托马斯·格里高利（Thomas Gregory）工作，后来做了哥伦比亚特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13. Jack Alexander, "Profile: The Director—II," *New Yorker*, October 2, 1937, 21. 亚历山大得出结论，胡佛的上级认为他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说服他在世界大战期间继续干下去"。虽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亚历山大的描述，但看结论就知道，这位记者与联邦调查局公共关系部门代表的立场一致。

14. Ovid Demaris (奥维德·德马里斯), *The Director: An Oral Biography of J. Edgar Hoover* (《支配者：J. 埃德加·胡佛口述传记》) (New York: Harpers' Magazine Press, 1975), 51. 胡佛一生都以其优雅品味而出名，1950 年《华盛顿邮报》将他评为华盛顿十大最佳着装男性之一。Gregory Carmichael (格雷戈里·卡迈克尔), "Washington's List of Ten Best-Dressed Men," (《华盛顿十大最佳着装男士名单》)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 1950, S5.

15. 关于公众对道德监管的呼吁，参见 Pliley, 85。

16.《白奴贩运法》第二条规定，任何因违反该法案而被捕的人"将被视为犯有重罪，一经定罪将被处以不超过 5000 美元的罚款，或不超过五年的监禁，或二者兼有，具体处罚由法院酌情决定"。这项法案自 1910 年 6 月 25 日通过并沿用至今，目前每项罪名的最高监禁年限为十年。参见 US Legal Code Title 18, part I, chapter 117, subsection 2421。法案原文见 Senate Document 702 of the 61st Congress, 3rd Session（December 13, 1910）。

17. Pliley, 132–135. 普利莱指出，同一时期因《曼恩法》定罪的案件只有 6335 起。不过，过分关注起诉与定罪的比例，会忽视调查局在代表国家谴责这种行为方面发挥的作用。定罪与否并非影响人们行为的唯一途径。

231 18. J. Edgar Hoover, "Accomplishment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uring the Fiscal Year Ending June 30, 1940," (《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截至 1940 年 6 月 30 日的财年成果》) July 31, 1940, 3,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19. James H. Hallas (詹姆斯·H. 哈拉斯), *Doughboy War: The 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 in World War I* (《"面团男孩"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远征军》)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1.

20. 有关淫秽档案的历史，参见 Douglas M. Charles, *The FBI's Obscene File: J. Edgar Hoover and the Bureau's Crusade against Smut* (《联邦调查局的淫秽档案：J. 埃德加·胡佛和调查局的反淫秽斗争》)（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2）。有关 1923—1925 年间的净化图书运动，参见 Paul S. Boyer（保罗·S. 博耶）, *Purity in Print: Book Censorship in American from the Gilded Age to the Computer Age* (《印刷品的纯洁性：从镀金时代到计算机时代的美国书刊审查制度》), 2nd ed.（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2）, 99–127。博耶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净化图书运动反而对纽约反堕落协会及其领导人约翰·萨姆纳造成了不良影响，二者都因试图监管大众读物而受到嘲笑。另外，博耶还认为净化图书运动是纽约反堕落协会这个庞大组织垮台的开端。

21. 1944 年 8 月 25 日联邦调查局备忘录（FBI document 80-662-[40?]）, 引自 Charles, *The FBI's Obscene File*, 22。

22. J. Edgar Hoover, "Pioneering in Honesty," (《诚信的先锋》) commencement address delivered at Oklahoma Baptist University (在俄克拉荷马浸会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Shawnee, May 23, 1938, 7,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23. J. Edgar Hoover, "No More Cops!," (《警察已经够多了！》)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6, 1938, I2.

24. Potter, *War on Crime*, 189–194.

25. 参见Alfred McCoy, *Policing America's Empire*（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9）。

26.《曼恩法》具有明确的州际性质，并通过监管联邦控制的邮政系统来规范淫秽行为，因此联邦机构的参与是正当合理的。

27. 出自 1925 年 5 月胡佛写给负责此事的特工的备忘录。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144.

28. "A Byte Out of History: 'Machine-Gun Kelly' and the Legend of the G-Men,"（《历史上的一个字节："机枪手凯利"和调查局特工的传说》）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Stories: September 29, 2003, https://www.fbi.gov/news/stories/2003/september/kelly092603. 调查局的这则轶闻出现的同一时间，其他媒体也赋予了调查局特工专属称谓。1933 年 8 月，《科利尔杂志》一篇文章称其为"埃德加手下的特工"（D of J men）。Ray Tucker（雷·塔克）, "Hist, Who's That?,"（《希斯特，那是谁？》）*Collier's* 92 (August 19, 1933): 15, 49. 在某个联合报纸专栏中，胡佛本人也复述了机枪手凯利这个故事中的要素。J. Edgar Hoover, "G-Heat Stays Hot,"（《调查局狂热依旧旺盛》）*Los Angeles Times*, June 5, 1938, I10.

29. Angel Kwolek-Folland（安杰尔·柯欧拉克－福朗）, *Engendering Business: Men and Women in the Corporate Office, 1870–1930*（《塑造商业形象：公司办公室里的男女，1870—1930》）(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47.

30. Pettegrew, 16.

31. Pettegrew, 40.

32. Cindy Sondik Aron（辛迪·桑迪克·阿隆）,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Civil Service: Middle-Class Workers in Victorian America*（《文职部门的女士和先生们：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工人》）(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88.

33. Kwolek-Folland, 48–49. 柯欧拉克－福朗还表示，"宗教可以引领成功，因为它不仅在道德上正确无误，而且使人身心强健。相应地，道德高尚证明了一个人具备相应的工作技能与男子气概"。 232

34. 传记作家理查德·吉德·鲍尔斯写道："胡佛上任刚满一年，就裁减了 61 名雇员，撤销了 5 个外地办事处（共 53 个），还从 240 万美元的预算拨款中返还了 30 万美元。上任十年后，他手下的雇员缩水至 581 人，其中 339 人为特工，远低于 1920 年调查局的人数巅峰（1127 人中 579 人为特工），外地办事处则减少至 30 个。1932 年底，外地办事处的数量降至最低，只剩 22 个。"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151.

35. Kwolek-Folland, 73. 对企业管理来说，科学管理理论同样是一种性别化理解。"工作过程可以被衡量，且受到技术进步和工作专业化不断提高的影响，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很难想象做到个性十足和白手起家，通过工作可以实现阶级流动，历经商海沉浮证明自己男子气概十足，明白体力劳动和持久耐力的价值……理性管理将中产阶级男子气概的信条拒之门外，从而扼杀了其自我评价的可能。然而，系统管理关于社会的机械性观点为男性气质的表达提供了其他途径：学习专业知识，发展诸如理性等男性特有的品质，以及攫取掌控他人（而非让自己被掌控）的权力。男性气质的表达方式包括合理地实践机械性的盈亏法则，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与枯燥乏味、女性化的文书类工作划清界限。" Kwolek-Folland, 73–74.

36. 有关胡佛自己对特工申请人的描述，参见 J. Edgar Hoover, "The Work of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调查局的工作》）*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美国政治学期刊》）2, no. 2（March–April 1931）: 103。

37. C. D. White (C. D. 怀特), "Report on Applicant for Position as Special Agent: Clyde Tolson," (《关于特别探员职位申请人的报告：克莱德·托尔森》) February 7, 1928 (document 76-9524-15, FBI Files, National Archives). 这句"对女性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出自美国战争部的执行秘书约翰·马廷（John Martyn）之口。

38. Potter, *War on Crime*, 49. 众所周知，胡佛非常偏爱这些组织，有些新闻记者甚至开始称调查局特工为"胡佛的童子军"。Walter Trohan (沃尔特·特罗安), "J. Edgar Hoover: The One-Man Scotland Yard," (《J. 埃德加·胡佛：一个人的苏格兰场》) *Chicago Daily Tribune*, June 21, 1936, D1.

39. J. Edgar Hoover, "Your Task as a Citizen: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 (《你作为一个公民的任务：在美国青年商会全国大会上的讲话》) Tulsa, OK, June 21, 1939, 1,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40. 1935 年，联邦调查局警察培训学院成立，面向美国各地的执法官员传授正确的调查方法。这所学院也深受这套计划的影响，开设了类似的课程。"A Milestone in Police Training: Seventy-Five Years Ago," (《警务培训中的一个里程碑：七十五年前》)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Stories, July 29, 2010, http://www.fbi.gov/news/stories/2010/july/national-academy.

41.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223–224.

42. 调查局内部的篮球队办得很成功，甚至赢下了 1932 年政府联盟篮球比赛的冠军。参见 George D. Riley（乔治·D. 莱利）, "The Federal Diary," (《联邦日志》)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 1933, 4。

43. Don Whitehead, *The FBI Story: A Report to the People* (《联邦调查局故事：给人民的报告》)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70–71. 233

44. 对这一观念的更全面检视，参见 Pettegrew, *Brutes in Suits*。

45.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265.

46. J. Edgar Hoover, "Your Future Task: Address at Commencement Exercis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你未来的任务：在南方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Sewanee, TN, June 9, 1941, 2,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47. 胡佛对大众媒体的兴趣由来已久，他 11 岁时就出版了自己的报纸（1 美分 1 份），报道家人和西沃德广场邻里街坊的新闻。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20–22.

48. 胡佛致梅尔文·珀维斯的信，1931 年 8 月 18 日（附于 V. W. 休斯给胡佛的备忘录，1931 年 8 月 15 日，FBI 档案号 67-7489-168），引自 Potter, *War on Crime*, 54。

49. Walter Winchell (沃尔特·温切尔), "Winchell on Broadway," (《温切尔论百老汇》) *New York Daily Mirror*, September 24, 1935, 10.

50. J. Edgar Hoover, "Editorial Comment: The Task of the Teacher," (《社论：教师的任务》) *Phi Beta Kappan* (《斐·贝塔·卡潘》) 22, no. 7 (March 1940),

329–330; J. Edgar Hoover, "Is There a Spy Menace?," (《那是间谍威胁吗？》)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亚特兰大宪法杂志》), July 14, 1940, B2; J. Edgar Hoover, "Juvenile—or Public—Delinquency?," (《少年犯罪，或公共犯罪？》)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19, 1937, J10; J. Edgar Hoover, "The Woman in Crime," (《罪案中的女人》)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17, 1937, J2; J. Edgar Hoover, "Is the Army Breeding Criminals?," (《军队是否在培养罪犯？》)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1, 1945, F4.

51. J. Edgar Hoover, "Fifty Years of Crime: Corruption Begets Corruption: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Fifty Years in Business Club, Nashville, Tennessee, May 20, 1939," (《五十年来的犯罪：腐败导致腐败：1939 年 5 月 20 日，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全国商业俱乐部五十年纪念讲话》)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当天重要演说》), June 1, 1939, 507.
52. J. Edgar Hoover, "Firearms Training in the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枪械培训》) *Leatherneck*, September 1939, 5–8.
53. J. Edgar Hoover, "M-Day for the FBI," (《联邦调查局的动员日》)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11, 1940, 14.
54. J. Edgar Hoover, "The Cost of Crime," (《犯罪的代价》) *Chicago Sun* (《芝加哥太阳报》), January 16, 1938, SM2.
55. J. Edgar Hoover, "We Prove Them Innocent," (《我们证明了他们的清白》) *Chicago Sun*, October 29, 1944, MS2.
56. Mary Elizabeth Strunk (玛丽·伊丽莎白·斯特朗克), *Wanted Women: An American Obsession in the Reign of J. Edgar Hoover* (《被通缉的女人们：J. 埃德加·胡佛统治时期的美国执念》)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25.
57. Emma Bugbee, "J. Edgar Hoover Asks Women to Aid in Crime Fight," (《J. 埃德加·胡佛要求妇女协助打击犯罪》)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纽约先驱论坛报》), May 18, 1938, 15.
58. "J. Edgar Hoover Pleads for Family Religious Life," (《J. 埃德加·胡佛为家庭宗教生活辩护》)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 1948, 10.

59. J. Edgar Hoover, "Pioneering in Honesty: Commencement address delivered at Oklahoma Baptist University," Shawnee, May 23, 1938, 7,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60. Erica J. Ryan (埃里卡·J. 瑞安), *Red War on the Family: Sex, Gender, and Americanism in the First Red Scare* (《对家庭的红色战争：第一次红色恐慌中的性、性别和美国主义》)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61. J. Edgar Hoover, "Address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22nd Annual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Legion," (《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第 22 届年度全国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Boston, September 23, 1940, 3–4,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62. J. Edgar Hoover, "Men of Tomorrow: Address before the Boy Scout Day Celebration at the New York World's Fair," (《明日之子：在纽约世界博览会的童子军日庆祝活动上的讲话》) New York, June 29, 1939, 3,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强调为原文所有。 234

63. Hoover, "Men of Tomorrow," 3；强调为原文所有。

64. J. Edgar Hoover, "Your Task as a Citizen: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 Tulsa, June 21, 1939, 1,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65. J. Edgar Hoover, "Your Future Task: Address at Commencement Exercis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Sewanee, TN, June 9, 1941, 1,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66. Hoover, "Your Future Task," 1.

67. Hoover, "Your Future Task," 4–5.

68. 这句套话由胡佛本人签名，通过邮件寄送给《调查局特工》的影迷作为回复。Richard Gid Powers, *G-Men: Hoover's FBI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调查局特工：美国流行文化中的胡佛的联邦调查局》)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3), 53.

69. 调查局特工起初也曾获准使用枪械，但该许可于 1924 年被取消了。

70. 在剧本中，格里高利其人"39 岁左右，面容坚毅，年纪轻轻便身居高位"。

Powers, *G-Men*, 61. 而电影上映这年胡佛恰好 39 岁。

71. Powers, *G-Men*, 61.

72.《黑手党女王》的主演是赫达·霍珀（Hedda Hopper），她作为演员咖位不大，后来成为全美最受欢迎的八卦专栏作家之一而出名。

73. 当今时代，系列电影基本已成为好莱坞的历史遗产，它是连续发行的真人演出作品，通常围绕至尊神探、佐罗、飞侠哥顿、惊奇队长等单个主角展开。大多数系列电影由 15 集组成，每集 15 到 20 分钟，在电影院的多功能展厅放映，目标群体是青少年观众。更多信息可参见 Buck Rainey（巴克·雷尼），*Serials and Series: A World Filmography, 1912–1956*（《连续剧和系列片：世界电影目录，1912—1956》）（Jefferson, NC: McFarland Books, 2010）。

74.《惩恶锄奸》《联邦调查局由你掌控》《少年特工的真实冒险》完整版可在互联网档案馆（www.archive.org）观看。

75. 这部漫画的作者是达希尔·哈米特，他的作品还有侦探小说《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哈米特后来成为麦卡锡主义的攻击目标。20 世纪 30 年代后，联邦调查局的名字被有意隐去，改用“某匿名秘密机构”。Bruce Canwell (布鲁斯·坎威尔), “Craft and Tradecraft,” (《手段和谍报技术》) in *Secret Agent X-9* (San Diego: IDW Publishing, 2015), 5.

76. Powers, *G-Men*, 134. 雷克斯·科利尔也是广播剧《惩恶锄奸》的创始人之一。

77. Susan L.Cook and Karen Krupar (苏珊·L. 库克、凯伦·克鲁帕), “Defi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Impacting the Twenty-First: Semantic Habits Created through Radio and Song: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 (《定义 20 世纪，影响 21 世纪：通过广播和歌曲创造的语义习惯： 一般语义学的回顾》) *Et Cetera* (《诸如此类》) 67, no. 4 (October 2010): 416.

78. Ray Tucker, “Hist, Who’s That?,” *Collier’s*, August 19, 1933, 49.

79. Peter Carter (彼得·卡特), “Peter Carter Says . . .” *Washington Herald*, August 3, 1933.

80. Ray Tucker, “Hist, Who’s That?,” *Collier’s*, August 19, 1933, 49.

81. Peter Carter, “Peter Carter Says...,” *Washington Herald*, August 28, 1933. 此后余生，胡佛都被批评者以“迈着小碎步”影射他的同性恋取向。1967 年，

在写给自由党报纸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Drew Pearson）的信中，威廉·莱因博尔德（William Reinbold）的表述几乎与“迈着小碎步”完全相同：“我一直都有听说埃德加·胡佛是个同性恋。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难以置信，但并非绝无可能。他厌恶女性，走路时扭捏作态，为人睚眦必报，出席公众场合常常由英俊的男性陪同，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William Reinbold to Pearson, folder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box G-273 (1 of 3), Pearson Papers.

82. Walter Trohan, “J. Edgar Hoover: The One-Man Scotland Yard,” *Chicago Daily Tribune*, June 21, 1936, D1.

83. 史密森学会实际上将其描述为“薰衣草（？？）”。“Eleanor Roosevelt’s 1933 Inaugural Ceremonies Dress, 1933,” (“埃莉诺·罗斯福的 1933 年就职典礼礼服”) https://americanhistory.si.edu/collections/search/object/nmah_491671. 关于“埃莉诺蓝”一词的使用，参见 Blanche Wiesen Cook（布兰奇·维森·库克）, *Eleanor Roosevelt*, vol. 2: *The Defining Years, 1933–1938*（《埃莉诺·罗斯福 第二卷：决定性的年代，1933—1938》）（New York: Viking Press, 1999）, 14。关于“薰衣草”一词作为同性恋标志的历史，参见Gershon Legman(格申·莱格曼), “The Language of Homosexuality,”(《同性恋的语言》) in *Gay/Lesbian Almanac: A New Documentary*（《男女同性恋者年鉴：一部新档案》）, ed. Johnathan Ned Katz（约翰纳森·内德·卡茨编）(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571–584; 以及 Judy Grahn(朱迪·格拉恩）, *Another Mother Tongue: Gay Words, Gay Worlds*（《另一种母语：同性恋的话语，同性恋的世界》）（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3–17。

84. 《自由》杂志，引自 Richard Harwood, “J. Edgar Hoover: A Librarian with a Lifetime Leas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5, 1968, D1。

85. Don Whitehead, “Hoover’s 30 Years with FBI—From Hack Bureau to Top Agency,” *St. Petersburg Times*, May 9, 1954, 11-A.

86. “Memo: FBI Agent to Conroy, 27 June 1944,”（《备忘录：联邦调查局特工致康罗伊，1944 年 6 月 27 日》）Official and Confidential File（正式和机密档案）, folder 75, 引自 Theoharis and Cox, *The Boss: J. Edgar Hoover and*

the Great American Inquisi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8；"Memo: FBI Agent to Hoover, 30 June 1943,"（《备忘录：联邦调查局特工致胡佛，1943年6月30日》）Official and Confidential File, folder 75 (reel 12, frame 750 of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microfilm)。

87. Theoharis and Cox, *The Boss*, 208–212.

88. "Memo: FBI Assistant Director Louis Nichols to FBI Associate Director Clyde Tolson, 20 June 1951,"（《备忘录： 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路易斯·尼科尔斯致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克莱德·托尔森，1951年6月20日》）引自 Athan Theoharis（阿森·西奥哈里斯）, *From the Secret Files of J. Edgar Hoover*（《来自 J. 埃德加·胡佛的秘密文件》）（Chicago: Ivan R. Dee, 1993）, 353–354。

89.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 1933, 引自 Potter, *War on Crime*, 48。

90. Lemuel F. Parton, "Beer Bottle Fingerprint Led to Karpis Gang Doom: Writer Learns How J. E. Hoover's Men Work in Battle Against Organized Criminals," *Los Angeles Times*, May 14, 1936, 21.

91. Samuel Bernstein（塞缪尔·伯恩斯坦）, *Mr. Confidential: The Man, His Magazine, & the Movieland Massacre that Changed Hollywood Forever* (《机密先生: 那个男人，他的杂志，以及永远改变了好莱坞的电影界大屠杀》) (West Hollywood, CA: Walford Press, 2006), 50.

236 92. Gentry, 512.

93. Gabler, *Winchell*, 197–202. 温切尔甚至在暗杀公司首脑路易斯·"莱普克"·布查尔特（Louis "Lepke" Buchalter）的投降谈判中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从而帮助胡佛抓获了莱普克。Gabler, 274–280.

94. Gentry, 329.

95. 胡佛致温切尔的信，1935年8月8日，引自 Gabler, 202。

96. Walter Winchell, "Walter Winchell on Broadway: G-Men about Town," *New York Daily Mirror*, September 29, 1935, 10.

97. Potter, *War on Crime*, 128–130.

98. 有人认为照片中的女郎是模特兼肥皂剧演员路易莎·斯图尔特。斯图尔

特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再度出名，她向为胡佛作传的安东尼·萨默斯表示，1936 年除夕夜，她曾目睹胡佛和托尔森坐在一辆豪车中，十指紧扣。

99. Marylyn Reeve (玛丽莲·里夫), "Lawyer, G-Man, Sailor, Diplomat Offered as This Week's 'Eligibles,'" (《律师、调查局特工、水手、外交官被列为本周的黄金单身汉》)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4, 1936, S4.

100. "Murphy Goes East 'Til July," (《墨菲在东部停留至七月》) *Los Angeles Times*, May 28, 1939, A1. 1952 年，胡佛被美国单身汉俱乐部评为世界十大黄金单身汉之一。同样出现在名单上的还有马龙·白兰度，这很好地证明了胡佛经久不衰的名流身份。"Here They Are, Girls!: World's Most Eligible Bachelors Chalked Up," (《他们来了，姑娘们！：世界上最优质的单身汉粉墨登场》)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9, 1952, 10.

101. Jessie Ash Arndt (杰西·阿什·阿恩特), "Boys in Neighborhood Turn Heat on J. Edgar Hoover," (《街头男孩陷入 J. 埃德加·胡佛狂热》) *Washington Post*, July 30, 1940, 13.

102. J. Edgar Hoover, "If I Had a Son...," (《如果我有一个儿子……》) *Woman's Day*, June 1938,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103. J. Edgar Hoover, "Our Future: Address at Commencement Exercis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我们的未来：在圣母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South Bend, IN, May 10, 1942, 4,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104. J. Edgar Hoover, "Law Enforcement in a Crisis: Address before the Annual *New York Herald-Tribune* Forum," (《危机中的执法工作：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年度论坛上的讲话》) New York, October 24, 1939, 1,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105. J. Edgar Hoover, "Law Enforcement in a Crisis: Address before the Annual *New York Herald-Tribune* Forum," New York: October 24, 1939, 2,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106. 出自 1938 年 9 月 19 日胡佛在洛杉矶面向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发表的演说。"'Twin Ism Evils' Hit by J. Edgar Hoover," (《J. 埃德加·胡佛对"两种邪恶主义"的打击》)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 1938, 25.

107. J. Edgar Hoover, "The Test of Citizenship: Address to the 49th Continental Congress of the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公民身份的考验：在美国革命女儿会第 49 届大陆会议上的讲话》) Washington, DC, April 18, 1940, 7,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108. 这一点的深入阐述，参见 Canaday, *The Straight State*。

109. Stuart, *Crea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Hogan, *A Cross of Iron*.

110. 德布斯最终只服完了一半的刑期。参见 Nick Salvatore（尼克·萨尔瓦托雷）, *Eugene V. Debs: Citizen and Socialist*（《尤金·V. 德布斯：公民和社会主义者》）（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237

111.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104.

112. Theoharis and Cox, *The Boss*, 59. 有关美国无政府主义的更多信息，参见 Kenyon Zimmer（凯尼恩·季默）, *Immigrants against the State: Yiddish and Italian Anarchism in America*（《反对国家的移民：美国的犹太人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

113. Betty Medsger (贝蒂·梅德斯格), *The Burglary: The Discovery of J. Edgar Hoover's Secret FBI* (《入室盗窃案: 发现J.埃德加·胡佛的秘密联邦调查局》) (New York: Vintage, 2014), 523.

114. J. Edgar Hoover, "Memorandum for Mr. Creighton,"（《给克雷顿先生的备忘录》）August 23, 1919, Emma Goldman Papers（《埃玛·戈尔德曼文件》）,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引自 Kathy E. Ferguson（凯西·E. 弗格森）, "Discourses of Danger: Locating Emma Goldman,"（《危险的话语： 定位埃玛·戈尔德曼》） *Political Theory*（《政治学理论》） 6, no. 5（October 2008）: 735–761。

115. Richard Harwood, "J. Edgar Hoover: A Librarian with a Lifetime Leas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5, 1968, D1.

116. 1932 年的《联邦反绑架法案》（又称《林德伯格法案》）对联邦政府的司法管辖权扩张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法案出台的背景是美国杰出飞行员林德伯格的幼子查尔斯·林德伯格被绑匪劫持并杀害，自此，绑架在联邦范围内成为一项犯罪行为。

117. Theoharis and Cox, *The Boss*, 151.

118. Theoharis and Cox, *The Boss*, 150–151. 关于这两次会议的内容出自 1936 年8月24日和8月25日胡佛提交给自己办公室和机密档案室的机密备忘录。

119. Theoharis and Cox, *The Boss*, 151.

120. Powers, *Secrecy and Power*, 274.

121. J. Edgar Hoover, "Accomplishment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uring the Fiscal Year Ending June 30, 1940," July 31, 1940, 2–3,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122. J. Edgar Hoover, "Law Enforcement in a Crisis: Address before the Annual *New York Herald-Tribune* Forum," New York, October 24, 1939, 3,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123. J. Edgar Hoover, "Address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22nd Annual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Legion," Boston, September 23, 1940, 3,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124. J. Edgar Hoover, "Accomplishment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uring the Fiscal Year Ending June 30, 1940," July 31, 1940, 3, Marquette University Archives.

125. 出自 1939年11月30日胡佛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发表的证词。科特·金特里指出，拘禁名单"会进行定期修订来更新敌对人士，后更名为安全名单和管理名单，并衍生出其他类似的清算名单，如候补名单（又称共产主义名单）、煽动者名单等"。Gentry, 213.

126. Theoharis and Cox, *The Boss*, 171.

127. Theoharis and Cox, *The Boss*, 193–198.

第三章　238

1. Jack Anderson and Ronald W. May (杰克·安德森、罗纳德·梅), *McCarthy: The Man, the Senator, the "Ism"* (《麦卡锡：那个男人，那位参议员，那种"主

义”》) (Boston: Beacon Press, 1952), 23.

2. Lately Thomas (雷特利·托马斯), *When Even Angels Wept: The Senator Joseph McCarthy Affair—a Story without a Hero* (《连天使都垂泪之时：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事件——一个没有英雄的故事》) (New York: Morrow, 1973), 10.

3. 麦卡锡的拳击生涯也预示着他在惠灵市演讲之后的政治轨迹：开始时是炙手可热的政治新星，最终却跌落云端。

4. Anderson and May, *McCarthy*; Richard H. Rovere (理查德·H. 罗维尔), *Senator Joe McCarthy* (《参议员乔·麦卡锡》)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9); Thomas C. Reeves (托马斯·C. 里夫斯),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e McCarthy* (《乔·麦卡锡的生平与时代》)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82); William Bragg Ewald (威廉·布拉格·埃瓦尔德), *Who Killed Joe McCarthy?* (《谁杀死了乔·麦卡锡？》)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安德森的专著起初以“来自威斯康星州的野蛮人”为噱头进行宣传。“Anderson–McCarthy Outline,” (“安德森——麦卡锡纲要”) box G221, 2 of 3, Pearson Papers.

5. David Oshinsky (大卫·奥辛斯基), *A Conspiracy So Immense: 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 (《一个巨大阴谋：乔·麦卡锡的世界》)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6. 我对麦卡锡的理解与奥辛斯基非常相似，在为麦卡锡作传时，奥辛斯基深入客观地回顾了他的生平。但奥辛斯基偏向于全面刻画麦卡锡的性格，本书则侧重描写麦卡锡推动政治身份发生关键变化的方式。

6. Anderson and May, 8.

7. Oshinsky, 6–7.

8. Oshinsky, 9.

9. Oshinsky, 9–10; Michael O'Brien (迈克尔·奥布莱恩), *McCarthy and McCarthyism in Wisconsin* (《麦卡锡和威斯康星州的麦卡锡主义》)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1), 10.

10. Oshinsky, 13.

11. Oshinsky, 13; Jeffrey S. Kinsler (杰弗里 · S. 金斯勒), "Joseph McCarthy, the Law Student," (《法学生约瑟夫 · 麦卡锡》) *Marquette Law Review* (《马凯特法律评论》) 85, no. 2 (Winter 2001): 469–470.
12. 参见 Kinsler, 470。
13. Anderson and May, 26–27.
14. Oshinsky, 14.
15. 语出埃德 · 哈特，引自 Oshinsky, 16。
16. Oshinsky, 19.
17. "Deposition of Senator Joseph McCarthy in the case of *Pearson v. McCarthy et al.*," (《参议员约瑟夫 · 麦卡锡在皮尔森诉麦卡锡等人一案中的证词》) September 26, 1951, F132, box 1 of 4, Pearson Papers. 麦卡锡的合伙人迈克 · 埃伯莱因同样觊觎巡回法官的位置，麦卡锡可能私下对他表示过支持，但到了选举的时候却在票数上超过了他。Oshinsky, 19–20.
18. Anderson and May, 38–39.
19. Oshinsky, 25–27.
20. M. DeGroot to Associated Press, June 23, 1942,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lder "A," box 1, series 1, McCarthy Papers.
21. McCarthy to *Milwaukee Journal*, June 22, 1942,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lder "Mi–Mz," box 3, series 1, McCarthy Papers. 239
22. McCarthy to Klapp, January 1, 1942,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lder "K," box 3, series 1, McCarthy Papers.
23. War Production Board to McCarthy, March 9, 1942,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lder "Ba–Bo," box 1, series 1, McCarthy Papers.
24. Blair Fraser (布雷尔 · 弗雷泽), "The Spectre of Senator McCarthy," (《麦卡锡参议员的幽灵》) *Maclean's* (《麦克林杂志》), May 15, 1953, 87.
25. Durfee to McCarthy, June 6, 1942,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lder "D," box 1, series 1, McCarthy Papers.
26. Kaminsky to McCarthy, March 15, 1941,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lder "A," box 1, series 1, McCarthy Papers.

27. Evers to McCarthy, June 8, 1942,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lder "E," box 1, series 1, McCarthy Papers.
28. 出自奥辛斯基对尤尔本·范·苏斯特伦（Urban Van Sustern）的采访。Oshinsky, 29.
29. Durfee to McCarthy, December 31, 1940,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lder "D," box 1, series 1, McCarthy Papers.
30. Larry Tye（拉里·泰伊）, *Demagogue: The Life and Long Shadow of Senator Joe McCarthy*（《蛊惑人心的政客：参议员乔·麦卡锡的生平和挥之不去的阴影》）(Boston: Houghton Miflin Harcourt, 2020), 41–42. 泰伊写道："麦卡锡的第一位未婚妻是玛丽·露易丝·朱诺（Mary Louis Juneau），她肤色黝黑，身材如同雕塑般充满美感，就读于密尔沃基市的玛丽山学院；第二位未婚妻是爱尔兰裔护士梅贝尔·库尼汉（Maybelle Counihan），她个子不高，魅力十足，曾为麦卡锡从密尔沃基搬到阿普尔顿定居。不同于其他前女友，库尼汉即使在分手后也和麦卡锡长期保持朋友关系。"
31. 不过，至少有一个女人深深迷恋着麦卡锡。1942 年 3 月，在写给前任家庭保洁员博哈舍克夫人（Mrs. Bohatschek）的信中，麦卡锡断然拒绝了她的求爱（在麦卡锡看来是这样的）："亲爱的博哈舍克夫人，我刚刚收到您 3 月 27 日的信，信中您提出了诸多要求，包括希望我主动向您示好。夫人，说实话，当初我雇您来打扫房子的时候，我可没想过给自己找个女朋友。您的信和电话对我来说是个麻烦，请您务必停止这种行为。"不过，博哈舍克夫人显然还在给他写信，有两封信的落款是 1942 年 6 月 6 日和 6 月 13 日。McCarthy to Bohatschek, March 28, 1942,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lder "Ba–Bo," box 1, series 1, McCarthy Papers.
32. Memo: Anderson to Pearson, January 3, 1953, folder "McCarthy–(Finances)," box G212 (3 of 3), Pearson Papers.
33. McCarthy to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December 22, 1942,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lder "Caa–Caz," box 1, series 1, McCarthy Papers.
34. McCarthy to Chief of Navy Personnel, July 7, 1942,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lder "Cb–Cz," box 1, series 1, McCarthy Papers.

35. "Candidate But 'Won't Talk,'" (《"不会说话"的候选人》) *Milwaukee Journal* (《密尔沃基新闻报》), July 21, 1944, p. 1143, MPL McCarthy.

36. 1934年，菲利普以进步党人的身份赢得了州长职位，并在1936年获得连任，不过在1938年输给了共和党人朱利叶斯·P. 海尔（Julius P. Heil）。

37. 威斯康星州进步党解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拉福莱特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可能无法再次赢得参议院的席位。W. H. Lawrence (W. H. 劳伦斯), "Progressives of Wisconsin Stated to Rejoin the Republican Party," (《威斯康星州进步党表示将重新加入共和党》)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46, 1. 240

38. Patrick J. Maney (帕特里克·J. 曼尼), *"Young Bob" La Follette: A Biography of Robert M. La Follette, Jr., 1895–1953* (《"小鲍伯"拉福莱特：小罗伯特·M. 拉福莱特传，1895—1953》)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8), 287.

39. "McCarthy's Record Like Alger Story," (《麦卡锡的经历就像阿尔杰笔下的故事》) *New York Times*, August 15, 1946, 16.

40. *The Newspapers Say: A Brief News and Editorial History of Judge Joe McCarthy, Regular Republican Candidate for the U.S. Senate* (《报纸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常规候选人乔·麦卡锡法官的简要新闻和社评史》) (Appleton, WI: McCarthy for Senator Club, 1946), 9, courtesy of the 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Madison.

41. The Newspapers Say, 1.

42. The Newspapers Say, 3.

43. The Newspapers Say, 3.

44. Maney, 290–292.

45. "Hand to Hand for McCarthy in Rock County," (《麦卡锡在洛克县与您携手》) *Milwaukee Journal*, July 26, 1946, p. 1144, MPL McCarthy.

46. 1940—1950年间，斯特金湾的造船业发展迅猛，人口增长率几乎达到30%。根据多尔县历史学会的记录，二战期间，斯特金湾的造船厂每五天就有一艘新船下水。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Number of Inhabitants: Wisconsin," ("威斯康星州居民人数") in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1950（《人口与住房普查，1950》）, https://www.census.gov/prod/www/decennial.html.

47. "McCarthy Wants No Man-Heavy Forces,"（《麦卡锡不希望军队人员繁冗》）*Door County Advocate*（《多尔县倡议书》）, April 19, 1946, 4.

48. "McCarthy Wants No Man-Heavy Forces," *Door County Advocate*, April 19, 1946, 4.

49. "La Follette's Folly,"（《拉福莱特的蠢事》）*The Nation*（《国家》）, August 24, 1946, 200–201.

50. "McCarthy, McMurray Stage a Verbal 'Slugfest.'"（《麦卡锡和麦克默里上演了一场口头的"互搏"》）*Milwaukee Journal*, October 23, 1946, p. 1146, MPL McCarthy. 麦卡锡的学术经历在此似乎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因为他声称自己是靠身兼多份蓝领工作来支付学费的，而且他也保留了工人阶级的性格。

51. "New Senator 'Vote Getter': McCarthy Knows Self,"（《新任参议员"拉票者"：麦卡锡了解自己》）*Milwaukee Journal*, November 6, 1946, p. 1146, MPL McCarthy.

52. "Hand to Hand for McCarthy in Rock County," *Milwaukee Journal*, July 26, 1946, p. 1144, MPL McCarthy.

53. "Candidate But 'Won't Talk,'" *Milwaukee Journal*, July 21, 1944, p. 1143, MPL McCarthy.

54. "Getting to Bed Is Out for Fellow Who Licks La Follette; Well Wishers Won't Allow It,"（《舔过拉福莱特的人没法上床睡觉了；好心人们不会允许的》）*Milwaukee Journal*, August 14, 1946, p. 1144, MPL McCarthy. 虽然"吹箫"一词出现的时间不算早，但用这个词来暗指性行为却并不新鲜。根据《格林俚语词典》（*Green's Dictionary of Slang*），最早使用"吹箫"指代口交行为的是 1948 年的一则地下漫画，其中描绘了惠特克·钱伯斯和阿尔杰·希斯之间的同性口交；而这种性隐喻的用法最早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不过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吹箫"才被用来指代口交行为。有关吹箫的词条，参见 Jonathon Green（乔纳森·格林）, *Green's Dictionary of Slang*（London:

Chambers Harrap Publishers, 2010）。

55. "Hand to Hand for McCarthy in Rock County," *Milwaukee Journal*, July 26, 1946, p. 1144, MPL McCarthy. 241

56. Anderson and May, *McCarthy*, 83–85.

57. *The Newspapers Say*, 10.

58. *The Newspapers Say*, 11.

59. 麦卡锡的两项指控都很荒谬。就像大卫·奥辛斯基所指出的，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指望拉福莱特参军，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已经是一名 46 岁的参议员了。另外，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真的通过密尔沃基无线电台牟利了。Oshinsky, 44. 参见 "Hand to Hand for McCarthy in Rock County," *Milwaukee Journal*, July 26, 1946, p. 1144, MPL McCarthy。

60. "La Follette's Folly," *The Nation*, August 24, 1946, 200–201.

61. Rovere, 93. 罗维尔特别提到，麦卡锡加入过海军陆战队这个说法在他的国会名录自传部分也多次出现，后因质疑之声不断而在 1948 年被删去。

62. Oshinsky, 62.

63. 语出麦卡锡，引自 Oshinsky, 32。

64. 拉里·泰伊援引了麦卡锡的战时日记和他的战友在战争结束后的来信，从而得出结论，麦卡锡并没有像许多记者和政敌所说的那样伪造战争经历。他本可以安全地待在基地，但他选择去执行任务，这无疑是值得称赞的。不过，鉴于麦卡锡在服役期间就准备为日后进入参议院打造一份光鲜的履历，我们必须以审视的态度来解读他所谓的英勇战绩。《麦迪逊首府时报》（*Madison Capital Times*）记者威廉·埃维尤（William Evjue）收集了麦卡锡在太平洋战场服役期间的战友的信件，他们认为麦卡锡的战火英雄形象很荒谬。Tye, 54–56; "Capt. Jack Cannon to William Evjue," (《杰克·坎农上尉致威廉·埃维尤》) December 1949, box G222 (1 of 3), folder "19. McCarthy— Marine Corps Record," Pearson Papers.

65. Robert H. Fleming (罗伯特·H. 弗莱明), "McCarthy War Injury? Just Felled by a Bucket," (《麦卡锡在战争中受伤？因为水桶摔伤罢了》) *Milwaukee Journal*, June 8, 1949, p. 1187, MPL McCarthy.

66. Joseph McCarthy, *McCarthyism: The Fight for America* (《麦卡锡主义：为美国而战》) (New York: Devin-Adair, 1952), 1.

67. 对这种现象的更新近的探索，参见菲尔·克莱（Phil Klay）的短篇故事《我的伊战》（"OIF"），载 *Redeployment*（《重新派遣》）（New York: Penguin, 2014）, 73–76。

68. "Medical Record of Senator McCarthy," May 27, 1952, box 5, David Lloyd Files, Staff Member Files, HST Library.

69. Irving Richter (欧文·里希特), *Labor's Struggles, 1945–1950: A Participant's View* (《劳工的斗争，1945—1950：一名参与者的视角》)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8. 里希特指出，"按总损失时间来计算，停工造成的时间浪费达1.16亿人工作日，或总工作时间的1.45%。相比之下，即使在1936—1937年间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静坐罢工高峰期，总损失时间也只有总工作时间的0.5%，仅为1946年总损失时间的1/3"。

70. George Lipsitz (乔治·利普席兹), *Rainbow at Midnight: Labor and Culture in the 1940s* (《午夜彩虹：20世纪40年代的劳动与文化》)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99–100.

242 71.《密尔沃基前哨报》连续59天刊登了要求审查工会内部共产党人的系列文章，全部署名为"哨兵约翰"，《密尔沃基前哨报》声称这是一位记者的化名。事实上，这些文章是由阿利斯－查默斯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撰写的。由于《密尔沃基前哨报》的指控，工会主席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最终承诺，会驱逐工会中所有的共产党人。阿利斯－查默斯公司的计谋成功了。1947年3月24日，罢工者在没有与公司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重返工作岗位。随后的一个月，阿利斯－查默斯公司解雇了工会中的活跃分子，此后不久，鲁瑟将工会的控制权交给了公司。Julian L. Stockley (朱利安·L.斯托克利), "'Red Purge': The 1946–47 Strike at Allis-Chalmers," (《"红色清洗"：1946—1947年阿利斯－查默斯公司的罢工》) *Wisconsin Academy of Sciences, Arts, and Letters* (《威斯康星州科学、艺术和文学学会》) 76 (1988): 17–31.

72. James Reston (詹姆斯·雷斯顿), "La Follette Loses His Seat in Senate," (《拉

福莱特失去了他在参议院的席位》) *New York Times*, August 15, 1946, 1.

73. Dewey L. Fleming (杜威 · L. 弗莱明), "Issues Ignored in Wisconsin," (《在威斯康星州被忽视的问题》) *Baltimore Sun*, July 13, 1946, 7. 初选结束后不久，《纽约时报》发表了如下观点：“拉福莱特先生失利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失去了工人的支持。与其说他是输给了同为共和党人的麦卡锡先生，不如说是输给了民主党初选中难逢敌手的麦克默里先生。麦克默里先生获得了 5.6 万多张选票，其中大部分来自工业区，这些选票本该投给拉福莱特先生，可惜他受到了不少工人团体的抵制，而他之前的很多支持者恰恰属于这些团体，现在他们转而把票投给了参加民主党初选的麦克默里先生。各县的投票情况表明，人口众多的工业县转投他人对拉福莱特先生产生了重要影响。1940 年选举时，拉福莱特先生获得了密尔沃基、拉辛和基诺沙县（全部位于威斯康星州东南部）总计 61831 张选票中的大半。而在昨天的投票中，大家以为他会再次拿下这三个县，他却以 10651 票之差输掉了它们，这一数字是他输给麦卡锡先生时的票数差的两倍多。” James Reston, "La Follette Loses His Seat in Senat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5, 1946, 1.

74. 1945—1946 年间的罢工潮促使 1947 年 1 月召开的美国第八十届国会出台了多项意在限制工会权力的法案，其中包括《塔夫脱 – 哈特莱法》（Taft-Hartley Act）。这项法案在杜鲁门总统的否决下通过，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工会运动的复兴。

75. Alonzo Hamby (阿伦佐 · 汉比), *Beyond the New Deal: Harry S. Truman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超越新政：哈里 · S. 杜鲁门与美国自由主义》)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136–137.

76. "McCarthy to Address G.O.P. Meet Here," (《麦卡锡将在共和党会议上讲话》) *Door County Advocate*, April 5, 1946, 1.

77. "Farmers Fed Up with New Deal Says M'Carthy," (《麦卡锡称农民对新政感到厌倦》) *Chicago Daily Tribune*, August 15, 1946, 1. 为拉福莱特作传的帕特里克 · J. 曼尼认为，反联邦主义情绪是拉福莱特初选失败的重要原因。

78. 语出马克斯 · 勒纳，引自 Hamby, 157。

79. 对于麦卡锡为何能够击败拉福莱特，一直有人有所误解，认为是共产党人害怕拉福莱特的反共立场，于是把票投给了麦卡锡。这种错误认知已经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彻底证伪。参见 Oshinsky, 46–48，以及 Maney, chap. 16。

80. "McCarthy, McMurray Stage a Verbal 'Slugfest,'" *Milwaukee Journal*, October 23, 1946, p. 1146, MPL McCarthy.

81. Maney, 299–300.

243 82. "Wisconsin Senate Nominee Was High School Wonder,"（《威斯康星州参议员被提名者曾是高中的奇才》）*Boston Daily Globe*, August 18, 1946, C36.

83. 这里并不是说拉福莱特或麦克默里积极倡导变革，只是他们缺乏麦卡锡那种平易近人的形象，这让选民对他产生了熟悉感，即使他也算是个新面孔。

84. James T. Patterson（詹姆斯·T. 帕特森）, *Grand Expect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74*（《宏大愿景：美国，1945—1974》）(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2.

85. Lipsitz, 49.

86. Patterson, 33.

87. Lizabeth Cohen（莉莎贝斯·科恩）, *A Consumer's 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Mass Consumption in Postwar America*（《消费者的共和国：战后美国的大众消费政治》）(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3). 关于女性被迫回归限制性的家庭角色，散见于该书第 133—150 页各处。

88. Lipsitz, 51. 利普席兹认为，女性的工作经历迫使她们联合起来，抵抗来自雇主和男性同事的不公平待遇，包括不平等的薪酬、更长的工作时间、更苛刻的工作条件和公然性骚扰。这些经验为后来政治组织所做的努力指明了方向。Dorothy Sue Cobble（多萝西·苏·科布尔）, *The Other Women's Rights Movement: Workplace Justice and Social Rights in Modern America*（《另一场妇女权利运动：现代美国的工作场所正义和社会权利》）(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89. D'Emilio and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260–261. 也可参见 Marilyn E. Hegarty（玛丽莲·E. 赫加蒂）, *Victory Girls, Khaki-Wackies, and Patriotutes:*

The Regulation of Female Sexuality during World War II（《胜利女孩、穿卡其色的疯女人和爱国者：二战期间对女性性行为的管制》）（New York: NYU Press, 2007）。

90. "'Work' Is McCarthy's Formula for Success," (《"工作"是麦卡锡的成功秘方》) *Milwaukee Journal*, November 10, 1946, p. 1146, MPL McCarthy.

91. "New Senator 'Vote Getter': McCarthy Knows Self," *Milwaukee Journal*, November 6, 1946, p. 1146, MPL McCarthy.

92. "'Work' Is McCarthy's Formula for Success," *Milwaukee Journal*, November 10, 1946, p. 1146, MPL McCarthy.

93.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pril 14, 1950, 40, "Internal Security—Senator Joseph R. McCarthy charges (Section no.1)," box 69, George Elsey Papers,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94. "Bachelor's Trick," *Milwaukee Journal*, November 10, 1946, p. 1146, MPL McCarthy.

95. 约翰·W. 哈内斯的口述史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相关收藏，引自 Oshinsky, 56。

96. Oshinsky, 55.

97. Oshinsky, 69.

98. "Ohioan Revises Dice-Game Story about McCarthy," (《俄亥俄州人修改了关于麦卡锡的骰子游戏故事》) *Toledo Blade* (《托莱多刀锋报》), August. 3, 1951, 3.

99. Oshinsky, 56.

100. Oshinsky, 57.

101. Oshinsky, 65–66. 事实证明，在麦卡锡的职业生涯中，弗兰德斯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他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时经常对麦卡锡展开人身攻击。 244

102. Tye, 86–87.

103. Oshinsky, 67.

104. 分类广告，引自 Jack Smith（杰克·史密斯）, "Give Me Shelter: LA's Post-WWII Housing Shortage Foreshadowed the Crisis of the 1980s,"（《给我

一处庇护所：洛杉矶二战后的住房短缺预示着 20 世纪 80 年代的危机》）*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7, 1989, 6。没有记录显示伯格伦先生独特的广告方式是否收到成效。

105. 塞缪尔·齐普更明确地阐释了这层关系，他认为住房“似乎是维持国家繁荣富足的脆弱梁柱。随着冷战的到来，住房不再只是经济问题，也成了国家安全问题。在这段时间里，物质上的富饶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符号，是新的全球竞争中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追寻的理想。希望繁荣延续不断的想法成了国家认同的堡垒；国家认同是一种共同追求，不同的民族通过国家认同凝聚在相同的世俗信仰中；国家认同是一种共同信念，但讽刺的是，这种归属感的来源却是个人主义、自力更生和消费选择的自由。冷战时期，国家交锋不是通过血肉相搏，而是物质上的丰富”。Samuel Zipp, *Manhattan Projects: The Rise and Fall of Urban Renewal in Cold War New York* (《曼哈顿计划：冷战时期纽约城市重建的兴衰》)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71.

106. Mary Spargo (玛丽·斯帕尔戈), “Truman Prods House to Act on Housing Bill,” (《杜鲁门敦促众议院就住房法案采取行动》) *Washington Post*, May 7, 1948, 1, 3.

107. Roslyn Baxandall and Elizabeth Ewen (罗斯琳·巴克森德尔、伊丽莎白·尤恩), *Picture Windows: How the Suburbs Happened* (《风景窗：郊区是如何出现的》)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90.

108. Baxandall and Ewen, 93.

109. *Congressional Record*, 8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948, part 2, 1230, 2823.

110. Anderson and May, 145.

111. Baxandall and Ewen, 104.

112. Zipp, 272.

113. William Levitt (威廉·莱维特), “The Builder and Banker, a Partnership in Democracy,” (《建筑商和银行家，民主的伙伴关系》) *United States Investor* 46 (1947): 1948.

114. “Malmedy Massacre Investigation,” (《马尔梅迪大屠杀调查》) Report of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United States Senate, 81st Congress, 1st Session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2. 有关马尔梅迪大屠杀审判的完整历史记录，参见 James Weingartner（詹姆斯·魏格纳）, *A Peculiar Crusade: Willis M. Everett & The Malmedy Massacre Trial*（《一场特殊的远征：威利斯·M. 埃弗雷特与马尔梅迪大屠杀审判》）（New York: NYU Press, 2000），以及 Steven P. Remy（史蒂芬·P. 雷米）, *The Malmedy Massacre: The War Crimes Trial Controversy*（《马尔梅迪大屠杀：战争罪审判的争论》）（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15. Weingartner, 10. 虽然多数同时期的报告称，受审的德国士兵有 73 人，但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被告人一共有 74 位。https://www.loc.gov/rr/frd/Military_Law/pdf/Malmedy_report.pdf, 4.

116. Oshinsky, 74.

117. 语出麦卡锡，引自 John Fisher（约翰·费舍尔）, "Senate Unit Clears Army in War Trial,"（《参议院小组在战争审判中为军队开脱罪责》）*Chicago Daily Tribune*, October 15, 1949, 1, 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暗示，苏联特工可能是质疑其调查策略的幕后推手，他们想要由此抹黑美国的民主立场。虽然报告没有直接点名麦卡锡，但这不是他最后一次被指认为共产主义特工。Weingartner, 196. 245

118. Remy, *The Malmedy Massacre*.

119. 这四位女性参议员分别是南达科他州的薇拉·C. 布什菲尔德（Vera C. Bushfield）、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内布拉斯加州的艾娃·凯利·鲍林（Eva Kelly Bowring）、内布拉斯加州的黑兹尔·汉佩尔·阿贝尔（Hazel Hampel Abel），她们大多没有完整走完六年任期。1950 年 6 月，史密斯发表了著名演讲《良知宣言》，公然抨击麦卡锡的战术策略，她也因此成为麦卡锡主义的早期反对者之一。

120. Paul H. Douglas (保罗·H. 道格拉斯),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The Memoirs of Paul H. Douglas* (《终有一日：保罗·H. 道格拉斯回忆录》)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251.

121. Oshinsky, 59.

122. Stuart Ewen (斯图尔特・尤恩), *PR!: A Social History of Spin* (《公关！：导向性陈述的社会史》)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esp. chap. 15. 关于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在战后迅速被打压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内容，详见该书第 15 章。尤恩对麦卡锡利用住房听证会来给公共关系下注的简要评述见该书第 368—369 页。

123. Richard O. Davies (理查德・O. 戴维斯), *Housing Reform during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杜鲁门政府时期的住房改革》)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66), 69.

124. 麦卡锡在 1951 年同样赢得了此项“殊荣”，参与调查的记者有 75% 把“选票”投给了他。“Newsmen Pick Worst Senator,” (《新闻工作者评选最差参议员》) *Milwaukee Journal*, August 10, 1951, 2.

第四章

1. Nicholas von Hoffman (尼古拉斯・冯・霍夫曼), *Citizen Cohn* (《公民科恩》) (New York: Doubleday, 1988), 52. 科恩一直为自己的外表和别人的看法所困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他做了数次面部拉皮和其他整容手术，通常在参加社交活动和出庭时脸上的缝线仍然清晰可见。参见 Barbara Walters (芭芭拉・沃尔特斯), *Audition: A Memoir* (《试演：一部回忆录》)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8), 114–115。冯・霍夫曼对科恩进行了深入研究，传记中对科恩以及他对权力追求的研究令人信服。但冯・霍夫曼更关注科恩在纽约的政治、犯罪和名人交汇处的造王者 (kingmaker) 地位，而我的理解是，科恩的重要性在于他塑造了表达美国政治身份的术语。

2. “Albert Cohn Marries,” (《阿尔伯特・科恩结婚》)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1924.

3. Von Hoffman, 50.

4. “Justice Albert Cohn Takes Ofice,” (《阿尔伯特・科恩法官就职》) *New York*

Times, April 3, 1929; "Justice Albert Cohn Promoted," (《阿尔伯特·科恩法官获得晋升》)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1937.

5. 语出罗伊·科恩，引自 Sidney Zion（西德尼·锡安）, *The Autobiography of Roy Cohn*（《罗伊·科恩自传》）（Secaucus, NJ: Lyle Stuart, 1988）, 23–24。

6. David McCullough (大卫·麦卡洛), *Truman* (《杜鲁门》)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371. 246

7. McCullough, 403, 779.

8. Zion, 19–22.

9. 语出罗伊·科恩，引自 Zion, 18。

10. 科恩在霍瑞斯曼学校的同学包括工业巨头之子詹纳罗索·波普（Generoso Pope），他同时也是《国家询问报》的最终创始人；未来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以及斯·纽豪斯（Si Newhouse），康泰纳仕集团的财产继承人，后来成为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11. "The Self-Inflated Target," (《自我膨胀的目标》) *Time*, March 22, 1954, 26.

12. Von Hoffman, 57–58.

13. Von Hoffman, 51.

14. "Bank Opened in 1913 Grew by Mergers," (《银行于 1913 年开业，通过兼并发展壮大》)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1930, 2.

15. Christopher Gray (克里斯托弗·格雷), "Streetscapes: The Bank of United States in the Bronx; The First Domino in the Depression," (《街景：布朗克斯区的美国银行；大萧条时期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1991; "3 In Bank of US Guilty; Face Maximum of 7 Years; Disagreement on Pollock," (《美国银行 3 人获罪；面临最高七年刑期；关于波洛克存在分歧》) *New York Times*, June 20, 1931, 1; von Hoffman, 48–49.

16. 语出罗伊·科恩，引自 Zion, 24–25。

17. Von Hoffman, 59.

18. Von Hoffman, 55.

19. "Character Investigation on Cohn, Roy M," (《关于罗伊·科恩的人物调查》)

Roy Cohn FBI File, box 23, pp. 11–22.

20. 语出罗伊·科恩在霍瑞斯曼学校的同学，引自 Hoffman, 62–63。

21. 语出罗伊·科恩，引自 Zion, 35–36。

22. Von Hoffman, 75.

23. Zion, 243.

24. 语出罗伊·科恩，引自 Zion, 30。

25. "Who We Are," (《我们是谁》) Ethical Culture Fieldston School (菲尔德斯顿文化伦理学院), https://www.ecfs.org/en/who-we -are/.

26. 语出彼得·博南，引自 von Hoffman, 68。

27. 语出尤金·马库斯，引自 von Hoffman, 53–54。正如冯·霍夫曼说的那样，这句话似乎表明科恩要求他的父亲把球低低地扔给他，因为这句话周围加了引号："你知道该怎么把球扔给一个小女孩吗？"我认为这些引号印错了，所以这是马库斯对冯·霍夫曼说的话，而不是罗伊对他父亲说的话。

28. Philip Wylie (菲利普·威利), *Generation of Vipers* (《蝮蛇一代》，附有作者新注释) (New York: Reinhart, 1955 [1942]), 208.

29. 在 1955 年的重版中，威利特地将"妈咪主义"与当时最大的新闻故事联
247 系起来："今天，正如新闻照片充分表明的那样，妈妈塑造了参议员麦卡锡狂热攻势的主体部分——盲目歌颂如她一般的无知的独裁主义……可悲的参议员微笑着走到讲台上，引领着一连串的恐慌、一系列荒谬的仪式，以及被诱导而出的天理不容的疯狂。缺乏理性的'麦卡锡主义'与'妈咪主义'是一回事：一个崇高的目的因病态的手段而夭折，一个正义的意图在恐怖主义中受到玷污，在暴政中失败。" Wylie, 196.

30. Lewis M. Terman and Catherine Cox Miles(路易斯·特曼、凯瑟琳·考克斯·迈尔斯), *Sex and Personality: Studies in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性与人格：关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研究》), 320, 引自 Julia Grant (朱莉娅·格兰特), "A 'Real Boy' and Not a Sissy: Gender, Childhood, and Masculinity, 1890–1940," (《一个"真正的男孩"而不是娘娘腔：性别、童年和男性气质，1890—194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社会历史杂志》) (Summer, 2004), 838。

31. Norton Hughes Jonathan (诺顿·休斯·乔纳森), *Gentlemen Aren't Sissies* (《绅士不是娘娘腔》) (Chicago: John C. Winston Company, 1938), 168. 诺顿的指南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下层和中下层青年中盛行的好战和大男子主义的男子气概，该指南指出“良好的举止不会让你被归为‘娘娘腔’。礼貌和得体并不会让你变得娘娘腔，就像举止粗鲁、穿得像个流浪汉也不会让你变成‘男子汉’一样”。“绅士亦即体面可敬的男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4）。然而，这种对平衡的呼吁并不适用于年轻的罗伊·科恩；他不需要任何指导就能避免穿得“像个流浪汉”。

32. 罗伊从菲尔德斯顿学校转到霍瑞斯曼学校的举动，也可以置于长期存在的一种模式下审视，即把男孩放到专门从事军事和工业训练的学校来“制度化”培养，作为纠正过度女性化行为的一种方式。罗伊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代儿童心理学家和卫生保健提供者规定的康复机构化模式。参见 Grant, 840–841。

33. Von Hoffman, 364, 438.

34. Robert A. Nye (罗伯特·A. 奈伊), “Western Masculinities in War and Peace,” (《战时与和平年代的西方男性气质》)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2, no. 2 (April 2007): 423.

35. Christina S. Jarvis (克里斯蒂娜·S. 贾维斯), *The Male Body at War: American Masculinity during World War II* (《战争中的男性身体：二战期间的美国男性气质》)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4), 56–85.

36. Daniel Bell (丹尼尔·贝尔),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Politics—1955,” (《对美国政治的解释—1955》) *The Radical Right* (《激进的右派》), ed. Daniel Bell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1963), 54–55. 另见科迪莱昂内《冷战时期的男子气概和美国政治文化》一书的引言。

37. Arthur Schlesinger Jr. (小亚瑟·施莱辛格), *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关键中枢：自由的政治学》)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49), 38–46.

38. Edward T. Folliard (爱德华·T. 福利亚德), “The Partnership of Cohn & Schine,” (《科恩和席因的伙伴关系》)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March 21, 1954, B3. 请注意，1954 年《华盛顿邮报》收购了《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从那时起直到 1973 年，该报纸的官方名称是《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

39. 当然，有一种外部可能性是，科恩的政治观点实际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指出，阿尔杰·希斯的审判是他从左翼转向右翼的一个主要因素。尽管科恩去世时是一名登记在册的民主党人，但他经常吹嘘自己从未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投过票，实际上他还声称曾在 1972 年的总统竞选中往民主党内部安插过间谍（见 von Hoffman, 175, 407）。他也是众多共和党工作人员和领导人的激励和榜样。见 Jeffrey Toobin（杰弗里·图宾）, "The Dirty
248 Trickster,"（《肮脏的捣蛋鬼》） *New Yorker*, June 2, 2008。话虽如此，科恩似乎从未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把他的公开言论和私生活放在一起比较，这一点就显得尤为明显。

40. 我有意识地使用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定义的“权力精英”一词：一群在国家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人，他们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决定对国家乃至世界都有深远影响。参见 C. Wright Mills（C. 赖特·米尔斯）, *The Power Elite*（《权力精英》）（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41. Zion, 40–41. 塞波尔是科恩的世交友人。尼古拉斯·冯·霍夫曼等人认为，他曾帮助罗伊·科恩逃避征兵、减轻兵役。具体而言，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通讯社报道称，科恩在美国国民警卫队服役期间，缺席了 44% 的体能训练，而塞波尔在“科恩提交的许多假条”上签了字。见 von Hoffman, 73–74。科恩声称，通过向《国家询问报》创始人詹纳罗索·波普做担保，他为塞波尔获得美国检察官的职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詹纳罗索·波普又将塞波尔推荐给了当地的政治掮客，包括爱德华·弗林、黑帮头目弗兰克·科斯特洛和盖塔诺·卢切斯。见 Zion, 60–65。

42. “4th Man Held After Cops Nab 3 With $10,000,” (《警方抓获 3 名携带 1 万美元的男子后，第 4 名男子也被擒获》) *New York World-Telegram*, February 19, 1949, 1.

43. 例如，可参见 “Eastern ‘Aid’ Held; Biggest Blow against Counterfeiting Ring,”

（《东方“外援”被抓；对造假团伙的最大打击》）*Chicago Daily Tribune*, July 9, 1949, 11。

44. “Judge Suspends Sentence on Va. Woman in N.Y.,” (《法官暂缓对该身在纽约的弗吉尼亚州女子做出判决》)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5, 1950, 6.

45. 怀特赫斯特因异性恋、白人身份和年龄而得到较为宽松的待遇，这也是合理的，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她有可能恢复正常生活。怀特赫斯特与 8 名男子一起被捕，她是其中唯一的女性，而且她是在纽约市被捕的，这一事实也加剧了当时人们对年轻女性会被城市生活腐蚀的担忧；此外，人们认为，只要回归田纳西州东部的乡村，她就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46. Von Hoffman, 76.《布朗克斯本地新闻》的大多数文章都没有署名，但如果科恩确实曾为该报撰稿，那么他很可能为 “Bokays and Brikbatz”（意第绪语“褒贬之词”）写作，这是一个专栏，主要报道来自布朗克斯区的无害八卦。把科恩描述成莱昂斯学徒的说法来自娱乐专栏作家杰克·奥布莱恩（Jack O’Brien）。

47. 语出罗伊·科恩的匿名同事，引自 von Hoffman, 77–78。

48. “The Self-Inflated Target,” *Time*, March 22, 1954, 25.

49. Von Hoffman, 133; Zion, 85–86. 也可参见 “The Self-Inflated Target,” *Time*, March 22, 1954, 25。

50. Walter Winchell, “Trapping Reds Coast-to-Coast,”（《在全境内诱捕赤色分子》）*New York Daily Mirror*, August 25, 1952. 温切尔的这篇专栏也刊发在《华盛顿邮报》上，题为“沃尔特·温切尔……纽约：花花公子”（“Walter Winchell . . . Of New York: Man about Town”），1952 年 8 月 25 日，第 19 页。关于佩格勒和他对麦卡锡的支持，参见 Finis Farr（费尼斯·法尔）, *Fair Enough: The Life of Westbrook Pegler*（《情有可原：威斯布鲁克·佩格勒的一生》）（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Publishers, 1975）, 213。

51. Alan Betrock (艾伦·贝托克), *Unseen America: The Greatest Cult Exploitation Magazines, 1950–1966* (《看不见的美国：最大的营利性流行杂志，1950—1966》) (Brooklyn: Shake Books, 1990), 8.

52. 有关麦克法登，参见 William R. Hunt（威廉·R. 亨特）, *Body Love: The*

Amazing Career of Bernarr Macfadden（《肉体之爱：伯纳尔·麦克法登的神奇生涯》）（Bowling Green, OH: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89。

53. Frank Mallen (弗兰克·马伦), *Sauce for the Gander* (《男女无别》) (White Plains, NY: Baldwin Books, 1954), 55.

54. 莱茵兰德离婚案的审判集中在爱丽丝·琼斯是否欺骗了她的丈夫，因为她在婚前不承认她的“老黑”（“Negro”）血统。莱茵兰德夫人的律师让她向全是白人男性的陪审团展示她的身体部位，包括乳沟和腿，以证明莱茵兰德先生肯定知道他妻子的种族。参见 Elizabeth M. Smith-Pryor（伊丽莎白·M. 史密斯－普赖尔）, *Property Rites: The Rhinelander Trial, Passing, and the Protection of Whiteness*（《财产仪式：莱茵兰德审判、“冒充白人”和对白人的保护》）（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202。

55. “The Press: Muscle Journalist,” (《新闻界：肌肉新闻的记者》) *Time*, March 31, 1941, 40.

56. Walter Winchell, “Trapping Reds Coast-to-Coast,” *New York Daily Mirror*, August 25, 1952. 温切尔喜欢把政治和社会八卦混在一起，这一点在同一篇专栏文章中得到了体现，文章中问道：“联邦调查局是否知道一位共产党高层（在苏联大使馆）为他的匈牙利进口洋娃娃准备了一套纽约式公寓？”

57. Walter Winchell, “Walter Winchell ... Of New York: Broadway Heartbeat,” (“沃尔特·温切尔……来自纽约：百老汇的心跳”) *Washington Post*, July 13, 1951, C7. 原文中的省略号，在该语境下放大了温切尔语气的爽直和紧迫。省略号也可以暗示有些东西没有说出来，否则温切尔就无法将其作品安全地出版。

58. 这个权力巨大的委员会以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为代表，当时他还是来自加州的年轻国会议员。

59. 希斯被指控作伪证，因为间谍罪的诉讼时效已经过期。见 Johnson, 32。

60. Zion, 49–50.

61. 参见 C. P. Trussel（C. P. 特鲁塞尔）, “Alger Hiss Admits Knowing Chambers;

Meet Face to Face,"（《阿尔杰·希斯承认认识钱伯斯；面对面交流》）*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1948, 1。钱伯斯在广播节目《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中重申了他的指控，这导致希斯起诉钱伯斯诽谤，并使该新闻节目自己也成了全国新闻。参见 Allen Weinstein（艾伦·温斯坦）, *Perjury: The Alger Hiss Case*（《伪证：阿尔杰·希斯案》）（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141–142。

62. Johnson, 33.

63. Johnson, 32.

64. Bob Adelman (鲍勃·阿德尔曼), *Tijuana Bibles: Art and Wit in America's Forbidden Funnies, 1930s-1950s* (《蒂华纳圣经：20 世纪 30 到 50 年代美国禁忌漫画中的艺术与智慧》)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125.

65. 有关雷明顿案的传奇故事最完整的讲述是 Gary May（加里·梅）,*Un-American Activities: The Trials of William Remington*（《非美活动：威廉·雷明顿的审判》）（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66. 参见 1951 年 1 月 5 日的《纽约邮报》与《纽约世界报》，以及 1951 年 1 月 6 日的《华盛顿明星晚报》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1 月 6 日的头版报道称，“以前的同班同学说雷明顿将他领进了红色青年团”。

67. May, 226.

68. May, 196. 古德曼似乎并不害怕，还是出庭作证了。

69. May, 282.

70. May, 284.

71. May, 264–265.

72. May, 308.

73. May, 310. 另参见 Ellen Schrecker（埃伦·施雷克）, *Many Are the Crimes: McCarthyism in America*（《罪行累累：美国的麦卡锡主义》）（Boston: Little, Brown, 1998）, 361。除了包括雷明顿在内的“几起谋杀案”外，施雷克还将大约 12 起自杀事件与红色恐慌和麦卡锡主义联系起来，其中包括亚伯拉罕·费勒（下文讨论）、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威廉·舍伍德（William Sherwood）和被列入黑名单的演员菲利普·勒布（Philip Loeb）。

74. Zion, 57.

75. John Wexley (约翰·韦克斯利), *The Judgment of 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 (《对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博格的判决》), revd. and updated e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7), 487.

76. Zion, 59.

77. Ronald Radosh and Joyce Milton (罗纳德·拉多什、乔伊斯·米尔顿), *The Rosenberg File* (《罗森博格档案》), 2n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8–149.

78. 语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恩的日记，引自 Radosh and Milton, 149。

79. Drew Pearson. "The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More on Mysterious Matusow." (《华盛顿的旋转木马：关于神秘的马图索的更多信息》)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February 5, 1955, 37; Wexley, 419. 《纽约时报》1955年2月1日和6日的文章也报道了这些指控。见 Edward Ranzal(爱德华·兰扎尔), "Anti-Red Witness Confesses He Lied; His Charge That Roy M. Cohn Prefabricated Parts of Testimony Is Denied," (《反赤色证人承认他在撒谎；罗伊·M. 科恩为其预先编织的部分证词的指控被否决》)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1955, 12。另见 Anthony Leviero (安东尼·列维罗), "Role of Informers Now under Inquiry; Matusow Case Raises New Questions about Ex-Communists as Witnesses," (《告密者正在接受调查；马图索案引发了前共产党员作为证人的新问题》)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55, E7。

80. "The Traitor," (《叛徒》) *60 Minutes II* (《60分钟II》), CBS (New York: CBS, December 5, 2001). 另见 Walter Schneir (沃尔特·施奈尔), *Final Verdict: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the Rosenberg Case* (《最后的审判：罗森博格案的真实情况》) (Brooklyn: Melville House, 2010), 140。格林格拉斯认为，他面临着一个几乎不可能的选择：如果他不指证他的妹妹，他自己的妻子就会被逮捕，并以叛国罪受审。

81. Zion, 65.

82. 其他历史学家认为，选择犹太人考夫曼是为了在起诉犹太人罗森博格夫妇时，使美国政府免受反犹主义的指控。这一解释反映了约瑟夫·麦卡锡后

来选择雇用科恩的一个原因。

83. Von Hoffman, 101.

84. Zion, 68. 科恩为这种行为辩护说，几乎在所有案件中，控方都直接与指定的法官进行沟通。他声称，这种做法在水门事件之后才停止，因为“每个人及其伙伴都对伦理准则变得敏感了”。

85. Von Hoffman, 101–104; Radosh and Milton, 278–279, 428. 251

86. Radosh and Milton, 536–537n.

87. Radosh and Milton, 3–4.

88. 这些调查与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进行的类似调查同时进行。关于这一时期更广泛的讨论，参见 James Barros（詹姆斯·巴罗斯）, *Trygve Lie and the Cold War: The UN Secretary-General Pursues Peace, 1946–53*（《特里格韦·赖伊与冷战：追求和平的联合国秘书长，1946—1953》）（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von Hoffman, 114–122；von Hoffman, 114-122。“近 2000”的数字来自“Bunche Denounces ‘Pressures’ on U.N.,”（《邦奇谴责对联合国施加的“压力”》）*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4, 1952, 4。

89. Edward Ranzal, “U.N. Ousts 6 American Aides after Security Risk Inquiry,”（《联合国在进行安全风险调查后撤销 6 名美国助理的职务》）*New York Times*, May 25, 1952, 1.

90. Thomas J. Hamilton（托马斯·J. 汉密尔顿）, “Secretary General Says Aide Sought Justice for Those Accused of Subversion,”（《秘书长称他的助手为那些被指控犯有颠覆罪的人寻求正义》）*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4, 1952, 1. 另见 “Leap Kills UN Legal Chief,”（《联合国总法律顾问跳楼身亡》）*Chicago Daily Tribune*, November 14, 1952, 1。

91. Willard Edwards（威拉德·爱德华兹）, “How Oficials Fought to Bar U.N. Red Expose,”（《官员们如何争取阻止联合国的赤色曝光》）*Chicago Daily Tribune*, December 5, 1952, 2.

92. 矛盾的是，批评人士认为，这种男性化的随大流需求与 20 世纪 50 年代心理学家认定的女性化的本质特征是一致的：“在对‘归属感’的需求、对

群体的依从、接受合作和解决冲突的理想疗法方面，组织中的男性在心理倾向上看起来非常女性化。” Cuordileone, *Manhood and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Cold War*, 119. 另见 Barbara Ehrenreich（芭芭拉·埃伦赖希）,*The Hearts of Men: American Dreams and the Flight from Commitment*（《男人的心：美国梦与对承诺的逃避》）（New York: Doubleday, 1983）, 32–35。

93. 20 世纪 60 年代末，科恩开始在公共场合穿得更加华丽，这种风格在其母亲去世后趋于常态。在种种华服当中，科恩选择穿着橙色格纹无尾礼服出现在《60 分钟》节目里。见 von Hoffman, 22。

94. Von Hoffman, 78.

95. Von Hoffman, 79. 科恩与妓女打交道的经历显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这样一次艳遇之后，他有时会向他的朋友们吹嘘他的床上天赋。参见 von Hoffman, 143, 310。科恩的《罗伊·科恩自传》的合著者西德尼·锡安也听到了类似的故事。“我和他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两个都和这些女人上了床，”锡安引用科恩助手的话回忆道，“从布法罗到巴黎，我们每到一个城镇，他都会找女孩。”见 Zion, 242。

96. Walters, 97–98.

97. 语出罗伊·科恩，引自 von Hoffman, 364。

98. Zion, 41.

99. Zion, 44.

100. Jack Steele（杰克·斯蒂尔）, “Plans to Probe Red Influences on Campus,”（《计划在校园内探测赤色影响》）*Boston Daily Globe*, December 30, 1952, 1, 15.

1. “Weather Forecast Map for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天气预报地图”）*Chicago Daily Tribune*, February 9, 1950, 2.

2. “205 Reds on Job in State Dept. McCarthy Says,”（《麦卡锡称有 205 名在国

务院工作的共产党人》) *Chicago Daily Tribune*, February 10, 1950, 5. 在其撰写的麦卡锡权威传记中，大卫·奥辛斯基引用了“几位目击者”报告麦卡锡的原话：“虽然我无法花时间列出国务院中所有被称为共产党成员和间谍组织成员的名字，但我手上有一张 205 人的名单……国务卿已知晓这些名字，但他们仍在工作，并继续影响着国务院政策。”奥辛斯基还注意到麦卡锡否认说过那些话；麦卡锡声称他真正的措辞是“我掌握了 57 个人的情况，这些人要么是正式党员，要么肯定是忠于共产党的”。见 Oshinsky, 109。

3. Oshinsky, 111.

4. “Telegram from Senator Joseph McCarthy to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致哈里·S. 杜鲁门总统的电报》) February 11, 1950, General File on McCarthy, Joseph, box 111,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s, HST Library.

5. “Dr. Fuchs Held in London Jail; Trial on Friday,” (《福克斯博士被关押在伦敦监狱；审判将于周五进行》)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4, 1950, 1. 第二天，《纽约时报》报道说，福克斯的被捕“［在伦敦］引起的轰动远远不及在美国引起的轰动”，这一事态发展突显了美国人的反共狂热。“Britain Unexcited over Fuchs Arrest,” (《英国对福克斯被捕反应平平》)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1950, 2.

6. 第 10104 号行政命令添加了新的“最高机密”名称作为最高安全级别，其等级超过了“机密”“保密”和“受限”。

7. “McCarthy Says Truman Offered 'Phony Files,'” (《麦卡锡称杜鲁门提供了“虚假文件”》) *Boston Daily Globe*, May 7, 1950, 1.

8. “McCarthy Says Truman Offered 'Phony Files,'” *Boston Daily Globe*, May 7, 1950, 1.

9. “McCarthy Accuses Truman of 'Deceit,'” (《麦卡锡谴责杜鲁门的“欺骗行为”》) *Los Angeles Times*, May 7, 1950, 24.

10. George Eckel (乔治·埃克尔), “McCarthy Scorns 'Phony Files Offer,'” (《麦卡锡对提交的“虚假文件”表示不屑》) *New York Times*, May 7, 1950, 35.

11. 同样，为什么第二次红色恐慌通常被称为“麦卡锡主义”，而不是“麦卡伦主义”（McCarranism）或“华卡主义”（HUACism）？历史学家埃伦·施雷克认为，“如果观察家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知道他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信息自由法案》公开了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了解到的东西，‘麦卡锡主义’很可能会被称为‘胡佛主义’”。见 Schrecker, *Many Are the Crimes*, 203。

12. 有关这个故事的更详细叙述及其事实缺陷，参见 Oshinsky, 107–108。

13. Rovere, 21–22.

14. Will Straw, “Introduction,” *Cyanide and Sin: Visualizing Crime in 50s America*（《氰化物与罪恶：50 年代美国犯罪的可视化》）(New York: Andrew Roth, 2009).

15. Bernstein, *Mr. Confidential*. 哈里森最终将《耳语》重新设计成《机密》的克隆版，用它发表一些对他的旗舰八卦杂志来说过于粗俗的故事。参见 Samantha Barbas（萨曼莎·巴巴斯）, *Confidential Confidential: The Inside Story of Hollywood's Notorious Scandal Magazine*（《机密的机密：好莱坞臭名昭著的丑闻杂志的内部故事》）（Chicago: Chicago Review Press, 2018）, 102。

253 16. Bernstein, 47–48.

17. 这四本书分别是《纽约机密》（1948）、《芝加哥机密》（1950）、《华盛顿机密》（1951）和《美国机密》（1952）。《华盛顿机密》在出版当夏登上非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它描绘了一个同性恋泛滥的城市，并声称“至少有 6000 人……拿着政府的工资”。参见 John Kelly（约翰·凯利）, “Commies, Clip Joints, Easy Women: The World of ‘Washington Confidential,’”（《赤色分子、夜总会、轻浮女人：〈华盛顿机密〉的世界》）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9,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commies-clip-joints-easy-women-the-world-of-washington-confidential/2016/01/09/d1 fc2db4-b332-11e5-9388-466021d971de_story.html; Jack Lait and Lee Mortimer（杰克·莱特、李·莫蒂默）, *Washington Confidential*（《华盛顿机密》）（New York: Crown, 1951）, 116。

18. "Too Hot to Print!," (《热辣到没法打印！》) *Confidential*, December 1952, 20；强调为原文所有。

19. Scott, *Shocking True Story*, 34.

20. Theodore Peterson (西奥多·彼得森), *Magazin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二十世纪的杂志》)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6), 82.

21. *Confidential*, August 1953, 53；强调为原文所有。

22. *On the Q.T.*, August 1955, 2–3. 除了免费的"肌肉测量仪"，乔莱特健身训练学院还为潜在客户提供了免费的"强壮男士照片集"，考虑到它的广告小册子充斥着一些可能被认为是软色情的内容，这是一个颇具挑逗意味的细节。

23. Drew Pearson, "Washington Merry Go Round: 'Malinkov' at Golf Club," (《华盛顿的旋转木马：马林科夫在高尔夫俱乐部》) *Bakersfield Californian* (《贝克斯菲尔德加利福尼亚人报》), May 17, 1954, 36.

24. Scott, *Shocking True Story*, 40.

25. Scott, *Shocking True Story*, 40. 关于手表内隐蔽录音机的真实性存在一些争论；斯科特对此只字未提，伯恩斯坦则认为这个故事是假的。不管怎样，《机密》杂志的崇拜者和目标读者相信该杂志可以获得这样的技术（而且这样的谣言被广泛传播），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该杂志对八卦新闻的影响。

26. Hal C. Wingo (哈尔·C. 温戈), "Presidential Privilege," (《总统特权》) *New Yorker*, April 23, 2012. "［约翰逊］刚刚明确表示，" 温戈写道，"他想要得到与媒体给予约翰·肯尼迪总统的掩饰相同的待遇，而规则对总统有利。我们知道他对规则的理解是正确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 也见 Robert Dallek（罗伯特·达勒克）, *Flawed Giant: 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 1961–1973*（《有缺陷的巨人：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时代，1961—197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6–187。如果《机密》杂志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还处于鼎盛时期，约翰逊和肯尼迪的婚外情可能会被报道出来。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详细描述了名人和记者之间的联盟，一群记者在火车上打牌，这时赤身裸体的贝比·鲁斯（Babe Ruth，美国著名职业棒球运动员）从中间穿过，后面紧跟着一个挥

舞着刀的愤怒女人。“幸好我们没看到，”一名记者说，“否则我们就得报道了。”参见 Brad Schultz（布拉德·舒尔茨）, *Sports Media: Planning, Production, and Reporting*（《体育媒体：策划、制作和报道》）, vol. 1（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05）, 18。

27. Michael Stephenson（迈克尔·史蒂芬森）, “The O’Dwyer Story!,” (《奥德怀尔的故事！》) *Confidential*, December 1952, 21–23, 45–47; Jim Johnson（吉姆·约翰逊）, “Love in the U.N.!,” (《爱在联合国！》) *Confidential*, December 1952, 32–33, 58–59.

28. Brad Shortell（布拉德·肖特尔）, “Governor Dewey’s Biggest Blunder!,” (《杜威州长的最大失误！》) *Confidential*, April 1953, 10–11, 54.

254 29. Johnson Caldwell（约翰逊·考德威尔）, “How Boston’s Ex-Mayor Peters Corrupted Starr Faithfull!,” (《波士顿前市长彼得斯是如何腐蚀斯塔尔·费斯福的！》) *Confidential*, August 1953, 10–11, 51–52. 尽管有关彼得斯与费斯福关系的谣言早已流传——两人实际上是远亲——《机密》杂志发布了一封费斯福父亲的信，证明了彼得斯与费斯福的死脱不开关系，使这个故事又有了新进展。

30. Scott, *Shocking True Story*, 23.

31. Harvey Matusow（哈维·马图索）, *False Witness*（《伪证》）(New York: Cameron & Kahn, 1955), 128. 马图索没有透露科恩女友的身份。

32. Howard Rushmore（霍华德·拉什莫尔）, “Red Murder, Inc.” (《赤色谋杀公司》) *Confidential*, November 1953, 38–39, 62–63.

33. 语出佐洛托，引自 Bernstein, 3。

34. Scott, *Shocking True Story*, 82.

35. 简而言之，环球影城为了保护一位更有价值的明星，放弃了一位不那么重要的明星；直到 1985 年哈德森死于艾滋病，主流出版物才报道他的性取向。参见 Bernstein, 118–122。揭露卡尔霍恩入狱记录的故事出现在 “Movie Star Rory Calhoun: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Still a Convict!,” (《电影明星罗里·卡尔霍恩：但若非蒙受上帝的恩典，他仍然是个罪犯！》) *Confidential*, May 1955。

36. Scott, *Shocking True Story*, 81.

37. Joseph M. Porter (约瑟夫 · M. 波特), "How that Stevenson Rumor Started!," (《史蒂文森的谣言是如何开始的！》) *Confidential*, August 1953, 41–43, 59–60.

38. Marquis Childs (马奎斯 · 蔡尔兹),*Witness to Power* (《权力的见证者》) (New York: McGraw-Hill, 1975), 67.

39. Truxton Decatur (特鲁克斯顿 · 迪凯特), "We Accuse . . . Sumner Welles: A Confidential Report," (《我们指控……萨姆纳 · 威尔斯：一份机密报告》) *Confidential*, May 1956, 12–15. 自 20 世纪 40 年代初以来，有关威尔斯性取向的故事就在华盛顿流传开来。但在 1942 年，当威尔斯因醉酒时向一名铂尔曼搬运工求婚的谣言而被迫辞职时，大多数新闻报道都将这一变化归因于罗斯福政府的反苏情绪。唯一提到威尔斯下台真正原因的记者是德鲁 · 皮尔森，他提到了“离婚、家庭不忠和性谣言的故事”。即便是十年后，畅销书八卦指南《华盛顿机密》的作者们也只把它称为“盲闻”。参见 Gail Collins（盖尔 · 柯林斯）, *Scorpion Tongues: Gossip, Celebrity, and American Politics*（《毒蝎之舌：八卦、名人和美国政治》）（New York: Morrow, 1998）, 151–152。

40. Betrock, *Unseen America*, 28.

41. Matthew W. Dunne (马修 · W. 邓恩), *A Cold War State of Mind: Brainwashing and Postwar American Society* (《冷战时期的心态：洗脑与战后美国社会》)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3), 70. 另见 Paul S. Boyer, *By the Bomb's Early Light: 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at the Dawn of the Atomic Age*（《在核弹的初光下：原子时代来临之际的美国思想和文化》）（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Tony Shaw and Denise J. Youngblood（托尼 · 肖、丹尼斯 · J. 杨布拉德）, *Cinematic Cold War: The American and Soviet Struggle for Hearts and Minds*（《电影界冷战：美国和苏联的人心之争》）（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42. *Rave*, August 1955; *Tip-Off*, June 1957.

43. *On the Q.T.*, August 1955，强调为原文所有；*On the Q.T.*, November 1960,

强调为原文所有；*Whisper*, March 1955。

44. Desjardins, "Systemizing Scandal," 212.

255 45. Eric K. Foster (埃里克・K. 福斯特), "Gossip," (《八卦》) in *Encyclopedia of Human Relationships* (《人类关系百科全书》), ed. Harry T. Reis and Susan Sprecher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009), 769.

46. 语出杰克・奥・唐奈，引自 Max Lerner（马克斯・勒纳）, "Scandal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XI—Sex and Politics," (《国务院中的丑闻： XI—性与政治》) *New York Post*, July 21, 1950, 2。

47. Alan Dunn (艾伦・邓恩), "It's true, sir ... ," (《这是真的，先生……》) *New Yorker*, June 17, 1950, 21.

48. 在那个时代的俚语中，"背叛者"（treacher）就是指"叛徒"（traitor）。Joseph and Stewart Alsop (约瑟夫・艾尔索普、斯图尔特・艾尔索普), "Why Has Washington Gone Crazy?," (《华盛顿为什么变得疯狂？》) *Saturday Evening Post*, July 29, 1950, 60.

49. 语出麦卡锡，引自 "Aides of Acheson Under New Attack," (《艾奇逊的助手们遭到新的攻击》)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4, 1950, 14。

50. 语出 1950 年 4 月 20 日麦卡锡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演讲，引自 "Senator Declares His Attack Made Him 'A Revolving S.O.B. Automatically,'" (《参议员宣称他的攻击使他"成为一个全自动运作的混蛋"》) *Washington Post*, April 21, 1950, 1。

51. 语出麦卡锡，引自 "Wisconsin GOP Hails McCarthy as He Urges Acheson Be Fired," (《麦卡锡敦促解雇艾奇逊，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对此表示欢迎》) *Boston Daily Globe*, June 10, 1950, 2。

52. Holmes Alexander (霍尔姆斯・亚历山大), "No Tears Are Falling for State Department," (《无人为国务院垂泪》)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4, 1950, A5. "老兄"（dude）这个词长期以来一直用于指代无法适应西方所谓喧嚣生活的东方人。

53. 据官方说法，麦卡锡和胡佛认为他们同时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同一家酒店只是巧合。胡佛的话可参见 I. F. Stone（I. F. 斯东）, *The Haunted*

Fifties（《惶惑的 50 年代》）（New York: Vintage, 1969）, 23–24。

54. "Memo to Pearson from F.B." (《F. B. 给皮尔森的备忘录》) in folder "McCarthy et al.—Law Suit I," box G221 (2 of 3), Pearson Papers. 皮尔森在做记者期间树敌不少（一封只写了“狗娘养的，华盛顿特区”的信都能被准确地送到皮尔森的办公室），但他的日记显示，他似乎认为麦卡锡特别危险。参见 "Memoirs (unpublished)," box G211 (1 of 3), Pearson Papers; 以及 Drew Pearson and Tyler Abell (德鲁·皮尔森、泰勒·阿贝尔), *Drew Pearson Diaries 1949–1959* (《德鲁·皮尔森日记，1949—1959》)（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4）。

55. Oshinsky, 179–182.

56. *Milwaukee Journal*, May 8, 1950，引自 Edwin R. Bayley（埃德温·R. 贝利）, *Joe McCarthy and the Press*（《乔·麦卡锡和新闻界》）（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1）, 79。

57. Walter Winchell, "Walter Winchell on Broadway," *Zanesville Signal*, March 7, 1951, 4.

58. 语出 1951 年 2 月 5 日开始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连载的系列文章，转引自 Bayley, 154。另见 "McCarthy Says Truman Offered 'Phony Files,'" *Boston Daily Globe*, May 7, 1950, 1。

59. 语出 1950 年 4 月 20 日麦卡锡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演讲，引自 "Senator Declares His Attack Made Him 'A Revolving S.O.B. Automatically,'" *Washington Post*, April 21, 1950, 1。

60. 语出麦卡锡，引自 Bayley, 73。

61. 文章和新闻稿来自卷宗 "Sex Crimes (1 of 2),"（“性犯罪［1/2］”）box F170 (3 of 3), Pearson Papers。

62. Angus McLaren, *Sexual Blackmail: A Modern History* (《性讹诈：一部现代史》)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48. 256

63. J. Edgar Hoover, "How Safe Is Your Daughter?," (《你的女儿有多安全？》) *American Magazine*, July 1947, 32.

64. Philip Jenkins (菲利普·詹金斯), *Moral Panic: Changing Concepts of the*

Child Molester in Modern America (《道德恐慌：现代美国对猥亵儿童者概念的变化》)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1.

65. 正如约翰·德埃米利奥和埃斯特尔·弗里德曼所证明的那样，“变态”的叙述源于 19 世纪晚期医学专业人士对同性恋的分类尝试，但它最终作为描述各种偏离常态的性欲和行为的一种手段进入了主流词汇。D'Emilio and Freedman, 129–130.

66. 历史学家大卫·凯尔·约翰逊（David K. Johnson）曾指出：“红色恐慌和薰衣草恐慌的领导者最害怕的不是苏联定义的共产主义，而是新政及其暗示的共产主义——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不道德、贪图享乐的官僚国家。” Johnson, 97.

67. Johnson, 97–98.

68. Johnson, 31.

69. Johnson, 33.

70. 关于所谓的哈登－欧伦堡事件（Harden-Eulenburg affair），参见 James D. Steakley（詹姆斯·D. 斯蒂克利）, “Iconography of a Scandal: Political Cartoons and the Eulenburg Affair,”（《丑闻的图像学：政治漫画与欧伦堡事件》） in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 in Europe & America*（《同性恋在欧洲和美国的历史》), ed. Wayne R. Dynes and Stephen Donaldson（韦恩·R. 戴恩斯、斯蒂芬·唐纳森编）（New York: Garland, 1992）, 328–337。

71. Max Lerner, “‘Scandal’ in the State Dept.V—The Problem of Blackmail,” (《国务院的“丑闻”——讹诈问题》) *New York Post*, July 14, 1950, 2. 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卢·尼科尔斯否认胡佛曾不遗余力地支持同性恋勒索论，但他指出，任何受雇于联邦调查局并被发现是同性恋的人都将被解雇。

72. Joseph and Stewart Alsop, “Why Has Washington Gone Crazy?,” 21.

73. Joseph and Stewart Alsop, “Why Has Washington Gone Crazy?,” 21, 61.

74. “Senate: Tuesday August 8, 1950,” (“参议院： 1950 年 8 月 8 日，星期二”) *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 81st Congress, 11979.

75. Bayley, 161–163.

76. “Expose of Reds Is Described as Just Beginning,” (《据称对赤色分子的揭露

才刚刚开始》) *Chicago Daily Tribune*, May 3, 1950, 5.

77. 另一个推动调查的因素是“一名大都会警察局警官的证词，他说华盛顿估计有 5000 名同性恋者，其中 75% 为政府服务”。参见 “$10,000 Voted to Investigate Perversion in U.S. Agencies,” (《经投票通过，1 万美元将被用于调查美国政府机构中的变态行为》) *Washington Post*, June 8, 1950, 1。霍伊得知小组委员会的新任务后很不高兴：“‘该死的。我不想调查那些东西，’他对弗朗西斯·弗拉纳根（Francis Flanagan）说，‘这纯属胡说八道，我不想掺和进去。’” Johnson, 101–102.

78. “Memo from FB to Pearson,” June 21, 1950, folder 34. McCarthy, Jos. (continued) General (folder 1 of 2), box G222 (3 of 3), Pearson Papers.

79. 克尔缺席了两个月，外界猜测她是去夏威夷处理怀孕事宜了，很可能是和麦卡锡有了关系。关于两人的谣言已经在流传，杰克·安德森在 1950 年 12 月指出，麦卡锡和克尔有可能上了床。“Memo: Anderson to Pearson,” December 16, 1950, folder IV “McCarthy—(Background Info),” box G221 (2 of 3), Pearson Papers. 关于克尔的“堕胎”传闻，参见 Ralph de Toledano（拉尔夫·德·托莱达诺）, “The Real McCarthy,” (《真实的麦卡锡》) *American Conservative* (《美国保守派》), April 25, 2005, http://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 /articles/the-real-mccarthy/。德·托莱达诺称，尽管堕胎传闻不实，但克尔的跌倒确实使她的盆骨严重受损，导致她无法生育。婚后，麦卡锡和克尔收养了一名女婴。 257

80. Gentry, 379.

81. “McCarthy Says Truman Offered ‘Phony Files,’” *Boston Daily Globe*, May 7, 1950, 1.

82. “Gerald M. Galvin to Arthur V. Watkins,” (《杰拉尔德·M. 高尔文致亚瑟·V. 沃特金斯》) September 29, 1954, box 56, folder 9, Watkins Papers. 关于“100% 的美国人”这一绰号的例子，参见 box 54, folder 15, Watkins Papers。

83. “Mrs. Joseph A. Drapeau to Arthur V. Watkins,” August 18, 1954 box 54, folder 15, Watkins Papers.

84. “Naomi Barnard to Arthur V. Watkins,” (《内奥米·巴纳德致亚瑟·V. 沃特

金斯》）October 1, 1954, box 55, folder 7, Watkins Papers，强调为原文所有。

85. 对于这种使用宗派语言的许多例子，参见 box 55, folder 12, Watkins Papers。

86. "McCarthy to Unmask Gen. Marshall," (《麦卡锡揭开了马歇尔将军的面纱》)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1951, 5.

87. "Brunauers, McCarthy Targets, Suspended from U.S. Posts," (《布鲁诺尔——麦卡锡的目标——其在美职务被暂停》) *Washington Post*, April 11, 1951, 3.

88. "Aides of Acheson Under New Attack,"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4, 1950, 14.

89. 希特勒用这个概念来指代那些（在他看来）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归咎于德国将军埃里希·卢登多夫（Erich Von Ludendorff）的犹太人。当然，这个概念后来被用在希特勒身上，他企图将德国经济萧条归咎于犹太人。见 Joel T. Nadler and Tiffany Edwards（乔尔·纳德勒、蒂芙尼·爱德华兹）, "The 'Big Lie' Technique," （《"弥天大谎"的诀窍》）in *The Encyclopedia of Deception*（《欺骗的百科全书》）, ed. Timothy R. Levine（蒂莫西·R. 莱文编）（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2014）, 77–79。

90.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 1952, B4.

91. 有关麦卡锡的指控及其在战后更大的红色恐慌中的作用，更全面的探讨参见 Victor S. Navasky（维克托·S. 纳瓦斯基）, *Naming Names*（《指名道姓》）（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0）；William L. O'Neill（威廉·L. 奥尼尔）, *A Better World: The Great Schism: Stalinism and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s*（《一个更好的世界：大分裂：斯大林主义和美国知识分子》）（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特别是第 9 章；Oshinsky；以及 Schrecker, *Many Are the Crimes*。

92. Alfred Friendly (阿尔弗雷德·弗里德利), "Lattimore Acted Like a Red, Freda Utley Tells Senators," (《弗雷达·阿特利告诉参议员，拉铁摩尔表现得像个赤色分子》) *Washington Post*, May 2, 1950, 1; "McCarthy Labels 4 Pro-Red," (《麦卡锡标记了 4 名亲赤色分子》) *Boston Daily Globe*, March 14 1950, 1, 10.

93. 语出麦卡锡，引自 Oshinsky, 144–145。

94. "Budenz Identifies Lattimore as Red,"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1, 1950, 1.

95. Oshinsky, 152–153.

96. Alfred Friendly, "Lattimore Acted Like a Red, Freda Utley Tells Senators," *Washington Post*, May 2, 1950, 1.

97. 参见 Desjardins, 211–212。

98. *Washington Star*, May 4, 1950.

99. Gentry, 379.

100. "From the Record," folder 2: "Clippings, 1946–1950," box 2, series 3.2, Millard Tydings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101. 语出泰丁斯，引自 Oshinsky, 119。

102. "Majority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Pursuant to Senate Resolution 231,"（《外交关系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根据参议院第 231 号决议提交的多数报告》）引自 "Excerpts from Text of Majority Report on Charges by Senator McCarthy,"（《参议员麦卡锡指控的多数派报告文本节选》）*New York Times*, July 18, 1950, 16。

103. William S. White (威廉・S. 怀特), "Red Charges by M'Carthy Ruled False,"（《麦卡锡的通共指控被裁定为伪造》）*New York Times*, July 18, 1950, 1.

104. 虽然泰丁斯建议谴责麦卡锡，但他并没有提出这样做的决议。Alfred Friendly, "Tydings Fires 2/2-Hr. Blast at McCarthy from Floor," *Washington Post*, July 21, 1950, 1.

105. "Maryland Senatorial Election of 1950,"（"1950 年马里兰州参议员选举"）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Rules and Administration, United States Senate (《美国参议院规则和行政委员会报告》), 82nd Congress, 1st Sess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ice, August 20, 1951), 5.

106. "Maryland Senatorial Election of 1950,"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Rules and Administration, United States Senate, 82nd Congress, 1st Sess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ugust 20, 1951),

5. 贝兹·米勒和坦克斯利后来结婚了，之前的米勒夫人也就是现在的“贝兹·坦克斯利”，在 1953 年克尔与麦卡锡的婚礼上担任伴娘。

107. William Graf (威廉·格拉夫), “Statistics of the Congressional Election of November 7, 1950” (“1950 年 11 月 7 日国会选举的统计数据”)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1), 13. 政治学家亚当·贝林斯基（Adam J. Berinsky）和加布里埃尔·伦茨（Gabriel S. Lenz）认为，麦卡锡对参议院选举结果的影响并不像许多观察人士得出的结论那样大。在巴特勒和泰丁斯的竞选中，他们注意到马里兰州在近期的全国选举中投票给了共和党——尽管他们的范例的确表明麦卡锡的最大影响可能在这里。参见 Adam J. Berinsky and Gabriel S. Lenz, “Red Scare?: Revisiting Joe McCarthy’s Influence on 1950s Elections,” （《红色恐慌？重新审视乔·麦卡锡对 20 世纪 50 年代选举的影响》）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公众意见季刊》） 78, no. 2（January 2014）: 369–391。

108. James P. Connolly (詹姆斯·P. 康诺利), “Maryland: M’Carthyism,” (《马里兰州：麦卡锡主义》)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50.

109. Alfred Friendly, “Insults Fly at Hearing on Loyalty,” (《忠诚度听证会上骂声四起》) *Washington Post*, March 10, 1950, 1.

110. 杰塞普 1950 年 3 月 20 日对泰丁斯委员会的声明，引自 “The Texts of Ambassador Jessup’s Statement and of the Senator McCarthy Letters,” (《杰塞普大使声明和参议员麦卡锡信件的文本》）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50, 24。

111. 语出麦卡锡，引自 “Congressmen Ask Jessup Rejection,” (《国会议员询问杰塞普驳回的情况》）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8, 1951, 8。也可参见 Oshinsky, 211–213。

112. Richard L. Strout (理查德·L. 斯特劳特), “McCarthy Clashes with Fulbright at Hearing on Jessup,” (《麦卡锡在关于杰塞普的听证会上与富布赖特发生冲突》)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ober 2, 1951, 1.

113. Richard L. Strout, “Jessup Brands McCarthy Charge False,” (《杰塞普谴责麦卡锡指控不实》)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ober 3, 1951, 1.

114. William S. White, "Senate Unit Votes to Reject Jessup as Delegate to UN,"(《参议院单位投票拒绝杰塞普作为联合国代表》)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1951, 1, 6. 不到一周，杜鲁门就绕过参议院，利用休会任命使杰塞普成为联合国代表("Truman Gives Jessup Recess Appointment as U.N. Delegate," *Boston Daily Globe*, October 23, 1951, 1)。 259

115. "McCarthy's Victory Vote Trails Ticket," (《麦卡锡的投票取胜之路》)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6, 1952, 7.

116. 参见 1952 年 11 月头五天，《华盛顿邮报》的"编辑来信"部分。

117. 语出罗伊·科恩，引自 Zion, 81。

第六章

1. 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也受到了邀请，但他和玛米（Mamie）表示辞谢，因为他们要在那个周末接待巴拿马总统。

2. 这篇关于麦卡锡婚礼的报道是根据《环球新闻》（Universal Newsreel）的报道改编的，"Wedding of Senator Joe McCarthy", a BBC newsreel, Oshinsky, 328–329；以及 "M'Carthy Marries Former Staff Aide," (《麦卡锡与前幕僚助理结婚》)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1953, 15。

3. Anthony Leviero, "1,456 Ousted by U.S. as Security Risks in 4-Month Period,"(《四个月内有 1456 人被美国列为安全风险人员》)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1953, 1. 第 10450 号行政命令更新了杜鲁门时代旨在改善政府安全的法规。该法案宣布，政府雇员可以因"存在安全隐患"而被解雇，而不需要有不忠行为的证据。《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在 1456 名政府雇员中，实际上只有 863 人被解雇；"其余 593 人在得知政府掌握了对他们不利的情报后辞职"。这种自我监管（不经过正当程序就结束职业生涯）的推广，可以说是麦卡锡主义政策最具破坏性影响的地方。

4. 就像麦卡锡的大部分指控一样，那些关于蒙茅斯堡的指控被证明没有这位参议员所承诺的那么重要。尽管大约 42 名员工因"安全隐患"而被解雇，

但那里从未发现一个有组织的间谍网，大多数被解雇的员工最终都得以复职，麦卡锡的指控被揭露是其早期指控的翻版，而他的早期指控已被证明不实。

5. David A. Nichols, *Ike and McCarthy: Dwight Eisenhower's Secret Campaign against Joseph McCarthy* (《艾克与麦卡锡：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反对约瑟夫·麦卡锡的秘密运动》)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7).
6. Zion, 81–84. 关于麦卡锡和科恩第一次相遇的经过，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一位国会议员声称，最初是埃德加·胡佛介绍两人认识的。参见 Tye, 241。
7. 麦卡锡的偏见可以从他对富布赖特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的攻击中看出，他称之为“半聪明计划”（the half-bright program），并将其继续存在归因于“一群老艾奇逊智囊团”。见 Reeves, 491。
8. Murrey Marder (默里·马德), “Red Inquiry Draws Fire on McCarthy,” (《麦卡锡因其红色调查而受到攻击》) *Washington Post*, March 25, 1953, 1.
9. Reeves, 465. 由于左派吸引了大量具有东欧血统的移民犹太人，对反共主义者的反犹主义指控也变得有理有据。关于麦卡锡将科恩用作盾牌的信息，参见 Drew Pearson, “The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McCarthy, Cohn Visit Baruch,” (《华盛顿的旋转木马：麦卡锡、科恩访问巴鲁克》)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March 27, 1954, 47。 260
10. “McCarthy to Sokolsky, August 29, 1951,” (《麦卡锡致索科尔斯基，1951年8月29日》) box 83, folder 3, George Sokolsky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1. Alan Betrock, *The Personality Index: To Hollywood Scandal Magazines, 1952–1966* (《人物索引：1952—1966年好莱坞丑闻杂志》) (Brooklyn: Shake Books, 1988).
12. Schrecker, *Many Are the Crimes*, 256; Zion, 83. 索科尔斯基是科恩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科恩在1968年的麦卡锡传记中专门写道：“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多拉·马库斯·科恩和阿尔伯特·科恩；以及乔治·E. 索科尔斯基，他经常代行父母职责。” Roy Cohn, *McCarthy* (《麦卡锡》)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 v.

13. Evan Thomas (埃文·托马斯), *Robert Kennedy: His Life* (《罗伯特·肯尼迪：他的一生》)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58–66.

14. Zion, 87; Reeves, 442. 罗伯特·肯尼迪最终确实得到了助理律师的（较低）职位。这一事件导致了肯尼迪和科恩之间长达一生的仇恨。科恩声称，委员会总法律顾问弗拉纳根告诉他，肯尼迪不喜欢科恩，因为“首先，[肯尼迪] 对犹太人无感。其次，你又不是棕榈滩马球俱乐部的一员。最后，你得到了他想要的工作”。语出科恩，引自 Zion, 88。肯尼迪于 1953 年 7 月离开了麦卡锡的工作队伍，只是在陆军 – 麦卡锡听证会期间回来帮助代表委员会本身。

15. Reeves, 464, per an interview with J. Edgar Hoover's assistant Lou Nichols.

16. Fred J. Cook (弗雷德·J. 库克),*The Nightmare Decade: The Life and Times of Senator Joe McCarthy* (《噩梦般的十年：参议员乔·麦卡锡的生活和时代》)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398.

17. 语出麦卡锡，引自 Schrecker, *Many Are the Crimes*, 256。

18. Drew Pearson, "The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Roy Will Be Missed," (《华盛顿的旋转木马：我们将怀念罗伊》)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July 24, 1954, 35; Drew Pearson, "The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Quiz Shows Joe's Need for Roy," (《华盛顿的旋转木马：测验显示乔需要罗伊》)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July 25, 1954, B5.

19. 科恩和席因第一次相遇的确切故事尚不清楚，但两人可能是通过纽约或华盛顿的共同政治和社会关系认识的。Cook, 409; Reeves, 465; von Hoffman, 142.

20. Piper Laurie (派珀·劳里), *Learning to Live Out Loud: A Memoir* (《学会肆意生活：一部回忆录》) (New York: Crown Archetype, 2011), 106.

21. Nat McKitterick (纳特·麦基特里克), "Covered Like an Election: Mr. Cohn and Mr. Schine Needed No Press Agent," (《像选举一样接受报道：科恩先生和席因先生无需新闻代理》) *Washington Post*, April 26, 1953, B3.

22. Drew Pearson, "The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Schine 'Studied' Via

Secretary," (《华盛顿的旋转木马：通过秘书“研究”席因》)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May 4, 1954, 39; von Hoffman, 146.

23. 语出理查德·罗维尔，引自 Cook, 409。

24. 有关席因授权行为的说明，参见 "Schine at Harvard: Boy with the Baton," (《席因在哈佛：拿着指挥棒的男孩》) *Harvard Crimson* (《哈佛深红报》), May 7, 1954, http://www.thecrimson.com/article/1954/5/7 /schine-at-harvard-boy-with-the/。

261 25. 关于科恩 – 席因浪漫关系的争论，见 von Hoffman, 188–190, 202, 226, 230–231。尽管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科恩和席因并没有发生过肉体关系，但有关他们两人的绯闻却足以让公众对他们的想象变得奇怪，并在流行文化中牢牢扎根。在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1996 年的独幕剧《地狱里的大卫·席因》中，罗伊·科恩称席因是现代版的“特洛伊的海伦”，称他有着“让人拜倒一千次的脸”。见 Tony Kushner, "G. David Schine in Hell," (《地狱里的大卫·席因》) in *Death & Taxes: Hydrioptaphia & Other Plays* (《死亡与税收：〈瓮葬〉及其他戏剧》)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2000), 234。

26. 尽管小组委员会的执行会议是保密的，但会议记录最终在 2003 年被公布。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83rd Congress (第 83 届国会参议院政府运作委员会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执行会议), First Session, 195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 vol. 1, 143.

27. Willard Edwards, "Tell Cover-Up of State Dept. Homosexuals," (《美国国务院掩盖同性恋者丑闻的声明》) *Chicago Daily Tribune*, February 6, 1953, 9.

28. 语出麦卡锡，引自 Roger D. Greene（罗杰·D. 格林）, "McCarthy Demands Penalties in Missing Files 'Reprisals,'" (《麦卡锡要求对丢失文件的“报复行为”进行处罚》)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7, 1953, 2。麦卡锡的夸张主张似乎奏效了；当马特森因其关键性的证词遭到明显报复而被降职时，麦卡锡找到媒体，迫使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下令让马特森复职。

29. Dean, 127.

30. Charles, *Hoover's War on Gays*, 130–131.

31. Von Hoffman, 148.

32. "Samuel Reber to Retire," (《塞缪尔·雷伯退休》) *New York Times*, May 30, 1953, 13; "Ex-Envoy Reber Refuses to Enter McCarthy Row," (《前特使雷伯拒绝加入麦卡锡阵营》) *Chicago Daily Tribune*, April 23, 1954, 9.

33. 施莱辛格致史蒂文森的信，1953 年 5 月 26 日，引自 Dean, 140–141。

34. "Charles Thayer, Soviet Expert, 59," (《查尔斯·泰耶，苏联专家，59 岁》) *New York Times*, August 29, 1969, 29.

35. Charles, *Hoover's War on Gays*, 122–123.

36. "Thayer Quits As Consul in New Inquiry," (《泰耶辞去新调查领事职务》) *Washington Post*, March 27, 1953, 3. 另一种解释泰耶辞职的观点认为，科恩在另一段风流韵事上勒索了泰耶，据说后者在墨西哥城让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怀孕了。科恩威胁要在奇普·博伦的任命听证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这让泰耶感到害怕，因为他担心自己的母亲知道怀孕、结婚和迅速离婚的事。参见 von Hoffman，169-170。

37. Reeves, 480.

38. "2 M'Carthy Aids Queried Sharply," (《麦卡锡的两名助手受到强烈质疑》)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1953, 7; "McCarthy Counsel in Europe to Study U.S. Information," (《麦卡锡的法律顾问赴欧考察美国信息》) *Washington Post*, April 6, 1953, 2.

39. "2 M'Carthy Aids Queried Sharply,"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1953, 7.

40. 他们依次去了巴黎、波恩、柏林、慕尼黑、维也纳、贝尔格莱德、雅典、罗马、巴黎（他们又去了一次）和伦敦。

41. Nat McKitterick, "Covered Like an Election: Mr. Cohn and Mr. Schine Needed No Press Agent," *Washington Post*, April 26, 1953, B3.

42. J. Edgar Hoover, "Radiogram to Rolland O. L'Allier," (《致罗兰·O. 勒阿利埃的电报》) April 3, 1953, Joseph McCarthy FBI File, part 4 of 56 (part 3 of 28). 262

43. July 8, 1953, entry from anonymous diary in Stevenson (史蒂文森的匿名日

记中的条目), Adlai (folder 2), box 32, Names Series, Ann Whitman File, DDE Library.

44. July 13, 1953, entry from anonymous diary in Stevenson, Adlai (folder 2), box 32, Names Series, Ann Whitman File, DDE Library.

45. July 9, 1953, entry from anonymous diary in Stevenson, Adlai (folder 2), box 32, Names Series, Ann Whitman File, DDE Library. 日记被转交给艾森豪威尔，以便了解史蒂文森在 1956 年再次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挑战艾森豪威尔时的策略（他最终做到了）。目前尚不清楚这位不具名的记者是否知道艾森豪威尔获得了这份日记的副本。从 1956 年大选的角度来看，日记中最重要的一段写于 1953 年 6 月 20 日："在我们看来，这次世界旅行给了[史蒂文森] 一个很好的机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麦卡锡主义，即它对我们的外交服务、我们的宣传工作以及我们与盟国的关系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史蒂文森承认，他对自己在国内外的所见所闻感到非常震惊，我认为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设法在这个问题上从艾森豪威尔那里抢到主动权，也许这样就能赢回许多幻想破灭的自由派共和党人。"毫无疑问，由于担心史蒂文森会采取这种策略，艾森豪威尔决定从 1953 年年底开始更直接地攻击麦卡锡。

46. July 22, 1953, entry from anonymous diary in Stevenson, Adlai (folder 2), box 32, Names Series, Ann Whitman File, DDE Library.

47. Drew Pearson, "The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McCarthy's Men Get Attention," (《华盛顿的旋转木马：麦卡锡的手下受到关注》)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2, 1953, 41; "McCarthy Men Depart England amid Laughter," (《麦卡锡的手下在欢声笑语中离开英国》) *Washington Post*, April 26, 1953, B3.

48.《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引自 Reeves, 489。

49. "McCarthy Men Depart England Amid Laughter," *Washington Post*, April 26, 1953, B3.

50. Reeves, 491.

51. Johnson, 131–134.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但科恩称这次旅行是他的一

大遗憾，表面上是由于此次旅行对他和席因在美国的形象造成了影响。见 Zion, 90–91。

52.《晚邮报》报道，引自 Drew Pearson, "The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McCarthy's Men Get Attention," *Washington Post*, April 22, 1953, 41。

53. 剪报来自文件夹 "26. McCarthy—(Schine)," box G222 (2 of 3), Pearson Papers。

54. 语出罗伊·科恩和大卫·席因，引自 Cook, 412。

55. Von Hoffman, 151.

56. Laurie, 123.

57. Drew Pearson., "Washington Merry-Go Round," *Madera Tribune* (Madera, California), July 17, 1953, 12.

58. Oshinsky, 363.

59. *Point of Order!* (《程序问题！》), directed by Emile de Antonio (导演：埃米尔·德·安东尼奥) (1964; New York: New Yorker Video, 2005), DVD. 263

60. Schrecker, *Many Are the Crimes*, 263.

61. "Text of Army Report Charging Threats by McCarthy and Cohn in Interceding for Schine," (《指控麦卡锡和科恩通过威胁为席因说情的军方报告全文》)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54, A9.

62. Drew Pearson. "The McCarthy-Go-Round,"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March 19, 1954, 63.

63. "Army Charges McCarthy and Cohn Threatened It in Trying to Obtain Preferred Treatment for Schine," (《军方指控麦卡锡和科恩威胁军方为席因争取优先待遇》)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54, 1.

64. W. H. Lawrence. "Stevens a Target," (《目标史蒂文斯》)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54, 1.

65. W. H. Lawrence. "M'Carthy Charges Army 'Blackmail,' Says Stevens Sought Deal with Him; 'Utterly Untrue,' Secretary Replies," (《麦卡锡指控军方"敲诈"，称史蒂文斯寻求与他达成协议；部长回应称"完全不实"》)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54, 1.

66. Reeves, 575–577.

67. Clayton Knowles (克莱顿・诺尔斯), "Cohn Again Denies He Asked Favors and Accuses Army," (《科恩再次否认曾索要优待并指控军方》)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1954, 1.

68. W. H. Lawrence, "Mundt Will Direct Senate Unit Study of McCarthy Fight," (《蒙特将指挥参议院对麦卡锡之争进行研判》)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54, 1.

69. Andrea Friedman (安德里亚・弗里德曼), "The Smearing of Joe McCarthy: The Lavender Scare, Gossip, and Cold War Politics," (《乔・麦卡锡的诽谤：薰衣草恐慌、八卦和冷战政治》) *American Quarterly* 57, no. 4 (December 2005): 1110.

70. FB, "Memo for DP," June 28, 1950, folder "McCarthy et al.—Law Suit I," box G221 (2 of 3), Pearson Papers.

71. Oliver Pilat and William V. Shannon (奥利弗・皮拉特、威廉・V. 沙农), "Smear, Inc.: The One-Man Mob of Joe Mc-Carthy, Part 12: Joe Changes the Subject to Sex," (《诽谤公司：乔・麦卡锡的单人黑帮，第 12 部分：乔将话题转移到性上》) *New York Post*, September 17, 1951, 2.

72. W. O. Berry (W. O. 贝瑞), "Letter to Jacob R. McCarthy" enclosed in "Letter to Drew Pearson," (《致雅各布・R. 麦卡锡的信》，附于《致德鲁・皮尔森的信》) May 14, 1950, box F41, folder Anti-McCarthy #2 (1 of 2), Pearson Papers.

73. William Evjue, "Letter to Drew Pearson," May 15, 1950, folder 33. McCarthy General II (folder 3 of 3), box G222 (3 of 3), Pearson Papers.

74. "Letter from 'A University Student' to William Evjue," (《 "一位大学生" 致威廉・埃维尤的信》) May 11, 1950, folder 33. Mc-Carthy General II (folder 3 of 3), box G222 (3 of 3), Pearson Papers.

75. "Statement of R. Garth McMahon—'I swear to the following facts ... ,'" ("R. 加斯・刘易斯的声明：'我对以下事实发誓……' ") Confidential Memos Folder, box G44 (3 of 3), Pearson Papers.

76. "Memo from Anderson to Pearson," (《安德森给皮尔森的备忘录》)

November 15, 1954, folder 33 McCarthy General II (folder 2 of 3), box G 222 (3 of 3), Pearson Papers.

77. "Memo from Anderson to Pearson," October 20, 1951, folder "McCarthy et al.—Law Suit I," box G221 (2 of 3), Pearson Papers.

78. Jack Anderson, "Memo to DP," (《给 DP（德鲁·皮尔森）的备忘录》) December 16, 1950, folder "IV. McCarthy (Background Info)," box G221 (2 of 3), Pearson Papers.

79. Anonymous (匿名者), "Letter to William Benton," (《致威廉·本顿的信》) December 29, 1951, folder "6. McCarthy—Sen. Benton," box G221 (2 of 3), Pearson Papers.

80. 埃德温·贝利（Edwin Bayley）详细阐述了《密尔沃基新闻报》收到这类信息后的反应："《密尔沃基新闻报》中有一个人确实主张出版，他是前城市版编辑默里·里德（Murray Reed）……他提议让一名政治记者给所有与麦卡锡关系密切的人打电话，询问这位参议员是否为同性恋。里德说，如果所有人都说他不是，报纸就可以这样开头：'麦卡锡最亲密的 35 个朋友否认他是同性恋。'或者，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拒绝回答，文章就可以写：'麦卡锡最亲密的 35 个朋友中有 28 个否认……'但里德的建议最终被否决了。" Bayley, 134. 264

81. J. Edgar Hoover, "Memorandum for Mr. Tolson, Mr. Ladd, Mr. Nichols, 10:51," January 17, 1952, Joseph McCarthy FBI File, part 3 of 56 (part 2 of 28).

82. J. Edgar Hoover, "Memorandum for Mr. Tolson, Mr. Ladd, Mr. Nichols, 5:12," January 16, 1952, Joseph McCarthy FBI File, part 3 of 56 (part 2 of 28).

83. J. Edgar Hoover, "Memorandum for Mr. Tolson, Mr. Ladd, Mr. Nichols, 5:06," January 16, 1952, Joseph McCarthy FBI File, part 3 of 56 (part 2 of 28).

84. J. Edgar Hoover, "Memorandum for Mr. Tolson, Mr. Ladd, Mr. Nichols, [time unclear]," January 17, 1952, Joseph McCarthy FBI File, part 3 of 56 (part 2 of 28).

85. J. Edgar Hoover, "Memorandum for Mr. Tolson, Mr. Ladd, Mr. Nichols, 12:06," January 18, 1952, Joseph McCarthy FBI File, part 3 of 56 (part 2 of 28). 调查的

结果之一是，姓名出现在原始信件上的陆军中尉承认自己有过同性恋关系。亚历山大·博林将军（General Alexander R. Bolling）向胡佛保证，此人将因此被开除军籍。

86. 亚当·海茨（Adam Hats）很快就放弃了对皮尔森的赞助。麦卡锡宣布胜利，但亚当反驳说，这一变化早在麦卡锡发出呼吁之前就发生了。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指出，他认为麦卡锡在发起抵制行动之前就知道即将发生的变化。参见 Oshinsky, 181–182。另一方面，反诽谤联盟执行董事阿诺德·福斯特（Arnold Forster）声称，他们的目的是续签赞助协议，“正是麦卡锡的抵制行动改变了赞助商的想法”。Herman Klurfeld（赫尔曼·克鲁菲尔德）, *Winchell: His Life and Times*（《温切尔：他的生活和时代》）（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6）, 146, 强调为原文所有。

87. FB, “Memo for DP,” June 28, 1950, folder “McCarthy et al.—Law Suit I,” box G221 (2 of 3), Pearson Papers.

88. Drew Pearson, “Letter to Col. William A. Roberts,” (《致威廉·A. 罗伯茨上校的信》) February 16, 1951, folder “McCarthy et al.—Law Suit I,” box G221 (2 of 3), Pearson Papers.

89. Hank Greenspun (汉克·格林斯彭), “Where I Stand: 8/1/52,” (“我的立场：8/1/52”) archives of the *Las Vegas Sun*.

90. 麦卡锡很可能是想说“前罪犯”而不是“前共产主义者”，但说错了；格林斯彭曾因在 1947 年向以色列准军事组织哈加纳（Haganah）运输枪支、弹药和飞机部件而被判违反《中立法案》。

91. *Where I Stand: The Hank Greenspun Story* (《我的立场：汉克·格林斯彭的故事》), dir. Scott Goldstein (New York: SGP Media, 2008). 作者对布莱恩·格林斯彭的采访，2014 年 1 月。另见 “McCarthy Clashes with Editor Also Backing Eisenhower,”（《麦卡锡与同样支持艾森豪威尔的编辑发生冲突》）*New York Herald Tribune*, October 15, 1952, 21，特别是文章的照片和说明。鉴于格林斯彭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他可能也因为麦卡锡参议员的反犹主义而对其心存警惕。

92. Hank Greenspun, "Where I Stand: 10/25/52," in *A Few Columns on Joe McCarthy by Hank Greenspun* (《汉克·格林斯彭关于乔·麦卡锡的几个专栏》) (1977 reprint in the archives of the *Las Vegas Sun*). 265

93. Hank Greenspun, copy of 10/25/52 "Where I Stand" column forwarded to Pearson, folder 12. McCarthy—(Hank Greenspun), box G221 (3 of 3), Pearson Papers.

94. Oshinsky, 310.

95. Bayley, 74.

96. 在鼎盛时期，皮尔森的专栏“华盛顿的旋转木马”出现在 650 多家报纸上。《时代》杂志在皮尔森的讣告中写道，他去世时是美国最著名的专栏作家。他也是第一个报道 1943 年乔治·巴顿将军臭名昭著的“掌掴”事件的专栏作家。“Columnists: The Tenacious Muckraker,” (《专栏作家：顽强的耙粪工》) *Time*, September 23, 1969, 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01423,00.html.

97. Justus Lawrence (贾斯特斯·劳伦斯), "Letter to Drew Pearson," April 15, 1953, folder "8. McCarthy— (Cohn) see Schine," box G221 (3 of 3), Pearson Papers.

98. Drew Pearson, "Merry-Go-Round: Cohn, Schine Also Disturb Senate GOP," *Washington Post*, July 17, 1953, 51.

99. Drew Pearson, "Merry-Go-Round: Wilson Out on Limb on Manpower," *Washington Post*, July 29, 1953, 35.

100. Drew Pearson, "Merry-Go-Round: Backstage Factors in Schine Cas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7, 1954, B.

101. Richard Gehman (理查德·盖曼), "Letter to Drew Pearson," June 2, 1954, folder "33. McCarthy General II (folder 1 of 3)," box G222 (3 of 3), Pearson Papers.

102. Phillip H. Bagby (菲利普·H. 巴格比), "Letter to Drew Pearson," July 30, 1954, folder "26. McCarthy— (Schine)," box G222 (2 of 3), Pearson Papers.

103. Frank J. Weber (弗兰克·J. 韦伯), "Letter to Drew Pearson," undated, folder

"26. McCarthy—(Schine)," box G222 (2 of 3), Pearson Papers.

104. 语出默里·马德，引自 von Hoffman, 187。

105. Joseph and Stewart Alsop, "Matter of Fact: The Tale Half Told," (《事实：被讲述了一半的故事》)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March 15, 1954, 14.

106. Undated note, folder 3 (McCarthy), box 4, Eyes Only Series, Fred A. Seaton Papers, DDE Library, emphasis in original.

107. Hank Greenspun, *A Few Columns on Joe McCarthy by Hank Greenspun*, April 2, 1954 (1977 reprint in the archives of the *Las Vegas Sun*). 格林斯彭进一步说明麦卡锡可能是一个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因为他的行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帮助大于阻碍。他还专门开了一个专栏，研究麦卡锡和阿道夫·希特勒之间的相似之处。

108. Hank Greenspun, "Secret Lives of Joe McCarthy," (《乔·麦卡锡的秘密生活》) *Rave Magazine*, June 1954, 58–73. 和《机密》一样，《锐舞》似乎对同性恋有一种痴迷。该杂志 1954 年 8 月号刊登了一篇关于李伯拉斯的封面故事，并在 1954 年 4 月号的一篇文章中质问了英国皇室的男性成员："为什么这些性感的基佬更喜欢童子军而不是漂亮的女人？"

266 109. "The Men in McCarthy's Life," *Celebrity Magazine*, August 1954, 4–8. 从 1954 年 4 月到 1956 年 1 月，该杂志只出版了 21 期。《名流》在内容上与《机密》非常相似，尽管从封面的美女模特来看，它似乎想吸引更多的男性观众。它似乎也效仿了《机密》和《锐舞》对同性恋的兴趣，1954 年 7 月的那期有一篇文章问："你是一个隐性同性恋吗？"文章开头承认"根据心理学家的说法，所有男人都担心自己不够有男子气概——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候。美国的男人尤其如此，那里的社会习俗要求男人强壮且有男子气概"。文章还声称："与普遍的看法相反……真正的同性恋很少显得娘娘腔。他们通常肌肉发达，体格健壮，行为举止与正常男性非常相似。根据金赛的说法，有 600 万'铁杆'同性恋者符合这种情况。"这篇文章把这些"铁杆同性恋者"描述成"不断寻找'隐性'同性恋者"的掠食者，他们可以引诱这些人进入"第三性别"。"Are You a Secret Homosexual?," (《你是一个隐性同性恋吗？》) *Celebrity Magazine*, July 1954, 8–9.

110. Betrock, *The Personality Index*; Orval Hopkins, "Magazine Rack,"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8, 1953, B5.

111. Joe Hyams (乔·海姆斯), "Hollywood," (《好莱坞》)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June 29, 1955, 23; "The James Masons' Suit Settled," (《詹姆斯·梅森的诉讼案已获解决》) *New York Times*, July 20, 1955, 19; "Terry Moore Sues Magazine for 2 Million," (《特里·摩尔起诉杂志社索赔 200 万》)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16, 1955, 4.

112. Wilbert Martin (威尔伯特·马丁), "Letter to Arthur V. Watkins," (《致亚瑟·V. 沃特金斯的信》) August 7, 1954, folder 2: "Responses from Watkins to neutral 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McCarthy, 16 March–18 August 1954," (《1954 年 3 月 16 日至 8 月 18 日，沃特金斯对有关麦卡锡的中立信件的回复》) box 47, series VI: Joseph McCarthy, Pamphlets and articles about 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13. Arthur V. Watkins (亚瑟·V. 沃特金斯), "Letter to Wilbert Martin," (《致威尔伯特·马丁的信》) August 12, 1954, folder 2: "Responses from Watkins to neutral 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McCarthy, 16 March–18 August 1954," box 47, Watkins Papers.

114. Charles A. Francis (查尔斯·A. 弗朗西斯), "Letter to Arthur V. Watkins," November 8, 1954, folder 15: "A-I, Correspondence from citizens with literature expressing anti-McCarthy views conc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McCarthy to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A-I，公民就麦卡锡的活动向参议院特别委员会表达反麦卡锡观点的信函》) box 80, Watkins Papers.

115. Thomas Doherty (托马斯·多赫蒂), *Cold War, Cool Medium: Television, McCarthy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冷战，冷媒介：电视、麦卡锡主义和美国文化》)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9–190.

116.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希望直播听证会，并问参议员蒙特他们是否可以有商业合作伙伴赞助直播，但蒙特回答说："由于这些听证会不寻常的性质，我们允许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赞助都是非常不合适的。" Karl Mundt (卡尔·蒙特), "Letter to Frank M. Russell, Vice-Pres.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Inc.," (《致全国广播公司副总裁弗兰克·M. 罗素的信》) April 22, 1954, Karl Mundt Papers, Dakota State University, box 558, folder 3.

117. Robert Shogan (罗伯特·肖根), *No Sense of Decency* (《不知体面》) (Chicago: Ivan R. Dee, 2009), 12, 264–265.

118. "Inquiry's Audience on TV Is Believed One of Largest," (《听证会的电视观众被认为是最庞大的观众群体之一》)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April 23, 1954, 9.

119. Rufus King (鲁弗斯·金), "Letter to the Editor," (《致编辑的信》)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 1952, B4.

120. 见 folder 3, box 13-16, folder 55, box 14,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有七个文件夹的信件抗议不播送听证会的决定，一个文件夹的信件称赞这一决定。

267 121. "Mrs. E. S. Hersh to Arthur V. Watkins," undated. folder 2, box 55,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22. 参见 folder 3, box 55,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23. "*The News* Prints the Facts," (《〈新闻〉刊载事实》) *New York Daily News*, undated, probably August 1954, newsclipping in box 47,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24. "N.B.C. Halts Live TV on Army, McCarthy,"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1954, 1.

125. Army-McCarthy Hearings, part 2, p. 83, April 22, 1954.

126. Bethan Benwell (贝瑟恩·本韦尔), "Language and Masculinity," (《语言与男性气质》) in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Gender, and Sexuality* (《语言、性别和性手册》), ed. Susan Ehrlich, Miriam Meyerhoff, and Janet Holmes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4), 240–259; Maureen C. McHugh and Jennifer Hambaugh (莫琳·C. 麦克休、珍妮弗·汉博), "She Said, He Said: Gender, Language, and Power," (《她说，他说：性别、语言和权力》) in *Handbook of Gender Research in Psychology*, vol. 1,*Gender Research in General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心理学中的性别研究手册》第 1 卷《普通实验

心理学中的性别研究》), ed. Joan C.Chrisler and Donald R. McCreary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2009), 379–410.

127. Bethan Benwell, "Male Gossip and Language Play in the Letters Pages of Men's Lifestyle Magazines," (《男性生活杂志通讯版中的男性八卦和语言游戏》)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大众文化杂志》) 34, no. 4 (Spring, 2001), 24. 本韦尔引述了 Geoffrey Hughes（杰弗里·休斯）, *Swearing: A Social History of Foul Language, Oaths and Profanity in English*（《咒骂：英语脏话、赌誓和亵圣的社会史》）（Oxford, UK: Blackwell, 1991）一书中提出的一种联系。

128. Robert Griffith (罗伯特·格里菲斯), *The Politics of Fear: Joseph McCarthy and the Senate* (《恐惧政治：约瑟夫·麦卡锡与参议院》)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0), 257.

129. Cook, 513.

130. "Testimony at Hearing," (《听证会上的证词》)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May 6, 1954, 14.

131. Cook, 498. Army-McCarthy Hearings, part 11, p. 437, April 29, 1954.

132. Army-McCarthy Hearings, part 2, p. 70, April 22, 1954.

133. Army-McCarthy Hearings, part 1, p. 44, April 22, 1954.

134. Army-McCarthy Hearings, part 3, p. 131, April 23, 1954. 值得注意的是，"闺蜜们"这个说法最初是由麦卡锡提出的，或许是为了在共同的男子气概的基础上与史蒂文斯找到共同点。

135. *Point of Order*, DVD, 18:30–19:10.

136. "Anonymous to Arthur Watkins," (《匿名者致亚瑟·沃特金斯》) August 12, 1954, folder 15, box 54,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人"一词在原文中两次下划线。

137. "Anonymous to Arthur Watkins," August 14, 1954, folder 15, box 54, series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38. "G. D. Gurley to Arthur Watkins," (《G. D. 格利致亚瑟·沃特金斯》) September 4, 1954, folder 9, box 56, series VI— 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Gerald M. Galvin to Arthur Watkins," (《杰拉尔德·M. 高尔文致亚瑟·沃特金斯》) September 29, 1954, folder 9, box 56,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39. "G. H. Stubblefield to Arthur Watkins," (《G. H. 斯塔布菲尔德致亚瑟·沃特金斯》) November 12, 1954, folder 10, box 55,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40. "George A. DeMontrond to Arthur Watkins," (《乔治·A. 德蒙特隆德致亚瑟·沃特金斯》) November 19, 1954, folder 7, box 56,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268 141. "John H. Widdowson to Arthur Watkins," (《约翰·H. 维多森致亚瑟·沃特金斯》) September 30, 1954, folder 10, box 55,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42. "F. H. Mulcahy to Arthur Watkins," (《F. H. 穆尔卡希致亚瑟·沃特金斯》) undated, folder 13, box 56,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43. "John T. Kelly to Arthur Watkins," (《约翰·T. 凯利致亚瑟·沃特金斯》) September. 1, 1954, folder 11, box 56, series VI— 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44. "Ralph W. Slate to Arthur Watkins," (《拉尔夫·W. 斯莱特 致亚瑟·沃特金斯》) November 17, 1954, folder 15, box 73, series VI— 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45. "Lee R. Atkins to Arthur Watkins," (《李·R. 阿特金斯致亚瑟·沃特金斯》) December 1, 1954, folder 1, box 74, series VI— 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46. "Anonymous to Arthur Watkins," undated. folder 15, box 77,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emphasis in original.

147. "Anonymous to Arthur Watkins," September 30, 1954, folder 8, box 74, series VI— Joseph McCarthy,Watkins Papers; "Anonymous to Arthur Watkins," November 16, 1954, folder 21, box 74,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Albert Horowitz to Arthur Watkins," (《阿尔伯特·霍洛维茨致亚瑟·沃

特 金 斯 》) undated, folder 14, box 76,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48. "Fred G. Wolverton to Arthur Watkins," (《弗雷德·G. 沃尔弗顿致亚瑟·沃特金斯》) November 15, 1954, folder 10, box 80,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49. Army-McCarthy Hearings, part 7, p. 293, April 27, 1954.

150. "What Every Boy Knows: 'Sic 'Em' Means Chase," (《每个男孩都知道："Sic'Em"的意思是"追上去"》) *New York Times*, June 10, 1954, 17. 韦尔奇后来利用自己上镜的机会出演了一些银幕角色，包括 1959 年在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的《桃色血案》(*Anatomy of a Murder*)中扮演法官。

151. Cohn, 208.

152. James Reston, "Washington: Unintended Achievements of Senator McCarthy," (《华盛顿：参议员麦卡锡的意外成就》) *New York Times*, May 30, 1954, E6.

153. Army-McCarthy Hearings, part 3, p. 99, April 22, 1954.

154. Murrey Marder, "McCarthy and Aides Perverted Power to Force Promotion of David Schine, Stevens Testifies in Army Inquiry," (《史蒂文斯在军方调查中作证：麦卡锡和助手滥用权力要求大卫·席因升职》)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April 22, 1954, 1. 关于一份更小型的报纸，见 "Joe vs. Army: Stevens Charges McCarthy and Cohn Perverted Power in Pvt. Schine Case," (《乔与陆军的对决：史蒂文斯指控麦卡锡和科恩在二等兵席因案中滥用权力》) *Stanford Daily* (《斯坦福日报》), April 23, 1954, 1。

155. Army-McCarthy Hearings, part 9, p. 355, April 28, 1954. 视频片段也可参见 *Point of Order* DVD, 19:10–19:25。

156. 科恩后来承认，照片是他裁剪的。参见 Cook, 497。

157. Army-McCarthy Hearings, part 14, p. 543, April 30, 1954.

158. Army-McCarthy Hearings, part 13, p. 15, April 30, 1954. "小精灵"可能另有一种含义。大约从 1947 年到 1951 年，洛杉矶的威廉·惠特克公司生产并销售一种名为"小精灵"的小型定焦相机。它很小，可以像手表一样戴在手腕上。"小精灵"相机的零售价为 4.95 美元，可以拍摄 14 张照片。

见 “Thrifty Cut Rate Drug Store advertisement,”（《节俭减价药店广告》）*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6, 1950, 28，以及 “May Company advertisement,”（《五月公司广告》）*Los Angeles Times*, May 1, 1949, A2。

269 159. “Fairy,” *Green's Dictionary of Slang* (London: Chambers Harrap Publishers, 2010), ebook.

160. “Appendix: The Production Code,” (《附录： 生产守则》) in Thomas Doherty, *Hollywood's Censor: Joseph I. Breen and the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 (《好莱坞的审查员：约瑟夫·I. 布林与生产守则执行局》)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353. 虽然多赫蒂转引的《生产守则》是在1956年，但其他的引用指出，“仙子”一词从1930年起就被囊括在内了。

161. “Pixie,” *Green's Dictionary of Slang*.

162. Army-McCarthy Hearings, part 44, pp. 1664–1665, May 28, 1954.

163. *Point of Order*, DVD, 11:30–12:04.

164. Army-McCarthy Hearings, part 57, p. 2300, June 8, 1954.

165. Robert V. Bienvenu II (罗伯特·V. 比恩韦努二世), “The Development of Sadomasochism as a Cultural Styl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United States” (《施虐受虐作为一种文化风格在20世纪美国的发展》)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98).

166. 关于韦斯特的讨论发生在6月8日，就在韦尔奇发表著名“体面”言论的前一天，这为听证会最著名的时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历史学家一直认为，韦尔奇的爆发是由于麦卡锡违背了一项君子协定：如果韦尔奇同意不提供科恩在二战期间逃避兵役的证据，麦卡锡就不会提起韦尔奇的员工弗雷德·费舍尔曾作为一名法学生在一个共产党附属组织任职的事实。但是，韦尔奇6月8日威胁要给韦斯特打电话（从而让科恩难堪）可能导致麦卡锡在6月9日攻击费舍尔，麦卡锡认为韦尔奇违反了他们的协议。

167. Walter Winchell, “Tales of Two Cities,” (《双城记》)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May, 6, 1954, 59; Walter Winchell, “Man about Town,”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June 10, 1954, 47; Walter Winchell, “Manhattan after Midnight,” (《午夜后的曼哈顿》)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June 24, 1954, 47; "See It Through," (《看透》)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June 10, 1954, 14.

168. Von Hoffman, 206. 马德不是专栏作家，而是一名新闻记者。温切尔威胁记者的事实表明，科恩感觉对他和麦卡锡的负面报道无处不在。

169. Ellen Schrecker, *The Age of McCarthyism: 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 (《麦卡锡主义时代：文件组成的简史》) (Boston: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1994), 65. 安德里亚·弗里德曼认为，默罗的《现在请看》报道涵盖了一组可以被解读为将麦卡锡"同性恋化"的内容。她指出，报道中有一段 1951 年退休国会议员弗兰克·基夫在致敬麦卡锡的宴会上发表演讲的镜头，基夫在演讲中引用了珍妮·恩吉·希尔（Jennie Earngey Hill）一首晦涩的浪漫诗，以此来赞扬麦卡锡，并为他辩护，使他免受"我所听到过的最恶毒的诽谤"。《现在请看》节目认为，这首诗让麦卡锡感动得热泪盈眶，使他无法按计划发表演讲。然而，这种对诗歌、鲜花、爱的颂歌和哭泣的描写似乎使麦卡锡变得女性化，而不是使他显得像是同性恋，尽管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在那个时代注定会交织在一起。默罗似乎更专注于打破麦卡锡的硬汉形象，而不是暗示他对男性的性吸引力。参见 Friedman, "The Smearing of Joe McCarthy," 1115–1117。

170. Drew Pearson. "The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Schine Ducks Talk of Draft,"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May 1, 1954, 47; Drew Pearson. "McCarthy-Go-Round,"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March 19, 1954, 63. 270

171. Drew Pearson. "The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Schine 'Studied' via Secretary," *Washington Post*, May 4, 1954, 39.

172. Drew Pearson, "The Washington Merry-Go-Round: More on Cohn-Schine Jaunt," *Washington Post*, June 5, 1954, 13. 1969 年，皮尔森再次用暗语暗示麦卡锡 – 科恩 – 席因的关系即使不是完全的同性恋（homosexual），也属于酷儿（queer）。一位采访者问皮尔森："你认为［麦卡锡］与罗伊·科恩以及那个叫席因的家伙，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邪恶的吗？"皮尔森回答："是的，是很邪恶的关系。""可以说"背后的暗示在语境中是相当清楚

的。参见 Transcript, Drew Pearson Oral History Interview I, 4/10/69, by Joe B. Frantz, Internet Copy, Pearson Papers。

173. Charles, *Hoover's War on Gays*, 91.

174. "Francis Patton Twinem to Arthur Watkins," (《弗朗西斯·巴顿·特维内姆致亚瑟·沃特金斯》) October 7, 1954, folder 13, box 55, series VI—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75. "F. W. Brunner to Arthur Watkins," (《F. W. 布鲁纳致亚瑟·沃特金斯》) November 22, 1954, folder 11, box 74, series VI— Joseph McCarthy, Watkins Papers.

176. John Harris (约翰·哈里斯), "Alleged Letter from Hoover Stirs Wrangle at Hearing," (《据称来自胡佛的信件在听证会上引发争论》) *Boston Daily Globe*, May 5, 1954, 1.

177. Homer Bigart, "McCarthy on Stand, Admits 'Letter' Was Not from F.B.I. Head to Army, Calls It Summary of a Memorandum,"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May 6, 1954, 1.

178. Oshinsky, 432.

179. Ralph Flanders (拉尔夫·弗兰德斯), "Colossal Innocence in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参议院中的巨大冤案》) *Congressional Record*, June 1, 1954, 7390. 弗兰德斯提到"阿丹"是对他给麦卡锡的绰号"淘气阿丹"的致敬。

180. 语出维托·马坎托尼奥，引自 von Hoffman, 241。

181. Senate Resolution 301, 83rd Congress, December 2, 1954, SEN 83A-B4, 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Record Group 46, National Archives.

182. "我对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非常有耐心，尽管他在过去几周一直在进行谴责。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绅士。我想知道这是衰老还是恶意的结果。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告知他，而放任其继续暗示自己确实掌握某些信息。主席先生，我可以说，在参议院的这次发言中，他比我听说过的任何人都更能煽动种族和宗教偏见。这是极其恶劣的行为。这是不诚实的做法。他提到了犹太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问题。主席先生，

我可以说，在我们委员会的三位高层人物中，首席法律顾问、参谋长和我，一个恰好是犹太人，一个恰好是新教徒，一个恰好是天主教徒。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积极地信仰我们各自的宗教。这丝毫不影响曝光共产党人的工作。我认为一个参议员在参议院发言时，试图在揭露共产主义的努力中注入宗教和种族偏见，这是不正直的。” Army-McCarthy Hearings, part 47, p. 1827.

后记 271

1. Joseph McCarthy, “Statement on the Cohn Resignation,” (《关于科恩辞职的声明》) *New York Times*, July 21, 1954, 10. 对于科恩的辞职，麦卡锡和科恩本人都将公开信各自发给了乔治·索科尔斯基。两份带标记的草稿参见 box 37, folder 7 (Cohn), and box 83, folder 3 (McCarthy), Sokolsky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 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的任期结束后，美国犹太反共联盟被交由乔治·索科尔斯基领导。1972 年，索科尔斯基去世，这个濒临解散的组织被移交给了科恩。
3. Cook, 535.
4. Russell Porter (罗素·波特), “2,000 Honor Cohn at a Dinner Here,” (《2000 人在这场晚宴上向科恩致敬》) *New York Times*, July 29, 1954, 9.
5. Mary Hornaday (玛丽·霍纳迪), “Backers Fete Cohn; McCarthyism Cited,” (《支持者为科恩欢呼；引述麦卡锡主义》)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30, 1954, 10.
6. 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引自 Nelson W. Polsby(尼尔森·W. 波尔斯比), “Toward an Explanation of McCarthyism,” (《对麦卡锡主义的解释》) *Political Studies* 8, no. 3 (October 1960): 250–271。
7. “Editors Express Views on World, US Affairs,” (《编辑就世界和美国事务发表观点》) *Detroit Free Press*, May 31, 1955, G222, 3 of 3, folder “34. McCarthy,

Jos. (continued) General (folder 1 of 2)," Pearson Papers.

8. Oshinsky, 503.

9. "Sen. McCarthy Lauded at Rites," (《参议员麦卡锡在仪式上受到赞扬》)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Herald*, May 7, 1957, B2.

10. Tim Weiner (蒂姆·韦纳), *Enemies: A History of the FBI* (《敌人：联邦调查局的历史》)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191.

11. Anthony Summers, *Official and Confidential: The Secret Life of J. Edgar Hoover* (《官方和机密：J. 埃德加·胡佛的秘密生活》) (New York: Open Road Media, 2012).

12. Summers, *Official and Confidential*.

13. Athan G. Theoharis, *J. Edgar Hoover, Sex, and Crime: An Historical Antidote* (《J. 埃德加·胡佛、性与犯罪：一剂历史解药》) (Chicago: Ivan R. Dee, 1995), 39–43.

14. 语出罗伊·科恩的同事，引自 von Hoffman, 283。

15. Von Hoffman, 333–334.

16. Albin Krebs (阿尔宾·克雷布斯), "Roy Cohn, Aide to McCarthy and Fiery Lawyer, Dies at 59," (《麦卡锡的助手、火爆律师罗伊·科恩逝世，终年 59 岁》) *New York Times*, August 3, 1986, 1. 科恩在金钱方面可谓声名狼藉，他时常会向朋友借钱（而且基本不会归还）。20 世纪 50 年代末，他从叔叔和堂兄那里买下了莱昂内尔火车模型公司，但很快就因为经营失败，被迫辞去在董事会的职务。

17. 语出韦恩·巴雷特，引自 Michael Kruse（迈克尔·克鲁斯），"'He Brutalized for You': How Joseph McCarthy Henchman Roy Cohn Became Donald Trump's Mentor,"（《"他为你而残暴"：约瑟夫·麦卡锡的刽子手罗伊·科恩如何成为唐纳德·特朗普的导师》）*Politico Magazine*（《政治家杂志》）, April 8, 2016。

18. Michael Kruse, "'He Brutalized for You': How Joseph McCarthy Henchman Roy Cohn Became Donald Trump's Mentor," *Politico Magazine*, April 8, 2016.

19. Kruse, "'He Brutalized for You.'" 在《罗伊·科恩传》的结尾，西德尼·锡

安预见性地指出，如果科恩的同性恋取向被广泛报道或公开证实，特朗普早就把他抛弃了。Zion, 242. 272

20. Jeffrey Toobin, "The Dirty Trickster," *New Yorker*, June 2, 2008, https://www.newyorker .com/magazine/2008/06/02/the-dirty-trickster.

21. 贝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监视国家男性气质似乎终于走到了尽头。尽管他对击毙奥萨马·本·拉登一事摆出了强硬的姿态，还扩大了无人机在作战方面的应用，但事实证明，他比以往的总统都拥护"软实力"。奥巴马是第一位接受"女性主义者"标签的总统，而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人们一直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将会胜出，成为美国首位女性总统。然而，特朗普的当选证明，监视国家男性气质仍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22. Gregory Krieg (格雷戈里·克里格), "Donald Trump Defends Size of His Penis," (《唐纳德·特朗普为自己的阴茎尺寸辩护》) CNN.com, March 4, 2016, http://www.cnn.com/2016/03/03/politics/donald-trump-small-hands-marco-rubio/.

23. Glenn Kessler (格伦·凯斯勒),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More Than 10,000 False or Misleading Claims," (《特朗普总统发表了1万多条虚假或误导性言论》) *Washington Post*, April 29,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19/04/29/president-trump-has-made-more-than-false-or-misleading-claims/.

24. David Smith (大卫·史密斯), "Trump Shows Fake Hurricane Map in Apparent Bid to Validate In-correct Tweet," (《特朗普展示伪造的飓风路径图显然是为了验证错误的推文》) *Guardian*, September 4,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sep/04/trump-hurricane-dorian-alabama-sharpie-map.

25. 语出尼科尔·海默，引自 Jane Mayer（简·梅耶）, "The Making of the Fox News White House," （《福克斯新闻白宫的诞生》） *New Yorker*, March 4, 2019,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9/03/11/the-making-of-the-fox-news-white-house。

26. Callum Borchers (卡勒姆·博彻斯), "The Very Cozy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ald Trump and the National Enquirer," (《唐纳德·特朗普与〈国家询

问报〉之间的亲密关系》) *Washington Post*, March 28,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6/03/28/the-very-cozy-relationship-between-donald-trump-and-the-national-enquirer/.

27. Joe Palazzolo, Michael Rothfeld, and Lukas I. Alpert (乔·帕拉佐洛、迈克尔·罗斯费尔德、卢卡斯·I. 阿尔伯特), "National Enquirer Shielded Donald Trump from Playboy Model's Affair Allegation," (《〈国家询问报〉在〈花花公子〉模特的外遇指控中包庇唐纳德·特朗普》)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4, 20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national-enquirer-shielded-donald-trump-from-play boy-models-affair-allegation-1478309380.
28. John Connolly (约翰·康奈利),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Enquirer*," (《〈国家询问报〉秘史》) *DuJour*, http://dujour.com/news/national-enquirer-history-scandal/.

参考文献

Ackerman, Kenneth D. *Young J. Edgar: Hoover and the Red Scare, 1919–20*. Falls Church, VA: Viral History Press, 2011.

Adelman, Bob. *Tijuana Bibles: Art and Wit in America's Forbidden Funnies, 1930s–1950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Anderson, Jack. *Confessions of a Muckraker: The Inside Story of Life in Washington during the Truman, Eisenhower,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Anderson, Jack, with George Clifford. *The Anderson Papers: From the Files of America's Most Famous Investigative Repor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Anderson, Jack, and Daryl Gibson. *Peace, War, and Politics: An Eyewitness Account*. New York: Forge, 1999.

Anderson, Jack, and Ronald W. May. *McCarthy: The Man, the Senator, the "Ism."* New York: Beacon Press, 1952.

Aron, Cindy Sondik.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Civil Service: Middle-Class Workers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Axelrod, Alan. *Selling the Great War: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ropaganda*. New York: Macmillan, 2009.

Bai, Matt. *All the Truth Is Out: The Week Politics Went Tabloi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Baldwin, Davarian L. *Chicago's New Negroes: Modernity, the Great Migration, and Black Urban Lif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Barbas, Samantha. *Confidential Confidential: The Inside Story of Hollywood's Notorious Scandal Magazine*. Chicago: Chicago Review Press, 2018.

Barros, James. *Trygve Lie and the Cold War: The UN Secretary-General Pursues Peace, 1946–53*.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Basso, Matthew, Laura McCall, and Dee Garceau.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Cultures of Manhood in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Bates, Anna. *Weeder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 Anthony Comstock's Life and Career*.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

Baxandall, Roslyn, and Elizabeth Ewen. *Picture Windows: How the Suburbs Happene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Bayley, Edwin R. *Joe McCarthy and the Pres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1.

Beck, Frank Orman. *Marching Manward: A Study of the Boy*. New York: Eaton & Mains, 1913.

Bederman, Gail. *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Beisel, Nicola. *Imperiled Innocents: Anthony Comstock and Family Reproduction in Victoria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Bell, Daniel.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Politics–1955." In *The Radical Right*, edited by Daniel Bell, 47–74.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1963.

Benwell, Bethan. "Language and Masculinity." In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Gender, and Sexuality*. Edited by Susan Ehrlich, Miriam Meyerhoff, and Janet Holmes, 240–259.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4.

———. "Male Gossip and Language Play in the Letters Pages of Men's Lifestyle Magazines."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34, no. 4 (Spring 2001): 19–33.

Berinsky, Adam J., and Gabriel S. Lenz. "Red Scare?: Revisiting Joe McCarthy's Influence on 1950s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8, no. 2 (January 2014): 369–391.

Bernstein, Samuel. *Mr. Confidential: The Man, His Magazine & the Movieland Massacre That Changed Hollywood Forever*. West Hollywood, CA: Walford Press,

2006.

Bérubé, Alan. *Coming Out Under Fire: The History of Gay Men and Women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Besnier, Niko. *Gossip and the Everyday Production of Poli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Bessie, Simon Michael. *Jazz Journalism: The Story of the Tabloid Newspapers*. New York: E. P. Dutton, 1938.

Betrock, Alan. *The Personality Index: To Hollywood Scandal Magazines, 1952–1966*. Brooklyn: Shake Books, 1988.

———. *Pin-Up Mania: The Golden Age of Men's Magazines*. Brooklyn: Shake Books, 1993.

———. *Unseen America: The Greatest Cult Exploitation Magazines, 1950–1966*. Brooklyn: Shake Books, 1990.

Bienvenu, Robert V., II "The Development of Sadomasochism as a Cultural Styl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United Stat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98.

Bird, S. Elizabeth. *For Enquiring Minds: A Cultural Study of Supermarket Tabloids*.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2.

Blake, David Haven. *Liking Ike: Eisenhower, Advertising, and the Rise of Celebrity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Blumenthal, Ralph. *The Stork Club: America's Most Famous Nightspot and the Lost World of Café Society*. Boston: Little, Brown, 2000.

Boyer, Paul S. *By the Bomb's Early Light: 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at the Dawn of the Atomic Ag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 *Purity in Print: Book Censorship in American from the Gilded Age to the Computer Age*. 2nd e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2.

Brod, Harry.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The New Men's Studies*. Abingdon-on-Thames: Routledge, 1987.

Brower, Sue. "Inside Stories: Gossip and Television Audiences." I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Language, Performance, Technology, and Media," edited by Sari Thomas and William A. Evans. Special issue,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4 (1990): 225–235.

Burrough, Brian. *Public Enemie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Caldwell, Mark. *A Short History of Rudeness: Manners, Morals, and Misbehavior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Picador, 1999.

Canaday, Margot. *The Straight State: Sexu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Canwell, Bruce. "Craft and Tradecraft." In *Secret Agent X-9: The Complete 1930s Comic Strip*, 5–13. San Diego: IDW Publishing, 2015.

Carnes, Mark C., and Clyde Griffen. *Meanings for Manho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Charles, Douglas M. *The FBI's Obscene File: J. Edgar Hoover and the Bureau's Crusade against Smu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2.

276 ———. *Hoover's War on Gays: Exposing the FBI's "Sex Deviates Program."*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5.

Chauncey, George. *Gay New York: Gender, Urban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Childs, Marquis. *Witness to Power*. New York: McGraw-Hill, 1975.

Chudacoff, Howard P. *The Age of the Bachel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Claridge, Laura. *Emily Post: Daughter of the Gilded Age, Mistress of American Mann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Clark, Daniel A. *Creating the College Man: American Mass Magazines and Middle-Class Manhood, 1890–191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

Clark, Kate Upson. *Bringing Up Boys: A Study*. New York: Thomas H. Crowell, 1899.

Clatterbaugh, Kenneth C.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sculinity: Men, Women, and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Cobble, Dorothy Sue. *The Other Women's Movement: Workplace Justice and Social Rights in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Cohan, Steven. *Masked Men Masculinity and the Movies in the Fift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Cohen, Lizabeth. *A Consumer's 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Mass Consumption in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3.

Cohn, Roy M. *McCarth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

Collins, Gail. *Scorpion Tongues: Gossip, Celebrity, and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Morrow, 1998.

Conant, Robert Warren. *The Virility of Christ: A New View*. Chicago: the author, 1915.

Conboy, Martin. *Tabloid Britain: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through Langu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Connell, R. W. *Gender and Pow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onnell, R. W., and James W. Messerschmidt.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and Society* 19, no. 6 (December 2005): 829–859.

Cook, Blanche Wiesen. *Eleanor Roosevelt*. Vol. 2, *The Defining Years, 1933–1938*.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99.

Cook, Fred J. *The Nightmare Decade: The Life and Times of Senator Joe McCart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Cook, Susan L., and Karen Krupar, "Defi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Impacting the Twenty-First: Semantic Habits Created through Radio and Song: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 *Et Cetera* 67, no. 4 (October 2010): 412–434.

Cuordileone, K. A. *Manhood and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277 Dallek, Robert. *Flawed Giant: 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 1961–1973*.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Davies, Richard O. *Housing Reform during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66.

Dawson, Graham. *Soldier Heroes: British Adventure, Empire, and the Imagining of Masculinities*. London: Routledge, 1994.

Dean, Robert D. *Imperial Brotherhood: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1.

Demaris, Ovid. *The Director: An Oral Biography of J. Edgar Hoover*. New York: Harper's Magazine Press, 1975.

D'Emilio, John,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Demos, John. *Entertaining Satan: Witchcraft and the Culture of Early New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Desjardins, Mary. "Systemizing Scandal: *Confidential* Magazine, Stardom, and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In *Headline Hollywood: A Century of Film Scandal*, edited by Adrienne McClean and David A. Cook, 206–231.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Doherty, Thomas. *Cold War, Cool Medium: Television, McCarthy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Hollywood's Censor: Joseph I. Breen and the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Douglas, Paul H.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The Memoirs of Paul H. Dougla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Dubbert, Joe L.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in Trans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9.

Dunne, Matthew W. *A Cold War State of Mind: Brainwashing and Postwar American Societ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3.

Ehrenreich, Barbara. *The Hearts of Men: American Dreams and the Flight from Commit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983.

Ehrenstein, David. *Open Secret: Gay Hollywood, 1928–2000*. New York: Perennial, 2000.

English, Daylanne K. *Unnatural Selections: Eugenics in American Modernism and the Harlem Renaissa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Epstein, Joseph. *Gossip: An Untrivial Pursuit*. Boston: Houghton Miflin, 2011.

Erenberg, Lewis A. *Steppin' Out: New York Nightlif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Estes, Steve. *I Am a Man!: Race, Manhood,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5.

Evans, M. Stanton. *Blacklisted by History: The Untold Story of Senator Joe McCarthy and His Fight against America's Enemies*.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2009. 278

Ewald, William Bragg. *Who Killed Joe McCart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Ewen, Elizabeth. *Picture Windows: How the Suburbs Happene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Ewen, Stuart. *PR!: A Social History of Spi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Farr, Finis. *Fair Enough: The Life of Westbrook Pegler*. 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Publishers, 1975.

Feeley, Kathleen A. "Gossip as News: On Modern U.S. Celebrity Culture and Journalism." *History Compass* 10, no. 6 (2012): 467–482.

Feeley, Kathleen A., and Jennifer Frost, eds. *When Private Talk Goes Public: Gossip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Ferguson, Kathy E. "Discourses of Danger: Locating Emma Goldman," *Political Theory* 6, no. 5 (October 2008): 735–761.

Filene, Peter. *Him/Her/Self: Gender Identities in Modern America*. 3r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Foote, Stephanie. "Little Brothers of the Rich: Queer Families in the Gilded Age." *American Literature* 79, no. 4 (December 2007): 701–724.

Forbush, William Byron. *The Boy Problem in the Home*. Boston: Pilgrim Press, 1915.

Foster, Eric K. "Gossip." In *Encyclopedia of Human Relationships*. Edited by Harry T. Reis and Susan Sprecher, 768–770.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009.

Foster, Eugene C. *The Boy and the Church*. Philadelphia: Sunday School Times Company, 1909.

Fraser, John. *America and the Patterns of Chival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Fried, Albert. *McCarthyism: The Great American Red Sca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Fried, Richard M. *Nightmare in Red: The McCarthy Era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Friedberg, Aaron L. *In the Shadow of the Garrison State: America's Anti-statism and Its Cold War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Friedman, Andrea. *Citizenship in Cold War America: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Dissent*.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4.

———. "The Smearing of Joe McCarthy: The Lavender Scare,Gossip, and Cold War Politics." *American Quarterly* 57, no. 4 (December 1, 2005): 1105–1129.

Friend, Craig Thompson, ed. *Southern Masculinity: Perspectives on Manhood in the South since Reconstruction*.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Gabler, Neal.*Winchell: Gossip, Power and the Culture of Celebrity*. New York: Knopf, 1994.

279 Gentry, Curt. *J. Edgar Hoover: The Man and the Secret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Gertzman, Jay A. "John Saxton Sumner of the 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 A Chief Smut-Eradicator of the Interwar Period."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17, no. 2 (June 1994): 41–47.

Gilbert, James. *Men in the Middle: Searching for Masculinity in the 1950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Gilmore, David D. *Manhood in the Making: Cultural Concepts of Masculi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Grahn, Judy. *Another Mother Tongue: Gay Words, Gay World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Grant, Julia. "A 'Real Boy' and Not a Sissy: Gender, Childhood, and Masculinity, 1890–194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7, no. 4 (Summer 2004): 829–851.

Greene, Theodore P. *America's Heroes: The Changing Models of Success in American Magazin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Greenstein, Fred I. *The Hidden-Hand Presidency: Eisenhower as Lead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Grifith, Robert. *The Politics of Fear: Joseph McCarthy and the Senate*.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0.

Griswold, Robert L. *Fatherhood in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Halberstam, David.*The Powers That B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Hallas, James H. *Doughboy War: The 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 in World War I*.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Hantover, Jeffrey P. "The Boy Scouts and the Validation of Masculinity." In *The American Man*, edited by Elizabeth Hafkin Pleck and Joseph H. Pleck, 285–301.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0.

Heale, M. J. *McCarthy's Americans: Red Scare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 1935–1965*.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8.

Heap, Chad. *Slumming: Sexual and Racial Encounters in American Nightlife, 1885– 194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Hegarty, Marilyn E. *Victory Girls, Khaki Wackies, and Patriotutes: The Regulation of Female Sexuality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NYU Press, 2007.

Herman, Arthur. *Joseph McCarthy: Re-examining the Senator's Life and Legacy*. New York: Free Press, 2000.

Hermes, Joke. *Reading Women's Magazines: An Analysis of Everyday Media Us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5.

Hoben, Allan. *The Minister and the Boy: A Handbook for Churchmen Engaged in Boy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2.

280 Hogan, Michael J. *A Cross of Ir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5–195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Hoganson, Kristin L. *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 How Gender Politics Provoked the Spanish-American and Philippine-American W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Hoover, John Edgar. *The Story of the FBI: The Oficial Picture History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New York: E. P. Dutton, 1947.

Horowitz, Daniel. *The Morality of Spend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in America, 1875–1940*. New York: Ivan R. Dee, 1992.

Horrocks, Roger. *Masculinity in Cri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Hughes, Geoffrey. *Swearing: A Social History of Foul Language, Oaths and Profanity in English*. Oxford, UK: Blackwell, 1991.

Hulbert, Ann. *Raising America: Experts, Parents, and a Century of Advice about Children*. New York: Vintage, 2004.

Hunt, William R. *Body Love: The Amazing Career of Bernarr Macfadden*. Bowling Green, OH: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89.

Izenberg, Gerald N. *Modernism and Masculinity: Mann, Wedekind, Kandinsky through World War 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Jarvis, Christina S. *The Male Body at War: American Masculinity during*

World War II.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4.

Jeffreys-Jones, Rhodri.*The FBI: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Jenkins, Philip. *Moral Panic: Changing Concepts of the Child Molester in Moder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Johnson, David K. *The Lavender Scare: The Cold War Persecution of Gays and Lesbian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Jonathan, Norton Hughes. *Gentlemen Aren't Sissies*. Chicago: John C. Winston Company, 1938.

Kantrowitz, Stephen. *Ben Tillma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hite Suprema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Karpis, Alvin, and Bill Treat. *The Alvin Karpis Story*. New York: Ishi Press, 2011.

Kim,Townsend. *Manhood at Harvard: William James and Others*. New York: W.W. Norton, 1996.

Kimmel, Michael S. *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Kinsler, Jeffrey S. "Joseph McCarthy, The Law Student." *Marquette Law Review* 85, no. 2 (Winter 2001): 466–477.

Klay, Phil. *Redeployment*. New York: Penguin, 2014.

Klurfeld, Herman. *Winchell: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6.

Kushner, Tony. "G. David Schine in Hell." In *Death & Taxes: Hydrioptaphia & Other Plays*, 227–240.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2000.

Kwolek-Folland, Angel. *Engendering Business: Men and Women in the Corporate Ofice, 1870–193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Lait, Jack. *U.S.A. Confidential*.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52.

Lait, Jack, and Lee Mortimer. *Chicago Confidential*.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50.

———. *New York Confidential*.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48.

———.*Washington Confidential*.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51.

Landis, Mark. *Joseph McCarthy: The Politics of Chaos*. Cranbury, NJ: 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Langum, David J. *Crossing over the Line: Legislating Morality and the Mann A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Laurie, Piper. *Learning to Live Out Loud: A Memoir*. New York: Crown Archetype, 2011.

Lears, Jackson. *Fables of Abun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dvertising in America*. Boston: Basic Books, 1995.

———. *Rebirth of a Nation: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1877–1920*. New York: Harper, 2009.

Legman, Gershon. "The Language of Homosexuality." In *The Gay/Lesbian Almanac: A New Documentary*. Edited by Johnathan Ned Katz, 571–584.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Lewis, Carolyn Herbst. *Prescription for Heterosexuality Sexual Citizenship in the Cold War Er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Lindsey, Rachel McBride. "'The Mirror of All Perfection': Jesus and the Strongman in America, 1893–1920." *American Quarterly* 68, no. 1 (March 2016): 23–47.

Lipsitz, George. *Rainbow at Midnight: Labor and Culture in the 1940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Logan, Andy. *The Man Who Robbed the Robber Barons*. New York: W. W. Norton, 1965.

Lui, Mary TingYi. *The Chinatown Trunk Mystery: Murder, Miscegenation, and Other Dangerous Encounters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Lynd, Robert S., and Helen Merrell Lynd. *Middletown: A Study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9.

Macleod, David. "Act Your Age: Boyhood, Adolescence, and the Rise of the Boy Scouts of America."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6, no. 2 (Winter 1982): 3–20.

———. *Building Character in the American Boy: The Boy Scouts, YMCA, and Their Forerunners, 1870–192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4.

Mallen, Frank. *Sauce for the Gander*. White Plains, NY: Baldwin Books, 1954.

Maney, Patrick J. *"Young Bob" La Follette: A Biography of Robert M. La Follette, Jr., 1895–1953*.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8.

Mangan, James A., and James Walvin. *Manliness and Morality: Middle Class Masculin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00–1940*.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Matusow, Harvey. *False Witness*. New York: Cameron & Kahn, 1955.

May, Gary. *Un-American Activities: The Trials of William Remingt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McAuliffe, Mary S. "Liberals and the Communist Control Act of 1954."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3, no. 2 (September 1, 1976): 351–367.

McCarthy, Joseph. *McCarthyism: The Fight for America*. New York: Devin-Adair, 1952.

McCoy, Alfred W. *Policing America's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Rise of the Surveillance Stat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

———. "Surveillance Blowback: The Making of the U.S. Surveillance State, 1898– 2020." *TomDispatch.com*. Last modified July 14, 2013. http://www.tomdispatch .com/blog/175724/alfred_mccoy_surveillance_blowback.

McCullough, David. *Tru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McHugh, Maureen C., and Jennifer Hambaugh. "She Said, He Said: Gender, Language, and Power." In *Handbook of Gender Research in Psychology*.Vol. 1, *Gender Research in General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ited by Joan C. Chrisler and Donald R. McCreary, 379–410.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2009.

McLean, Adrienne, and David A. Cook. *Headline Hollywood: A Century of Film Scandal*.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McDaniel, Rodger E. *Dying for Joe McCarthy's Sins: The Suicide of Wyoming Senator Lester Hunt*. Cheyenne, WY: WordsWorth, 2013.

McLaren, Angus. *Sexual Blackmail: A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The Trials of Masculinity: Policing Sexual Boundaries, 1870–193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Medsger, Betty. *The Burglary: The Discovery of J. Edgar Hoover's Secret FBI*. New York: Vintage, 2014.

Merry, Robert W. *Taking on the World: Joseph and Stewart Alsop—Guardian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York: Viking, 2012.

Meyerowitz, Joanne J. *Not June Cleaver: Women and Gender in Postwar America, 1945–196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83 Micale, Mark S. *Hysterical M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Male Nervous Ill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iller, Neil. *Banned in Boston: The Watch and Ward Society's Crusade against Books, Burlesque, and the Social Evil*. Boston: Beacon Press, 2010.

Mills, C. Wright.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Mitchell, Michelle. "A 'Corrupting Influence': Idleness and Sexualit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Interconnections: Gender and Race in American History*, edited by Carol Faulkner and Alison M. Parker, 187–228.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2.

Morton, Paula E. *Tabloid Valley: Supermarket News and American Culture*.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9.

Mosse, George L. *The Image of Ma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Mulloy, D. J. *The World of the John Birch Society: Conspiracy, Conservatism, and the Cold War*. Nashville, TN: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14.

Nadel, Alan. *Containment Culture: American Narratives, Postmodernism, and the Atomic Ag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Nadler, Joel T., and Tiffany Edwards. "The 'Big Lie' Technique." In *The Encyclopedia of Deception*, edited by Timothy R. Levine, 77–79.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2014.

Navasky, Victor S. *Naming Name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0.

Nichols, David A. *Ike and McCarthy: Dwight Eisenhower's Secret Campaign against Joseph McCart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7.

Nixon, Sean. *Hard Looks: Masculinities, Spectatorship and Contemporary Consump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Norton, Mary Beth. *In the Devil's Snare: The Salem Witchcraft Crisis of 1692*. New York: Vintage, 2003.

Nye, Robert A. "Western Masculinities in War and Pea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2, no. 2 (April 2007): 417–438.

O'Brien, Michael. *McCarthy and McCarthyism in Wisconsi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1.

O'Neill, William L. *A Better World: The Great Schism: Stalinism and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Osgerby, Bill. *Playboys in Paradise: Masculinity, Youth and Leisure-Style in Modern America*. Oxford: Berg, 2001.

Oshinsky, David M. *A Conspiracy So Immense: 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earson, Drew, and Abell, Tyler. *Drew Pearson Diaries 1949–195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4.

Peiss, Kathy. *Zoot Suit: The Enigmatic Career of an Extreme Styl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Pendergast, Tom. *Creating the Modern Man: American Magazines and Consumer Culture, 1900–1950*.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Peterson, Theodore. *Magazin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6.

Pettegrew, John. *Brutes in Suits: Male Sensibility in America, 1890–192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ierce, Jason Noble. *The Masculine Power of Christ: Or, Christ Measured as a Man*. Boston: Pilgrim Press, 1912.

Pleck, Elizabeth Hafkin, and Joseph H. Pleck, eds. *The American Man*.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80.

Pliley, Jessica R. *Policing Sexuality: The Mann Act and the Making of the FB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olsby, Nelson W. "Toward an Explanation of McCarthyism." *Political Studies* 8, no. 3 (October 1960): 250–271.

Ponce de Leon, Charles L. *Self-Exposure: Human-Interest Journ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Celebrity in America, 1890–194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Post, Edwin. *Truly Emily Post*.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Company, 1961.

Potter, Claire Bond. *War on Crime: Bandits, G-Men, and the Politics of Mass Cultur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8.

———. "Queer Hoover: Sex, Lies, and Politic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5, no. 3 (September 2006): 355–381.

Poveda, Tony, Richard G. Powers, Susan Rosenfeld, and Athan G. Theoharis. *The FBI: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Guide*. Phoenix, AZ: Greenwood, 1998.

Powers, Richard Gid. *G-Men: Hoover's FBI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ecrecy and Power: The Life of J. Edgar Hoov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Quartermain, Peter. *Disjunctive Poetics: From Gertrude Stein and Louis Zukofsky to Susan How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Radosh, Ronald, and Joyce Milton. *The Rosenberg File*. 2n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Rainey, Buck. *Serials and Series: A World Filmography, 1912–1956*. Jefferson, NC: McFarland Books, 2010.

Reeves, Thomas C.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e McCarthy*.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82.

Remy, Steven P. *The Malmedy Massacre: The War Crimes Trial Controvers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Richter, Irving. *Labor's Struggles, 1945–1950: A Participant's View*.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berts, Sam. *The Brother: The Untold Story of Atomic Spy David Greenglass and How He Sent His Sister, Ethel Rosenberg, to the Electric Chai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285

Robinson, Sally. *Marked Men: White Masculinity in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Rotundo, E. Anthony. *American Manhood: Transformations in Masculinit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Rovere, Richard H. *Senator Joe McCarth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9.

Ryan, Erica J. *Red War on the Family: Sex, Gender, and Americanism in the First Red Sca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Salvatore, Nick. *Eugene V. Debs: Citizen and Socialis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Savran, David. *Taking It Like a Man: White Masculinity, Masochism,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The Letters of Arthur Schlesinger, Jr*. Edited by Andrew Schlesinger and Stephen C. Schlesing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Boston: Mariner Books, 2002.

———. *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49.

Schneir, Walter. *Final Verdict: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the Rosenberg Case*. Brooklyn: Melville House, 2010.

Schrecker, Ellen. *The Age of McCarthyism: 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 Boston: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1994.

———. *Many Are the Crimes: McCarthyism in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8.

Schultz, Brad. *Sports Media: Planning, Production, and Reporting*. Vol. 1.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05.

Scott, Henry E. *Shocking True Story: The Rise and Fall of Confidential, "America's Most Scandalous Scandal Magazin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10.

Scott, Joan W.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no. 5 (December 1986): 1053–1075.

Sears, Clare. *Arresting Dress: Cross-dressing, Law, and Fasc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14.

Serlin, David. *Replaceable You: Engineering the Body in Postwar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Shaw, Tony, and Denise J. Youngblood. *Cinematic Cold War: The American and Soviet Strugg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Shibusawa, Naoko. "The Lavender Scare and Empire: Rethinking Cold War Anti-gay Politics." *Diplomatic History* 36, no. 4 (September 2012): 723–752.

Shogan, Robert. *No Sense of Decency: The Army-McCarthy Hearings: A Demagogue Falls and Television Takes Charge of American Politics*. Chicago: Ivan R. Dee, 2009.

286 Smith-Pryor, Elizabeth M. *Property Rites: The Rhinelander Trial, Passing, and the Protection of Whitenes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Snyder, Terri L. *Brabbling Women: Disorderly Speech and the Law in Early Virgin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Spacks, Patricia Ann Meyer. *Gossip*. New York: Knopf, 1985.

Steakley, James D. "Iconographyofa Scandal: Political Cartoons and the

Eulenburg Affair." In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 in Europe & America*, edited by Wayne R. Dynes and Stephen Donaldson, 323–386. New York: Garland, 1992.

Stearns, Peter N. *Be a Man!: Males in Modern Society*. Teaneck, NJ: Holmes & Meier, 1990.

Stockley, Julian L. "'Red Purge': The 1946–47 Strike at Allis-Chalmers," *Wisconsin Academy of Sciences, Arts, and Letters* 76 (1988): 17–31.

Stone, I. F. *The Haunted Fifties*. New York: Vintage, 1969.

Storrs, Landon R. Y. *The Second Red Scare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New Deal Lef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Straight, Michael. *Trial by Television and Other Encounters.* New York: Devon Press, 1979.

Strasser, Susan.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Mass Marke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Straw, William. *Cyanide and Sin: Visualizing Crime in 50s America*. New York: Andrew Roth, 2006.

———. "Trafic in Scandal: The Story of *Broadway Brevit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73, no. 4 (Fall 2004): 947–971.

Strunk, Mary Elizabeth. *Wanted Women: An American Obsession in the Reign of J. Edgar Hoover*.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Stuart, Douglas. *Crea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History of the Law That Transformed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ummers, Anthony. *Oficial and Confidential: The Secret Life of J. Edgar Hoover*. New York: Putnam, 1993.

Summers, Martin Anthony. *Manliness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Black Middle Cla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sculinity, 1900–193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Susman, Warren. *Culture as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Pantheon, 1984.

Tebbutt, Melanie. *Women's Talk: A Social History of "Gossip" in Working-*

Class Neighbourhoods, 1880–1960. Aldershot, England: Scolar Press, 1995.

Theoharis, Athan G. *The FBI: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Guide*. Phoenix, AZ: Oryx Press, 1999.

———. *From the Secret Files of J. Edgar Hoover*. Chicago: Ivan R. Dee, 1993.

———. *J. Edgar Hoover, Sex, and Crime: An Historical Antidote*. Chicago: Ivan R. Dee, 1995.

Theoharis, Athan G., and John Stuart Cox. *The Boss: J. Edgar Hoover and the Great American Inquisi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eweleit, Klaus, and Anson Rabinbach. *Male Fantasies*. Vol. 2. *Male Bodies: Psycho-analyzing the White Terror*. Translated by Erica Carter and Chris Turn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Thomas, Calvin. *Male Matters: Masculinity, Anxiety, and the Male Body on the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6.

Thomas, Evan. *Robert Kennedy: His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Thomas, Lately. *When Even Angels Wept: The Senator Joseph McCarthy Affair—a Story without a Hero*. New York: Morrow, 1973.

Trachtenberg, Alan. *The Incorporation of Americ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Gilded Ag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Traister, Bryce. "Academic Viagra: The Rise of American Masculinity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 52, no. 2 (June 2000): 274–304.

Turner, Graeme. *Understanding Celebrity*, 2n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4.

Tye, Larry. *Demagogue: The Life and Long Shadow of Senator Joe McCarthy*. Boston: Houghton Miflin Harcourt, 2020.

Von Hoffman, Nicholas. *Citizen Cohn*. New York: Doubleday, 1988.

Walls, Jeannette. *Dish: How Gossip Became the News and the News Became Just Another Show*. New York: Spike, 2001.

Walters, Barbara. *Audition: A Memoir*. New York: Knopf, 2008.

Wannall, Ray. *The Real J. Edgar Hoover: For the Record*. Paducah, KY: Turner, 2000.

Warshow, Robert, Stanley Cavell, and Lionel Trilling. *The Immediate Experience: Movies, Comics, Theatre, and Other Aspects of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Weiner, Tim. *Enemies: A History of the FBI*.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Weingartner, James. *A Peculiar Crusade: Willis M. Everett & The Malmedy Massacre Trial*. New York: NYU Press, 2000.

Weinstein, Allen. *Perjury: The Hiss-Chambers Cas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Wernick, Robert, and Arnold Roth. "When It Comes to Gossip, We're All-Ears Listeners." *Smithsonian* 23, no. 11 (February 1993): 76–83.

Wexley, John. *The Judgment of 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 Revd. and updated e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7.

Whitehead, Don. *The FBI Story: A Report to the Peop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Whitfield, Stephen J. *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288

Wickberg, Daniel. "Heterosexual White Male: Some Recent Interven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2, no. 1 (June 2005): 136–157.

Wicker, Tom. *Shooting Star: The Brief Arc of Joe McCarthy*. Orlando: Harcourt, 2006.

Wiebe, Robert.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Wilkes, Roger. *Scandal!: A Scurrilous History of Gossip, 1700–2000*.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2.

Williams, Timothy J. *Intellectual Manhood: Univers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Wood, Molly M. "Diplomacy and Gossip: Information Gathering in the US Foreign Service, 1900–1940." In *When Private Talk Goes Public: Gossip in American History*, edited by Kathleen A. Feeley and Jennifer Frost, 139–16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Wylie, Philip. *Generation of Vipers*. With new annotations by author. New York: Reinhart, 1955 [1942].

Zegart, Amy. *Flawed by Design: The Evolution of the CIA, JCS, and NS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Zimmer, Kenyon. *Immigrants against the State: Yiddish and Italian Anarchism 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

Zion, Sidney. *The Autobiography of Roy Cohn.* Secaucus, NJ: Lyle Stuart, 1988.

报纸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Bakersfield Californian

Baltimore Sun

Boston American

Boston Daily Globe

Boston Post

Bronx Home News

Chicago Defender

Chicago Sun

Chicago Daily Tribun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Cincinnati Enquirer

Door County Advocate

Los Angeles Times

Las Vegas Sun

London Evening News

Madera Tribune

Madison Capitol Times

Manchester Guardian

Milwaukee Journal

Milwaukee Sentinel

Mobile Register

St. Petersburg Times

Stanford Daily

New York Daily Mirror

New York Daily News

New York Evening Graphic

New York Herald-Tribune

New York Post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World-Telegram
USA Today
Washington Herald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Star
Washington Times-Herald
Zanesville Signal

其他期刊 289

American Mercury
Broadway Brevities and Society Gossip
Celebrity
Collier's
Confidential
Liberty
Maclean's
Newsweek
The New Yorker
The Progressive
Rave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Spy
Time
Town Topics
Woman's Day

索引

所有数字为本书边码，斜体数字对应该页插图。

Abel，Hazel Hampel，黑兹尔·汉佩尔·阿贝尔，245注119

Acheson，Dean，迪安·艾奇逊，132，145，259注7

Adam Hat Company，亚当·哈特公司，177

Adams，John G.，约翰·G.亚当斯，171–72，189，196

Addams，Jane，简·亚当斯，29

Adler，Felix，菲利克斯·阿德勒，113

adolescence，青春期，28

advertising，广告，26

African Americans，非裔美国人，26；internal migration of，~的国内迁移，42

Ahle，Charles，查尔斯·阿勒，41

Alabama，阿拉巴马州，38，211

alarmism，危言耸听，134

Alexander，Holmes，霍尔姆斯·亚历山大，145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31

Alger，Horatio，霍瑞修·阿尔杰，96，98–99

Allen，George E.，乔治·E.艾伦，22

Allis-Chalmers Manufacturing Company，阿利斯－查默斯汽车制造公司，96

Alsop，Joseph，约瑟夫·艾尔索普，145，148–50，180，192–93

Alsop，Stewart，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45，148–50，180

Amerasia (magazine)，《美亚》（杂志），154–55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BA)，美国律师协会，125

American Indians，美国印第安人，26

Americanism，美国精神，72；and masculinity，~和男性气质，58–59

American Jewish League Against Communism，美国犹太人反共联盟，203–4，271注2

American Law Students' Association，美国法学院学生协会，158–59
American Legion，美国退伍军人协会，58，76–77，147，203
American Magazine (magazine)，《美国杂志》（杂志），224 注 1
American Media，美国媒体，212
American-Russian Institute，美俄研究所，158–59
American Social Hygiene Association，美国社会卫生协会，29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美国报纸主编协会，147
AMVETS，美国退伍军人协会，203
Anatomy of a Murder (film)，《桃色血案》（电影），268 注 150
Anderson，Jack，杰克·安德森，175–76，178
Anderson，Sherwood，舍伍德·安德森，9
Ansberry，Louise，路易丝·安斯贝里，146
anticommunism，反共主义，4，97，124，126，151，153，163–65，168，178，193，199–203，252 注 5，259–60 注 9；embrace of，推崇 ~，108，117–18，122–23，125，128，133–34，138–39，145，150，159–60，183–84，204–5
Anti-Defamation League，反诽谤联盟，164，179
Anti-Saloon League，反酒吧联盟，35
anti-Semitism，反犹主义，104，112，163–64，204，250 注 82，259 注 9
anxiety，焦虑，7，141；era of，~的时代，163；gender identity，性别认同，9；and modernization，~和现代化，20；social shifts，社会变迁，28，41
Arkansas，阿肯色州，189
Army-McCarthy hearings，陆军－麦卡锡听证会，1–2，*2*，*4*，136，*140*，170，173–74，179，182–83，190–93，*194*，196–98，200，202，204，260 注 14，270 注 182；as elaborate performance，~作为精心制作的表演，184；gay-baiting，同性恋问题，188–89；masculine jousting，as pervasive，无处不在的阳刚之气的较量，187–88；masculinity，importance of in，~中男性气质的重要性，189；media attention，

as nonstop，媒体不间断的关注，187；as media milestone，~作为媒体的里程碑，184–85；pixie-fairy exchange，“精灵—仙子”对 话，3，194–95；surveillance state masculinity，监视国家男性气质，220 注 9
Army Signal Corps，美国陆军信号部队，162
Asia，亚洲，26
atom bomb，原子弹，155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EC)，原子能委员会，125
Austria，澳大利亚，168

Babcock，Ed，埃德·巴布科克，178
Baer，Max，马克斯·贝尔，67
Bagby，Philip H.，菲利普·H. 巴格比，180
Bank of United States scandal，美国银行丑闻，111–12
Barker，Fred，弗雷德·巴克，46
Barker，“Ma”，巴克“老妈”，46
Barrett，Wayne，韦恩·巴雷特，210
Barrow，Clyde，克莱德·巴罗，46
baseball，棒球，32–33；and gambling，~和赌博，27
Battle of the Bulge，阿登战役，103
Baughman，Frank，弗兰克·鲍曼，225 注 15
Baxandall，Roslyn，罗斯琳·巴克森德尔，103
Beck，Frank Orman，弗兰克·奥尔曼·贝克，27–28
Belgrade (Serbia)，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169
Bell，Daniel，丹尼尔·贝尔，117
Bennett，Constance，康斯坦斯·贝内特，161
Bentley，Elizabeth，伊丽莎白·本特利，123
Benton，William，威廉·本顿，176
Berinsky，Adam，亚当·贝林斯基，258 注 107
Berkman，Alexander，亚历山大·贝克曼，74
Berlin，Richard E.，理查德·E. 柏林，164
Bernstein，Samuel，塞缪尔·伯恩斯坦，253 注 25
Berry，W. O.，W. O. 贝瑞，175
Bielaski，Frank Brooks，弗兰克·布鲁克斯·比拉斯基，155
Billingsley，Sherman，谢尔曼·比林斯利，67，127

bin Laden, Osama, 奥萨马·本·拉登, 272 注 21
Black Panthers, 黑豹党, 205
Blumenthal, Fred, 弗雷德·布卢门撒尔, 175, 177
Bogart, Humphrey, 亨弗莱·鲍嘉, 182–83
Bohlen, Charles "Chip", 查尔斯·"奇普"·博伦, 167, 261 注 36
Bonan, Peter, 彼得·博南, 114
Bonn (Germany), 波恩（德国）, 168
Bowditch, Nathaniel, 纳撒尼尔·鲍迪奇, 27
Bowring, Eva Kelly, 艾娃·凯利·鲍林, 245 注 119
Boyer, Paul S., 保罗·S. 博耶, 231 注 20
Boys Clubs of America, 美国男孩俱乐部, 69
Boy Scouts Day, 童子军日, 59
Boy Scouts of America, 美国童子军, 28, 69
Bradley, Kenneth, 肯尼斯·布拉德利, 194
branding, 品牌, 8
Brando, Marlon, 马龙·白兰度, 236 注 100
Breitbart.com, 布莱巴特新闻网, 211
Brieux, Eugène, 尤金·白里欧, 34
Broadway Brevities and Society Gossip (magazine), 《百老汇简讯与社会八卦》（杂志）, 41, 43, 120, 134, 144, 195, 229 注 97; homophobic sensationalism of, ~的同性恋炒作, 42; "Nights in Fairyland" feature, "仙境之夜", 42
Bronx Home News (newspaper), 《布朗克斯本地新闻》（报纸）, 119
Browder, Earl, 厄尔·白劳德, 157, *157*, 158
Brower, Sue, 苏·布劳尔, 224 注 47
Brunauer, Esther, 艾斯特·布鲁诺尔, 152
Buckley, William F., 威廉·法兰克·巴克利, 133, 203–4
Budenz, Louis, 路易斯·布登兹, 151, 154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BOI), 调查局（BOI）, 46–47; Gener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情报总局, 48; sexual morality, conservative code of, 维护传统的性道德准则, 48–49。也

见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Burroughs，Edgar Rice，埃德加·赖斯·巴勒斯，134–35
Bush，George W.，乔治·W. 布什，90
Bushfield，Vera C.，薇拉·C. 布什菲尔德，245 注 119
Butler，John Marshall，约翰·马歇尔·巴特勒，156，158，258 注 107
Butler，Judith，gender performativity，朱迪斯·巴特勒，性别表现性，222 注 27

Caesar，Julius，尤利乌斯·恺撒，31
Cagney，James，詹姆斯·卡格尼，60
Cain，James M.，詹姆斯·M. 凯恩，195
Calhoun，Rory，罗里·卡尔霍恩，139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州，149
Callender，James T.，詹姆斯·T. 科连德，14
capitalism，资本主义，2；and communism，contest between，~和共产主义的竞争，244 注 105；consumer，消费者，41；managerial，管理，53
Carr，Frank，弗兰克·卡尔，199
Carson，Ben，本·卡森，211
Carter，Peter，彼得·卡特，63–64
Catholic Church，天主教会，28
Catholic War Veterans，天主教战争退伍军人组织，203
Catlin，Mark，Jr.，小马克·卡特林，87
celebrity，名流，47，68，135，143，161，245 注 1；birth of，~的诞生，6；celebrity boudoir，名人闺房，120–21；celebrity gossip，名人八卦，136–37，181；and modernity，~和现代性，14；and politics，~和政治，209
Celebrity (magazine)，《名流》（杂志），*16*，141，182，266 注 109
celebrity culture，名人文化，14
Centenary Cadets，百年庆典，32
Central High School，中区中学，22–23，52；Brigade of Cadets，~学员旅，24；Debate Society，~辩论协会，24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CIA），7，137，168–69，171

Chambers，Whitaker，惠特克·钱伯斯，122–23，154，240 注 54，242 注 71，249 注 61
Charles，Douglas，道格拉斯·查尔斯，224–25 注 8
Chauncey，George，乔治·昌西，29
Chicago (Illinois)，芝加哥（伊利诺伊州），121
Childs，Marquis，马奎斯·蔡尔兹，141
Christianity，基督教：and athletics，~和体育运动，32；Christ，as ideal human male，基督作为理想的男性形象，31；feminization of，~的女性化，31；leadership，association with，~与领导力相关，30；male physicality，男性体态，33
Christian manhood，基督徒的男子气概，29–30，32–33，35
Churchill，Winston，温斯顿·丘吉尔，97
Civil Rights Movement，民权运动，206
Civil War，南北战争，8
Clark，Kate Upson，凯特·厄普森·克拉克，27
Clay，Henry，亨利·克莱，27
Clean Books Crusade，净化图书运动，50
Clinton，Hillary，希拉里·克林顿，272 注 21
Clow，Stephen G.，斯蒂芬·G. 克洛，41，229 注 97
Coggins，Jesse，杰西·科金斯，228 注 71
Cohn，Albert，阿尔伯特·科恩，107–10，112–14，116，260 注 12
Cohn，Dora Marcus，多拉·马库斯·科恩，107–10，113–14，116，260 注 12；bank scandal，银行丑闻，111–12
Cohn，Roy M.，罗伊·M. 科恩，2–4，5–7，11–12，64，72，77，109，138，147，150–51，160–61，164–67，172–73，186，189，*194*，201，205，207，224–25 注 8，246 注 10，246 注 27，247–48 注 39，248 注 46，250 注 82，250 注 84，259 注 6，260 注 1，261 注 36，269 注 168，271 注 2；accent of，~的口音，192；aggressive masculinity，侵略性的男性气质，171；as “American Dreyfus”，~作为“美国的德雷福斯”，204；anticommunism，embrace

of，推崇反共主义，108，117–18，122–25，128，183–84；appearance，obsession with，痴迷于外表，245注1，247注31，251注93；Army-McCarthy hearings，陆军－麦卡锡听证会，187–88，191–92，194–98，200；arrogance，displays of，展现傲慢，127–28，191，198；counterfeiting case，造假案，118–19；death of，～的死亡，209；distilled malice，target of，恶意中伤的目标，17；downfall of，～的倒台，162–63；as draft dodger，～作为逃兵，248注41，269注166；as easily fooled，被轻易愚弄，169；effeminate behavior，and military training，娘娘腔行为，以及军事训练，247注32；as entitled，～拥有特权，191；Europe，trip to，欧洲之旅，168–70，174，179，198–99；as feared，被畏惧，168–69；female prostitutes，experiences with，～与妓女的性经历，251注95；formal education of，～接受的正规教育，112–13；gender identity，性别认同，112–13，116；and gossip，～和八卦，15–16，108，202；gossip column，writing of，撰写八卦专栏，119；in gossip columns，～在八卦专栏中，127；Hiss case，希斯案，122–23；HIV/AIDS，contracting of，感染艾滋病，209–10；and homosexuality，～和同性恋，113；homosexuality，rumors of，同性恋谣言，162，170，174，179–81，184，193，195–202，261注25，270注172；and Robert Kennedy，hatred between，～与罗伯特·肯尼迪之间的仇恨，260注14；machismo of，～的大男子主义，108；manhood，and power，男子气概和权力，117–18；masculine identity，constructing of，男性身份的建构，118；and masculinity，～和男性气质，108，113–14，116–17，119，127–29，189，191，193，206；media profile，obsession with，执着于媒体形象，119–20；momism，妈咪主义，114–15；money，as terrible with，～在金钱方面声名狼藉，271注16；mother，relationship with，～与母亲的关系，111–12，

115，128；National Enquirer，connection to，~与《国家询问报》的关系，212；nose job，鼻子整形手术，107；pixie-fairy exchange，“精灵—仙子”对话，194–95；political identity of，~的政治身份，108；and power，~和权力，119，128；power elite，权力精英，107–8，127；presentation，importance of，演示的重要性，211；public perception of，~的公众观感，120；public persona of，~的公众形象，108，122，127，170，192，198；queering of，~的酷儿行为，195，200；Remington trial，雷明顿审判，123–25；resignation of，~辞任，202–3，271注1；Rosenberg trial，罗森博格审判，124–26；ruthlessness of，~的残酷，128；second act of，~重操旧业，209；sense of entitlement，特权感，110–12；as social outsider，~作为社会局外人，10；surveillance state masculinity，监视国家男性气质，187；as Trump's mentor，~作为特朗普的导师，210；upbringing of，对~的抚养，107–8；upper-class credentials，advertising of，宣传上层阶级身份，108；white-collar masculinity，白领男性气质，117；Winchell，popularized by，~被温切尔推广，121；women，awkwardness around，~和女性在一起时感到尴尬，116；women，distaste for，~对女性的厌恶，128；women，linked to，~与女性有染，127–28

Cold War，冷战，4，6–8，11，15，17，73，104，133–34，149，151，160，182，206，219注2，244注105；communism，as intellectual disease，共产主义被当作一种“思想疾病”，143；gossip industry，八卦产业，141；“hard masculine toughness”，“硬朗的男子气概”，221注11；and masculinity，~和男性气质，187，220注9；secrecy and intelligence，obsession with，对保密和情报的痴迷，184；spies，fear of，对间谍的恐惧，141–42；surveillance state masculinity，监视国家男性气质，220注8，220注9

Collier，Rex，雷克斯·科利尔，56，62，234注76

Columbus Exhibition，哥伦布市展览会，32
Committee of Fifteen，十五人委员会，28
Committee of Fourteen，十四人委员会，28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CGO)，政府行动委员会，163
communism，共产主义，1，70–71，74，89，95，97，121，145，149，155，184，199；film plots，电影情节，143；and homosexuality，~和同性恋，122–23，132；as intellectual disease，~被当作一种“思想疾病”，143；and machismo，~和大男子主义，132；and New Deal，~和“新政”，256注66
Comstock，Anthony，安东尼·康姆斯托克，29，226注41
Conant，Robert Warren，罗伯特·沃伦·科南特，31–32
Confidential (magazine)，《机密》（杂志），6，15，*140*，*142*，144，181，185，195，212，252注15，253注25，253注26，254注29，265注108；anticommunism of，~的反共主义，138；broad readership of，~的广大读者群体，136；common man，speaking for，为普通人发声，135；composite-fact story，technique of，合成事实故事的技巧，155；government intelligence agencies，emulating of，模仿政府情报机构，137，140；homosexuality，preoccupation with，139–41，关注同性恋，265注108，266注109；imitators of，~的模仿者，143；personal lives of politicians，gossip about，关于政客私生活的八卦，137–41
Confidential book series，《机密》系列丛书，135，253注17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产业工会联合会，241注69，242注71
Connell，R. W.，瑞文·W. 康奈尔，222注29
Connolly，James P.，詹姆斯·P. 康诺利，158
conspiracies，阴谋论，152，156，162，168–69；anti-Semitic，反犹主义，111–12；communist，共产主义者，102，153–54，186，190；public paranoia，公众妄想症，154

consumerism，消费主义，8–10
Cook，Fred J.，弗雷德·J. 库克，164
corporatization，公司化，36
Costello，Frank，弗兰克·科斯特洛，212，248 注 41
Counihan，Maybelle，梅贝尔·库尼汉，239 注 30
Cox，John Stuart，约翰·斯图尔特·考克斯，224–25 注 8
criminality，犯罪，5
crisis theory，危机理论，222 注 30
Crucible，*The* (Miller)，《熔炉》（米勒著），223 注 41
Cruz，Ted，特德·克鲁兹，211–12
Cummings，Homer，霍默·卡明斯，61
Cuordileone，K. A.，K. A. 科迪莱昂内，220 注 9
Curran，Charles，查尔斯·柯伦，82
Czolgosz，Leon，里昂·乔戈什，73–74

Dailey，Dan，丹·戴利，139
Damaged Goods (Brieux)，《残次品》（白里欧著），34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DAR)，美国革命女儿会，71，76
Davies，Joseph E.，约瑟夫·爱德华·戴维斯，156
Davies，Richard，理查德·戴维斯，106
Davis，Charles，查尔斯·戴维斯，178
Dean，James，詹姆斯·迪安，10
Dean，Robert D.，罗伯特·D. 迪安，220 注 9
Debs，Eugene V.，尤金·V. 德布斯，73
DeGroot，Margaret Mary，玛格丽特·玛丽·德格鲁特，84
D'Emilio，John，约翰·德埃米利奥，98，256 注 65
Dempsey，Jack，杰克·登普西，161，190
Department of Defense，美国国防部，7，71，156–57，171，181
DeWeese，Cornelius，科尼利厄斯·德威斯，228 注 71
Dewey，Tomas，托马斯·杜威，137–38
Dick Tracy (comic)，《至尊神探》（漫画），62
Dick Tracy's G-Men (serial)，《至尊神探》（系列），61
Dietrich，Marlene，玛琳·黛德丽，

139
Dillinger，John，约翰·迪林杰，46，55，60，62
dime novels，廉价小说，26
Doherty，Tomas，托马斯·多赫蒂，184–85，269 注 160
Door County Young Republicans，多尔县青年共和党人，90
Douglas，Paul H.，保罗·H. 道格拉斯，105
Dulles，Allen，艾伦·杜勒斯，161
Dulles，John Foster，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00，261 注 28
Dunne，Mathew，马修·邓恩，143
Durfee，James，詹姆斯·德菲，85–86
Dvorak，Ann，安·德拉克，60

Earp，Wyatt，怀亚特·厄普，45–46，58
Eberlein，Mike，迈克·埃伯莱因，83，238 注 17
economic panics，经济恐慌，26–27
Egan，Pierce，皮尔斯·伊根，78
Eighteenth Amendment，第十八修正案，67
Eisenhower，Dwight D.，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159，162–63，165，169，181，205，259 注 1，262 注 45
Eisenhower，Mamie，玛米·艾森豪威尔，259 注 1
Eliot，Charles William，查尔斯·威廉·艾略特，29
elitism，精英主义：attack on，对～的攻击，91，163；Eastern establishment，～在东部的建构，149；Midwestern and Western states，中西部和西部各州，149–50；power elite，权力精英，107–8，127；power elite，as term，权贵集团，248 注 40
England，英国，32，169；royal family，皇室家庭，265 注 108
Equitable Life Insurance Society，英国衡平人寿保险社，61–62
espionage，间谍活动，56–57，75–76，137，141–42，162，202，206，259 注 4
Espionage Act，《反间谍法》，73
Europe，欧洲，50，97，104，168，170，179，198–99
Everett，Willis M.，威利斯·M. 埃弗雷特，103
Evers，Walter A.，沃尔特·A. 埃弗斯，86
Evjue，Bill，比尔·埃维尤，176，

178，241 注 64
Ewen，Elizabeth，伊丽莎白·尤恩，103

Fairchild，Tomas E.，托马斯·爱德华·费尔柴尔德，159
Faithfull，Starr，斯塔尔·费斯福，138，254 注 29
fascism，法西斯主义，70–71，74，128，146
FBI in Peace and War, The (radio program)，《和平与战争年代的联邦调查局》（广播节目），61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11，25，44–46，65，70，121–22，127，138，140，150–51，155–56，162，167，177，183–84，199，209，226 注 41，230 注 13，230 注 17，232 注 34，234 注 69，234 注 75；agents，as action heroes，特工作为行动英雄，47，62；basketball team，篮球队，232 注 42；code of conduct，行为准则，55；code of ethics，道德准则，52；COINTELPRO，205–6；counter-surveillance programs，反监视计划，76；cultural depictions of，~的文化描述，72；domestic surveillance program，国内监视计划，74–75；as force for good，~作为正义的力量，62–63；gendered policies of，~的性别化政策，77；and G-Men，~和特工，47，60，62；hiring practices，redesign of，重新设计招聘程序，54–55；ideological warfare，as specialty of，~作为意识形态战争的特色，71；information，weaponizing of，信息武器化，74；manliness，阳刚之气，57；masculine ideal，embodiment of，男性理想的化身，52；masculinity，男性气质，57–58，134–35；as modern policing unit，~作为现代警务部门，51；moral character，品行，56；national security apparatus，central pillar of，国家安全机构的核心支柱，63；Obscene File，淫秽档案，49–51；obscenity，combatting of，与淫秽做斗争，224–25 注 8；paternalistic role of，~的家长式角色，63；Police Training School，警察培训学院，232 注 40；rebranding of，~的品牌重塑，52，54–57；

Sex Deviates File，性变态档案，166；sexual morality，policing of，~对性道德的监管，51；subversives，investigating of，调查颠覆分子，205；White Slave Division，打击白奴交易司，73；wire-taps，use of，窃听器的使用，51，76–77，205。也见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BOI)，调查局；G-Men，（调查局）特工

Feller，Abraham，亚伯拉罕·费勒，250 注 73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Washington，华盛顿第一长老会，34

First Red Scare，第一次红色恐慌，183–84，206。也见 Red Scare，红色恐慌；Second Red Scare，第二次红色恐慌

Fisher，Fred，约翰·费舍尔，269 注 166

Flanagan，Flip，福利普·弗拉纳根，260 注 14

Flanders，Ralph，拉尔夫·弗兰德斯，101，201–2，204，244 注 101，270 注 179

Fleischmann，Julius，朱利叶斯·弗莱施曼，41–42

Floyd，“Prety Boy”，“漂亮男孩”弗洛伊德，46，55，60

Flynn，Edward J.，爱德华·J. 弗林，109–10，248 注 41

flyting，对诗互骂，187

Folliard，Edward T.，爱德华·T. 福利亚德，118

football，橄榄球，27，32–33

Forbush，William Byron，威廉·拜伦·福布什，30

Foresman，Shirley，雪莉·福尔斯曼，92

Fort Monmouth investigations，蒙茅斯堡调查，161–62，172，189，199，202，259 注 4

Foster，Eric K.，埃里克·K. 福斯特，144

Foster，Eugene C.，尤金·C. 福斯特，30

Founding Fathers，开国元勋们，59

Fox and Friends (news show)，《福克斯和朋友们》（新闻节目），211

Fox News，福克斯新闻，211

Franklin，Benjamin，本杰明·富兰克林，27

Freedman，Estelle B.，埃斯特尔·B. 弗里德曼，98，256 注 65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信息自由法案》，252 注 11

Friedman, Andrea, 安德里亚·弗里德曼, 269 注 169
Friendly, Alfred, 阿尔弗雷德·弗里德利, 155–56
From the Record (campaign mailer), 《记录在案》(竞选邮件), 155–56; composograph, use of, 利用构图, 157–59
Front Page, The (Hecht and MacArthur), 《头版》(赫奇、麦克阿瑟著), 121
Fuchs, Klaus, 克劳斯·福克斯, 131, 252 注 5
Fulbright, J. William, 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 159
Fulton, William, 威廉·富尔顿, 147

Gabler, Neal, 尼尔·加布勒, 13–14
Galante, Carmine, 卡迈恩·加兰特, 209
Galleani, Luigi, 鲁奇·加里尼, 73
Gang Busters (radio serial), 《惩恶锄奸》(系列广播剧), 61–62
Gannet, Bety, 贝蒂·甘内特, 121
Garret, Pat, 派特·加勒特, 58
Garrison, William Lloyd,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 27
Gauvreau, Emile, 埃米尔·高夫罗, 120
"G. David Schine in Hell" (Kushner), 《地狱里的大卫·席因》(库什纳著), 261 注 25
gender, 性别, 4, 14, 39, 51, 58, 64, 128, 136, 174; American security state, 美国国家安全, 220 注 9; business management, gendered understanding of, 企业管理的性别化理解, 232 注 35; gendered boundaries, of newspaper industry, 报业的性别边界, 121; gendered imagery, 性别意象, 71; gendered language, use of, 性别语言的使用, 132, 190–91; gendered performance, 性别化的表演, 11; gender identity, 性别认同, 9, 11, 25, 47, 52, 77, 107–8, 113, 116–17, 122, 144, 183–84, 202, 219–20 注 6, 221 注 11, 269 注 169; gender inversion, 性别倒置, 139; gender performativity, 性别的表现性, 222 注 27; gender politics, 性别政治, 134, 220 注 9; gender relations, 性别关系, 28, 31; gender roles, shifting of,

性别角色的转变，5，8–9，11，29，36，41，98，116；gender segregation，两性隔离，98；political culture，gendered valences of，政治文化的性别价值，5；public perceptions of，公众对~的看法，46；sexual identities，性认同，15，17；sexual politics，性政治，7，41；as socially constructed，~作为社会建构，9

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29，58

Gentleman Prefer Blondes (film)，《绅士爱美人》（电影），181

Gentry，Curt，科特·金特里，67，237注125

Germany，德国，47–48，148，167，257注89。也见West Germany，西德

Gilbert，James，詹姆斯·吉尔伯特，222注30

Giles，Roscoe C.，罗斯科·康克林·贾尔斯，123

Gillette，Guy，盖伊·吉列特，159

girlie magazines，色情杂志，134–35

G-Men，（调查局）特工，47，65，69，72，137，179，192；creation of，~的创造，52–53，206；as cultural icons，~作为文化符号，60，63，77；as family men，~作为家庭中的男人，62–63；frontier lawmen，as modern incarnations of，~作为边疆执法者的现代化身，58；home，protecting of，保卫家庭，62；masculinity，as central to identity，男性气质作为身份认同的核心，63；as moral figures，~作为道德模范，77；myth，perpetuation of，神话的延续，67；preparedness of，~的准备工作，57；in public imagination，公众想象中的~，53；white-collar masculinity，personification of，白领男性气质的化身，51，56。也见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

G-Men (film)，《调查局特工》（电影），60–61，234注70

G-Men (radio program)，《调查局特工》（广播节目），234注76

Goebbels，Joseph，约瑟夫·戈培尔，153

Goldman，Emma，埃玛·戈尔德曼，

73–74
Goldwater, Barry, 巴里·戈德华特, 161
Goodland, Walter S., 沃尔特·古德兰, 100
Goodman, Bill, 比尔·S. 古德曼, 124
gossip, 八卦, 4–5, 7, 12, 39, 65, 119, 153, 174, 180, 208, 210; celebrity, birth of, 名流的诞生, 6; circulating information, means of, 传播信息的手段, 14; Cold War, effect on, 对冷战的影响, 141; Cold War and Red Scare, fueled by, 由冷战和红色恐慌推动, 6; columns, ~专栏, 66, 120, 127, 136, 162, 202; distilled malice, 恶意中伤, 13, 15, 17; domesticity, guardians of, 家庭的守护者, 58; forms of, ~的形式, 12–13; impact of, ~的影响, 15; as industry, ~作为产业, 6, 36, 120, 132; and innuendo, ~和影射, 6; journalism, 新闻报道, 120–21, 253注25; and modernity, ~和现代性, 14; in national security, ~在国家安全领域, 6; as perennial presence, ~作为长期存在, 141; political intrigue, as source of, ~作为政治阴谋的来源, 184, 204; positive rumors, 正面的谣言, 13; power of, ~的力量, 13–14; rumor, difference from, ~与谣言的不同, 13; in shadow worlds, ~在黑暗世界中, 14–15; surveillance, as form of, ~作为一种监视形式, 15; as term, ~作为术语, 12。也见 gossip magazines, 八卦杂志
gossip magazines, 八卦杂志, 15, 41, 136, 163, 173, 195, 202, 208, 212; acceptable behavior, defining and policing of, 界定和监管可接受的行为, 144; blind item, 盲闻, 38; flourishing of, ~的发达, 134; golden age of, ~的黄金时代, 135; guilt by association, 牵连定罪, 211; hyperbole, 夸张, 211; imitators of, ~的模仿者, 141; insinuation, 影射, 211; libel charges, avoiding of, 避免诽谤指控, 143; origins of, ~的起源, 36–37; photography, 摄影, 26, 120; popularity of, ~的流行,

144，184；tactics of，～的策略，132，144，211。也见 individual magazines，独立杂志
Gotti，John，约翰·高蒂，209
Great Depression，大萧条，11，63，101，121
Green，T. F.，西奥多·弗朗西斯·格林，161
Greenglass，David，大卫·格林格拉斯，125，250 注 80
Greenspun，Harold，哈罗德·格林斯彭，178–79，181，182，195，265 注 107
Gregory，Tomas，布鲁斯·格里高利，230 注 12
guilt by association，牵连定罪，16，105，132，134，143–44，159，174，211

Hall，G. Stanley，G. 斯坦利·霍尔，27
Hamilton，Alexander，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4
Hammett，Dashiell，达希尔·哈米特，121，234 注 75
Hanes，John W.，约翰·W. 哈内斯，100
Hannity，Sean，肖恩·汉尼提，211
Hanson，Haldore，哈尔多·汉森，152–53
Hantover，Jeffrey，杰弗里·汉托弗，27–28
Harding，Warren G.，沃伦·G. 哈丁，48，52
Harriman，W. Averell，W. 埃夫里尔·哈里曼，41–42
Harris，Field，费尔德·哈里斯，92–93
Harrison，Robert，罗伯特·哈里森，135–36，138–40，185，252 注 15
Hart，Ed，埃德·哈特，83
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139
Hayden，Carl，卡尔·海登，177
Hearst，William Randolph，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20，212
Hefner，Hugh，休·海夫纳，10
Heil，Julius P.，朱利叶斯·P. 海尔，239 注 36
Hemmer，Nicole，尼科尔·海默，211
Herblock (cartoonist)，赫布罗克（漫画家），153，*200*
Hill，Jennie Earngey，珍妮·恩吉·希尔，269 注 169
Hiss，Alger，阿尔杰·希斯，122–23，131，154，204，240 注

54，247–48 注 39，249 注 59，249 注 61
Hiss-Chambers trial，希斯－钱伯斯审判，122–23，148
Hitler，Adolf，阿道夫·希特勒，153，257 注 89，265 注 107
Hitz，William，威廉·希茨，230 注 12
Hoben，Allan，艾伦·霍本，30，32–33
Hoey，Clyde，克莱德·霍伊，150，256 注 77
Hollywood (California)，好莱坞（加利福尼亚州），137
Hollywood Production Code，《好莱坞生产守则》，195，269 注 160
Hollywood Ten，好莱坞十人组，141–42
homosexuality，同性恋，115，209，256 注 65，256 注 77；attacks on，针对～的攻击，146–47，150；blackmail，susceptibility to，易受勒索，145，148；Cohn，rumors of，关于科恩的谣言，162，170，174，179–81，184，193，195–202，261 注 251，270 注 172；communism，link with，～与共产主义的联系，122–23，132，147–48，183–84；as dangerous，～的危险性，148；fairy，usage of，“仙子”的用法，195；Hoover，rumors of，关于胡佛的谣言，64–65，162，207–8，235 注 81；masculinity，as threat to，～作为对男性气质的威胁，108，113；McCarthy，rumors of，关于麦卡锡的谣言，87，146，162–63，173–82，182，183–84，193，195–98，200–202，270 注 172；obsession with，对～的痴迷，265 注 108，266 注 109；pixie，usage of，“小精灵”的用法，195；queer，as term，“酷儿”作为术语，219–20 注 6；sadomasochism，association with，～与施虐受虐有关，197；Schine，rumors of，关于席因的谣言，170，174，179–81，184，193，195–99，261 注 25，270 注 172；security risk，安全隐患，144–45，166；sissy，as term，“娘娘腔”作为术语，219–20 注 6；slang terms，俚语，139，195，240 注 54；in State Department，rumors of，关于美国国务院的～谣言，122–23，144–50，165–68，198–99；Stevenson，rumors of，

关于史蒂文森的谣言，139–41，142
Hoover，Annie，安妮·胡佛，34，36
Hoover，Dickerson，Jr.，小迪克森·胡佛，21，36
Hoover，Dickerson，Sr.，老迪克森·胡佛，21–22，35–36，228 注 71
Hoover，J. Edgar，约翰·埃德加·胡佛，5–8，12，20，27，44，46，49，60，68，75，79–80，87–89，100，107–8，118，120，127，132–33，137–38，145–48，153–56，164，166–67，177，183–84，192，199–200，*200*，204，206，209，211，226 注 41，230 注 13，232 注 34，232 注 38，233 注 47，234 注 70，236 注 98，255 注 53，259 注 6；American home，as defender of，美国家庭的捍卫者，70；Americanism，conception of，“美国精神”的概念 58–59，72；anticommunism，embrace of，推崇反共主义，139；authoritarianism of，~的独裁主义，224–25 注 8；as bachelor，~作为单身汉，66，68，236 注 100；celebrity status，名人地位，68，236 注 100；character of，~的性格，24–25；Christian manhood，基督徒的男子气概，29，33–36；class valedictorian，毕业生代表，23；cult of personality，fostering of，树立个人崇拜，66，206；as debater，~作为辩手，23–24；desanctification of，~走下神坛，206；distilled malice，target of，恶意中伤的目标，17；as domestic guardian，~作为家庭的守护者，70；domestic surveillance，国内监控，205–6；drill team，军训队，23–24；effeminacy of，~的女性特质，63–64；“Eleanor blue” wardrobe of，“埃莉诺蓝”的衣橱，64，235 注 83；FBI，personification of，联邦调查局的化身，25，52；FBI，rebranding of，联邦调查局的品牌重塑，52，54–57；foreign isms，as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外来主义作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70–72，206；G-Man，creation of，创造调查局特工形象，52–53，206；G-Man，as example of，~作为调查局特工的典范，63，69；and gossip，

~和八卦，15–16，65，208；height of，~的身高，23，225注16；homogeneity，同质性，23；homosexuality，rumors of，同性恋谣言，64–65，162，207–8，235注81；Hooverism，胡佛主义，252注11；as household name，家喻户晓，62；machismo of，~的大男子主义，11，47；manliness，debate over，“阳刚之气”之争，63；manliness，definition of，“阳刚之气”的定义，59；martial discipline，belief in，崇尚军事纪律，25；masculinity，男性气质，25，52，54，64–66，69–70，139，206，208；masculinity，as vehicle，男性气质作为载体，4；mass media，use of，利用大众传媒，77；McCarthy，association with，~与麦卡锡的关系，150–51；“mincing step”，“小碎步”，64，235注81；moral character，and self-restraint，品德和自我约束，56；muscular manhood，adoption of，采用强健型男子气概，11；myth，perpetuation of，神话的延续，67；national security apparatus，central pillar of，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63，72，74，76–77；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nd masculinity，as link between，~作为国家安全国家与男性气质之间的联系，77；newspapers and magazines，contributions to，向报纸和杂志投稿，56–57；nick-name of，~的昵称，22，225注15；as nineteenth-century relic，继承了19世纪的遗风，21；Official and Confidential file on，~相关官方机密文件，65；the other，distrust of，~对他人的不信任，23；paternalistic role of，~的家长式角色，63；public persona of，~的公众形象，208；public relations push of，~推动改善公共关系，45；queering of，~的酷儿行为，65，207；rapid ascent of，~的迅速高升，48；as respected，受人尊敬，151；scientific policing tactics，application of，运用科学的警务战术，50–51；sense of style，时尚感，230注14；social life，press coverage of，媒体对~社交生活的报道，67–69；as social outsider，~作为交际场上的边缘人，10；as stutterer，~作为口吃者，22；surveillance state masculinity，reliance on，~对监

视国家男性气质的依赖，207；as "swarthy"，"皮肤黝黑"，64；telegraphic warrants，use of，使用"电报令"，73；true Americanism，preserving of，~维护真正的美国精神，47；upbringing of，对~的抚养，21–23，36，88；War on Crime，as public face of，~作为"对犯罪宣战"的公众形象代言人，61；white-collar masculinity，白领男性气质，117；wiretaps，use of，~使用窃听手段，206；women's clothing，wearing of rumors，~着女装的谣言，207–8；young men，as role model for，~作为年轻人的榜样，69。也见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

Hoover，Lillian，莉莲·胡佛，21

Hoover，Sadie，萨迪·胡佛，21

Hopper，Hedda，赫达·霍珀，234注72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75，122，138，150

Hudson，Rock，洛克·哈德森，139，254注35

Hull，Cordell，科德尔·赫尔，74–75

Hunter，Tab，泰布·亨特，139

Hurricane Dorian，and Sharpiegate，飓风多利安和"记号笔门"，211

Hutton，E. F.，E. F. 赫顿，204

hyperbole，夸张，134

Illinois，伊利诺伊州，149

immigration，移民，35，42，49；spike in，~飙升，26

immorality，道德败坏，28–29，49，58，77

Indian Wars，印第安人战争，26

individualization，个性化：and masculinity，~和男性气质，54；and modernization，~和现代化，53

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36，49

InfoWars.com，资讯战争网，211

innuendo，影射，41，132，170，196；in American politics，美国政治中的~，14

insinuation，暗示，5–6，12–13，16，64，120，126，132，134，143–44，151，158，174，184，196，198，211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IA)，国际信息署，167–69，202
Investigator, The (newspaper)，《调查者》（报纸），65

Jackson，Andrew，安德鲁·杰克逊，137
Jackson，Henry M.，亨利·M. 杰克逊，188
Jackson，Robert H.，罗伯特·H. 杰克逊，77
Jefferson，Thomas，托马斯·杰斐逊，14，137
Jenkins，Philip，菲利普·詹金斯，148
Jenkins，Ray，雷·詹金斯，189，193，196
Jessup，Philip，菲利普·杰塞普，132，158–59
Jim Crow，吉姆·克劳，23
Johnson，David K.，大卫·肯尼斯·约翰逊，122–23，148，256 注 66
Johnson，Lyndon B.，林登·B. 约翰逊，137；adultery of，~的奸情，253 注 26
Johnson，Mickey，米基·约翰逊，176
Johnson，Van，范·强生，139
Joint Chiefs of Staff，参谋长联席会议，7
Joint Committee Against Communism，反共联合委员会，203
Jonathan，Norton Hughes，诺顿·休斯·乔纳森，247 注 31
Jones，John Paul，约翰·保罗·琼斯，153–54
Jonkel，Jon M.，乔恩·M. 琼克尔，156
journalism，新闻：gossip，八卦~，120–21，253 注 25；legitimate，合法~，211–12；muscle，肌肉~，121；print，186；professionalization of，~的专业化，6；Saloon，沙龙，41；tabloid，小报，6，26
Jowlet Institute，乔莱特健身训练学院，253 注 22
Joyce，Peggy，佩吉·乔伊斯，67
Juliana，Jim，吉姆·朱利安纳，3，193–95
Juneau，Mary Louis，玛丽·露易丝·朱诺，239 注 30
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青年商会，59
Junior G-Men of the Air (film serial)，《飞行少年 G-战警》（系列电影），62

Karpis，Alvin，阿尔文·卡皮斯，

44–46，66，229 注 1
Kaufman，Irving，欧文·考夫曼，125–26，250 注 82
Keefe，Frank，弗兰克·基夫，269 注 169
Kefauver hearings，凯弗维尔案听证会，135
Kelly，George “Machine Gun”，“机枪手”凯利，46，52–53，57
Kennedy，John F.，约翰·F. 肯尼迪，161，164，212；adultery of，~ 的奸情，253 注 26
Kennedy，Joseph P.，约瑟夫·P. 肯尼迪，164
Kennedy，Robert F.，罗伯特·F. 肯尼迪，164，188；and Cohn，hatred between，~ 和科恩之间的仇恨，260 注 14
Kerr，Jean，珍妮·克尔，147，150–51，161，174，179，181，256–57 注 79
Kessler，Glenn，格伦·凯斯勒，211
Kimmel，Michael，迈克尔·坎摩尔，8，10，222 注 30
King Features Syndicate，国王影业，62
Kinsey，Alfred，阿尔弗雷德·金赛，147，266 注 109
Kohlberg，Alfred，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203–4，271 注 2
Kohler，Walter，沃尔特·科勒，159
Korea，韩国，157
Korean War，朝鲜战争，126
Kraus，Charles，查尔斯·克劳斯，133
Ku Klux Klan (KKK)，三 K 党，37，146，205
Kushner，Tony，托尼·库什纳，261 注 25
Kwolek-Folland，Angel，安杰尔·柯欧拉克 – 福朗，53，232–32 注 33

Ladies' Home Journal (magazine)，《女士家庭杂志》，224 注 1
La Follette，Phillip，菲利普·拉福莱特，88，239 注 36
La Follette，Robert M.，Jr.，小罗伯特·拉福莱特，88–91，93，95–100，239–40 注 37，241 注 59，242 注 73，242 注 79，243 注 83
La Follette，Robert M. “Fighting Bob”，Sr.，“斗士鲍伯”罗伯特·拉福莱特，88
Lait，Jack，杰克·莱特，135

Lamour, Dorothy, 多萝西·拉莫尔, 68
Lattimore, Owen, 欧文·拉铁摩尔, 132, 153–54
Laurie, Piper, 派珀·劳里, 165, 170
Lavender Scare, 薰衣草恐慌, 150, 256 注 66;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的国际化, 169
Lawrence, David, 大卫·劳伦斯, 162
Lawrence, Justus, 贾斯特斯·劳伦斯, 179
Leatherneck (magazine), 《皮领》(杂志), 57
Le Club, 乐俱乐部, 209
Lehman, Herbert, 赫伯特·雷曼, 109, 111
Leibowitz, Samuel, 塞缪尔·莱博维茨, 147
Lenin,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列宁, 165
Lenz, Gabriel, 加布里埃尔·伦茨, 258 注 107
Lerner, Max, 马克斯·勒纳, 97, 148
Levitt, William, 威廉·莱维特, 103
Lewis, Anthony, 安东尼·刘易斯, 246 注 10
Lewis, Fulton, 富尔顿·刘易斯, 203–4
Lewis, R. Garth, R. 加斯·刘易斯, 176
Liberace, 李伯拉斯, 10, 265 注 108
Lie, Trygve, 特里格韦·赖伊, 126
Lincoln, 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27
Lindbergh, Charles, Jr., 小查尔斯·林德伯格, 121, 237 注 116
Lindbergh Law, 《林德伯格法案》, 237 注 116
Lipsitz, George, 乔治·利普席兹, 96, 243 注 88
Littlejohn, Fritz, 弗里茨·利特约翰, 185
Livingstone, David, 大卫·利文斯敦, 27
Lodge, Henry Cabot, 亨利·卡伯特·洛奇, 164
Loeb, Philip, 菲利普·勒布, 250 注 73
Longworth, Alice Roosevelt, 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斯, 161
Louis, Joe, 乔·路易斯, 67, 136
Louisville Greys, 路易斯维尔灰人队, 27

Lucchese，Gaetano，盖塔诺·卢切斯，248注41
Luce，Henry，亨利·卢斯，21
Luciano，Lucky，幸运卢西亚诺，137–38
Ludendorff，Erich，埃里希·卢登多夫，257注89
Lustron Company，卢斯特龙公司，175
Lynd，Helen，海伦·林德，19–20，28，120，224注1
Lynd，Robert，罗伯特·林德，19–20，28，120，224注1
Lyons，Leonard，伦纳德·莱昂斯，119–20，248注46

Macfadden，Bernarr “Bodylove”，伯纳尔·“肉体爱好者”·麦克法登，120，210
MacLeod，Donald Campbell，唐纳德·坎贝尔·麦克劳德，34–35
Madison，James，詹姆斯·麦迪逊，34
Mailer，Norman，诺曼·梅勒，195
Mallen，Frank，弗兰克·马伦，120，195
Malmedy massacre，马尔梅迪大屠杀，103–4，175，244注115
Malone，George “Molly”，乔治·“莫利”·马龙，178
manhood，男子气概，10，42–43，66，87，99，114，140，157，170，184，190–91，198，232注35；and Americanism，~和美国精神，57–59；authenticity，真实性，89；authority，权威，210；Christian，基督徒，25，29–30，32–33，35；civilized，有教养的，32；crisis theory of，~的危机理论，222注30；as defined，~被界定，8–9；depiction of，对~的描述，26–27；individualism，embracing of，推崇个人主义，53；mainstream conceptions of，~的主流观念，115；as morality，~作为道德，32；muscular，强健型，11；overcivilization，and primitivism，过度文明和原始主义，53；power，synonymous with，权力的代名词，117；producerist，生产主义，11，220注9；professional，职业型，11；sexual deviance，性偏差，28；shift in，~的变迁，53；white-collar，白领，53–54；working-class，工人阶级，100，117。也见manliness，阳刚之气；

masculinity，男性气质
Manion，Clarence，克拉伦斯·马尼恩，204
manliness，阳刚之气，11，63，87，231–32 注 33；Christ，as epitome of，基督作为~的典型，31–32；concept of，~的概念，10；Founding Fathers，connection to，~与美国开国元勋联系起来，59；masculinity，supplanting of，~取代了男性气质，9；roughneck，粗犷，5；shifts in，~的变化，8；of special agents，特工的~，57；virtues of，~的美德，59。也见 manhood，男子气概；masculinity，男性气质
Mann，Eugene，尤金·曼恩，37–38
Mann，William d'Alton，威廉·道尔顿·曼恩，37，228 注 76，228 注 77；blind item，盲闻，38；trial of，~的审判，40–41
Mann Act，《曼恩法》，49，51，73，230 注 17，231 注 26。也见 White-Slave Traffic Act，《白奴贩运法》
Marcantonio，Vito，维托·马坎托尼奥，201
Marcus，Bernie，伯尼·马库斯，111–12
Marcus，Eugene，尤金·马库斯，114，246 注 27
Marcus，Joseph，约瑟夫·马库斯，111
Marder，Murrey，默里·马德，180，198
Marine Corps Association，海军陆战队协会，57
Marion，Frances，弗朗西丝·玛丽恩，68
Marshall，George，乔治·马歇尔，152
Martyn，John，约翰·马廷，232 注 37
Maryland，马里兰州，158，258 注 107
masculinity，男性气质，25，43，65–66，79，95，99，114，119，129，139，145，181，183，188–91，193，198，202，232 注 35，267 注 134；aggressive，咄咄逼人的~，163，171，205–6；American，美国式~，10；Americanism，美国精神，58，69；and anxiety，~和焦虑，9，163；blue-collar，蓝领，117，149–50；brutish，粗野的~，87；and Christianity，

~和基督教，30；Cold War，冷战，220注9；consumerist，消费主义，5；crisis in，~的危机，10，29；as defined，~被界定，222注26；elasticity of，~的弹性，10；of FBI agents，联邦调查局特工的~，57，63；gossip columns，八卦专栏，121；hegemonic，霸权式~，10，39，206，222注29；heroic，英雄主义的~，208；heterosexual，异性恋者，108，113，127；homosexuality，as threat to，~作为对同性恋的威胁，115，146；and individualization，~和个性化，54；and machismo，~和大男子主义，11，47，108，132；machismo，societal emphasis on，社会对大男子主义的强调，116；macho，男子汉，134–35，247注31；markers of，~的特征，187；and morality，~和道德，36，52；new forms of，~的新形式，77；as political tool，~作为政治手段，210；populist，民粹主义，92，97，144，152；and power，~和权力，128；professional，职业型~，51；“real men”，“真正男子汉”，69–70；shifts in，~的变化，8；as socially constructed，~作为社会建构，10；surveillance state，监视国家，3–4，6，12，20，41，46，77，108，163，184，187，204，207–8，210，220注8，272注21；as term，~作为术语，8；versions of，~的版本，10；white-collar，白领，11，51，53，56，89，117；working-class，工人阶级，84。也见manhood，男子气概；manliness，阳刚之气

Mason，James，詹姆斯·梅森，182，184

Mason，Noah，诺亚·梅森，149

mass media，大众媒体，26，47

Matson，John E.，约翰·E.马特森，165–66，261注28

Mattachine Society，马太辛协会，*140*

Matusow，Harvey，哈维·马图索，125

May，Ronald，罗纳德·梅，175–76，178

McCall's (magazine)，《麦考尔》（杂志），224注1

McCarran，Pat，帕特·麦卡伦，133，149

McCarthy, Bridget, 布里奇特·比德·麦卡锡, 79
McCarthy, Joseph R., 约瑟夫·R. 麦卡锡, 1–3, 4, *4*, 5–8, 12, 64, 72, 77, 93, 107–8, 115, 118, 120, 123–24, 128, 130, 136, 141, 165–72, 173, *194*, 199, *200*, 203, 207, 219 注 2, 224–25 注 8, 234 注 75, 238 注 5, 238 注 17, 239 注 31, 242 注 73, 242 注 79, 243 注 83, 244 注 101, 245 注 119, 252 注 2, 255 注 53, 255 注 54, 256–57 注 79, 258 注 107, 259 注 6, 259 注 7, 260 注 12, 261 注 28, 262 注 45, 269 注 168, 271 注 1; as alarmist, 危言耸听, 149; *Amerasia* affair, investigation into, ~对《美亚》事件的调查, 154–55; anticommunism, embrace of, ~推崇反共主义, 133–34, 138–39, 145, 150, 159–60, 183–84, 204–5; anti-Semitism, charges of, 反犹主义指控, 104, 163–64; as approachable, 平易近人, 97; Army-McCarthy hearings, 陆军－麦卡锡听证会, 187–89, 191–92, 195, 198, 200; athleticism of, ~的运动能力, 99; authenticity of, ~的真实性, 84, 89; authoritarianism, 独裁主义, 246–47 注 29; as bachelor, ~作为单身汉, 86–87, 98–100; background of, ~的背景, 11, 79–85, 88; big lie, tactics of, “弥天大谎”的伎俩, 153; as blank canvas, ~如同白纸, 86; blue-collar masculinity, 蓝领男性气质, 117, 190; as boorish, 粗野, 100; boxing style of, ~的拳击风格, 78–79, 238 注 3; as brash, 傲慢, 190; as brawler, ~作为斗殴者, 78–79; brutish masculinity of, ~的野蛮男性气质, 87; as bully, ~作为霸凌者, 193, 198; burlesque clubs, patronizing of, 光顾俱乐部, 82; campaigning style, 竞选风格, 84; center-right, rejection of, 中右翼的排斥, 200; as chicken farmer, ~作为养鸡农户, 90; coarseness of, ~的粗鲁, 88, 91–92; Cohn, hiring of, 聘用科恩, 163–64, 250 注 82; common man, speaking for, 为普通人发声, 91; communist agent, accusation of, 共产党代言人指控, 245 注 117; cult of personality, 个人崇拜, 162–63; death of, ~的死亡,

205; as "Dennis the Menace", "淘气阿丹", 201, 270 注 179; as disheveled, 邋里邋遢, 192; distilled malice, target of, 恶意中伤的目标, 17; downfall of, ~的倒台, 79, 162–63, 184, 205; elitism, attack on, ~对精英主义的攻击, 91, 163; emotional connection, forging of, 建立情感联系, 151–52; Fort Monmouth investigations, 蒙茅斯堡调查, 161–62, 259 注 4; gay-baiting by, ~用同性恋问题进行诱导, 188–89; gendered language, use of, 性别语言的使用, 132, 190–91;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controversy, 德国战俘争议, 103–4; and gossip, ~和八卦, 15–16; gossip industry, employing tactics of, ~利用八卦产业的伎俩, 132, 153–55, 159–60, 163, 211; government, distrust of, 对政府的不信任, 210; "have you no decency" comment, directed at, 针对"难道您不讲一点体面吗"的评论, 184, 193, 198, 269 注 166; as heavy drinker, 热爱喝酒, 87; homosexuality, attacks on, ~对同性恋的攻击, 146–47, 150; homosexuality, rumors of, 同性恋谣言, 87, 146, 162–63, 173–82, 182, 183–84, 193, 195–98, 200–202, 270 注 172; Hoover, association with, ~与胡佛的关系, 150–51; hothead, reputation of, "急性子"的名声, 106; as influential, 具有影响力, 131; Jessup, campaign against, 反对杰塞普的运动, 158–59; as judge, ~作为法官, 84–86, 89–90, 92; machismo of, and fighting communism, ~的大男子主义, 与对抗共产主义, 132; manliness, 阳刚之气, 87; in Marines, ~在海军陆战队中, 85, 88, 94; marriage of, ~的婚姻, 161–62, 181; masculine persona of, ~的男子气概, 133–34; masculinity, 男性气质, 87, 89, 92, 95–98, 129, 139, 189, 191, 193, 206, 267 注 134; masculinity, questioning of, ~对男性气质的质疑, 181; media, manipulating of, 操纵媒体, 134; military service of, 服兵役, 92, 94, 198, 241 注 64; national notoriety, ~在全国范围内声名狼藉, 174; national press, handling

of，掌控国家媒体，105；as one of the guys，~像个普通男性，86，92；as outsider，~作为局外人，10，104，210；as pariah，~作为贱民，204；as “Pepsi-Cola Kid”，~作为“百事可乐之子”，101；personal connections，talent for，人脉方面的才能，97，99；persona of，~的形象，84，99；physical altercations of，的肢体冲突，146；pixie-fairy exchange，“精灵—仙子”对话，194–95；poker playing of，玩扑克游戏，81–82；populist credentials of，~的民粹主义倾向，91–92，95；populist masculinity of，~的民粹主义男性气质，97，144，149–50，152；public housing hearings，公共住房听证会，101–3，105–6；public image of，~的公众形象，79，84–85，132，192；queering of，~的酷儿行为，178，181，193，200，269 注 169；red-baiting language of，利用“赤色”概念下套，97，102；as relatable，和蔼可亲，97；Schlitz beer slogan，play on，借用施乐兹啤酒的营销口号，181；as secret communist，~作为秘密共产党员，265 注 107；self-made man，mantle of，白手起家的衣钵，96，105；self-sufficiency，advocacy of，倡导自给自足，90，96，98–99；Senate campaign，参议院竞选，88–92，96–97；sledge-hammer techniques of，连续猛击战术，106；“Smiling Joe”，“笑面乔”，78；social class，社会阶层，87；surveillance state masculinity，监视国家男性气质，187；as “Tail-Gunner Joe”，~作为“尾炮手乔”，92，94；television，effect on，~对电视的影响，185–86；temper of，~的脾气，101，104，192；as tomcat，四处留情的浪子，86；traditional values，as representative of，~作为传统价值观的代表，97–98；Tydings，campaign against，反对泰丁斯的运动，155–58；voters，and “most wanted to have a beer with”，选民“最想与~共饮啤酒”，90；as war hero，depiction of，~作为战争英雄的描述，92–93，105；war record，exaggeration of，夸大战绩，94–95；work ethic of，~的职业道德，79–81，89，100；working-class masculinity，工人阶

级的男性气质，84；working-class roots，工人阶级出身，84–86，89，100–101，104–5，240注50
McCarthy，Timothy，蒂莫西·麦卡锡，79–80
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1–2，72，124，131，138，147，168，170，191，201，207，245注119，252注11，262注45；as dead issue，~已成为过去式，204；end of，~的终结，205；government overreach，政府过度干预，206；Hoover，desanctification of，胡佛走下神坛，206；and momism，~和妈咪主义，246–47注29；rise of，~的崛起，132；Salem witch trials，塞勒姆女巫审判，223注41；self-policing，promotion of，促进自律，259注3；suicides，connection to，与~有关的自杀，250注73；as term，~作为术语，219注2
McClellan，John，约翰·麦克莱伦，189，197
McDougal，Karen，凯伦·麦克道戈，212
McGranery，James P.，詹姆斯·帕特里克·麦克格兰里，119
McGrath，J. Howard，詹姆斯·霍华德·麦格拉思，177
McKellar，Kenneth，肯尼斯·麦凯勒，45
McKinley，William，威廉·麦金莱，73–74
McMahon，William，威廉·麦克马洪，176，178
McMurray，Howard J.，霍华德·麦克默里，91，95，97，242注73，243注83
Methodist Church，美国卫理公会，32
Middletown (Lynd and Lynd)，《米德尔敦》（林德夫妇著），19，28
Midwest Council of Young Republicans，中西部青年共和党委员会，132，151
Miles，Catherine Cox，凯瑟琳·考克斯·迈尔斯，115
Miller，Ruth McCormick “Bazy”，露丝·麦考密克·“贝兹”·米勒，147，156
Mills，C. Wright，C.赖特·米尔斯，248注40
Milwaukee (Wisconsin)，密尔沃基县（威斯康星州），81–82，93，176，178–79，181

Milwaukee County Young Republicans，密尔沃基县共和党青年会，176
modernity，现代性，36；and celebrity，~和名流，14；and gossip，~和八卦，14
modernization，现代化，11，19–21，30，40；and individualism，和个人主义，53
momism，妈咪主义，114–15；and McCarthyism，~和麦卡锡主义，246–47 注 29
Monroe，James，詹姆斯·门罗，34
Monroe，Marilyn，玛丽莲·梦露，181
Moore，Terry，泰瑞·摩尔，182–83
Morgan，J. P.，约翰·皮尔蓬·摩根，228 注 84
Morris，Robert J.，罗伯特·J. 莫里斯，204
Mortimer，Lee，李·莫蒂默，135
Motion Picture (magazine)，《电影故事》（杂志）136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MPA)，美国电影协会，60
Muncie (Indiana)，曼西市（印第安纳州），19
Mundt，Karl E.，卡尔·厄尔·蒙特，172，187，189，197，266 注 116
Murphy，Audie，奥迪·墨菲，94
Murrow，Edward R.，爱德华·罗斯科·默罗，198，269 注 169
muscular Christianity，强健派基督教，29，31；origins of，~的起源，32

Naked and the Dead, The (Mailer)，《裸者与死者》（梅勒著）195
Napoleon，拿破仑，31，227 注 46
National Enquirer (tabloid)，《国家询问报》（小报），211–12。也见 *New York Evening Enquirer* (newspaper)，《纽约晚间询问报》（报纸）
National Police Academy，国家警察学院，50
National Purity Congress，国民纯洁会，29
national security，国家安全，5；gender identity，性别认同，183
National Security Act，《国家安全法》，7，72–73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美国国家安全局，73，137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国家安

全委员会，7，205
national security state，国家安全国家，77，128–29，200，206；advent of，~的出现，7；surveillance states，监视国家，72–73。也见security states，安全国家
national surveillance，国家监视，4，7；security state，and masculinity，安全国家和男性气质，206
National Vigilance Association，美国警醒会，29
Nation of Islam，伊斯兰民族组织，205
Native Americans，美国原住民，26
Nazism，纳粹主义，67，71，128，186
Nebraska，内布拉斯加州，149
Nelson，“Baby Face”，“娃娃脸”纳尔逊，46，60
neurasthenia，神经衰弱，228注71
Nevada，内华达州，149
New Deal，新政，11–12，62–63，74，83，90，95–97，99，103；and communism，~和共产主义，256注66；perversion，association with，与变态的联系，148
New England，新英格兰，14
New England Watch and Ward Society，新英格兰观察和护卫协会，28，226注39
Newhouse，Si，斯·纽豪斯，246注10
New York City，纽约市，29，67，73，137，167，209；Jewish community，犹太人社区，111；nightlife circuit，夜生活圈，165
New York Daily Mirror (newspaper)，《纽约每日镜报》（报纸），120
New York Daily News (newspaper)，《纽约每日新闻》（报纸），120
New York Evening Enquirer (newspaper)，《纽约晚间询问报》（报纸），212。也见*National Enquirer* (tabloid)，《国家询问报》（小报）
New York Evening Graphic (magazine)，《纽约晚报》（杂志），134，144，157，212；composographs，pioneering of，开创了“合成图像”的使用，120–21；morally questionable tactics of，~在道德上有问题的策略，121
New York Post (newspaper)，《纽约邮报》（报纸），119
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 (NYSSV)，纽约反堕落协会，29，226 注 41；Clean Books Crusade，净化图书运动，231 注 20
Nichols，Louis，路易斯·尼科尔斯，65，151，155
Nimitz，Chester W.，切斯特·W. 尼米兹，92–93
Nixon，Richard M.，理查德·M. 尼克松，133，146，149，161，164，205，210
North Dakota，北达科他州，100

Obama，Barack，embracing of soft power，贝拉克·奥巴马对软实力的拥护，272 注 21
O'Brian，John Lord，约翰·罗德·奥布莱恩，85
O'Brien，Jack，杰克·奥布莱恩，248 注 46
O'Donnell，Jack，杰克·奥唐奈，145
O'Dwyer，William，威廉·奥德怀尔，110，136–37
Ohio County Republican Women's Club，俄亥俄州县共和党妇女俱乐部，130
old boys' network，"老男孩"网络，105
Old First Presbyterian，旧第一长老会，52
On the Q.T. (magazine)，《秘密》（杂志），136，143
Operation Whitewash，粉饰行动，132
Oppenheimer，J. Robert，J. 罗伯特·奥本海默，204
organization man，need for belonging，组织中男性的归属感需求，251 注 92
Orton，Peter，彼得·奥顿，139
Oshinsky，David，大卫·奥辛斯基，179，204，241 注 59，252 注 2
Oswald，Lee Harvey，李·哈维·奥斯瓦尔德，212

Pacific Islands，太平洋岛屿，26
Palmer，A. Mitchell，A. 米切尔·帕尔默，48，73
Palmer Raids，帕尔默突袭，73–74
Parker，Bonnie，邦妮·帕克，46
Patton，George S.，乔治·S. 巴顿，265 注 96
Pearl Harbor，珍珠港，57
Pearson，Drew，德鲁·皮尔森，125，146，171，180–81，198，235 注 81，254 注 39，255 注 54，265 注 96；coded language，

use of，使用暗语，270注172；McCarthy，homosexuality rumors，麦卡锡，同性恋谣言，174–78，198，270注172；McCarthy，as nemesis of，~作为麦卡锡的克星，174–75

Pecker，David J.，大卫·J.佩克，212

Pegler，Westbrook，威斯布鲁克·佩格勒，41，120，162

Peiper，Joachim，约阿希姆·派普，103–4

Pendergast，Tom，汤姆·彭德加斯特，109

People (magazine)，《人物》（杂志），224注47

Pepsi-Cola，百事可乐，175

Peters，Andrew J.，安德鲁·詹姆斯·彼得斯，138，254注29

Pettegrew，John，约翰·佩特格鲁，53，222注26

Peurifoy，John，约翰·皮里福伊，144–45

Philippines，菲律宾，7

Photoplay (magazine)，《影戏》（杂志），136

Pierce，Jason Noble，杰森·诺布尔·皮尔斯，30–31，227注46

Pliley，Jessica，杰西卡·普利莱，224–25注8，230注17

Ponce de Leon，Charles，查尔斯·庞塞·德·莱昂，14

Pope，Generoso，Jr.，小詹纳罗索·波普，212，246注10，248注41

Post，Edwin，埃德温·博斯特，40–41

Post，Emily，艾米莉·博斯特，40–41

Potter，Claire Bond，克莱尔·邦德·波特，55，224–25注8

Powers，Richard Gid，理查德·吉德·鲍尔斯，23，35，75，224–25注8，232注34

Pozzoni Company，波佐尼公司，40

primitivism，原始主义，53，56

Progressive era，进步时代，6，21

Progressive Party，进步党，88，91

Prohibition，禁酒令，67，74

Protestantism，新教，25，29，35

Public Enemy (film)，《人民公敌》（电影），60

public housing，公共住房，101–3，105–6，244注105

public morality，公共道德，28–29

pulp fiction，低俗小说，26

Purvis，Melvin，梅尔文·珀维斯，55–56

Putney, Cliford, 克利福德·普特尼, 32

Queen of the Mob (film), 《黑手党女王》（电影）, 234 注 72

queerness, 酷儿特质, 5, 42, 139, 147, 179, 270 注 172; Cohn, queering of, 科恩的酷儿行为, 195, 200; and communists, ~和共产主义者, 148; harbingers of, ~的先兆, 115; Hoover, queering of, 胡佛的酷儿行为, 65, 207; McCarthy, queering of, 麦卡锡的酷儿行为, 178, 181, 193, 200, 269 注 169; queer, as term, 酷儿作为术语, 219–20 注 6

Radio Free Europe, 自由欧洲电台, 168

Rave (magazine), 《锐舞》（杂志）, 143, 181, *182*, 195, 212; homosexuality, obsession with, ~对同性恋的痴迷, 265 注 108, 266 注 109; libel suits against, 针对~的诽谤诉讼, 182–83

Ray, Johnnie, 约翰尼·雷, 139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209–10

Reber, Miles, 迈尔斯·雷伯, 188–89

Reber, Samuel, 塞缪尔·雷伯, 166, 188–89

Reconstruction, 重建, 37

Red Scare, 红色恐慌, 73–74, 97, 256 注 66; suicides, connection to, 与~有关的自杀, 250 注 73。也见 First Red Scare, 第一次红色恐慌; Second Red Scare, 第二次红色恐慌

Reeve, Marylyn, 玛丽莲·里夫, 68

Rego Park Veterans Housing Project, 雷哥公园退伍军人住房项目, 102

Reinbold, William, 威廉·莱因博尔德, 235 注 81

Remington, William, 威廉·雷明顿, 123–24, 250 注 73

Reston, James, 詹姆斯·雷斯顿, 192–93

Reuther, Walter, 沃尔特·鲁瑟, 242 注 71

Rhinelander, Alice Jones, 爱丽丝·琼斯·莱茵兰德, 121, 249 注 54

Rhinelander, Kip, 基普·莱茵兰德, 121, 249 注 54

Rickard，Tex，特克斯·里卡德，41
Roaring Twenties，咆哮的20年代，50
Roberts，William，威廉·罗伯茨，133
Rogers，Ginger，金格尔·罗杰斯，68
Rogers，Lela，莱拉·罗杰斯，68
Rome (Italy)，罗马（意大利），169
Roosevelt，Eleanor，埃莉诺·罗斯福，64
Roosevelt，Franklin D.，富兰克林·D.罗斯福，63，67，74–77，109，122，137–38，148，205，254注39
Roosevelt，Theodore，西奥多·罗斯福，14
Rosenberg，Ethel，埃塞尔·罗森博格，163–64，250注82；execution of，处决~，126；trial of，审判~，124–26
Rosenberg，Julius，朱利叶斯·罗森博格，162–64，250注82；execution of，处决~，126；trial of，审判~，124–26
Rosenstiel，Lewis，刘易斯·罗森斯蒂尔，207，209
Rosenstiel，Susan，苏珊·罗森斯蒂尔，207–9
Rovere，Richard，理查德·罗维尔，134，165
Rubell，Steve，史蒂夫·卢博，209
Rubio，Marco，马尔科·卢比奥，210
Ruppert，Jacob，雅各布·鲁珀特，41–42
Rushmore，Howard，霍华德·拉什莫尔，138
Russell，Jane，简·拉塞尔，181
Ruth，Babe，贝比·鲁斯，253注26
Ryan，Sylvester，西尔维斯特·瑞安，121

Sage，Anna，安娜·赛奇，62
Salem witch trials，塞勒姆女巫审判，223注41
Salerno，Tony，托尼·萨莱诺，209
Saloon journalism，酒吧新闻业，41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gazine)，《星期六晚邮报》（杂志），224注1
Saypol，Irving H.，欧文·H. 塞波尔，118，121，123，125–26，

248 注 41
Schine，G. David，杰拉德·大卫·席因，2–3，136，162，164–65，167，173，186–87，189，191，194，*194*，201；as easily fooled，~被轻易愚弄，169；Europe，trip to，欧洲之旅，168–70，174，179，198–99；as feared，~被畏惧，168–69；homosexuality，rumors of，同性恋谣言，170，174，179–81，184，193，195–99，261 注 25，270 注 172；preferential treatment，securing of，确保优待，171–72
Schine，Myer，迈尔·席因，179
Schlesinger，Arthur，Jr.，小亚瑟·施莱辛格，117–18，166–67
Schmidt，Godfrey，戈弗雷·施密特，203–4
Schrager，Ian，伊恩·施拉格，209
Schrecker，Ellen，埃伦·施雷克，250 注 73，252 注 11
Schultz，Benjamin，本杰明·舒尔茨，203
scientific management，科学管理，232 注 35
Scott，Henry E.，亨利·E. 斯科特，137，253 注 25
Scott，Lizabeth，丽莎贝斯·斯科特，139
Seaton，Fred，弗雷德·西顿，181
Second Red Scare，第二次红色恐慌，6，72，133，252 注 11。也见 First Red Scare，第一次红色恐慌；Red Scare，红色恐慌
Secret Agent X-9 (comic)，《秘密特工 X-9》（漫画），62
security states，安全国家，4–5，7，10，108，117，141，206，220 注 9，221 注 11；security state masculinity，安全国家男性气质，272 注 21。也见 national security state，国家安全国家
See It Now (television program)，《现在请看》（电视节目），198，269 注 169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参议院军事委员会，103
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128，162–63，165，172，202–3
serials，连续剧，234 注 73
sex crimes，性犯罪，147–48
sexual identity，性别认同，5，15，17，116，184
sexuality，性，4–5，8；revolution in，~的革命，11

Sheen, Fulton J., 富尔顿·约翰·申, 138
Sherwood, William, 威廉·舍伍德, 250 注 73
Sickles, Daniel, 丹尼尔·西克尔斯, 137
sissydom, 娘娘腔化, 30, 247 注 31; sissy, as term, 娘娘腔作为术语, 219–20 注 6
Smith, Bedell, 比德尔·史密斯, 168–69
Smith, Liz, 丽兹·史密斯, 209
Smith, Margaret Chase, 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 245 注 119
Smith Act, 《史密斯法案》, 75–76
Smith-Dunkley Company, 史密斯-邓克利公司, 40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史密森学会档案馆, 64, 235 注 83
Sobol, Louis, 路易斯·索博尔, 120
soft power, 软实力, 220 注 8, 272 注 21
Sokolsky, George, 乔治·索科尔斯基, 120, 162, 164–65, 170, 198, 203–4, 250 注 12, 271 注 1, 271 注 2
South America, 南美, 26
South Dakota, 南达科他州, 189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SCLC), 南部基督教领导联合会, 205
Soviet Union, 苏联, 1–2, 7, 104, 124, 131, 167, 220 注 8, 220 注 9, 256 注 66; atom bomb, test of, 原子弹试验, 155; iron curtain, 铁幕, 97
Special Agent J-8 (comic),《特工J-8》(漫画), 62
Stalin, Josef, 约瑟夫·斯大林, 153, 165
Star (magazine), 《星报》(杂志), 224 注 47
Stassen, Harold, 哈罗德·斯塔森, 161
State Department, 国务院, 122, 169–70; communist infiltration, rumors of, 共产主义渗透的谣言, 106, 130–31, 149, 152–53, 158, 252 注 2; homosexuality, rumors of, 同性恋谣言, 122–23, 144–50, 165–68, 198–99; spy ring, 252 注 2
Steinbrenner, George, 乔治·施泰因布伦纳, 209
Stevens, Robert T., 罗伯特·T.史蒂文斯, 171–72, 186–89,

193–94，199，267 注 134
Stevenson，Adlai，阿德莱·史蒂文森，166，168，262 注 45；homosexuality，accusation of，同性恋指控，139–41，142
Stone，Harlan Fiske，哈伦·菲斯克·斯通，48，74–75
Stone，Roger，罗杰·斯通，210
Stork Club，斯托克俱乐部，67–68，68，127，138
Straw，Will，威尔·斯特劳，41
strikes，罢工，95–96，241 注 69，242 注 71，242 注 74
Stuart，Luisa，路易莎·斯图尔特，68，236 注 98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205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学生志愿宣道运动，35
Studio 54 (nightclub)，54 俱乐部（夜总会），209
Sturgeon Bay (Wisconsin)，斯特金湾（威斯康星州），90，240 注 46
Sulgrave Club，萨格瑞夫俱乐部，146
Sullivan，Ed，埃德·沙利文，56，120
Summers，Anthony，安东尼·萨莫斯，207–8，236 注 98
Summers，Martin，马丁·萨默斯，9
Sumner，John S.，约翰·萨克斯顿·萨姆纳，29，231 注 20
surveillance state masculinity，监视国家男性气质，3–4，6，12，20，41，46，77，108，163，184，187，204，207，210，272 注 21；Cold War，冷战，220 注 9；federal government，distrust of，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208；and Trump，~ 和特朗普，220 注 8
Sutton，Willie，威利·萨顿，139
Symington，Stuart，斯图尔特·塞明顿，192，197–98

Taft-Ellender-Wagner (TEW) Housing Act，《塔夫特－艾琳德－瓦格纳住房法案》，102–3
Taf-Hartley Act，《塔夫－哈特莱法》，242 注 74
Tankersley，Garvin，加文·坦克斯利，156
team sports，团队运动，32
Teapot Dome scandal，茶壶山丑闻案，47
Tegge，Lloyd，劳埃德·泰格，176

television，电视：masculinity，男性气质，189；truth，exposing of，暴露真相，185–87
temperance organizations，禁酒组织，28–29
Tennessee，田纳西州，189
Terman，Lewis，路易斯·特曼，115
Texas，得克萨斯州，190
Thayer，Charles W.，查尔斯·惠勒·泰耶，167，261 注 36
Theoharis，Athan，阿森·西奥哈里斯，208，224–25 注 8
This Is Your FBI (radio program)，《联邦调查局由你掌控》（广播节目），61
Tip-Off (magazine)，《密告》（杂志），143
Tobey，Charles，查尔斯·托比，101
Tolson，Clyde，克莱德·托尔森，54–56，65，67，68，100，150–51，225 注 15，236 注 98
Tony's (nightclub)，托尼俱乐部（夜总会），67
Top-Secret (magazine)，《最高机密》（杂志），212
Town Topics (magazine)，《都市话题》（杂志），36，41，120，134，144，229 注 97；popularity of，~的流行，39–40；"Saunterings" column，"闲逛"专栏，37–39
Traister，Bryce，布莱斯·特雷斯特，222 注 30
Trohan，Walter，沃尔特·特罗安，64
Trotsky，Leon，托洛茨基，165
True Adventures of Junior G-Men, The (radio program)，《少年特工的真实冒险》（广播节目），62
true crime magazines，真实犯罪杂志，134–35
True Story (magazine)，《真实故事》（杂志），120
Truman，Harry S.，哈里·S. 杜鲁门，7，96，109，122，127，131–32，153，158，242 注 74，259 注 3，259 注 114；top secret，as security designation，最高机密作为安全级别，141
Trump，Donald，唐纳德·特朗普："authenticity" of，~的"真实性"，211；fake news media，虚假新闻媒体，211；government，distrust of，不信任政府，210；lies，use of，利用谎言，211；National Enquirer，association with，~与《国家询问报》的关系，211–

12；outsiders，局外人，210；persona of，~的形象，210；presentation，importance of，演示的重要性，211；propriety information，weaponization of，~将机密信息当作武器，210；racial discrimination，charges of，种族歧视指控，209；security state masculinity，安全国家男性气质，272注21；surveillance state masculinity，practitioner of，监视国家男性气质的实践者，210，220注8；tools of gossip，employment of，使用八卦工具，210–11

Trump，Fred，弗雷德·特朗普，209

Tucker，Ray，雷·塔克，64

21 Club，21俱乐部，67，209

Tydings，Millard E.，米勒德·泰丁斯，155–57，*157*，158–59，258注107

Tye，Larry，拉里·泰伊，86，239注30，241注64

unions，工会，205，242注74

United Auto Workers–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UAW-CIO)，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96

United Nations (UN)，联合国，126，154，169

United States，美国，1–2，5–7，10，14，32，47–48，70，74–76，124，129，131，136，138，141，148–49，153，155，160，162–63，167–69，183，190，202，204，206，220注9；“American century”，“美国世纪”，21；behaviors，changes in，~行为的变化，144；communism，susceptible to，易受共产主义影响，132；demographics，shift in，~人口结构的变化，25–26；as economic juggernaut，~作为经济巨头，26；as global power，~作为全球大国，50；industrial production，工业生产，8；moral decline，道德滑坡，132；population increase，人口增长，25；transformations in，~的转变，25–26；women in workforce，劳动力中的女性，98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美国新闻署，168–69

Universal Studios，环球影城，139，254注35

urbanization，城市化，11，26，36，42，49

Utley, Freda, 弗雷达·阿特利, 154

Valentino, Rudolph, 鲁道夫·瓦伦蒂诺, 120–21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 203
Vienna (Austria), 维也纳(奥地利), 168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138
Virginia, 弗吉尼亚州, 14
Vogeler, Robert, 罗伯特·沃格勒, 204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 167, 169
von Hoffman, Nicholas, 尼古拉斯·冯·霍夫曼, 245 注 1, 246 注 27, 248 注 41

Walner, Woody, 伍迪·瓦尔纳, 169
Walsh, Edmund, 埃德蒙·沃尔什, 133
Walters, Barbara, 芭芭拉·沃尔特斯, 127
Warner, Eric, 埃里克·华纳, 83–84
War of 1898, 美西战争, 220 注 8
War on Crime, 对犯罪宣战, 46, 53, 56, 61, 66, 74, 224–25 注 8
War on Crime (comic strip), 《对犯罪宣战》(连环画), 62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 73, 79, 176–77
Watergate scandal, 水门事件, 138, 250 注 84
Watkins, Arthur V., 亚瑟·维维安·沃特金斯, 146, 152, 183, 186, 189–91
Wayne, John, 约翰·韦恩, 10
Webster, Daniel, 丹尼尔·韦伯斯特, 27, 137
Welch, Joseph Nye, 约瑟夫·奈·韦尔奇, 2, 188, 192, 197, 268 注 150; "have you no decency" comment, "难道您不讲一点体面吗"评论, 3, 184, 193, 198, 269 注 166; pixie-fairy exchange, "精灵—仙子"对话, 194–95
Welles, Sumner, 萨姆纳·威尔斯, 56, 141, 254 注 39
West, James E., 詹姆斯·E. 威斯特, 28
West, Percy B., 珀西·B. 韦斯特, 181, 197–98, 269 注 166
West Allis (Wisconsin), 西阿利斯(威

斯康星州），96
West Germany，西德，104。也见 Germany，德国
Wexley，John，约翰·韦克斯利，124
Wherry，Kenneth，肯尼思·维利，149–50
Whisper (magazine)，《耳语》（杂志），143，252 注 15
White，William，威廉·怀特，155
white-collar men，白领男性，26，226 注 31；G-Men，（调查局）特工，51，56；and manhood，~ 和男子气概，53–54；and masculinity，~ 和男性气质，11，51，53，56，89，117；and neurasthenia，~ 和神经衰弱，228 注 71
Whitehurst，Charlote，夏洛特·怀特赫斯特，119，248 注 45
White-Slave Traffic Act，《白奴贩运法》，49，230 注 16。也见 Mann Act，《曼恩法》
Wickberg，Daniel，丹尼尔·维克伯格，222 注 30
Wiley，Alexander，亚历山大·威利，88
William R. Whitaker Company，Pixie camera，威廉姆·惠特克公司，“小精灵”相机，268–69 注 158
Wilson，Woodrow，伍德罗·威尔逊，14，24
Winchell，Walter，沃尔特·温切尔，6，56，66–67，120，122，136，138，147，162，170，198，249 注 56，269 注 168；Cohn，popularizing of，宣传科恩，121；newspaper industry，redrawing of gender boundaries，报业，重新划分性别边界，121
Wingo，Hal，哈尔·温戈，137
Wirth，Louis，路易斯·沃思，13
Wisconsin，威斯康星州，11，83，85–86，88–91，94，96–99，149，174–77
Wisconsin Federation of Young Republicans，威斯康星州青年共和党联盟，146–47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WCTU)，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29，35
women’s organizations，妇女组织，28–29；workplace experiences，工作场所的经验，243 注 88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战，3，8–9，11，49，50，73–74，98，120，220 注 9，257 注 89
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战，1–2，

10–12，15，46，72，76–77，85，95，118，128–29，133，141–42，144–45，162，206；machismo，societal emphasis on during，~期间社会强调的大男子主义，116

Wylie，Philip，菲利普·威利，114–15；and momism，~和妈咪主义，246–47 注 29

Yalta Conference，雅尔塔会议，122

Young Communist League (YCL)，共产主义青年团，123

Young Lords，青年基督会，205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基督教青年会，29，33，35，227 注 63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基督教女青年会，29

Ziegfeld Follies，《齐格菲歌舞团》，67

Zion，Sidney，西德尼·锡安，113，251 注 95

Zipp，Samuel，塞缪尔·齐普，244 注 105

Zolotow，Maurice，莫里斯·佐洛托，139